

刊 印 說 明

由于中国現代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現代史教学及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們准备編輯和翻印有关中国現代史的資料。由于人力、物力不足和資料缺乏，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錯誤，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和協助。

翻印的資料，除明显的錯誤加以改正外，一般均照原書翻印不加修改，閱時請注意。

本委員會系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俄語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五院校中国革命史教研組（室）組成。

办公地点設在北京西郊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

本書（“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翻印，得到人民日报社資料研究部的協助，謹此致謝。

中国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员会

1957 年 6 月

例 言

第一，時事問題的材料書太少又不普遍，敵后方及我后方之僻遠地方找不到報紙刊物，為抗戰干部們明了時事問題與研究時事問題之一大苦悶。本社特從這本“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起，用“綜合文摘”的辦法，編輯關於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的時事問題材料，名曰“時事問題叢編”，借供抗戰干部們的迫切需要。

第二，本書及以後本社所出各種“時事問題叢編”均是“綜合文摘”性質，除少數按語外，全部採摘國內外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報紙、刊物上的文字，借供讀者研究時事問題的參考之用。這是參考書，不是本社的主張，本社的編者，只在書內標題中及少數按語中表示自己的方向，祈讀者注意及之。

第三，按照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研究問題須先詳細佔有材料。本社從這本書起的各種“時事問題叢編”，因為交通限制，取材不夠說“詳細”，但把極力搜集的都編上去了，並費了頗大的心力。如讀者見有本社所沒有的材料，幸為惠寄延安本社，本社當以這類“綜合文摘”性的書奉寄，以為酬謝。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目 录

例 言	首 頁
第一編 兩年來日本的政治形勢	1—51
第一章 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性質	1
一 明治維新的不徹底	
二 重工業的落后	
三 工業集中的程度	
四 資本集中的程度	
五 國家資本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六 皇室與官僚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七 獨佔資本與封建地主的勾結	
八 軍需工業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九 農業發展的桎梏	
一〇 日本帝國主義的規定性——軍事封建性	
第二章 日本國內的基本矛盾——統治階級 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9
一 失業勞動者大增	
二 失業對策	
三 失業對策的失敗	
四 水深火熱中的農民 ——土地分配——地主的剝削——資本家的剝削	

——政府的剝削——高利貸的剝削——

五 人民大众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

——政治內層的两种傾向——無法鎮压的反战运动——日本共产党的反战綱領——

第三章 日本的統治階級——軍部、元老、重臣、官僚、財閥、政党、法西斯……20

一 軍部

——軍部的構成——軍部的特殊地位——軍部內的派別——

二 元老重臣

三 財閥

四 政党

五 法西斯的組織

——民政党——政友会——其他小党派

第四章 兩年以來日本統治階級的动态及其內部矛盾的發展 ……………30

一 从近衛內閣到平沼內閣

——近衛內閣的本質——內閣參議會之成立——大本营之成立——对华院之成立——宇垣辞职的政治背景——近衛內閣之改組——近衛內閣的倒台——平沼內閣的成立

二 統治階級內部的“抱合”与“失和”

——軍閥与財閥的抱合——电力統制案的爭执——总動員法案之糾紛——軍閥与財閥矛盾的

	激化——軍部与其他党派之冲突——对国际关系之意見冲突	
三	政民兩党的沒落和新党运动的抬头	
四	社大党的反动化	
第二編	侵略战争中日本的对华政策 ……………	52—94
第一章	蘆溝桥事变以前 ……………	52
一	田中奏摺	
二	天羽声明	
三	广田的三原則	
四	松室孝良的祕密情报	
第二章	蘆溝桥事变到南京佔領 ……………	54
一	广田的所謂“不扩大”主义	
二	杉山的战争演說	
三	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	
第三章	南京佔領到武汉佔領 ……………	56
一	日本政府十二月十一日的決議	
二	日本海軍司令長谷川十二月十七日的談話	
三	广田外相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談話劝中国投降	
四	日本政府一月十六日的宣言	
五	日本駐华大使川越茂一月二十日談話	
六	一月二十二日广田在議會宣佈德国調解的和平条件	
七	一月下旬时第七十三屆議會中的对华政策	
八	日本政府中的主和派	
九	主战派的对抗	

- 一〇 日本駐滬大使谷正之三月九日發表談話謂如能議和則耗費小而效力大
- 一一 五月二日近衛演說准备長期战争
- 一二 五月九日广田外相演說：鑒于国际环境恶劣主張慎重处理事变
- 一三 五月二十二日敌前綫指揮官發表談話謂佔領徐州后要繼續打到昆明
- 一四 五月宇垣初上台的發表
- 一五 宇垣外相的主和政策
- 一六 六月十七日永井遜位大臣發表謂必須打倒中国政府
- 一七 七月張姑峯事变时外傳日本提出和平的五条件
- 一八 七月坂垣發表：坚持一月十六日的方針，打倒中国政府的强硬論
- 一九 敌人策略的二重性——軟硬兼施
- 二〇 設立对华院总攬对华統治大权
- 二一 九月近衛准备改变策略以誘降为中心
- 二二 九月底軍部赶走宇垣
- 二三 十月上旬近衛还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話
- 二四 十月二十四日同盟社宣佈日本政府已决定新策略
- 二五 武汉佔領之日法西斯政党东方会尙唱蛮干論

第四章 武汉佔領到現在 70

- 一 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發表声明
- 二 美国通訊社亦傳日本曾向英国提出和平条件
- 三 日本策略轉变的步驟
- 四 畑俊六还在口出大言

- 五 东条的兩國作战計劃
- 六 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声明
- 七 馬場恆吾謂“东亚新秩序”不要明吹
- 八 木村謂乐观可为寒心
- 九 一个日本記者謂事变結束無期
- 一〇 松木慎一謂中国不可輕視
- 一一 馬場恆吾謂中国人民已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
- 一二 平沼一月二十日的上台演說
- 一三 有田一月二十一日的外交演說
- 一四 平沼与有田說了些什么？
- 一五 离間国共合作剽窃三民主义的大陰謀
- 一六 日本的积极誘降政策
- 一七 武汉佔領后敌人策略的重心放在誘降上
- 一八 敌人的新策略——政治与軍事、經濟与武力、东方与西方的有机配合
- 一九 远东慕尼黑的極大危險
- 二〇 喜多特务机关長的和平計劃
- 二一 日本七十四屆議會中所反映的对华政策
——策略已經轉變——以战为主到以和为主
——無意撤兵，三民主义是要利用的——縊鬼式的和平——杀人不見血的政策——
- 二二 四月十二日平沼演說表示日本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針是不变的
- 二三 四月十二日小磯謂解决中日問題將採最迅速有效办法

- 二四 五月六日有田謂日本与大陆同生死
- 二五 五月十日日本外务省發言人謂实行亞洲地域自治为上帝意志
- 二六 日本的大帝国夢想
- 二七 敌国“国民新聞”謂基本的侵略方針非貫激不可，否則有德俄革命危險
- 二八 一个英国記者謂日本决不能放下已經拿在手里的劍

第三編 侵略战中日本的軍事与战略 95—146

第一章 敌人的兵力..... 95

- 一 敌人究能出兵多少——九种不同的估計
- 二 敌軍的編制和裝备
 - 敌我武裝配备之比較——战时陸軍師的編制和裝备——
- 三 扩軍計劃
 - 一九三九年新海軍計劃——战时扩軍的数量和質量——
- 四 来华軍隊
 - 徐州会战前后調华軍隊表——武汉失陷后在华各戰場吸收敌人軍隊估計——
- 五 国内防民与滿州防苏之兵力
- 六 在华作战損失的估計
- 七 征兵对工業劳动力的影响
- 八 击破日本帝国主义的紙老虎

第二章 敌軍的内部矛盾 130

- 一 前綫少壯派与穩重派的冲突
- 二 各方面的傾軋
- 三 三派軍人侵略目标的分歧
- 四 軍隊中政治情緒的下降

第三章 侵略战争中敌人的战略……………133

- 一 武汉陷落前的幻夢
- 二 进攻华南的战略作用
- 三 所謂“坂垣停战綫”
- 四 日人大場弥平对于武汉、广州攻守战的評論
- 五 日軍攻势已鈍
- 六 日軍在中国戰場上的“瑟当”战略之历史根源——
一个苏联人的看法
- 七 日本侵华战略——一个美国人的看法

第四編 侵略战争中日本的財政經濟……………147——228

第一章 侵略战争中日本的財政狀況及財政政策……………147

- 一 三个年头的龐大預算
- 二 單就对华战費而論三年中就有一百二十万万
- 三 这样的龐大的預算支付势將括尽人民的膏血
- 四 是否可从对外借款找到解决財政困难的出路？不能
- 五 为应付財政困难首先不得不执行竭澤而漁的租稅政策
- 六 解决財政困难的主要方法不是依靠發行公債
- 七 但公債的消化已日見困难了

八 最后必然走到通貨膨脹的路上去

第二章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經濟狀況及經濟政策..... 163

一 資源貧乏的日本，重要資源均不能自給，这是日本長期戰爭的致命伤

二 日本政府三种解决原料飢荒的办法
——消耗的分配与統制政策——代用品的寻求
——向国外購買

三 但已开始遇到了抵制日貨运动勢將促进日本的崩潰

四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行經濟統制政策
——物資总动員計劃——物資总动員計劃的产生
——物資总动員計劃的內容——实施物資总动員計劃的办法——物資总动員計劃实行后的影响——

五 發生問題的总动員法第十一条它的問題在那里？
——第十一条的內容——实施第十一条將發生何種影响？——第十一条的內容——实施第十一条將發生何種影响？——軍閥財閥互相妥協以便共同向中国侵略——

六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日本的工商業狀況它究竟是怎样的
——軍需工業打倒和平工業——侵略戰爭又使日本在华財產大受損失——戰爭与工商業狀況之惡化引起人民生活的惡化——

七 我們再来看一看日本的对外貿易政策及对外貿易狀

况

——为了战争厉行貿易統制政策——但結果使輸出銳減入超激增——入超增加則国际收支必然惡化——日本政府乃改变办法实行所謂貿易联系制——貿易联系制的内容——但是这个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空隙——到底得一个悲慘的結果——

八 因为輸出不振外匯有崩潰之勢，外匯統制政策也將無济于事

——拚命維持匯价实行外匯的統制政策——但是不能增加輸出就决不能長久維持匯率——这就影响到国际賒貨的可能——沒有办法只好向中国找出路——無法增加輸出便是採取日元贬值政策也無用

九 現金是日本的求命王菩薩，但可惜牀头金尽壯士無顏

——日本原来存金究有多少？——結城的所謂“新金現送主义”——賀屋已用完了所謂“金資金”——現在則連正貨准备也用完了——無錢不能买貨外匯有崩潰之虞——兩種材料說明日本存金已尽——救济办法在于獎勵产金与搜括民間存金——

第三章 从財政經濟上看日本帝国主义崩潰的时间——几种不同的看法…………… 210

- 一 美人耿德謂日本暫時不至崩潰
- 二 一个英国記者也有同样的論調
- 三 汉奸刊物的“日本万年”論
- 四 日人藤原謂日本可打十年之久
- 五 时事日报謂去年已是日本的危机年
- 六 陈豹隱謂本年夏天敌人將陷入絕境
- 七 蕭学海謂本年是日本最后崩潰的时间

第四章 日本侵略战争的全国总动员218

- 一 日本国家总动员法案全文
- 二 企划院的組織內容

第五編 日本帝国主义的國際关系

及外交政策..... 229——263

第一章 日本对外政策的矛盾229

- 一 軍部与財閥对外交問題之爭執
- 二 海洋政策与大陆政策
- 三 欧美派与亲軍派
- 四 从广田到有田

第二章 日本与英美法..... 232

- 一 兴亞院的企圖
- 二 日本的南进政策与英美法
- 三 进攻华南与英美法
- 四 佔領海南島与英美法
- 五 日佔斯巴特萊島与英美法
- 六 英美在华利益之被損害

七	英美为什么不积极干涉日本	
八	日本对英美之准备	
九	日本对英的外交政策	
一〇	日本企图离间英美	
一一	英美的团结及其远东政策的积极化	
一二	日本认法国为英国的尾巴	
第三章	日本与德意	249
一	狼狽为奸	
二	日本为什么尚未参加三国军事同盟	
第四章	日本与苏联	254
一	日苏的根本矛盾	
二	日本企图缓和苏联	
三	渔业纠纷	
四	英美法苏在远东共同反日的可能	
五	苏联在远东坚持反对侵略政策	
六	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苏联一二年內不干涉中日战争	
七	一九三九年日本会挑起更大的張姑峯事件么?	
八	根据一九三九年新国防估计日苏战争爆发的时间	
第五章	侵华战争中日寇外交的总检讨	259
第六章	在未来世界大战时日本立场之估计	261
第六編	侵略战争中日本的指导人物	264—300

第一編 兩年來日本的政治形勢

第一章 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性質

一 明治維新的不徹底

“明治維新”后，宣佈了土地的私有權，買賣土地的自由，自由耕種任何作物和自由買賣農產品。但是所有這些措施，主要的是有利於地主和富農份子，對於廣大的農民大眾並沒有多大好處。

這樣做法，主要的是因為政府要調查田地征收田賦，所以頒佈土地私有權。許多侵入農村並非法掌有土地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如今可以公開的正式的確定他們所佔有之土地的私有權。另一方面，極多數的農民，他們原來在封建主的土地上耕種，他們已有永久租佃權，即是一代傳一代地耕種下去，他們已將自己耕種的土地視作已有，這時候他們得不着這些土地的所有權，而必須從地主封建主買這些土地，或者正確些說，把土地交給他們的主人。因為大多數農民是沒有錢來買這些他們和他們父親當作已有的土地的，而這些土地的一部份仍舊留在地主封建主手里，一部份被富農和各種投機者等於無代價的買去，而農民要種土地必須從新的所有主手里租佃田地了。結果，百分之七十的農民變成佃農或者是半佃農。

明治的土地改革，並未給與農民土地，恰恰相反，還把他們老早就認為是自己的而且實際上也掌握在手里的土地奪了去。“明治維新”並未解決日本的土地問題，而且直到現在也未得解

决，这問題等待着真正的土地革命来解决。这一情形决定了有名的“明治維新”的資產階級改革的未完成和不徹底。在这种“解决”土地問題的基础上，在日本建立了地主資產階級集团——剝削日本劳动大众的統一陣綫。（“日本論”哈耶瑪原著，張原譯，頁六二——六三）

二 重工業的落后

日本工業中的缺点是它的重工業的落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常常將这种落后性竭力解釋說是因为日本沒有丰富的原料，缺乏煤、石油、鉄矿等的緣故。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理由是不成立的。我們知道，除掉日本而外，不是有許多国家缺乏工業原料但也能發展他們的重工業的嗎？同时我們又知道，日本是很少棉花的，那末为什么沒有阻碍了他的紡織工業的極度發展呢？日本重工業落后的真正原因，是日本工業乃是在对农村半封建剝削的基础之上产生出来的。貧困飢餓的农村，归根結底，是不会有机械的一般重工業生产的要求的。日本重工業既不能为生产而生产，目前只得靠着政府軍事訂購而發展。

貧困的农民和工資低微的工人，連許多輕工業产品也無力購買。这就是意味着日本国内市場一般的縮小，同时这又推着日本工業不得不爭夺国外市場。日本在国外市場上和別的国家竞争，最有把握的是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紡織工業較之重工業所需資本很少，創辦又便当，而获利却丰厚，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能进厂做工，因此容易利用妇女和兒童的便宜劳动。最后，日本有了靠近的广大的市場，如中国和印度这两国众多的人口都是需要便宜的紡織品，这也大大的使日本紡織工業获得順利發展。結

果，日本变成一个輕工業特别是紡織工業的国家。这是日本工業在它的前此長时期發展的特征。……日本和别的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內，领导的工業部門是五金工業，机械制造工業，化学工業，採矿工業等。日本工業的弱点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整个兒正在輕工業發达和重工業的落后。（“日本論”頁一〇〇——一〇一）

三 工業集中的程度

根据最近發表的材料，在一九三二年，日本有五名以上工人的工場和作坊共計六七、三一八個，在这些工場中，有百分之八十六是仅有五名至三十名工人工作的小作坊，僱三十名到一百名工人的中等工場約佔百分之十，至于僱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工厂，仅佔百分之四；而最大的工厂，有五百名工人以上的，佔全日本工厂的百分之〇·六，有一千名工人以上的佔百分之〇·二，这些数字証明：日本工厂企業以五名工人以上的小工場为最多，这里我們还没有把一名至五名帶有家庭手工業性質的極小工場算在內哩。

我們看到，小工場佔極大多数，还不能作为我們判断日本工業集中的程度的全面根据。为了这，我們还得看一看究竟有多少工人在大、中、小企業中工作，和这些企業提供出怎样的生产的比例。如果我們看一看在大、中、小工厂做工的工人数目和这些大、中、小工厂的生产数量，那末我們得到如下的数字：在佔全部工厂百分之八十六的小工厂中，有佔全日本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工人，而这些工厂的生产佔全日本工厂生产百分之二三·二；佔全部工厂百分之十的中等工厂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而生产也佔百分之二十；佔全部工厂百分之四的大工厂，却包括百分之五十

的工人，生产佔百分之五六.六；至于有五百名以上的工人佔全部工厂百分之〇.六的最大工厂，包括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人，生产約佔日本全部工厂生产百分之三十。这就是說，虽然日本小工厂佔着龐大的数目，可是日本工業集中的程度已經是非常之高了。不过日本和其他工業国家相比，小工厂还演有巨大的作用。

在日本这种小的和極小的工厂，老是存在的原因，必須在这些工厂对工人極端殘酷剝削中去找。因为这种極端殘酷的剝削，使它有可能和大工業並存。至于大的独佔工業是不受这些小工厂絲毫妨碍的。因为它们使这些小工厂完全处于它們的經濟势力之下，而后，它們利用这些小工厂作为它們的从屬。（“日本論”頁一〇五——一〇六）

四 資本集中的程度

在日本，我們看到資本集中已达到世界上最發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發达的程度。……从下列材料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日本資本的高度集中和这种集中的更在往上增長。在一九一九年，即是在世界大战結束的时候，日本有二千以上的銀行；在一九二九年，即是在世界經濟恐慌之前，日本銀行只有一千多了；而到了一九三五年，已經減少到不够五百，不論是在資本或在存款方面，都是很大的。这种大銀行，都是屬於所謂銀行“五巨头”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和第一銀行。在这几家銀行內，集中着全日本銀行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指出超过工業集中的日本資本集中的程度是如何龐大。（“日本論”頁一二六——一二七）

五 国家資本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使日本資本加速集中的还有下面一个原因，即是直到現在，

掌有鐵路、大工厂（包括八幡五金工厂）的政府，在日本經濟中还演有巨大的作用。我們曉得，日本國家資本在日本工業和運輸中要佔全部資本四分之一以上。（“日本論”頁一二七——一二八）

六 皇室与官僚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日本皇室除掉佔有着巨大的土地和森林財產而外，还掌握着投在各大銀行和企業中的巨大資本。因此，日本天皇不但是大地主，而且是大資本家。不仅是皇室，而且一切國家官僚機構中，上从政府和樞密院官員，下至國會議員，都是掌握着工業和熱心靠剝削工人獲得利潤的。日本的獨佔資本，和小心謹慎保護它的利益的国家機構，有着密切的關係。这不仅表現在日本政府實行保護工業的政策上，而且也表現在國家以款子直接津貼和賄賂資本家等事實上。（“日本論”頁一二八）

七 獨佔資本与封建地主的勾結

並且日本獨佔資本和封建地主階級也有密切的勾結。因为一方面，資本家也在农村中掌有土地並且和地主一樣用半封建方法剝削佃农，而另一方面，地主將他用半封建方法，从农民身上剝削來積蓄的資本投在銀行和工業中。因此，日本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有了一個密切的共同性。日本常常更有一個人既是資本家又是地主，很難分出界限。研究他是先地主而后兼資本家，或是先資本家而后兼地主，這是不容易曉得的。（“日本論”頁一二八——一二九）

八 軍需工業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日本帝國主義是靠着軍事起家的；假如不是經過中日、日俄兩

次战争，日本资本主义决不会发展得那样快；假如不是经过世界大战，日本资本主义的集中和集积也决不会如此急速；可知军事力量，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极重大的作用。原来日本资本主义的脆弱的经济基础，不能不依靠军事的力量，而军事对外的“胜利”，又反复影响于日本的经济机构，使日本全国的产业以军需工业为中心而再编成、再扩大生产起来。这种倾向，到了最近，尤为明显。因为日本军阀的加紧备战，日本经济早已采取“战时编制”了。日本的军事工业资源本来是极端薄弱的，然而帝国主义者却不顾一切的牺牲，把生铁、钢铁拼命发展起来。

其他凡与军事有关的机械工业，造船业和化学工业等，都同样以强制的方法发展起来。自去年（一九三六）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军阀对政府的控制更加强化，对战争的准备更加疯狂，因而军事工业更有畸形的发育。一九三六年的钢铁生产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三倍，成为日本军事生产中心之一的电气事业的资本额，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倍之多。

自世界经济恐慌爆发以来，假如不是因为军事工业的膨胀，则日本必然成为恐慌最严重的一国；可无疑问。日本军阀在最近发行的“陆军军备的充实及其精神”小册子上也公开承认：“我们只要想到将陆军年年消费数万万元的军费即时停止，我国（日本）的经济将陷于怎样的命运时，就可以了解现在军事费怎样发挥生产的效果吧？”

由上面的种种事实，可以明白：在日本，军事的要素是佔何等重要的地位；若依列宁的话，军事的独佔，一部份已代替了现代最新的金融资本的独佔，一部份又补足了它。而这种军事独佔的基础，则显然是建筑在对勤劳大众半奴隶的剥削上面。（季凡夫

著“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頁八六——八九)

九 农业发展的桎梏

第一，日本的地主在与都市的资本家“和气霏然”地苟合以后，他们只知道拿从农村得来的钱，即用高利贷或高度地租向农民剥夺得来的钱，到都市里去做投机生意，去开工厂，而很少拿来用作改良农业之用。像日本那样充满火药气的社会里，地主或资本家与其拿钱投在农业中，不如投在军需工业或其他工商业里，其利润一定要来得雄厚些。第二，日本农村主要的生产是米、麦、茧等，这些东西是不需很大的耕地面积的，所以这也是不能促进日本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本五段（即五十亩）未满的小农经营是佔绝大多数，五町（一町等于中国一六·一四一五亩）以上是佔极少数；而且除在恐慌后几年间，五町以上的耕户略有增加外，其余二町级以上耕户反而逐年减少。由此可知在日本农业经营中，资本主义化的进展是非常迟缓的。在农村经济中，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既不发达，则原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被保留下来，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頁九〇——九二）

一〇 日本帝国主义的规定性——军事封建性

什么是半军事的帝国主义？这是说全国工业以军需工业为骨干而再编成、再扩大生产。这庞大的军需工业，无疑是为了补强这先天不足国家的药剂，而国内工人反遭受半奴隶的剥削。明治维新不是彻底的民主革命，而只是资本家和地主的苟合，所以国内还残留着半封建的榨取关系。半奴隶半封建的榨取网，就是半

軍事半封建帝国主义的写照。（“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頁八五——八六）

日本的半軍事性与半封建性不但是分不开，而且是互为影响的。因为軍事的向外“膨脹”，必然要对老百姓加强封建的剝削。而封建的剝削愈加强，农工的痛苦愈深，社会基础愈不稳固，則軍事向外“膨脹”就愈加要急进。这样循环往复，使得半奴隶半封建的榨取关系，不但沒有因資本主义的發展而消灭，而且愈加强化。日本工人工資的低下，固为世界任何資本主义国家所不及，日本农民生活的悲慘，也是世界上任何資本主义国家所沒有的。日本的佃农，平均要对地主納全部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这种高度的地租，只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可以媲美！这样的—个帝国主义，我們就叫它为半封建的帝国主义。（“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頁九二——九三）

日本經濟中独佔資本演着主要的作用和国家机构与金融寡头有着密切的联系，証明現代日本是資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是有其决定的、独特的特性的。在日本經濟中，特別在日本农業中，保持着封建的残余。这种封建残余，决定日本工業机构，决定国内市場的狭小，决定对工人阶级的殖民地的剝削，这是一。这种封建的残余，不仅仅在經濟上保持着，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人民意識中，都保持着，这是二。在日本，正如在当时的沙俄—样，独佔資本是被封建的前資本主义关系的密網交織着的，这是三。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特种的帝国主义，是一个軍事封建的帝国主义。一九一六年列宁写道：“在日本和俄国，軍事力量的独佔，广大的領土掠夺的便利和对外国人对中国等掠夺的特別便利，部份地滿足現代

最新的金融資本獨佔，部份地使后者有所變更。”

日本帝国主义的軍事封建性質，大大的使它内部所有的矛盾尖銳化。……日本帝国主义的軍事封建性質，还决定了它特別富于野蛮的对外侵略的性質。日本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極度尖銳化，深刻的半封建余孽，推着它不得不从对外佔領、对外国人民的殖民地的奴役、准备再分割世界的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中，来解决这些矛盾。为了要用血与鉄来解决它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就动员一切經濟資源，用尽一切力量加紧剝削日本工农和广大劳动大众，掠夺日本殖民地人民，廉价在世界市場上出賣日本工农劳动产物，以冀搜得資金准备大战，加紧政治恐怖，总之，是無所不为了。（“日本論”一二九——一三一頁）

第二章 日本国内的基本矛盾——統治階級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一 失業劳动者大增

侵华战争最重大的影响，是大量失業的造成。滿洲事变以来，軍需工業的扩充，的确吸收了不少的失業劳动者。到了七七战争發生以后，失業人数不过八万，而且軍需工業还痛感熟練劳工的缺乏，以致日当局要实施总动员法的第六条关于劳动者的規定，充实軍需工業劳动力的供給。可是这个物資总动员的实施，却不能避免的引起大量的失業。現在日本从事和平產業工厂的劳动者約有一百七十万人。据企划院的估計，因为和平工業的急激衰退，中小工商業和居間者的沒落，和平產業的工厂劳动者，約八十万人，商店員、汽車夫等約五十万，合計一百三十万人，会

加入失業之羣里。連他們的家族算起來，至少有四百万人生活受失業的影響而惡化。

二 失業對策

日本的工業、商業和交通業人口，不過一千二百万人左右，一百三十万人的失業，對於日本國民經濟影響的重大，可以想見。所以在这回的物資總動員計劃中，也有轉業失業的救濟一項。厚生省且設立“中央失業對策委員會”和在地方設立同樣機關，來處理失業。至於厚生省擬定的失業對策，不外以下幾項：

（一）由工廠主自動縮減勞動時間，或用其他方法，使失業均等化，減少失業。（二）軍需工業減低採用勞動者的銓衡條件，和採用兩次輪班制，便利和平產業工人的轉業。（三）由國營職業介紹所及公共團體，對失業工人作職業輔導，或施以技術訓練，幫助他們向軍需工廠轉業。（四）勸婦女歸農，填補農村勞動力的缺乏。

三 失業對策的失敗

這種對策，誠然說得很好聽，但實行起來，却有種種的困難，例如以轉業于軍需工業論，熟練的金屬工人、機器工人、汽車夫等，或青年的工人，還有希望；不熟練工人、老年工人和商店店員，便不易轉業。所以軍需工業所吸收的新失業工人，是有限的（日當局希望有六七十萬人）。皮革手工業者代表向當局表示，轉業殆不可能，而請求救濟。技術教育的設施，雖可以助進一部份青年工人的轉業，然也要費相當的時日。女工歸農，說來容易，但是，我們如果記起她們大部份是包身工，負有債務，則

不难断定她們的出路恐怕只有卖身做娼妓的一途。和平工業的中小工厂，如果改制軍需，这不独要失去独立性，也須要相当的資金来改換工厂的設備，商工省今年度（一九三八）預算內本有轉換補助費百六十萬元，但从五月至六月，請求此种補助金来組織工業組合，裝置适宜于軍需品制造的設備的組合，已有二百四十一个，所請求的補助費達一千一百余萬元，为原預算的十倍。……減少劳动時間，軍需工業採用輪班制等，必然使本来實質工資已日見低落的劳动者，受到名义工資也要減削之苦（四月份的實質工資比三月份低 1.2%）。大队失業軍的存在，加紧了劳动市場的竞争，工資当更減低。其次，中小工業为苟延殘喘，也不能不加紧榨取工人，加时減工的採用当在意想之中。（思慕：“日本物資总动员計劃及其影响”“世界知識”八卷三四合期，二十七年八月出版）

去年（一九三八）六月起，所謂“物資动员法”施行以来，中产与小本經營之商賈，以及工業界份子之失业者，迄去年十一月底止，共达八万八千人左右。……已停閉之平时工商業組合，失業僱員达二十八万六千人。……日本本部失業人数总额，据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一日統計，为三十七万五千人。……日本工資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起，增加 17.4%，而同时期物价又漲 22.5%，故实际工資只有下降也。（“日經濟益危殆、失業問題严重”，“大陆报”轉載在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导报”）

他們的生活負担，随着“軍事景气”的發达，在物价高漲下，已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他們还要負担膨脹軍費的攤派。反之，他們的收入却没有增加，他們的實質工資倒是減少了。日本工人在侵略战争之下所得到的，只是“为使人民生活适合战时的需

要”，而被驅出平时保护工人的法令的範圍之外。（宋斐如譯著“日本人民統一戰綫的發展”，頁八三，二十八年四月出版）

四 水深火热中的农民

土 地
分 配

日本有五百五十万农家从事农业經營。其中有一百五十万左右沒有一点土地，二百五十万以上有半公頃（合八·一六华亩）和不到半公頃的土地。这就是說，日本的五百五十万农民人家，有四百万，即是百分之七十五，有的完全沒有土地，有的虽有一点但如不添租土地耕种，則無以为生。另一方面，日本有五万佔有十公頃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和十一万佔有五公頃到十公頃土地的中小地主。这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地主們，他們手里握有日本全部耕地百分之四十。

日本耕地差不多一半，而且都是些肥沃的耕地，是握在地主們的手里。日本农民的階級分化大約是这样，三百五十万到三百八十万家是貧农，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家是中农，还有二十万家是富农。（“日本論”頁八三）。

地 主
的 剝
削

日本的租佃制度，帶着極端奴隶式的性質。佃农繳付地主或是富农的地租，要佔他們的收成一半以上。日本的地主或是富农，他們出租稻田，要以稻米做田租。

佃农耕种一公頃稻田，大約可收十八石至二十石米，可是一大半都要付給地主，日本农村中还保留这种自然物租的田租形式，不仅仅說明封建制度的殘余还保留在日本，而且說明日本地主剝削的厉害，因为地主們把大量的稻米集中在自己手里，

他們可以做市場上的壟斷者（市場上銷售的稻米有百分之四十二是地主的），而且可以在米價高漲的時候將它賣出。

資 本 家
的 剝 削

日本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民呻吟于半封建性的奴隸式租佃制度之下，這種半封建性的奴隸式租佃制度，就是現代日本農村中基本的剝削方式。但是，這是

基本的剝削方式，而不是唯一的剝削方式。日本農民不僅僅遭受地主的半封建剝削，而且遭受資本家、獨佔資本代表們的剝削。獨佔資本纏住整個日本經濟的各毛孔，當然農村也不會例外。日本的農民，不管是佃農或者是自耕農，他作為一個城市商品購買者或是農產品的出賣者，都是要受着日本資本家支配的。日本農民種一小塊土地，既無錢，又不會使用農業機器。但是為了收得一點糊口糧食，不得不靠着使用大量肥料。但是，肥料是在工廠主獨佔資本家的手裡。而他們却利用獨佔的地位，用極高的價格來剝削農民。因此，每一公頃要用一百元以上的肥料，即是說要佔全部生產費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也就是說要佔全部收穫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光景。

另一方面，日本農民出賣他們的勞動生產品如米、蠶繭、生絲等的時候，資本主義或公司的直接經理人——臺商以及各種顧客，都利用在農村市場中的獨佔地位，迫得日本農民不得不以極低的价格出賣他們的農產品。

日本農民基本羣眾的貧困，由於獨佔資本的奴役，是因為他們既吃米——農民經營的基本產物——價格低落的苦，又吃米價高漲的苦。日本常常，特別是在荒年，在年終的時候，因為藏米都吃完了，米價總是特別高漲起來。但是遭受損失的只是農民大

众，这是因为农民，除富农而外，常常是被迫在收获后立刻出卖他们的粮食，甚至为了要缴纳国税，偿还债务，付高利贷者的利息等，常常出卖青苗。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米价和一切农业生产产品的价格，都是很低很低。农民以低价出卖了他们的稻米，过了几个月，所余藏米吃完了的时候，又不得不在市场上依投机的高价买粮食吃。地主、富农和米商，算到农民缺米的时候，于是便在这几月间将米价提高到几倍。

政 府
的 剝 削

除掉地主和资本家而外，资产阶级地主的政府本身也剥削日本农民。日本农民，不断呻吟在国家赋税的重担之下。日本帝国主义每年军事预算不断的

增长，试问这些钱从那来的呢？主要的都是政府从构成全日本人口差不多一半的农民身上压榨出来的。乡村人口的赋税，要比城市居民高上三倍以至四倍。日本农民每年所付的所得税，和与农民收入相同的小商人及手工业者相比，要高上三倍有余，现今在日本特别是在农村，苛捐杂税的重担，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即是连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再不能多向农村人口征收赋税了。

高 利 貸
的 剝 削

日本农民除掉耕种土地而外，还从事养蚕、煮茧、抽丝各种家庭工业，各种手工副业。日本农民如果不干这些副业，就不能生活。但是，即使日本农民

有了这些补助工作，为了养家活口，还必须向高利贷者借债。

高利贷者在日本农村中非常之多，这又是一种日本农民身上的寄生虫。如果说，小康的农户和一部份中农自耕农能够以田产抵押从银行中借一些利息比较正常一点的款子，那末，对于日本

基本农民羣众——佃农和半佃农——是沒有可能的，因为沒有田产抵押，銀行是不借錢給他們的。因此，他們不得不求之于高利貸者，不得不付他們強盜式的利息。农民們被迫付高利貸者很多利息，甚至佔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恐慌前日本农民的負債，根据日本經濟学家計算約有五万万元。如今他們的負債已經到八万万元以上，而有些經濟学者甚至說有十万万元了。……不仅最穷的佃农和半佃农，就是中农，他們的債務，平均起来要超过他們全部动产和不动产的价格。最悲慘的是，农民借了債不但沒有扩大生产，而且不得不減低消費。日本农民想除去这个高利貸的束縛的机会，一年年的少了，無怪乎日本农村中流行着这么一句話：“逃不出債獄”。日本有一个报纸也这样写道：“日本的农民为債耕种，为債工作，为債生活。”

由此看来，如果我們把封建地主的奴隶式的剝削，独佔資本的掠夺，国稅的担負，高利貸的奴役，和农业恐慌的打击，合到一起，我們不能不得出这一結論：日本农民担不起这样的重压。

（以上均見“日本論”頁八五——九〇）

战争更使农民陷入地獄，农民所担負的高額租稅，只有因为战争而加重。他們的高率佃租。依然是無界無比的高，並不因战争而降低絲毫。他們終年終岁在卖出买入的过程上所受中間商業資本的剝削，反因战争而增高其剝削程度。（“日本人民統一战线的發展”頁八四）

农村的农民一批一批的被征入营，稍經集訓，又是一批一批的开赴戰場。农村人口于是一天一天的減少，食料以及其他軍需农产物，也就一天一天的缺乏。食料問題，遂变成了日本的致命伤。（李支：“半月文摘”二卷一期，二十七年二月出版）

瑞士籍的凱勒教授(Prof. Keller), 在他的“日本旅行記”中, 記載一个农家有十口人, 每年仅有一五〇元的进款, 当冬天剛到来时, 他們已經不得不仰仗草根树皮为食了。(陈豹隱等著, “經濟恐慌下的日本”頁一五四)

日本第二年战費, 已必須佔全国国民經濟收入百分之六十, 榨取人民生活費至百分之六十二, 按帝俄在欧战末年, 战費膨脹, 榨取人民生活費至百分之六十, 終不能支持而崩潰。中欧同盟国方面, 在欧战第四年, 战費龐大, 榨取人民生活費至百分之五十四·七, 亦皆不能支持而紛紛瓦解。(刘仰之著“徬徨沒落中之日本”頁一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出版)

五 人民的大众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

政	治	內
層	的	兩
种	傾	向

(一) 上層政党、軍閥、官僚、財閥的团结, 支持战争运动——国民陣綫; (二) 前进自由主义教授、作家、左傾学生, 以及無产党革命团体等, 共

同联合的反战陣綫——人民陣綫。至于可左可右, 可支持战争亦可反对战争的中間物——由法西斯与社会改良主义者合組的社会大众党, 在这旗帜分明、陣綫不能混淆的过程中, 它的去路只有一条——分化与沒落。(王紀元著“一年来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斗”, “世界知識”八卷一期, 二十七年七月出版)

日本人民陣綫組織的形态, 大概如下:

第一, 主体势力;

一, 社大党及其领导的劳农組合 (編者按: 社大党上層現在已反动化, 內部也發生了分化, 詳見后);

二，勞农無产協議会及其領導的勞农組合；

三，其他無产团体。

第二，資產階級的进步党——分化政友、民政兩党的内部，另外成立較新的自由主义政党；

第三，其他——学术团体、文学团体、和平主义团体等。

他們的中心斗争綱領是：“軍事預算的削減”，“反对战争政策”，“即時停止对中国民众的战争”，“即時締結对苏不侵犯条約”，“全国劳动者起来作反对大众課稅的斗争”，“电灯費之減少，工資之增加”，“劳动時間的縮短”。（王紀元著“日本政治研究”頁一〇五）

关于反法西斯活动的呼声，已在好几次的国家农民协会，和其他农民組織的會議中議決。如宮城的农民协会大会所議決的，是要求消灭屬於法西斯組織的党团，和工农联合，以組織人民陣綫党。更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些农民协会所議決的，主張階級斗争。在上述宮城农民协会所議決的，里面有一段話：“欲使我們脱离貧苦的境地，是須要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奋斗以獲得工农大联合陣綫。”（吳浩宇編“危机四伏的日本”頁七六）

总动员法案实施后，失業者加至一百五十万人，半失業者三百万人。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罢工案件共五九三起，参加罢工者三万五千人。农民与地主冲突，此半年中共計二九九九起。因耕具肥料等之缺乏，今年稻米收成較去年少四、七三五、〇〇〇担（二十七年，十二月七日，“新华日报”）

由去年（一九三八）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日本的罢工怠業事件：

去 年	勞資糾紛總數	罷工怠業案件數	罷工怠業所佔%比	本 年	勞資糾紛總數	罷工怠業案件數	罷工怠業所佔%比
七 月	166	56	34	一 月	88	20	23
八 月	137	38	28	二 月	90	27	30
九 月	104	19	18	三 月	111	31	28
十 月	76	14	18	四 月	122	38	31
十一月	65	15	23	五 月	177	26	22
十二月	55	5	9	六 月	65	17	26
合 計	602	147	114	合 計	593	159	117

(“翻譯与評論”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頁三二)

無 法 鎮
壓 的 反
戰 運 動

以劳动大众与左傾作家、教授、青年、知識份子作領導的反战运动，自蘆溝桥事变以后，更活躍起来。他們深入每一个角落，去进行反軍閥、反法西斯、反战争

的工作。如拥有會員八百万人的日本学生联合会，曾推代表向东京政府請願，如前綫上士兵之厭战怠工，甚至自杀的事实，即是好例。为了要使侵华战争能兇殘进行，对于反战运动，自非加以鎮压不可。近衛之借重“猛烈的法西斯”末次大將做內相，这就是原因之一。他上任不到几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即發動全国警察进行檢举被捕的有一千三百余人。以后接二連三，因散佈“惡意謠言”的嫌疑而被捕的不可胜数。全国左翼各党，不但日本共产党積極从事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进攻中国而受到極端的摧殘与压迫，就是“日本劳农党”，“日本無产党”，“全日本工农联合会”，亦均被取締解散。日本的反战运动，不但不因此而停滯，反而日益深入与扩大。在前綫上，反战的傳單，如雪片一般的散發，以間諜或違反軍紀的罪名而被杀的日本將士，各战区

皆有。最近（指一九三八年底）汉口北尾屬下的一部份士兵，被敌宪兵解除武装。海空军中水上飞机母艦“能登呂”的飞行將校，有激烈的反战論爭，甚至拒絕轟炸的命令。在国内，关东一帶的农民，为反对汽油代用品原料的甘薯之栽培，而呈現不穩，几有搗毀軍部的御用机关的农会之勢。去年（一九三八）上半年罢工案件，共五百九十三起，参加者三万五千余人。去年一月至十一月間，日本国内反战反法西斯份子之被捕入獄者达一万三千人左右。同时，末次的“猛烈性”不但遇事把持，使近衛成为“阿斗”，而且引起法西斯軍人的跋扈，造成去年二月十七日所謂“防共护国团”四百人突然在政友、民政兩党本部示威，並一度佔据該部的事件。（許滌新：“近衛內閣的总结”，見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新华日报”）

日本共产党的
反战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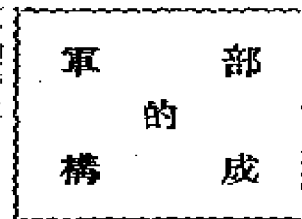
（一）立即停止和中國战争，我們为着偉大的中国国民之独立而做共同盟者，努力反对战争；（二）要求削減軍事預算，並將該經費改为农民、失业者、中小工商業者的救济費；（三）为着获得民主主义的权利，为着拥护民权，为着获得結社、言論、集会及出版之自由，而努力与法西斯軍閥斗争；（四）努力發动撤廢强制劳动並临时僱佣制度，廢止农民的榨取，改善农民劳动者及其他劳动階級的劳动条件等的斗争。（潘冲洲編“日本人民反战的怒吼”，頁一）

日本反战争的工农大众，还没有形成一个坚实的人民陣綫，执行其反官僚、資本、法西斯的使命。日本工农大众統一陣綫的要求，在軍事法西斯政府的戒严令之前，还只是一种潛伏的意志。感覺銳敏的社会运动指导者，几乎被日本政府一網打尽了，

日本人民陣綫的發動更喪失了車頭。（“日本人民統一戰綫的發展”，頁八五）

第三章 日本的統治階級——軍部、元老、重臣、官僚、財閥、政黨、法西斯

一 軍 部



在陸海兩省上面的軍事機關，是“元帥府”和“軍事參議院”。

“元帥府”為軍事上最高顧問機關，輔翼天皇，貢獻關於軍事方面的意見。

由海陸軍大將中有“老功卓拔”者選任之。中選的海陸軍大將，稱為元帥，天皇特賜元帥佩刀和元帥徽章，系日本武人最榮耀的職務。……明治三十一年設立元帥府。

到明治三十六年，又頒佈“軍事參議院”的條例。它是通常重要軍務諮詢奉答的機關。依條例，它的任務是：“在帷幄之下，應重要軍務的諮詢，應諮詢而開參議會，將意見上奏。”列于該院的人，除元帥外，另有海陸軍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長及特任軍事參議官。會議時，以年齡最高者為參議院議長。在宮中開會時，天皇親臨議席。

海軍省內，設“軍令部”，它是海軍方面掌管國防和用兵的機關，總長直轄于天皇。它的任務，除參贊帷幄機密之外，另掌國防用兵的計劃，以及傳達用兵之事。

另有“參謀本部”，它是陸軍方面掌管國防及用兵的機關。參謀總長，由陸軍大將和中將任命，直蒙天皇，參贊帷幄軍事，掌

国防及用兵之一切事宜。陸軍大學及陸軍地測量部，都屬參謀總長指揮。

上述各機關，合稱為“軍部”。（家禾：“日本軍部、政黨與財閥”，頁一八三——一八五）

軍 部 的
特
殊 地 位

所謂二重內閣，其理由就在這裡。內閣總理大臣統轄以外，軍部在內閣里保有獨立性。軍部大臣可以不經過總理大臣直接留任，直接上奏。總理大臣可以統一各部，惟不能統一軍部。所以，軍部有很多的內情，總理大臣不能過問，其實也不敢過問。

近年來軍部的勢力因法西斯勢力的增長越發擴大起來了。“軍部內閣”這一名詞已成為司空見慣的口頭語。軍部大臣不僅不受內閣總理的支配，相反的，它會支配整個的內閣。滿洲事變以後的日本內閣如果不得軍部大臣的同意，是不會成立的，二重內閣漸漸變成軍部內閣了。

日本所得的屬地如朝鮮、台灣和東北几省，完全受軍人管理。他們是最高權威；他們所管的區域比較日本本部的面積要大得多。明治以來由於軍部大臣反對內閣因而崩潰的例子，已屢見不鮮。

軍部之所以能這樣橫行無阻，是有它的根據的。憲法第十一條就說：“天皇統率海陸軍”；第十二條又說：“天皇決定海陸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故軍事支配權實際是在輔助天皇的“參謀本部”和“軍令部”。至於議會政黨影響下的軍部大臣，要是向內閣負責，自然不免受到軍部的白眼與反對。結局，軍部大臣只有軍部的代表才行得通。（柳仁：“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頁一二

軍 部 內
的 派 別

就政治的立場來講吧，陸軍和海軍就有些不同，各軍中的大部份首腦份子與少數的首腦份子，和中堅幹部及下級幹部，也有些不同。陸軍偏重鼓吹大陸政策（侵華）、北進政策（反蘇），而海軍則偏重鼓吹南進政策，積極經營南洋羣島及澳洲。鼓吹北進的，當然主張以強化陸軍及其附屬的空軍，為國防擴充的着眼點。鼓吹南進的，當然以強化海軍及其附屬的空軍，為國防擴充的第一義。

其次，在政治意識上，一般的說來，陸軍偏重急進，而海軍則偏重保守。這從歷史上的沿襲看來，也很明白，歷屆干與政治，和政黨處於對立地位的，總是陸軍省佔主要地位。（“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二八——一二九）

陸軍省大致分為以下三派：

荒木派——即所謂真崎荒木系，是軍部的急進派，又稱“少壯派”。這一派根據少壯派的主張，再滲進陸軍中堅層的意見，而成為陸軍軍部的主張。換句話說，他們就是代表軍部的立場的。

宇垣派——又稱為穩重派。這一派的份子非常複雜，滿洲事變後，以青年激進氣焰的影響，內部分化為“統治派”與“中立派”，“二·二六”事變後，統治派失勢，另形成一個“肅軍系”，不過肅軍這一名詞近來也漸漸生疏，它是和中立派並稱為穩重的軍人系統。

中立派這是對着急進派與穩重派而說，以林銑十郎為主。不過這派的中立態度始終不能介在兩者中間而獨立，故至今已在無

形中消失。

“五·一五”事件以前，在日本还听到“打破現狀派”与“維持現狀派”的名詞。这就是荒木派与宇垣派的別称。

这里不能不附帶說一句关于日本在乡軍人的組織。他們虽不能公然独树一帜，但是他們在軍部里的势力是不能否認的。日本少壯軍人也都借他們的力量做后盾。这羣人的中心人物，首推“明倫会”的田中国重大將，“皇道会”的力森藏一中將、大井成元大將、兩角三郎等。（“日本軍部与法西斯蒂”，頁二二——二五）

二 元老重臣

元老在政治上本操有把握时局关键的大权。但是在目前，事实上，西园寺公沒有权宜应变之权，一切須視下層各派的意見如何而决定。自二·二六事变（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少壯派暴动打击元老重臣）以后，更噤若寒蟬了。所以輿論界称西园寺为聪明的机会主义者。（“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二二）

重臣層的政治意識，一般說来，是保守性特別濃厚。他們反对軍部干政，反对政治的东更西張，反对国防預算的無限扩大，甚至反对日本过份向海外侵略，而是抱着保守的“忠君尽节，与世無爭，天下太平”的政治意見的。他們也不鼓吹極端的自由主义，更不贊成法西斯主义。因此，軍部目为腐朽的障碍物，非扫除不可。（同上，頁一二四）

老官僚也者，是無政治团体結合的、資格較老的、而無固定政治主見、目的只在做官的一羣。新官僚的政治立場，是贊同軍部的“革新”政策，反对政党政治。因此，在目前，他們与軍部勾結的关系，頗为密切。（同上頁，一二五）

三 財 閥

第一，政友系財閥——三井財閥	{	安田財閥	商船財閥	藤井財閥
		住友財閥	片倉財閥	久原財閥
		川崎財閥	吉河財閥	藤山財閥
		大倉財閥	福澤財閥	大橋財閥
		野村財閥	淺野財閥	澀澤財閥
第二，民政系財閥——三菱財閥	{	根津財閥	山口財閥	片岡財閥
		原財閥	服部財閥	伊藤財閥

就財閥的勢力而論，政友系的力量遠較民政系為雄。合計起來，民政系財閥的勢力，尚不及政友系的三分之一。即以三井、三菱兩主體財閥自身比較而論，三井財閥有金融資本二、五二七、百萬元，而三菱財閥僅有二、〇〇九百萬元。三井財閥有工業資本計八十一社，共一、二二三、五〇二、〇〇〇元，而三菱財閥僅有五十二社，共七八一、一七七、〇〇〇元。不過三菱財閥比三井財閥來得集中。三井財閥中的安田與住友，因金融投資發展的結果，差不多快與三井完全脫離關係，而另成一勢力；與政友會的關係亦較為淡薄。

自滿洲事變後，財閥的陣營中，有了顯著的變化。第一，就是財閥陣營中分裂為好戰財閥與反戰財閥（編者按：不是好戰與反戰之分，而是比較急進與比較緩進之分）。前者主要的包含以軍需工業（軍需工業的基本部門有五種，即造船業、礦業、化學工業、鋼鐵業、機械工業）起家的如久原、淺野、澀澤、大倉等。後者則主要的包含以金融資本、輕工業、貿易起家的財閥。因此，反映於產業界的，也有“革新”的意見與“保守”的意見。第二，在金融資本的陣容中，眼光比較看得遠的金融家，也開始探

机地转变，顺应法西斯潮流，开始与军部急进派份子暗渡陈仓。因此，革新派的金融家，和革新派的军需工业家，就合成一起，而产生一新的力量。（“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一〇）

除了农业、小本商业及家庭工业之外，私人工商业，大部份都在四巨头手中。三井与住友已有数百年历史。三菱与安田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始勃然兴起。最近三十年来，崛起了一些新兴团体，以与这四系对立，不过他们合起来的金融势力还不及三井一家大。（“文摘”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

鮎川，他的股票公开政策，他应付外国洋行的成功，及他的商业冒险心，联合起来，使他成为军部的宠人。军部支配的“满洲国”的树立，更使流星一般的鮎川，一躍而立于人前。几乎操縱着满洲、华北及朝鲜一部份的所有铁道之南满铁路公司（满铁株式会社）在纯粹运输活动之外，又曾经开採满洲的大部份金、铁和煤矿；並且经营瓦斯、电气、自来水、船塢、工程、旅馆与报社种种事业。当局因为不满于这种壟断行为，極欲迅速开发伪国，遂将满洲採矿、煤铁生产，与工程，以及满铁的許多工业权益，一齐交给鮎川办理，不过保持了一半股本。（同上）

四 政 党

民
政
党

民政党从历史上講来，党员官僚的倾向，特别来得濃厚，故又名官僚党。以前民政党的指导者如若槻、井上、江木三巨头，都是贵族院的議員，党外的顧問如伊澤、幣原等，亦同样的是著名的官僚。官僚与專制主义的三菱財閥配合起来，真是最适当不过的。此外，再加上少数自

由主义的份子，而構成民政黨。

所以，民政黨的內部構成，一向分成三個系統：（一）桂（太郎）系，富有官僚主義傾向；（二）國民黨系，富有自由主義傾向；（三）岩崎系（三菱財閥主人），三菱金融資本家的代表。其理想的政綱是偏重保守的，和平的，財政經濟上採用緊縮政策的。民政黨過去曾反對過出兵西伯利亞，出兵濟南，反對軍部的冒險政策。

可是，自從昭和六年總裁井上准之助被刺以來，內部就開始露出分崩離析的現象。井上一死，政府中財政之支柱失掉了。不久，安達又脫離民政黨而另組成國民同盟。中野政剛，則脫離民政黨而另組東方會。

在目前，民政黨內部，雖比政友會來得團結些，但是依然是各懷所信的。最明顯的劃分便是總裁派與非總裁派。前者以町田為首，以永井、櫻內、賴母木、大藤為支柱。而後者即以富田幸次郎為主体，仍想擁宇垣出馬，實現政黨之大同團結的方針。

不過，總裁派干部的永井，近來與軍部的關係，一点点親密起來，而脫黨之心搖搖，不過“待價而沽”罷了。（“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二二——一二四）



近年來政友會黨內的形勢，更是一團糟。一般說來，內部派系大概可以分為：（一）鈴木、鳩山派，一名總裁派，以辭職未久的鈴木總裁及筆頭總務鳩山一郎為領袖。其部下主將有濱田國松（在七十屆議會中向軍部大施抨擊的七十歲老將）、安藤純正（現政友會幹事長）、松鶴野平等。（二）舊政友系，即政友會的長老派，以望月、永

野、秋田清等为中心。(三)床次派，以床次竹二郎为领袖，主要份子有山崎达之辅（现农相）、瀧正雄、东乡实、津奇尚武等。(四)久原派，以久原房之助为领导人物，以津云国利、藤井达也等少壮派份子为中心。

自从一九三五年十月议会总选举以后，内部更形分解。政友会内部的小组织，复杂异常，有革新派（一名铁道旅馆组）、鳩山派、前田派、知久平系、国政一新会（知久平之别动队）、松野派、五人组、久原系、新党组、总裁亲兵组、旧一一会等。在这许多组织里面，可以分成三个系统，即：（甲）革新派。以政友会组织机构之刷新，反对鳩山之独裁，发挥地方党员之政治意见，为革新运动的指标。这一派的先锋为西岡、生田、肥田、三人、此外，再加上加藤（久米）、河上、田边（熊）、熊谷、岩崎、西村、山崎（猛）、門田、志賀、高桥（熊）、岡田（伊）、清瀬、川口、八田、山口等议员，在党中都是居于中下级干部的新进人物；他们的口号是：“从速再检讨党的组织，扩充并强化政友会立党时的精神。”他们的运动事务所是铁道旅馆，他们策动党外的顾问，联合党内一切不满现状的份子，迫铃木总裁辞职。（乙）鳩山派，一名“现状维持派”。主张在“保持现状”原则之下，把党的内部略加刷新，如铃木总裁之必须拥护，自由主义的宪政常道之必须恢复，军部干政之抵死排斥等。其主干人物，前面已说过，除铃木鳩山等外，为濱田国松等。这一派是政友会中的上层干部派，在政友会历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丙）中島知久平派。这一派与松野派、前田系、久原系取密切的联络，推中島繼任政友会总裁，而以反对“自由主义的现状维持派”（即鳩山派）为中心。久原系的久原房之助，因有资助军人叛乱的嫌疑

疑（按指二·二六事件），被捕后釋放未久，所以，不便乘机公开从事活动，而知久平因为是以開設航空飞机厂發財的，与久原真是無独有偶的人物。一九三七年春，濱田国松在議會席上对軍部大施抨击，当时政友会內反对濱田国松的演說的就是这一派的人物。

鈴木總裁辭職后，这三派的暗斗日益剧烈，而中島知久平系，頗有脫离政友会，別树旗帜，另与其他各党以及軍部方面的法西斯份子合組新党之势。（“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一五——一一八）

其	他
小	
党	派

資產階級的政党，除了民、政兩大党而外，还有国民同盟、昭和会，东方会三者。国民同盟原是从民政党内分化出来的，没有什么財閥的背景，而是清一色的官僚投机主义，現任總裁安达，是具有淡薄的法西斯色彩的。可是，官僚始終不失为官僚的本質，他善于順風轉舵，一九三六年末各政党联合反攻軍部的时候，安达也曾对外交失敗，預算膨脹而攻击过軍部的。

昭和会主要的是政友会的長老系人物組織的，党魁为望月圭介，与元老重臣有密切的关系，任何人出来組閣，只要不十分使昭和会难堪，它总是取贊助态度的。可以說，这是“若有若無”的老官僚集团。

东方会的主腦中野正剛，在民政党内与安达原是共一派的，即是所謂安达、中野派。后来安达脫离民政而另組国民同盟，中野亦脫离民政而暫抱中立，不久即倡議組东方会，具有比国民同盟更进一層的法西斯色彩。（“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一八——

五 法西斯組織

日本法西斯派系的現狀：（一）國粹主義派，以頭山滿所領導的玄洋社為主腦。其所屬的團體，有黑龍會、大日本生產黨、國粹會、滿蒙義團、大和民勞會、大正赤心團等。偏向鼓吹國粹主義。主要的構成份子，包含浪人階級、俠客、義士等，富有武士道精神。前首相廣田弘毅，與玄洋社關係頗密切。（二）國社主義派。以高島素之等的老壯會起始，加上大化會、建國會、神武會、行地社、祖國同志會、國民青年同盟、日本國家社會黨、士林庄、七生社、愛國無產同盟、大日本主義同盟、大日本青年同盟、愛國勤勞黨、愛國無產青年同盟、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全日本學生協議會、金鷄學院、大統社、大眾社、日本法西斯聯盟等。中心理論鼓吹國家社會主義，同時，揭起“一君萬民”、“君民一如”、“君民共治”、“皇道”等口號。構成份子，包含從無產陣營投降過來的知識份子、少數勞動者等。（三）皇道主義派。以明倫會為首要。此外，包含恢弘社、大日本國輝會、皇道義會、大日本護國會、大日本殉國會、勤王聯盟、全日本皇國同志會、櫻會、小櫻會、大日本奉公團、國風會等（平沼騏一郎、荒木貞夫所組織的國本社，原為這一派的領導者，自平沼就任樞密院議長，荒木辭陸相後，即宣告解散）。這派的構成份子以軍人為最多，此外，包含多數金融家（現日本銀行總裁池田成彬，與皇道主義派關係極密切，原為國本社理事）、政治家、教育家。這一派中的櫻會、小櫻會二者，系完全由陸軍青年將佐所組織，櫻會由陸軍佐官階層人員組成，小櫻會則由尉官階層人員

組成。陸軍軍部所倡議的政治改革論，都是這一派人的政治意識的反映。因為它有槍桿實力為後盾，所以在目前右翼陣營中，處處居于主體的領導地位。而且，他們和其他各派，也有橫的聯絡。（四）農本主義派。這一派包含權藤成卿的自治學舍及血盟團、愛鄉塾、自治農民協會等團體。其組織以封建的地主、農民為主體，勢力薄弱，在法西陣營不佔重要地位。（五）社會民主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轉向派。這一派包含日本村治派同盟、國民解放社、國民鬥爭同盟、日本國家社會黨等。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一部份人轉向法西斯後所組成的，沒有什麼羣眾，以知識份子為主體，因非法西主義的正統，自然勢力更為薄弱了。（“日本政治研究”，頁九三）

第四章 兩年以來日本統治階級的動態及其內部矛盾的發展

一 從近衛內閣到平沼內閣

近衛內閣
的本質

近衛內閣的使命，在於完成軍部財閥的“抱合”，調和因林內閣解散國會而起的軍部與政黨間的矛盾，和繼續實現自上層變革的合法的法西斯主義的要求。……雖說是站在軍部、財閥、政黨、官僚的平衡之上，事實上卻沒有深厚的基礎，逃不出軍部的掌心。……

可是，近衛內閣的混合性質，雖造成“舉國一致”的外貌，同時也就是它的弱點所在。內閣內部的矛盾，各派系間常引起磨擦。（思慕：“近衛內閣到何處去？”，“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

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內閣參
議會
之成立

蘆變后，战事的發展，这是日本資本家羣所不及料的，也是近衛本身以及元老、重臣、官僚、政党層所不及料的。战争好比一条頑劣無比的劣馬，一

爆發必然形成不可收拾的狀態。……于是就大喊充實內閣本体，加強战時機構的實質，等等，就跟着來了。（“一年來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十月末，決定于閣內添設“內閣參議會”，由政府網羅海、陸、政、財、外交及其他方面最有力之人物，參與內閣機宜，審議重要國策，並由日皇予以親任待遇。內閣參議的名字：

宇垣一成（政界惑星，穩重派軍人之元老）

荒木貞夫（陸軍少壯派領袖）

末次正信（海軍少壯派領袖）

安保大將（海軍現狀維持派代表）

町田（民政黨總裁）

前田米藏（政友會）

乡城之助（農產界現狀維持派巨頭）

池田成彬（金融界革新派巨頭）

松崗洋右（大陸急進派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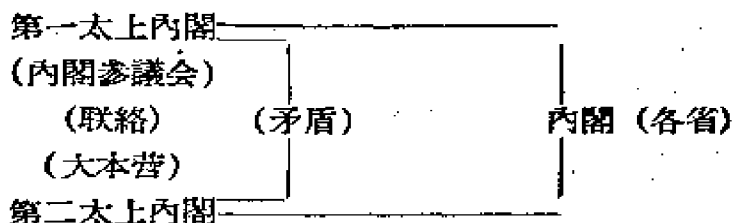
內閣參議會的性質：（一）這一“太上內閣”的共同目標，是支持對華戰爭，但對於內政的一切設施，却各有獨特的主張，未能融洽一體；（二）這一“太上內閣”，僅為重要政策的決定機關，而不是直接執行機關，政治效率上自然差得很遠；（三）這一“太上內閣”，與發號施令的軍部尚沒有直接的關係。

大本營
之成立

日本战时大本营，于十一月（一九三七）十八日正式成立的，以日皇为最高统帅。参与大本营的有多田陆军，岛田海军两次长，町尻陆军，井上海军两

军务局长；内閣方面则由近衛首相、風見書記長、杉山陆相、米内海相四人代表内閣参与大本营会议。在大本营成立前夕，日华论者认为大本营是战时内閣。后经大本营海陆军当局声明，认为大本营仅系一单纯指挥作战的统帅机关，与行政方面完全分离。但事实上，大本营的权力，有直接压迫、指挥近衛内閣之实权。

大本营成立后（次期），近衛内閣之实体是：



一个国家而有三个事实的内閣，而这三个内閣中，又各表现着不同的政治意见。（“一年来日本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对华院
之成立

五月，宇垣、坂垣上台，为着内部的整理，及对英交涉，暂时不提起该

案。至九月上旬，坂垣陆相又提出“对华院”的理由書，并要求近衛首相从速召集閣議，决定此事。近衛首相乃从其議。坂垣陆相所提出的“对华院大綱”，要点有七：（一）掌管树立对华政策所关之各种事务；（二）与中国新政权有关之政治、經濟、文化各种問題，要实行内部合作所关之各种事务；（三）关于中国之政治、經濟

及文化各種問題的調查與計劃，並在其實施上有關之事務。但對華事務中純屬外交者除外；（四）在華公司之監督及統治所關之事務；（五）保持各廳對華行政之統一所關之事務；（六）設“對華政策聯絡委員會”與五相會議採取聯絡；（七）設“對華申議會”，網羅各官廳之關係官吏及民間有學識經驗者為委員。

宇垣外相的反对理由——此案提出五相會議后，宇垣外相極力反对，提出修改案三次，結果不能妥協。宇垣外相的反对理由如下：（一）中國是獨立國，對華事務原屬外務省的職權，無須另設機關，（二）要有新機關，亦應限在陸海軍佔領區域內，佔領區外之事，仍屬外務省；（三）掌管事項凡涉外交事項，不可包括在內；（四）戰爭是一時的，故應明定為戰爭期間中之臨時機關；（五）對華院不可為執行機關。

這是宇垣外相的反对理由。后来經海陸外三省事務當局拟定妥協案，但宇垣外相仍不接受而下台。九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八）宇垣外相提出辭職的理由兩點：第一點，反对“對華院是執行機關”；第二點，以全中國為其管轄區域與其對華認識根本不能相容，換句話說，以中國為日本政府對華院統治下的殖民地，這是宇垣外相所不能同意的對華思想。宇垣所代表的日本統治階級，認為中國是日本資本的投資殖民地，即是自由主義的殖民地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的殖民地思想的鬥爭。兩派對於侵略中國的方式及其程序雖不同，但最後目的在使中國化為日本殖民地，是一樣的。

對華院的政治意義——宇垣外相下台后，十月一日重開四相會議，通過對華院的大綱，除在華第三國有關係的外交問題外，一切政治、經濟及文化問題概歸對華院管理，簡直說一句，就是英國的印度事務大臣。不過陸軍省的原案，總裁是陸相兼任的，

現在改為首相兼任，外、海、陸、藏四相為同等的副總裁而已。但是該院的總務長官已決定陸軍中將柳川平助，實權仍歸陸軍省。並且決定在中國設立該院的支局，執行一切事務。同時取消現存在的特務部，以期侵略政策的統一。在對華院爭論過程中，我們應該指出的政治特點，計有三項：（一）在日本內政上，現狀維持派（即對華政策上的經濟侵略派）完全失敗，一切的政治實權已轉入法西斯軍閥（即對華政策上的武力侵略派）的手里。五相會議變為內閣中的內閣，即寡頭獨裁制的确立。（二）又在日內政上陸海軍與外務省的对立，陸軍省得到實行領導權的方式，造成表面上的對華政策一元化的形態。（三）在國際政治上，即正式聲明中國是日本的殖民地，放棄其假面具，自認有領土的野心，暴露其一切的欺騙手段。隨着對華院的決定，十一月三日（一九三八），即聲明建設東亞的新秩序，否認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馬脚盡露。（謝南光：“日制‘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宇垣辭
職的政
治背景

九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八）宇垣外相的辭職，對於日本內政上以及對外關係，不能不說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促成宇垣辭職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對華中央

機關的性質和對英外交談判問題；這裡表現着當前日本統治陣營里無可掩飾的矛盾，以及侵略主義者瀕於崩潰前夜之慌亂的掙扎。

對華中央機關問題的正式的搬上日本政壇，始於今春（一九三八）七十三屆會議，迄宇垣辭職止，僵持已達半年以上。這個機關的難產，在表面上僅為霞關（外務省所在地）和坂垣之單純

的职权上的对立，实际上則包有稳健派与急进派間，以至軍閥与財閥間的多重的磨擦。唯軍部之命是听的广田前外相，所以也敢跟軍部碰一碰，显然曾經有人在給他撐腰。而宇垣之曾討好少壯派，复一变和少壯派相而再火併，除宇垣个人野心的不可駕馭外，又意味着日本国内渐进、准急进和急进的几种势力斗争的錯綜和尖銳。隱居宇垣后面的，不但有旧政党人員、元老、重臣、一部份官僚和稳健財閥，而且据說荒木、池田、近衛也相当支持他。荒木是少壯派領袖，……但現在不如过去的主張蛮干，目前他在少壯派的地位也漸趋于沒落。池田虽为亲軍財閥，但他身为藏相兼商相，对当前日本經濟危机是特別敏感的，而軍事法西斯要擡取掠夺中国經濟的絕對領導权，当然非池田所乐意，年来給近衛弄得团团轉，是很想借重宇垣来牽制一下，所以至少精神上是同情宇垣的。

原来，对华中央机关，軍部主張必需包罗一切对华侵略之政治、經濟、金融、文化各部門，而和軍事相呼应。这直接剝夺了外务、拓务、尤其外务省的职权。而其影响所及，軍部独攬大权，其他各种势力全被排挤。同时又損害了財閥的利益，束縛了財閥的自由。更以軍部坚持对华事务，不分佔領区和非佔領区等等事情，这是宇垣所不願的（詳見下文“对华政策”节），因之为坂垣系少壯軍人所打敗了。（郑森禹：“从日本政治危机說到进犯华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近	衛	內
	閣	
之	改	組

將內閣參議中的真正一等人才請出来，分坐大臣椅子，使內閣參議會这“太上內閣”与近衛內閣合成一体，而与大本營保持平衡的关系。……

經過二月余醞釀的內閣改組，終於在徐州取得后而于五月（一九三八）二十六日正式實現了。攻取徐州與改組內閣這兩件事合起來看，是有意義的一回事。這不是表示日本軍閥的志驕意盈，而是表示日本法西斯軍人對於戰局前途的擔心，亟思鞏固其國內的陣綫，以徹底進行對華的戰爭。……因為他們的共同出路，是夢想獲得戰爭的贖物，然後進行其內政鬥爭。

這樣的內閣（改組後的），是否能使它的戰時動員政策風行無阻呢？是否能消除其內部的矛盾呢？……坂垣在華，獨佔一方，影響內閣，未始不叱咤一時，但一上台做陸相，能否統治其法西斯軍人集團的各派意見，就成了大問題。我們只要看坂垣就陸相任后，于車上答記者問，默然不語，僅言“痛感責任之重大”，可以想見。其次，池田雖系金融界巨頭，然以池田一人，而要統制全國，恐亦無能為力，鄉城之助便是他最大的對頭，而日本工業聯盟、日本工商會議所兩俱樂部，花樣百出，池田怕也要感到左右為人難吧。再次，宇垣與少壯派，近來關係雖比較融和，但他的政治主張與外交基本立場，仍與少壯派不無出入。如少壯派悍然不顧一切，主張發動對蘇宣戰，進行反英，而宇垣則一反其方針，而採取親英與調整對蘇關係政策，這樣的外交立場，又豈能避免不發生磨擦么？（“一年來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近 衛 內
閣
之 倒 台

在法西斯操縱下的近衛內閣本身，是一個矛盾的合成體，不管幾次的“補強”工作和一次的大改造，隨着對華侵略戰爭形勢的惡化和困難增加，近衛內閣之基礎，便愈動搖。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第七十四屆議會開

会的前夜，以“总动员全部实施”与“政治总动员”的争执为契机的財閥与軍閥、政府与政党的一般的对立，內閣中末次与池田及其他閣僚間的对立，使內閣矛盾到了爆發的程度。对华战争的無法結束和前途的黯淡，更惹起樞密院及各方面对近衛內閣的責难，表现出近衛內閣的最后掙扎的“近衛声明”仍然碰壁之后，近衛便無可恋棧，只好拂袖而去。

平 沼 內
閣
的 成 立

平沼內閣，可說是近衛內閣的踏襲。新閣十三閣員中，有七人（木戶、坂垣、荒木、八田、米內、有田、鹽野）为近衛內閣的閣員，旧閣次官二人（石渡庄太郎与广賴文忠）升任为大臣，而近衛文磨本身，也为新閣不管部大臣出席內閣會議，所以有平沼近衛联合內閣之称。內务大臣由木戶調任，比之末次会緩和一些，而陸軍的坂垣，海軍的米內光正，外務的有田八郎，文部的荒木貞夫，司法的鹽野季广，都是留任。而現任大藏大臣石渡是旧任次官。由此就知平沼內閣在內政、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的政策，都不会有大的改絃更張。

但是，平沼內閣的陣容，显然比近衛內閣更为弱化。平沼本人是法西斯团体国本社的領袖，法西斯色彩和官僚气味，都比近衛濃厚，政治手腕却比上近衛圓滑，博不到各方面的好感，人望是比近衛低得多。木戶虽沒有末次那种“烈性”，但在比重上是比不上末次。他出身貴族，染上很濃厚的官僚气味，而且也是新党运动的主要角色，提出他来緩和政党的冲突，显然是不可能。石渡庄太郎虽然是一个編制預算的能手，但他沒有指揮財界的能力，他固然比不上池田。甚至連賀屋吉野也不及。去了池田，填上石渡，軍閥就可予取予求。編制預算，石渡自屬优为，但实行

預算，恐是毫無辦法。

平沼雖聲言“尊重政黨”企圖減少議會的困難，但對外方面之對華問題，對英、美、法、蘇外交問題，及對內方面之九十萬萬預算，和總動員法全部實施問題，以至議會改革，精神總動員等等問題，實屬不容易解決的。

平沼對報界聲明：“近衛首相允留于新閣任不管部大臣之原因，系欲對外表示新閣仍遵照舊閣之大政方針處理一切之意，新閣對於御前會議所定之方針，決遵守不渝，而對於調整對華關係之一點尤然”。（以上見梁式文：“近衛內閣崩潰與日本政局的前途”，“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出版）

日人眼中之“日本政治的貧困”——日本政界，現對平沼內閣的觀感，僉認必辭職，“辭職”時期，早則議會閉幕後，遲則孟夏。平沼內閣一成立，便令人敗興。“哦，軟弱哩”，請看全班的閣僚，角色陳舊。平沼內閣，無“政治”可言。進而言之，現在日本難道就有“政治”嗎？譬如對英國態度，那末的畏首畏尾，閃爍與躲藏，這種徘徊歧途的政治，平沼內閣實負其咎。……目下充為元老重臣的雖有西園寺、牧野、湯淺、近衛、松平等，近來他們對政治影響，似有似無，實際上縱使元老重臣不存在，也仍是一樣。因為沒有“上層”的指導，沒有政治，所以國民精神不緊張。

日本真正的危機，不在前次中日及日俄之戰，委實在今天的“中國事變”里。……政界“上層部”的指導大權已旁落，最後手段厥唯組織新黨了。日本政黨與英國迥異，不是以主義綱領結合，而是唯領袖馬首是瞻。日本這樣政黨的領袖，現可沒有適當的人物，因此新黨運動，恐怕要成永久的懸案。（“日本政治的貧困”，佑藤垢石著，純青譯，“大公报”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二 統治階級內部的“抱合”與“失和”

軍閥與 財閥 的抱合

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軍閥差不多兵不血刃而攫奪了我們的東四省，趾高氣揚的軍閥，一時間曾有反財閥的傾向。但是，經過急進法西軍人的

直接行動失敗，和滿洲的經濟碰壁以後，日本軍閥已不能不改絃易轍。准戰時體制的圓滑的完成，更非得財閥的充分支持不可。所以，到林內閣時代，我們便開始看見軍財的明白的“抱合”。對華侵略戰爭發動的初期，日本軍閥要想速戰速決，迎合軍部意旨的賀屋、吉野兩“獨善官僚”之多少忽視財閥利益的統制政策，引起財閥的不滿。加以對華戰爭已成為長期戰爭，欲貫徹對華戰爭的目的，戰時的財政經濟須大加調整，而這種調整也非得財閥的積極參加不可。此外在戰爭中財閥資本加速的膨脹，因而財閥勢力增大。在佔領地經濟發展上，需要巨額資本的進出（單就“滿洲五年計劃”新決定的資本額，即達六十三萬萬），而國家資本不能充分應付，因而財閥的經濟地位增高。由於這種原因，近衛內閣便不能不大加改組，以財界第一人的池田和代表關西財閥為財閥所歡迎的宇垣大將做台柱。（宋斐如：“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日本財閥的勢力，在這一階段上，隨着日本軍閥大陸侵略的進展而日益膨脹。並且隨着軍事的擴大及產業開發的需要，而其對外的進出，提高了它在所謂“大陸政策”上的地位。在“九一八”事變過後，日本軍閥，曾經一度夢想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實施反財閥獨佔的統治，阻止既成財閥資本之進出于滿洲。但不久，即于

客觀的需求之下，對財閥讓步，再三表示歡迎他們投資的意向。現在，實際上，財閥資本之進出于東四省及華北的傾向，已相當急進。鮎川養介之被推為“滿洲國防經濟”的實際指導者，“日本產業會社”全部資本（二億餘元）之移投于東四省，當然不只是因為鮎川是“親軍”的財閥，或日本產業會社一家一族獨佔成份比較淡薄（日產的股票共有五萬人以上）實際是日本國家資本與財閥資本支配的一種交替表現罷了。以日本國家資本佔支配地位的滿鐵，最近讓出地盤來給滿洲重工業公司（即日本產業會社改組的），滿鐵旁系的昭和制鋼會社五家公司的大部份股票，就于這一轉變上，過渡到未來的滿洲重工業大王的滿洲重工業公司的手中，其評價資本總額共達一億八百五十萬元。更有進者，日本政府對於滿洲重工業會社的保護程度，並不下于三十年前創設滿鐵的優越。第一，鮎川所繼承的各種產業，皆以“國防產業”的理由，由產業統制法受到獨佔保護的特惠。第二，政府並且加以創業後十年間六厘紅利的保證。

日本財閥資本支配的增大，不獨表現于親軍的新進的鮎川資本之進出東北；即從來受到極度排斥的舊財閥三井、三菱及住友等，也有相當的表現。……

這種財閥資本之進出與其勢力之增大，自然增高了財閥資本問題的重要性及其在政治上的比重。（宋斐如：“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電力統
制案
的爭執

據東京三月八日（一九三八）路透電：貴族院曾熱烈辯論電力業國有議案，由商業電力專家前商工大臣松本開始之。松本就技術之觀點，抨擊該案，

指为違背宪法条文，侵害各电力会社所發行的内外債券持有人所应享之权利。此諸会社，皆將为行將組織以便国家統制电力業之日本电气会社之一份子。松本語記者云：“該議案之規定，政府实圖不費一文而統制电力業。”

据二十七年三月七日香港中央社电：政友会秘書，頃向政友会及民政党發出申請書，劝令該兩大党，增强合作，俾阻止發生政治剧变，而使現政府不致顛复。此外遞信省当局，現正考虑在电气事業統制法內，于必要时，採納政友会与民政党所提議之修正文。惟多数報紙則紛紛指責各政党陰謀，將全国动员法及电气事業統制法延緩通过，其中以“京都新聞”措辞，尤为激烈。（見二十七年三月九日“新华日报”）

据二十七年三月九日香港中央社电：电气事業統制法案，日前經众議院投票通过，並加修正后，本日提交貴族院討論，貴族院多数議員，立即口头表示反对，其中前閣員松本宣称，此項法案，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質（按即法西斯主义），对于外国投資，亦將有不良的影响。（二十七年三月十日“新华日报”）

久已成为財閥軍閥的斗争目标的电力国营愚案，果然在議會开会之初已惹起剧烈的反对。近衛虽表示信念，以为众議院可通过該案，但各政党对于該案，意見紛歧。民政党預料該案將大加修正，然后通过。而政友会議員則取靜觀的态度，揣測政府或不会借解散議會來圖此案的通过。至于一般大資本家，借口电气事業有外国資本外資利益必須保护，竭力反对。現該計劃原稿已被修正，財閥获得初步胜利。較為緩和的新草案，財閥虽反对，但已接受考虑。（思慕：“日本七十三屆議会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这一問題自广田內閣以来即成为爭論之中心，迄今几历二年。这問題看起来並不怎么大，但几次审議时，都因为五大电力社長的强烈反对，未能通过。而既成政党更利用这問題，获得財閥的支持，进行倒閣及反对革新势力运动。自去年（一九三七）侵华战争爆發以后，电力統制更認為急不容緩，乃由遞相永井制成統制法案，由政府通过后，更提出第七十三屆議會通过。众議院接到此案时，討論經月，开会达二十八次之多。財閥坚持二点：（一）电力統制案，实为非常时期之必要对策；（二）私有財產無理割取，实为不法之行为。此案后来虽勉强于三月二十七日（一九三八）由參、众兩院議員挽回政府代表制成折衷通过議會，但从此我們又可看出日本政治斗争的真相。（“一年来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斗”，“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总 动 員
法 案
之 糾 紛

到了中国抗战發动后，日本的兩次特別議會，把“国家統制工業財物法”，“貿易統制法”，“匯兌統制法”，“取締投机法”，“航業統制法”等，十五种法令

通过了，这些可以說是总动員法案的前奏曲。

总动員法案的主要內容：（总动員法案的全文見后）（一）严格执行征兵令，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子，一律服兵役；（二）严格执行統制工商業、交通事業，动員各种資源；（三）統制資本、生产和分配；（四）禁止人民集合遊行，强迫劳工服役，規定工价，絕對禁止罢工。为实行此法，近衛还提出設立“国家总动員审議會”的議案，該会直屬于內閣，总理大臣任会长，由貴、众兩院議員有学識經驗者及各省高級官員中选任委員三十余人。

总动員法案的目的：由这法案的內容，可見軍部是想借它来

把日本整个国民經济和社会生活，置于軍部的支配下，以及鎮压一切反战反法西斯的运动，完成軍事法西斯的独裁，同时，更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准备更大規模的長期战争——不但是与中国战争，而且是与第三国战争。民政党議員池田質問該案时，曾說比中日事件更严重的战争，将会發生，故需要一周密的总动员法。杉山陆相在答复質問时也說日本不仅应顧慮及中日战事的影响，即較此“更重的事实”亦应計及，故总动员法案实为必要。这里所謂“更重要的事实”当然是对英国或苏联的战争。广田在議会的答辯更是明白，他說：“欲对华作長期的战事，日本不能不顧及其对各国之关系，現在日政府正設法將日苏关系納入常軌，英国对日之态度也日見改善，但目前的局势極为严重，故日本不能不作万一形势更趋恶劣之准备。”所以后来杉山又說：“目前中国事变是否有实行此項法案之必要，尚未决定。”这可見日本軍閥是不惜牺牲全国的国力来作更大的軍事冒险，貫徹它的进攻中国的計劃的。不过，如果中日战事再延長和扩大下去，恐怕日本必須在“更重要的事实”未有来临之前，就实施总动员法了。

总动员法的風波：总动员法案如果側重精神方面，对于私人企业，不拟干涉，只須略加修正便可在議會通过。……政、民兩党的大多数是反对这案的，骨子里的理由，当然是因为該案予政府在紧急时征收全国財力、人力的無限权力，侵及私有财产的神聖，以及增加軍部的独裁权，消灭議會政治的緣故。他們借口有三点：（一）違宪，……認該法为法西斯意識的产物；（二）認为这时必須保持激昂的民气。頒佈此法有引起国内冲突之虞；（三）日本目前尚未至战时状态，無行此种战时法律的必要。所以多数議員坚持对于实施全国总动员法之时期，应有詳确的說

明。……可是在他方面，右派的政党如东方会、昭和会、国民同盟，以及在野的法西斯团体，都一致拥护这种“全能主义”的法案。

既成政党显然是代表一部份保守主义的財閥与軍部的法西斯斗争……不过軍部是强硬的。……但近衛却持較慎重的态度，主張避免事件的严重化，应与政党諒解。結果便採取一种折衷政策，即是一方面，对政党略为讓步，避免与政党發生不必要的冲突；他方面，宣称：政党如不觉悟，採取較合理的态度，則政府便用“積極手段”对付。

政府在軟硬政策下，总动员法通过了。政府答应該案的說明同时提出，並声明將另訂特別办法来規定实行該法的办法，保証政府不採任何足以激动人民情感及妨碍工商業自由發展的行动。……可見总动员法的实施仍有問題。將來能否达到軍部統制整个国民經濟的目的，还視乎保守派財閥与軍部間斗争的情形而定。

（思慕：“总动员法与日本政爭”，“世界知識”七卷七期，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軍閥与財
閥矛
盾的激化

侵略战争，不仅在日本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造成严重的惡果。其实正因为經濟的惡化，才使政治局勢更为严重。战争結束依然遙遙無期，在經濟上却已形成破局的危机。和平产业固已被牺牲了，軍需生产扩充也很渺茫。在極端統制下已無“生意”可做，而軍費負担日益加大。于是乎財閥与軍閥的矛盾与斗争，日益扩大。

財閥埋怨軍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而軍閥攻击財閥不“協力國策推进”，于是爆發所謂总动员法第十一条（关于总动员法十一

条的詳細內容及其实施后的影响見本書第四編) 發動問題的斗争，不仅是池田內閣时对末次木戶的对立。軍部方面，以在上次議會喝罵議員出名的情报部長佐藤賢了且公开在报章上对池田攻击。財閥方面，如日本銀行總裁結城丰太郎，日本經濟联盟會長乡城之助等，則積極支持池田的运动，在經濟上發生一大混乱，股票暴跌。結果使軍部不能不暫時讓步，同意大藏相的主張，原則上限制分派百分之十以上的紅利，但受限制的利益金仍由企業者自由用作擴張產業之需，限制金融机关的資金运用，暫不發動，佐藤賢了也因而免职。(梁式文：“近衛內閣崩潰与日本政局的前途”，“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近衛曾經宣言过在对华战争上不实施的動員法，也不得不發動起来，因此与財閥的冲突，也是日趋尖銳。……情报部長佐藤賢了，以恐吓的口吻，声言总動員法必須实施，于是引起了証券的下跌，更增进了軍部与財閥的磨擦。

为了緩和國際形勢，为了調整國內关系。坂垣不得不將几个重要人物，实行更动。

东条佐藤發了对國際的狂言，佐藤对財閥擲以恐吓之辭，在华各地則为租界与通航等問題与各国引起各种冲突，誇大狂妄的論調，言之非不痛快，但是对于負有責任的陆相，这种言論行动所引起的反响，实在是不易应付的。……此次日本陸軍中央人事的移动，在中国各戰場最高指揮官的更迭，其重要的目的，是为的減少对内对外的磨擦。但是时至今日，國際对日攻势已成，国内对軍閥的仇恨日深，要想挽救也是来不及了。(吳斐丹：“日本軍部的新动向”，見二十八年二月七日上海“导报”)

財閥和軍閥合作的根据，是建筑的交換的关系上；在軍閥方

面是需要財閥供給他們軍費，在財閥方面是欲軍閥向他們大量定購軍火並讓他們自由發展華北的資源。

軍財二閥沖突第一次的表現，是在把所謂河北省“地方事件”，擴張到上海來，一變而為全國的戰爭。大財閥原打算在一二次軍事接觸之后就結束戰爭，然後安然的接收富裕的中國大平原，但結果日本參謀本部的縝密計劃，已被中國所決定的長期抵抗粉碎無余，因而大為震驚。……最後是對廣州漢口的兩個打擊，日本軍閥雖然作了孤注一擲，但絲毫未能動搖中國的士氣。

意想不到的長期戰爭，使日本以前的大量出口貿易嚴重削弱下去，使日本資金、原料，和人民的財富，陷入涸竭，而且使大多數的非軍需工業，事實上崩潰了。

日本的“五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大倉和安田，——曾經大規模的承當軍火業務，但現在感覺到（除安田外）他們的戰時利得，實不足以補償他們在消費品的製造、對外的貿易，以及航業和商業等方面的損失。

對於軍閥們的霸佔行為，五大財閥警覺起來了，同時並發現軍部在中國的佔領區域，並無意給他們以自由行動的權利。

日本軍閥們為了確定他們在新的“夢想的黃金國”內的統治，把新設的“興亞院”中的重要位置，全部安插了他們自己的人。

為管轄這個“興亞院”的問題，大財閥與軍閥間的沖突，便在去年（一九三八）九月間發生了。彼時外相宇垣大將，是代表保守派大財閥的利益的，他想要在中國為日本大財閥確立一種“門戶開放”政策，把新計劃的“興亞院”置於外務省的管轄之下，但宇垣大將的計劃遭遇了無情的否決。

宇垣的辭職顯示了軍閥與財閥關係的益形尖銳化。結果柳川

中將被任为“兴亞院”院長，为关东軍計劃进攻中国的四魔之一的鈴木少將被任为重要的政治局局長。（“日本內閣更迭的內幕”，樊維揚譯自“China Weekly Review”，“时与潮”三卷一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軍部与其他
党派之冲突

在这回七十三屆議会的質問战中，日本政府內部的矛盾更为显著，民政黨議員小坂，对于末次內相認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共产主义的根源之談話，加以抨击。……議会的質問战中，除了表示財閥与軍閥間的对立之外，还可以显見大財閥与中小資本家間亦互相軋轢。例如政友會議員小笠原發言質問，謂：“官僚派的国家統治主义者，專以保护大資本家的利益为务，致小商家与小工業家目前均陷于困难中，政府不得借口統制消費而以压力施諸中小商業。”極右派的东方會議員三浦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步驟，控制国内資金，並以严厉抑制工农的方法施之富人”，这虽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欺人之談，但也可想見所謂“全国一致”的真面目了。

照目前情形推測，日本政府內部的軋轢，虽还不致使近衛內閣坍台，但战争繼續下去，純一色的極右派法西斯軍閥代执政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思慕：“最近日本內部危机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对国际关系
之
意見冲突

我們記得在去年（一九三七）底，日本拟向华南进攻时，日本政府內部已見兩派意見的对立，軍閥——特别是海軍——主張發动华南战争，而“文治派”則以把香港卷入漩渦为慮。到了前旬（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要

決定對中國宣戰問題時，代表極端派之末次主張宣戰，擴大戰事，加強華南封鎖，取消承認國民政府。而代表“溫和派”之中島鐵相，則主張暫時觀望事變之發展，再為慎重之決議。結果，近衛內閣採取了折衷的辦法。想在宣戰後獲取首相椅子的末次的提議，沒有完全被採納；末次的向英挑戰及排斥白人的狂妄談話，引起了國際的反感，廣田外相不能不來一個更正的聲明。一月十八日（一九三八）近衛主張對英必須避免操切言論的談話，廣田在會議的演說亦極力緩和英國，雖是耍外交手腕，却也表示近衛廣田與末次之間是有着芥蒂存在。……海陸軍退伍軍人座談會，討論日英開戰問題，它的結論是“排斥英國離開遠東”，又顯然是為末次張目。（同上）

三 政、民兩黨的沒落和新黨運動的抬頭

新黨運動與改革議會：政治總動員和解散政黨問題，並非突如其來的，末次早已有解散既成政黨併為一黨的主張。新黨運動與改革議會，為日本法西斯勢力企圖操縱政治的主要鬥爭。然而新黨運動已受到一大挫折，改革議會的提案很難有通過今次會議之可能，故末次急不及待的提出解散政黨的主張。（“近衛內閣崩潰與日本政局的前途”，“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目前醞釀中的解散現有的民政黨與政友會混合為一個所謂全國的組織，……政友會已準備完全仰承着軍部的鼻息做了，但民政黨方面還是有不能同意的表示。（“日本帝國主義往何處去？”，“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目前敵人政黨的內部，因戰時體制政治機構的強化，而起了

下列三种变化：（一）政友会民政党内部分化；（二）一国一党运动的抬头；（三）合法法西斯势力的进展。日本“一国一党論”的由来，早在兩年以前，到了去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第二期長期对华战争的形勢决定以后，这一論調，更形高漲。同月十六日黑龙会的流氓首領头山滿与貴族老官僚一条实孝公爵、山本英輔海軍大將，联合署名發表“举国一致、一国一党”的声明。至今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一日更公开举行所謂“大日本运动”的集合，而这一运动，居然影响了貴族院、軍部、官僚、政党的一部份人士，暗中醞釀着新党的組織。公开贊助这一运动的，除了在朝的鹽野法相、永井遜相、秋田、荒木等外，軍部、官僚、貴院、政党、以及右翼各团体中参加的，竟达五百余人。其中如政友会的东武、宮田光雄、川村竹治、津云国利、濱田国松、熊谷直太，民政党的賴母木桂吉、小象又次郎、櫻内幸雄、俵孙一、富田幸次郎等，素来是政党政治的有力維護者，而今已迨之惟恐落后。（王紀元：“抗战第二期敌我情勢的确視”，“世界知識”七卷九期，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新党問題：現在的既成政党，仍不失为大部份穩健財閥的代言人，保持相当的势力。財閥內部的矛盾斗争既無法解决，故解散既成政党，組織成一个以軍需工業資本家的利益为中心的混合政党，捧軍事法西斯独裁者的場，实不可能。如果撇开既成政党，另組純右翼的政党，只会增加国内的糾紛。（思慕：“近衛內閣到何处去？”，“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革新与現狀維持派兩大体系的矛盾，因此而發生了“三重內閣”，排斥政、民兩党，組織新党，等等事情。

在林內閣時代，一部份少壯軍人、新官僚，頗有擁林銑十郎組新黨的意思。同時，有政、民兩黨的宇垣擁立運動。此外，尚有以“國策研究會”為中心的近衛擁立運動。

近衛上台後，策動他組新黨的背景，頗為複雜，計有民政黨的永井系，政友會的中島系，貴族院的山崎、有馬、河田烈，社大黨的麻生久，少壯派中的橋本系、建川系，以及在鄉軍人之一部，此外，尚加上新官僚之錚錚者吉野、安田等。份子既甚龐雜，懷抱亦各不同。隱隱然含有排除政、民兩黨以及保守財閥勢力的企圖。

政民本部被佔與安部被毆事件：本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七日，日本所謂“防共護國團”約四百人，突然在政友、民政兩黨本部示威，並曾一度佔據本部。三月三日，右翼法西斯份子，更突入社大黨總裁安部磯雄的寓所，將安部頭部擊傷。

政、民、社大之聯合行動：由於法西斯之更形跋扈，結果形成政、民、社大聯合反末次（他是鎮壓人民陣綫的能手）、反右翼、反法西斯軍人。……從此，却更促成政友與民政兩黨既成勢力的團結。……這種聯合陣綫之構成，實足以表示日本既成政黨的勢力，尚有向右翼勢力回擊的可能，法西斯勢力也未必能順利進行呵。（“一年來日本政治上之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四 社大黨的反動化

自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社大黨遂開始向着“全體主義”轉變了。因為社大黨的首腦部，忽然被第三黨的地位所迷惑，做起政權慾的夢來。中日事變發生以來，對於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的

压迫，更加殘酷，在这种情形之下，社大党为了保存自己，为了維持它的第三党的地位，終于不得不放棄反法西斯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了。（編者按：無恥的放棄原来主張）。

社大党轉变以后，乃高唱“民族協調”及“东亚国民联盟”，並主張成立“国民之党”。社大党書記長麻生久，曾对陸軍省所發行的“广义国防之提倡”小冊了，發表声明，加以贊同。于是社大党的干部又向內务省方面，請求指示活动方針。在这期間，軍部中对于社大党的政策，由于內务省官僚的媒介，也漸漸开始理解，而社大党中就有一部份是亲軍派。及至“电力管理法案”提出于前屆議會的时候，社大党更一致表示贊成。因此，河上丈太郎及片山哲等，对社大党最近的动向異常不滿，但他無可奈何。（“时与潮”三卷三期，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再来看一个七十四屆議会的旁景，那就是沒落的社会大众党和軍事法西斯御用小党东方会的合併。“大阪每日新聞”和“东京日日新聞”（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把這兩党的醜史，批判得很有意味。它說：“回顧社大、东方兩派过去的历史，終是日本流行思想的先驅者。德謨克拉西思想流行时，它們是德謨克拉西的先驅者；無产階級斗争理論盛行时，它們便是無产階級的先驅者；全体主义理論風靡国内时，它們便是全体主义的先驅者；常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变，我們对于它們能敏捷的把握时代和政机，自然致最大的敬意。可是轉变太快，却觉得信念基础太薄弱。我們担憂，兩三年后如果有别的流行思想代替全体主义时，它們又要做先驅者了”（“美国各报关于远东政策的社評”，元住譯，“世界知識”九卷二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第二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对华政策

第一章 蘆溝橋事變以前

一 田中奏摺

“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既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尙未能實現。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與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洲之用。我大和民族欲步武於亞洲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關鍵也。”

我們從田中奏摺上，明顯的看出：日本對華政策是整個的，但在步驟上分下列四期實現：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全土。（錢亦石：“中日問題講話”，頁二八——二九）

二 天羽聲明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發表獨佔

中国的非正式声明，其中主要内容是：“日本所处之地位，足以尽其力之所能，履行其在东方之使命。虽日本对华之地位与各国不同，故有退出国联之举；然日本認其自己維持东方和平，並自己負責为之，乃当然之举动。日本並願与中国同时分負維持东方和平与治安之責任，中国秩序之恢复端賴中国自身努力，故日本不能不反对中国可与东方和平抵触的行为。即他国方面任何举动碍及东方和平者，日本亦必反对之，日本聞他国有共同襄助中国之說，故不得不說明日本之地位。”（“中日問題講話”，頁三三）

三 广田的“三原則”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六年初，日本外相广田高唱对华“三原則”。一月二十一日，广田在日本會議演說日本外交方針，对“三原則”更有露骨的說明：其第一，为根本調整中、日兩國关系，即中国無論在任何形态之下，亦不应採取以前非友好的行为及政策，且更进而以举亲善提攜之实，積極的加以协力。如中国对于日本出以非友誼行动，或故意利用第三国而行其常套手段，以为逆行东亚安定之事，則此誠屬遺憾而不忍受者也。第二，查中、日兩國关系，为完全恢复其常軌，当然須將中国与“滿洲国”之关系，亦有就于常軌之必要，然而中国尙未承認其接壤华北之“滿洲国”，如中、日“滿”三国关系不能同时調节，則終难求其安定。为达成此目的者，实为我决定方針之第二点也。第三，中国今日遭遇最大之困难者，为共产党之运动，而东亚之不安定，实为赤化运动正乘之点。故吾人在此，为东亚世界之安定，应阻止此东亚之赤化运动。使中国免去此种危險一事，非仅为中国，此乃应为各国共同之最大事也。此乃为此次决定方針之第三点。（“日

本大陸政策的真面目”，頁一二七——一二九)

四 松室孝良的秘密情報

一九三七年春所發現的松室孝良少將致關東軍的秘密情報，其主要結論如次：“我帝國今後對華工作之方法，決宜隨時促進下列數點實現：（一）以威力脅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二）慎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損失。（三）嚴苛監視並排擊中國各實力派之精誠團結、自立更生、自覺悟而聯合抗日。（四）嚴防中國當局之聯蘇、英、美，而進行抗日。（五）務宜阻防馮系實力（指宋、韓言）與閻、張陝北紅軍之總聯合而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實力份子，與以實力之援助，使之鎮壓抗日份子。”（“日本大陸政策的真面目”，頁一二五——一二六）

第二章 蘆溝橋事變到南京佔領

一 廣田的所謂“不擴大”主義

當蘆案發生的時候，近衛內閣的廣田外相，聲明採取“不擴大”主義，願以“局部解決”的原則解決糾紛。此時尚稱不抱領土野心，只求中、日的經濟合作。但是日參謀本部竟置若罔聞。（謝光南：“日制‘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二 杉山的戰爭演說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社東京電：陸相杉山，七月二十七日，在

議會（按即七月二十五日開幕的特別議會）演說華北事件，結論謂：“事態如此，因華武力妨害，致保護僑民及保護平、津間交通綫陷于危殆，駐屯軍已不容隱忍。為遂行其任務及自衛，決定斷然膺懲，陸軍當局已決意採取適當之重要措置。”（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公报”中央社電）杉山當時又謂：“中國事件，前途之發展如何，不能逆料，但軍部已決意向前進行，克服一切之困難，俾能達到膺懲華軍之目的。縱令中國計劃作長期之抵抗，日本軍部于達到膺懲華軍，令其失去戰鬥精神之目的以前，亦決不罷手。”（鑄成：“第一次對外抗戰”，“國聞週報”十四卷三三——三五期，二十六年十月四日出版）

三 開戰以後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

據英國“標準晚報”傳出外交上可靠之消息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議和條件送達蔣介石氏，內容為：

第一，中國承認內蒙為獨立國；

第二，華北五省有決定自治之權，中國政府應予承認；

第三，直至停戰時為止，日軍在滬附近所佔領之土地當改為日租界，並許其取得通海道路；

第四，中國沿海自山海關起，至越南界止，所有各島附近之捕魚權，讓給日本；

第五，中國退出國聯；

第六，中國不得設立軍用航空。

（“反對漢奸的‘和平’運動”，“解放週報”時評，一卷二十三期，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

第三章 南京佔領到武漢佔領

一 日本政府十二月十一日的決議

今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閣議批准五相會議对华政策之決定。此种決定，包括下列几点：（一）除非中国改变对日态度，日本决不放棄其十字軍的“征討”政策；（二）不承認蔣介石政府，帮助新中国之建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同盟社东京电）

（編者按：这个十二月十一日內閣決議，到一月十二日通过于御前會議，一月十六日以政府宣言形式公佈。）

二 日本海軍司令長谷川十二月十七日的談話

日駐艦隊司令官長谷川，对外国記者团發表談話，大意如下：“击败中国軍隊，日軍現已佔領中华民国之首都南京，期于今日举行有历史意义之入城式，数小时間，日本陸、海、空軍將在南京成为一体。日本帝国决不滿意今日之成功，盖因距总局的前途尚远。帝国軍人基于日本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到达澈底的进步的目的。中、日事变發生以来，帝国对第三国之呼訴，虽曾付以極大之努力，但仍向其目的迈进。最近对于美艦英艦之不幸事件，实表示誠心誠意之遺憾。（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同盟社上海电）”

三 广田外相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談話劝中国投降

一九三七年最后一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發表談話如下：

“友邦中国，今日实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国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中国自能免除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一九三八年之时，能与友邦中国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则中、日大局，即可展开一新局面。”（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同盟电）

四 日本政府一月十六日宣言

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书，阐明对华态度，略谓：“此次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与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而至今日，国民政府依然不解日本真意，策动抗战，不察国内人民涂炭，对于东亚和平毫无顾忌。因此，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并协力建设新中国。日本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及列国在华权益之方针，当然毫无变更。现今日本对于东亚和平之责任愈重，政府切望中国更为发奋，实行此项重大任务。”（“日本政府侵华宣言”，“时事类编”特刊第九期）

五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一月二十日谈话

川越茂顷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渠“接奉东京训令，即将于日内离滬返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日高，及其他馆员，仍将留滬。惟彼等留滬之目的，并非意在与中国政府交涉，而仅在与滬上外国外交人员讨论将来可能发生之事件”，川越并谓：“日本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现已关闭，纵然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而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二十

七年一月二十日海通社上海电)

六 一月二十二日广田外相在議會宣佈德国調解的和平条件

一月二十二日路透电：外相广田在議會宣佈，最近經由德国調解，日本向蔣介石氏所提出之四項議和条件，內容大意为：

(一) 中国政府須放棄联共以抵抗日本及“滿洲国”之政策，而与日、滿合作，形成对抗共党之壁壘；(二) 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域，並在非战区内成立特殊行政管理；(三) 中、日、滿經濟合作；(四) 中国对日賠款。广田謂“以上为最低之議和条件”。並謂“中国已拒絕德方之調解，並拒絕答复日本之提議”。广田又称：“日本对华並無領土野心，亦不欲华北脱离中国，日本希望中国認清現勢，重新合作，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广田謂：“日本並無驅逐各国在华权益之意，中国之門戶繼續开放。”

七 一月上旬对第七十三屆議會中的对华政策

在會議開幕的演說詞中，近衛曾声言：“中日战争离結束之期尚远，战争之解决尚須長久时日。”又說：“現政府採取坚决的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發生关系。”外相广田說明日方对中、日和解所持的四原則：“(一) 中、日‘滿’合作反共；(二) 特殊政权的設置；(三) 經濟合作；(四) 賠款。”……民政黨議員劈头便求政府保証“嗣后决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討論媾和条件”因为他恐怕有第三国出而从中干旋，則現政府或有重与国民政府开談判之可能。在二十三日(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議席上，政友會議員島田俊維，除了暴露政府的野心之外，还質問政府为什么还迟疑对华宣战。民政黨議員觀見祐补質問：“如国民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場时，日方应持何种态度？”並提議：“除非国

民政府放棄武力抵抗而屈服，日政府應拒絕其要求”，后来又詢問政府，是否欲對華宣戰。近衛答稱：“日政府將繼續以軍事及其他手段顛覆國民政府。同時，日政府宣佈對華政策四要點：

（一）絕對不與國民政府交涉；（二）日本為阻止軍火運華，仍可對華宣戰；（三）日本對華北‘新政权’居監護人地位；（四）絕對不容第三者出而調解。”日政府的這些答復，似乎真把“和平”之門關閉了，怎知到了二十九那天（一九三八年一月）近衛在議會中又表示：“日本對國民政府宣戰之舉，政府仍在考慮中，而其決定將視中國將來態度為斷。”由這話看來，“和平”之門仍是縫兒的。（思慕：“日本七十三屆議會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八 日本政府中的主和派

據一月三十日香港傳來的東京路透電，謂近日以來，此間有人主張停戰，與中國談判議和。日內閣各派，與日皇左右，及參謀本部人員，雖大多數主張集中實力對付中國，及時改編軍隊，長期作戰；但一部份穩健派軍人亟欲迅速結束中日戰爭。必要時甚或引起閣潮，俾新內閣組成後與中國開始談判。（“日本七十三屆議會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九 主戰派的對抗

一部份穩健派軍人，亟欲迅速結束中、日戰爭，甚或將引起閣潮，俾新內閣組成後與中國開始談判。因此，杉山陸相發表“必須準備長期戰爭”的文告，與之對抗。（“日本七十三屆議會

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一〇 日本駐滬大使谷正之三月九日發表

談話謂如能議和則耗費小而效力大

三月九日同盟電：日本駐滬大使谷正之對新聞記者之談話，宣稱：“蔣介石政權行將崩潰，但須繼續加緊戰爭，促進蔣氏政權倒台，並使第三者各國放棄援蔣企圖。戰爭以外之法如能使蔣氏議和，則耗費較少，效力更大。華中新政權前途光明，希望不僅蘇、浙、皖受此新政權統治，即贛、鄂、湘亦加入其版圖，贛、鄂、湘人口有一萬八千萬人，肥沃領土有一百萬方里。”

一一 五月二日近衛演說準備長期戰爭

日本為調整國內大政適應二期戰爭，而召集之地方長官會議，於五月二日午前十時在首相官邸開幕。首相訓詞大意如下：“政府為推翻蔣介石政權，剷除東亞禍根，雖費數年光陰亦所不惜。同時，全國民應極力援助華北、華中兩防共親日政權之發展。為實現此種偉大政策，七十三屆議會開過八十六件法律案及八十億元總預算。今後為遂行戰爭達到長期目的，應總動員物質及精神兩方面之力量。事變發生後，不論戰場和後方，均見發揮日本精神反對抗日容共之思想與政策。吾人當將日本誇躍世界之信義、正義及日本之躍進與真姿，明示世界全球。”（二十七年五月四日同盟社電）

一二 五月九日廣田外相演說：鑒於國際

環境惡劣主張慎重處理事變

地方長官會議最後一天，廣田外相說明日本對華方針及列國

今后对华之动向如下：“中国事变进行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在占领区域内，已成立‘临时’‘维新’两政权。津浦线完全被我占领之时，两政权即刻实行合并。帝国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其合并统一，并能完满健全的发展。”（二十七年五月十日同盟电）

一三 五月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

话谓占领徐州后要继续打倒昆明

我（日本）最高指挥官（按指寺内）在前线与记者团谈话，据云：“徐州被我攻陷，但战争并未因此停止。我军此后之路线可分三步，第一即徐州大战，第二进攻汉口，第三进击重庆或昆明。（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同盟电）

一四 五月宇垣初上台时发表半硬半软主张

日本占领徐州（五月十九日）后，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就将它的内阁加以改组（五月二十六日）。这次改组的用意，承继广田弘毅出任外相的宇垣一成，曾经很明显的表示过，是在对付中国之“第二期抗战”。他说：“在中国既有决心对日本延长它的抗战，日本内阁即须在它的政治、经济 and 外交政策上，重新加以决定，以应付由长期抗战所产生之环境。日本现在料定在华之战争，须再延长数年。但内阁改组之后，日本将用全力以结束战争之决心，当已无疑义。现在援助中国作战之各国，即应因战事之延长，充分了解日本欲推倒蒋政权之决心，已牢不可破。而彼等

如果明白的認識日本之所欲為，即宜避免不必要的干涉。”（見六月七日及八日香港“南華晨報”所載同盟電及海通電）

一五 宇垣外相的主和政策

宇垣外相繼任廣田外相后，仍稱對中國無領土野心，只冀中國放棄抗日政策。若中國願意接受日本的提議，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地位，與日本合作，日本願意考慮取消一月十六日的聲明。對各國在華權益，日本政府並不妨害，且向英國提攜，以外交路徑解決遠東糾紛。（“日制‘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一六 六月十七日永井遜信大臣發表談話

謂必須打倒中國政府

永井遜信大臣，西下參加大阪遜省醫院奠基典禮，在車上對於目前對華諸方策作如下之談話：“目前政府之對華政策，在於打倒蔣政權，援助新政府建設新中國，借此奠定東亞永遠之和平。其他之政策，亦須沿此綫進行。”（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同盟電）

一七 七月張娃峯事變時外傳日本曾向

中國提出和平的五條件

當日、蘇邊境糾紛日烈，將有成為大規模的戰爭可能時，中、日和平的空氣今日突又盛傳于香港。上午是“孖刺西報”首傳日本向中國求和五條件，下午則各晚報均已刊載。細察那五個條件：：（一）日本軍退出佔領區，但中國也不得駐軍；（二）承

認“滿洲国”的獨立；（三）將虹口、閘北、江灣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雙方各賠償此次戰事之損失；（五）共同防共。（陳榮丸：“日本向中國求和的問題”，見二十七年八月五日“星島日報”）

一八 七月坂垣發表：堅持一月十六日
的方針，打倒中國政府之強硬論

七月一日同盟電：由某地視察返京之坂垣陸相，發表帝國對蔣政權態度之重大意見：“最近有第三國出而調停中、日戰爭之說，此為蔣政權所指使，或第三國自動出而調停，尙不可知。但帝國是不收回打倒蔣政權之決議的。帝國政府已於一月十六日發表不與蔣介石政權交涉，且常常強調此點，但蔣介石政權及第三國常常想調解中、日戰爭，對此事現無議論之余地。若使蔣政府及第三國對於帝國一月十六日之宣示即認為策劃和平，這是認識不足。不知我國朝野打倒蔣政權之決心，在蔣政權依然存在之時，中、日間絕無和平之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與蔣介石攜手開和平談判。”

七月四日同盟電：正午，近衛首相與坂垣陸相在首相官邸密談二小時半，坂垣對收拾時局的根本方策對首相作重要之進言云：“帝國政府以今年一月十六日之聲明，即不以蔣政權為對象之根本方策為旗幟，澈底向消滅蔣政權的路上邁進。當蔣政權尙存在之時，中、日間無和平之可能。此次之事變，帶有國力戰的新性質，應與建設平衡。所以我國必需清楚的認識此點，官民一致的整備戰時體勢，來完成此種目的。”在五日的五相會議之前夜，首相陸相之會談，頗甚注目。

七月七日同盟電：中、日事變一週年紀念日，坂垣陸軍大臣發表談話如下：“今後戰事，無論延長多少年，帝國所走之路只有一條（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國），除此以外，不能達到東洋百年之和平。現在吾人應認識時局之重大性，實現近代戰爭所要求之國家總動員，使戰爭早日結束。現在之戰爭，乃經濟或思想戰。因此，在後方不得發生使前綫將士驚異之事件。皇軍在二千基羅的前綫上作戰，在遼遠的敵軍後方作戰，忍飢耐寒的毫不动摇的繼續戰爭。吾人知道這種之情形，應即刻覺悟，努力支持戰爭。”

一九 敵人策略的二重性——軟硬兼施

回億去腊南京陷落前後，我堅拒敵方無理要求後，敵竟惱羞成怒，一方樹立傀儡組織以相要挾，他方發表“不以國府為對手”之聲明以相恫嚇。然而窮兵黷武，師出無名，敵國民間固多怨言，即敵政府內部亦復意見分歧，有外務省發言人的“所謂不以國府為對手者並非否認國府”之解釋，亦有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的“不以為對手者較諸否認之意義尤甚”之訂正。五月末敵閣改組，有宇垣“苟中國局勢有重要變更時，則日本自有其重新考慮其態度之必要”，及“對於第三國之調停，當充分檢討其動機及性質”之誘惑，復有七月初陸相坂垣“非打倒國府無和平可言”之爭訴。敵國侵華之根本政策，固毫無變化，而具實行之步驟，則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青山和夫：“日本革命的現階段”，武漢“大公报”“星期論文”，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〇 設立對華院總攬對華統治大權

在對華院爭論過程中，我們應該指出的政治特點，計有下列

三項：（一）在日本內政上現狀維持派（即对华政策上的經濟侵略派）完全失敗，一切的政治實權已轉入法西斯軍閥（即对华政策上的武力侵略派）的手里，五相會議變為內閣的內閣，即寡頭獨裁制的确立；（二）在日本內政上，陸、海軍與外務省的对立，已有陸軍省得到領導權的方式，造成表面上的对华政策一元化的形态；（三）在国际政治上，即正式聲明中國是日本的殖民地，放棄其假面具，自認有領土的野心，暴露其一切的欺騙手段。（“日制‘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对华院總裁由首相兼，副總裁由陸、海、外、藏四相全体出馬，成為第二重的五相會議。如果此五相意見紛歧，試問怎辦？……在軍部看來，這仍舊不是像它理想的独立的統一機關。軍部將再提出進一步的要求，迫使完全給它操縱，這是必然的。（鄭森禹；“从日本政治危机說到進犯華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二一 九月近衛準備改變策略以誘降為中心

抗戰繼續了十四個月，大量消耗日本國力的結果，促成敵國十分疲弊，而朝野人士皆有早日結束戰爭之企望。財閥由於保全獲得利潤的舊地盤和開拓新路線的見地，這種企望尤其迫切。其事實的反映，就是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仍決心準備長期戰爭，一方面再作速戰速決的嘗試。在侵略者急激攻襲武漢的今日，日本朝野又充滿着結束戰爭，以從事於所謂“長期建設具體化”的工作的空氣。其具體的方針，表現於近衛見西園寺後的談話中。他固然依舊大吹其“澈底毀滅”的論調，但是他的談話的要点却在於：

(一) 幻想在汉口攻陷后認我中央政府为一地方政权；(二) 今后的重大的问题是“長期建設的具体方策”；(三) 以佔領地权益引誘第三国，緩和國際的孤立；(四) 設置对华中央机关，統一開發我国經濟的工作。这里很濃厚的表露着日本財閥的要求，所謂“長期的建設”，正是財閥資本的要求。因为繼續作战下去，不但投資的新路綫無法保証，即旧地盤也有动搖的可能，所以在“長期建設方策”当中，于經濟開發物資需給关系之外，还列入“治安維持”为首項。又因为經濟經常的發展，需要看各国关系的圓滑化，所以对第三国要避免無用的刺激，用“尊重既得的权利”为釣餌，誘惑各国。其調整國際关系的具体工作，是明显的表現于外交新方針上。又为急速而有效的进行对华經濟侵略，所以急需設立对华中央机关。但这对华中央机关的設置，即为关西財閥所急逼要求的。近衛內閣大改組以来，日本內外施政方針，决定于所謂五相會議。这种寡头独裁机关（日本朝野皆認这會議为永久性的制度），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以來，前后开过十七次會議，其重心始終在于侵华的大方針上。大阪商工会議所，特于八月二十三日举行对华問題調查委員會，要求統一对华諸机关的分立运用統合的強力的国家机关，以做一元的活动。（宋斐如：“战时日本內外政策变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二二 九月底軍部赶走宇垣

軍部坚持对华事务不分佔領区与非佔領区，並強調“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到底，以及反对和英国作軟弱的談判，使宇垣在外交上非常辣手。畏惧战争前途的宇垣等一部份人，是企圖于軍事

之外，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以“和平”的圈套使中国屈膝。这一毒计，一方面固早为我们戳穿，一方面也没有为少壮派支配下的军部所接纳，更形成侵略者意见的不统一，而宇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下台的。（郑森禹：“从日本政治危机说到进犯华南”，“世界知识”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气焰万丈的日寇少壮派军人，并不能因为赶跑了稳进派缓进派的巨头宇垣一成，即得掩饰他们图谋速战速决的慌张。据说，宇垣曾经看清，日寇欲免其灭亡，必须早日结束战争，欲结束战争必须在汉口未陷落以前进行外交的谈判。因为汉口攻陷后，问题将更复杂化，倒反阻碍双方的谈判。所以，宇垣上台，就极力主张不坚决否认国民政府为其谈判的对手，竭力谋英、日关系的调和，以为中、日谈判的基础。但是宇垣这种方针，不见容于少壮派军人。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宇垣召集少数新闻记者开机密的叶山会议后，宇垣派与反宇垣派的暗斗，遂至成熟，表面化。据坂垣所统率的陆军部，及米次所盘据的内务省散佈的消息，叶山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三：（一）严格批评日本内閣处理中、日事变的方针及态度；（二）深刻批判一月十六日的对华宣言；（三）表示反对现内閣的外交方针。这当然不是少壮军人所能默認的，反宇垣的声浪遂至高涨一时，甚至于危及宇垣本身的安全，增加了警卫的人数。当时宇垣即已感觉外相椅子不能久安，因借口对华中央机关问题，拂袖而去。（宋斐如：“汉口战后日寇的对华政策”，“世界知识”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二三 十月上旬近卫还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话

十月三日同盟电：本日上午，近卫兼任外相与前外相宇垣办

理移交手續后，接見記者團，發表帝国外交方針云：“关于帝国之外交方針，如屢次所發表之聲明，基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之根本方針，来处理中、日事变。关于此点，毫不变更。宇垣前任外相之辭职，並不是因为此种之根本政策。今后，因基于此种原則，使五相會議之決議更加具体化。”

二四 十月二十四日同盟社宣佈日本政府已決定新策略

十月二十四日同盟社電：帝國政府對於今后处理中日事变之方針，大概已決定如下：“（一）处理中日事变之目标，乃在于實現中、日、‘滿’提攜，結成东洋和平之軸心之國策。因此，当处理此項事变时，中、日、‘滿’三国間应實現下列三項工作：第一，禁止破坏三国間之教育及其他之行动；第二，文化的提攜及實力防共政策；第三，基于產業及經濟的提攜，約定三国之共同利益。依此，帝國政府之國策，在澈底毀灭国民政府，並助長新中国政府之成立，由中国扑灭抗日容共之思想，廢除‘以夷制夷’之政策，借此真正完成中、日、‘滿’之提攜，並使中国轉变为亲日，加强与日、‘滿’兩國之結合，以圖經濟的發展。确立东洋永远和平之目标，即在于此。（二）我国与国民政府之关系，早已聲明，即不承認国民政府为交涉之对象。此后，国民政府要求和日本講和，而使我承認为中央政府，則日本亦不能首肯。因此，当我在汉口失守而發出聲明后，如国民政府願与我講和，則我政府亦断然不承認其为中央政府，而与进行和平交涉。（三）关于树立中国新中央政府，則日本必須使其改正过去一切中、日国交上相尅之政策，确立使新中国变成支那之基础。因此，必須早日使‘临时’‘維新’政权成立‘联合委员会’后，再与‘蒙古联合委员会’相联合，收

拾分散各地之政权，使其成为真正之中央政权。帝国政府不断的努力于这一方面之工作，现在已逐渐收到效果。（四）协助新政权之成立，调整中、日关系，缔结调整中、日国交之协定，努力于新中国之建设，政府循此根本政策，开发有利于调整中、日国交之各种资源，实行强化日‘满’提携之各种对策，尊重中、日、‘满’固有之文化，以便达到共存共荣之目的。由于中、日、‘满’提携后澈底实行防共政策及经济合作，必须各主要机关之共同努力。因此，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部门，必须努力工作。（五）此次神圣之战争，必须复灭抗日容共之势力，消灭蒋介石政权，或使其降为地方政府，并维持治安。可是，这种任务乃长期之事业。因此，还须长期的驻兵。且今后不但以武力，而且必须发动政治、文化、经济之全部力量，向建设新中国之途中迈进。因此，为扫除外国干涉此种事业，或横在此路上一切之障碍物，必须扩充我陆、海、空军之军备，扩充生产力，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使国家之力量，有飞躍的增长。希望全国民众，努力完成此维持东亚永远和平之伟大事业。”

二五 武汉佔領之日（十月二十五日）

法西斯政党东方会尙唱蛮干論

十月二十五日同盟社电：在佔領武汉之后，近衛首相發表正式宣言之前夜，由中野、西乡所领导之东方会，通过決議，向政府要求巩固军事成功：“（一）不顧英、美、法、苏，毅然前进，保持军事上成功，对全世界宣佈新中国产生。（二）与新中国澈底合作，并要求列强退还以前中国所放棄之利益。（三）使新中国收回租界，剷除醞釀抗日主义根据地。（四）收回海关稅收，

統治鹽稅等。（五）实行武装警察权，镇压反日活动与助蒋活动。”

第四章 武汉佔領到現在

（編者按：这部份材料到二十八年五月止）

一 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發表声明

“帝国陆海軍，此次仰賴陛下宸武陵威，攻陷广州、武汉三鎮，戡定中国各要地，国民政府由是降为一地方政权。但該政府如仍冥頑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則在該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軍事行动。帝国之所期待者，在乎建設能保东亚久安長治之新秩序，此次出师之最終目的，亦即如此。所謂建設新秩序，即由日、华、“滿”三国相提攜，树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环之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而确立国际正义，达到共同防衛，創造新文化，实现經濟合作，此即所以安定东亚，裨益世界进化者也。帝国所望于中国者，在求共肩建設东亚新秩序之任务。且冀中国国民，理解此中真意，而与帝国政府协力迈进。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拋棄从来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維持，則帝国亦不事拒絕。帝国且深信各国，必能正确認識帝国之真意，而有以适宜于东亚之新情形。尤其盟帮諸国从来之厚誼，更深有足多者。盖建立东亚新秩序，乃濶源于我国締造之精神。完成此种精神，乃現代日本国民所負之光荣任务。帝国应断行国内諸事之革新，並扩充国家总力，排除万难，而迈进于完成此大業。茲特將帝国坚定之方針与决言，声明如右。”（編者按：广州于十月十二日失守，武汉于十月二十五日失守，十一月

三日为日本天長节，故日本發此声明。)

二 美国通訊社亦傳日本會向英国提出和平条件

据某著名外商發表，數月前日本特使谷正之，曾向英国大使提出日本停战之条件，內容如下：（一）中国承認“滿洲国”；（二）中国及他国不得干涉日本在蒙古之活动；（三）除重要地点数处駐兵之外，日軍將退出揚子江；（四）日本在华北五省有政治及經濟优先权。（“申报”十一月三日“北平美联社”电）

三 日本策略傳变的步驟

这次所謂“和平”的空气，竟自东京傳出，甚至連謊謬的“和平”条件，也為日本半官式的通訊社所登載。其主要的內容是：（一）中国在政治上或經濟方面放棄一切有碍兩國友誼之行动；（二）中、日兩國文化合作，並取反共政策；（三）兩國經濟与工業合作。又日政府可以保證，倘和平恢复后，不再有战事發生。（十月二十五日“海通社”东京电）这多么富于引誘性。即日本声明的所謂基本方針，“決不与蔣介石氏所领导的政府言和”云云，也有修改。上月二十四日招待新聞記者的日本外务省發言人，对于“中国实际領袖之意义”的質問，竟不加答复。即侵华敌會畑俊六的談話，也只称：“日本所願意者，仅为中国政府放棄反日态度”。……日寇誘降的第二个步驟，就是央求德、意居間牽綫。英、德調停中、日战争的消息虽曾一度为中国方面所否認，但聞希特勒与日政府之間确曾电报来往磋商过，香港德、意領事館前的友帮車馬，也曾如龙似水般熱鬧过一陣。希特勒“时常准备和平，时常准备自衛”的警句，对于他的这东方伙伴的日寇，当然

有丰富的暗示蘊蓄其中。……所以在德、意調停擱淺以後，即刻派遣所謂“支那通”的重光葵趕赴倫敦上任，重光到任第一日即對報界發言，謂英、日兩國確曾有過誤會，他的職務在於泯除此種誤會，並改善兩國邦交。……他到任第三日，即有所謂“日本有力份子開始試探英國政府的意見，懇請英國政府出任調人，恢復遠東和平的消息”（“路透社”倫敦電）這有力分子當然是重光。同一電文又謂：“倫敦之日人方面証實，日本軍事當局鑒於今日戰事已使日本之人力、物力、金錢蒙受莫大之損失，其希望停戰的真切，正不下於一般平民，故確信中國所能接受之條件，日本亦必能接受之。”又據明治生辰紀念日宣言（即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聲明）內稱：“如國民政府放棄其排日容共之新政策，並作人選上之更動，則日本將不拒絕其參加樹立遠東新秩序運動。”並謂：“……日本目前之軍事行動，其最後目的即在樹立此種新秩序。”

日本對華的四個步驟：第一步驟，武裝併吞華北五省。其時適當蘆變前後，借防共之名，企圖將華北劃成非武裝地帶，置於日本統治之下，達到所謂“不戰而勝”的目的。第二步驟，使用武力迫我國民政府屈服。其時間適當南京陷落的前後。日本所採的策略，是勾結一部份失敗主義者進行講和，誘我訂城下之盟。第三步驟，排演傀儡戲，離間我民族抗戰的內部。其時間適當於一月十六日“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的宣言發佈後以至現在，其方法是創造華中偽臨時政府，促進華北與華中兩個偽組織的合流，並引誘我國民政府參加。第四步驟，企圖設立所謂“東亞聯邦”。北至西伯利亞，南至爪哇及印度，皆劃入東亞聯邦的範圍內，而自己充當盟主，絕對排斥亞洲以外的人。（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

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四 畑俊六還在口出大言

日本華中總司令畑俊六，昨日向柏林“金融報”特約訪員發表談話，宣稱：“各綫戰事，現時正在繼續中”。繼稱：“倘有必要，渠將跟隨華軍至重慶昆明。”（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申報”）（編者按：這大概是畑俊六所以被免職的原因罷？）

五 東條的兩國作戰計劃

東條在武漢失守後之演說：“日、蘇衝突，將來是不可避免的。日本軍部為對付東亞的新形勢，為了完成天與皇國的大使命，建立東洋永遠的和平，建設東亞的新秩序，非至抗日的蔣政權潰滅，是實難收兵的。從今以後，無論如何，必須做對華對蘇二正面的武力同時作戰的準備，不可不傾倒人馬資財全力，以建設新軍備。”（吳斐丹：“日本軍部的新動向”，見二十八年二月七日上海“導報”）（編者按：東條號稱坡垣的智囊，急進派代表，任陸軍次官，現已調任，未知是否因其在武漢佔領後與當局意見衝突之故？）

六 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聲明

“日本政府，一如本年屢次所聲明，始終在謀徹底掃蕩國民政府之武力，並與中國卓識之士相提攜，以向‘東亞新秩序’建設之途邁進。現在，中國各地更生之勢，澎湃而起。而建設之氣象，亦日盛一日。政府于此，爰將日本與更生中國關係之根本調整方針，向中外闡明，籍所昭示帝國之真意。

中、日、‘滿’三国，应以建設东亚新秩序为共同之目的，互相結合，互相亲善，並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經濟之提攜’。因此，中国必須首先消除其从来之褊狭观念，而放棄其抗日与不忘‘滿洲国’之情緒。質言之，日本率直的希望中国进而与‘滿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

其次，日本不容許东亚有第三国际势力之存在，故当本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以締結中日防共协定，为調整中、日国交之紧急要件。又鑒于中国现在之情况，为充分保障防共目的起見，在‘防共协定’繼續期間，日本要求中国承認日本特定地点駐軍防共，以及將內蒙地方作为特殊防共地域。

关于中、日經濟提攜，日本既無在中国为实行經濟的独占之企圖，亦非要求中国对于理解新东亚情勢，並順应此种情勢而动之善意第三国之利益，加以限制。其唯一希望，在使中、日兩國之提攜与合作發生实效。即在中、日平等之原則下，中国应承認帝国臣民在中国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以增進中、日兩国民之經濟的利益。再鑒于中、日間历史的經濟的关系，尤其在华北以及內蒙地域內关于資源之開發与利用，应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

以上为日本对于中国要求之大綱。如能洞悉日本發动大軍之真意，自可明了日本所要求于中国者，既非区区之領土，亦非战費之賠償，而其实际，不过要求中国对于分担建設‘新秩序’之职责，予以最低限度之必要的保障而已。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进而有完成中国之獨立，对于必要之治外法权之撤廢及租界之交还，亦不惜予以積極的考虑。”（楊云竹譯：“战时綜合叢書”，第四輯）

七 馬場恆吾謂“東亞新秩序”不要明吹

日人馬場恆吾，在“三國通牒與日本外交”（“改造”三月號）一文中，說道：“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外交像今日這樣失去自信的例子，很少。日本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標，也須可以作為民族的信念，然信念不必一定立即作為外交談判的條件。希特勒總統以東進為信念，其理想也須在支配烏克蘭，佔領莫斯科。然今日之德國並不立即向蘇聯要求割讓烏克蘭，並且從來不公然說合併烏克蘭的意思。因為那樣說，徒足以使與蘇聯的關係惡化，實際上毫無利益。美國之門羅主義，亦是美國人的信念，可是美國並不向歐洲諸國要求承認門羅主義。信念只是信念，並不成為外交談判的議題。東亞新秩序的信念，在意味上也是貴重的。可是作為外交談判的議題，則發生種種障礙。由於漢口、廣州的攻陷，英、美的感情一時頗傾向於日本有利之途。然以後情形逆轉，英、美的同情反傾向於中國，豈非由於把新秩序之信念作為現實外交議題所致乎？民族的信念，不應胡亂向外交方面要。然則所謂東亞新秩序者，究竟是什麼意思？這疑問自然要發生。在議會屢次有關於此點之質問應答，可是連日本人自己也不明了東亞新秩序究竟是什麼意思？說明此思想的有田外相，在眾議院預算總會，答中島彌因次之質問曰：“東亞新秩序之觀念，是更加發達下去的，不應以今日之固定的有限制的見解加以決定，應從大體的觀念，漸次使之發達。”可見新秩序之觀念，連外務大臣也還漠然。為使國民知有所趨，揭明高遠的理想，是可以的。但以假定之事項，作為外交談判之議題，實笨拙中之尤笨拙者。試觀外交史上的列國慣例，自國所做的事情，說是沒有做，實在掩

飾不住了，也說的很小。可是我們日本，把還沒有成就的事情，作為以成就了，很小的事情，說的很大。大言壯語，雖頗痛快，然因此而使國家受到損失，則大言壯語，宜加审慎。”（見二十八年四月二日“大公报”）

八 木村謂樂觀可為寒心

日人木村增太郎著文說：“有一部份的日本言論機關，從前曾經發表過‘如果南京陷落，則中國定會屈服’，‘如果取了徐州，則國民政府定要瓦解’等不可靠的預想。此種論調，是由于對於中國的實體，與對於此次事變的本質認識不足而來的樂觀的希望。但是，到最近，以漢口戰為契機，對於事變的前途，又發生了無批判的輕視。這種觀察，不能不說是最可寒心的事。縱然連打敗仗，不是預定的計劃，但長期抗戰，從最初起就是蔣介石氏的有計劃的行動。中華民族本有一個特性，凡事非到最後一綫不止。加以蔣氏長時期的抗日訓練，以及經濟的連帶關係，中國民眾深信事變為確保民族生存權的戰爭，事變的結果，日本的財政經濟必然崩潰，中國一定可以獲得最後勝利。……此種形勢下的蔣政權，外得列強的援助，內有民眾物與心的支持，即使漢口陷落，不過是第三期戰爭的一個大關口罷了。實是有合理論據的考察。”（“漢口戰后日本的經濟對策”，木村增太郎著，斐丹譯，“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九 一個日本記者謂事變結束無期

混跡香港、華南一帶已久的一個間諜性的日本記者說：“武漢三鎮的攻陷，不能算作戰爭的終結，中國長期徹底抗日政策仍

必激烈的繼續下去，事变終熄之期还遙远得很，战局將更形扩大，超意識的扩大，日本將臨到未曾有的大战，須具有未曾有的决意去应付大难。”（“从日本政治危机說到进犯华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一〇 松本慎一謂中国不可輕視

松本慎一則直捷了當的說：“汉口攻略即和平來到的預想，不過是一種有害的空想，相反的，事变隨着汉口的陷落，將突入更深刻階段；一時的部份的勝利並無多大意義，最後勝利才是問題的核心。”他又依次就經濟力、地域、人力、軍火、團結力、外交等方面，大膽地分析中國繼續抗戰的力量，依然為無窮盡。他認為：“貧寒的西北，尙可從事工業的建設；天然資源豐富的西南，在英、法援助之下，更可隨心開發；而抗戰基礎地也依舊廣大；中國最高軍事當局的威令，且可及到日本佔領區域之內；中國抗戰地域有如海之浩大，日軍佔領區則不過大海中的羣島。”“就兵力說，汉口放棄以後，大部份兵力仍舊保存着，可繼續作為抗日的主力軍。而且得再繼續而踏上抗日前綫的中國方面人的資材，可說是無盡藏。像今春新編成的四十餘萬的新軍，那樣的新軍隊可隨處組織起來。中國軍火也是無盡藏的，尤其足以用做游擊隊的散在民間的軍火，到處都有。且中國內部已統一團結，抗戰以來，中國民族統一過程之急激的進展，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同時，外交政策在汉口攻略後，也不會有本質上的變化，那種以為汉口攻略後各國對華政策將起一大轉換，停止對華援助，轉而對日和協的預測，不能不說是太一向情願的見解”。松本氏的結論是：“比判斷中國之更緊急更重要的問題，是判斷日本。”（同上）

一一 馬場恆吾謂中国人民已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

馬場恆吾在“中央公論”上著文說：“日本飞机到处轟炸中国全土，中国人民在炸彈下历受生命财产之威胁，已經驗到和国家同命运的危險，日本不能否定跟着战争的进展，中国人民已日益关心其国家的命运。”（郑森禹：“从日本政治危机說到进犯华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一二 平沼一月二十日的上台演說

平沼騏一郎于本年一月上旬繼近衛內閣登台，于一月二十日在貴族院發表如下之演說：

“对于中国事变，天皇已定有确乎不动之方針，現內閣当然依此根本方針，向所期之目的徹底迈进。日、“滿”、支三国，应立于互相充分理解之上，互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实现互助关系，善鄰友好，奠定东亚兴隆之基础。此乃显示日本肇国精神之道，亦为固定之国是。以东亚安定之責自任之日、“滿”、支三国，应从速本此公正之目标，向新秩序协同前进，俾完成永远之安定。

中国应諒解此帝国之大精神，从速协同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設。如始終不理解此意，繼續抗日，唯有使之潰灭。然对中国卓識之士，协助帝国国策之遂行，以期奠定更生新中国之基础者，当欣然援助与挽救中国民众塗炭之苦，而欢迎其参加建設东亚新秩序之历史的事業。

共产主义已弥漫中国大陆，而有支配其政权之势，故必須实行防共之道。此次事变之最后目的，不單在武力的胜利，而在求

中国之更生。同时，由于日、“滿”、支三国互相提携，以确立东亚新秩序体制。在未完成此目的之前，事变绝不终结。”

一三 有田一月二十一日的外交演说

平沼内閣之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于一月二十一日在众院发表演说如下：“帝国政府，关于此次事变之根本方针与决意，已于去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三日宣明中外。日本所希望者，为建设确保东亚永远安宁之新秩序。此所谓建设新秩序，不外维持日、“滿”、支三国各自之独立，一方使之充分发展其个性而互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树立积极的互助关联之关系，以道义的基础为立场，建设新东亚。

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二十二日，帝国政府曾声明，希望与中国同憂卓識之士相提携，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结合。以期实现相互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同时，並表明帝国政府所要求于中国者，既非区区之领土，亦非战費之赔偿。帝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进而为促进中国之独立起见，关于撤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均不惜加以积极之考虑。凡此皆系阐明以道义为出发点之帝国国策。

现中国各地已成立新政权，帝国政府希望其中央政府早日成立，以便与日方协助，謀事变之收拾。最近发生所谓和平派首領之脱出事件，帝国政府正注意其前途之发展。”

一四 平沼与有田说了些什么？

综合平沼有田所说之对华政策是决定遵行前内閣时御前会议所决定之方针，即文中所提及去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三日及十

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中所宣佈之政策。其主要内容为：（一）承認伪滿；（二）中、日締結防共協定，在協定繼續期間在中国特定地点駐兵，並以內蒙地方作为特殊防共区域；（三）中、日經濟提攜，日人在中国内地自由居住及營業，承認华北及內蒙之特殊性等。有田此番演說中，則又声明維持中国之獨立，尊重中国之主权，此与駐兵防共絕對不能兩立。且只需在中国駐兵，則事实上中国即在其控制甚至統治之下，然則又何需乎要求割讓、賠償及保留治外法权及租界？且所謂：“維持日、“滿”、支三国各自之獨立，一面使之充分發展其个性而互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树立積極的互相關联之关系”云云者，尤为惡毒！既云“各自獨立”，“發展其个性”，而又套以“互相關联”之圈子，而成为其所謂日、“滿”、支之“立体关系”。措詞俾管巧妙，而騙术則又愈揭愈穿。至所謂共同防共，正如蔣委員長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駁斥者，“在我們全国一致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其目的無非欲假防共名义，控制我軍事以亡中国而已。（楊云竹：“日本內閣之更迭”，“時事月报”二十卷二期，二十八年二月号）

一五 离間国共合作剽竊三民主义的大陰謀

敌人集中策动于一点，即是“国共之分离”。盖“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陣綫之根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敌明白声称：“武汉作战之目标，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佔領，好似在国共間插入一个楔子，战略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

敌謂：“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徹底击灭抗日政权及軍隊，第二在要日、支兩民族之提攜融和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

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証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試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屬誤謬，但蔣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質，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現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或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軍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緣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蔣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誠不啻緣木求魚，盖愈欲倒蔣，愈使支那民族拥蔣，要打倒蔣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無由倒蔣，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敌續謂：“然为貫徹目的起見，实有爭取支那民族之必要。而爭取民众，尤有賴于彼等之心服及协力。我官撫班之活动，虽頗值注目，但亦仅系軍事行动之側面補助，华北之新民会，其本質乃教化团体，尤不足以担負政治斗争之重任。至于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維新政府，因尙無民众基础，故其合流問題，並不重要。即或成統一政府，亦無多大意义。最重要者，乃政府之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則南北二政府自不难合流。为此，新政府之結成，实为目下之紧急任务，而新政党之綱領，应以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党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指国民政府——笔者註）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对日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口号，而吾人則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設三民主义相号召。新政党果能成立，支那民众果能爭取得到，則事变得最后解决，南北政府亦自能統一，而抗日政权亦將失其立場，为新政党所吸收。”（引文均見松本鎮一所著“爭取支那民族大众之問題”）

敌国最近新年号杂志中，亦有同样新陰謀之洩漏。杉浦晴夫

在其所著“日本滿洲支那——东亚联盟之諸国家”之長文中，亦謂新中国之政治，“应結成新組織体，活用中国国民所有国民党組織之經驗，及孙女大亞細亞主义之思想”。

最近我华北將領在“华北抗战概況与今后形势估計”之一文中，曾有“日寇最近更無恥的提出什么‘打回祖國去’‘实现孙总理亞細亞主义’之类的口号”之具体报告。吾人提笔至此，回想首都淪陷当时，敌將松井亲至中山陵献花祭奠，武汉撤退后，报載敌对总理遺銅像特加保存等等，可知敌早已佈下剽窃三民主义之伏綫矣。（以上均見邵毓麟：“打击暴敌剽窃三民主义之新陰謀”，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公报”）

一六 日本的积极誘降政策

汪兆銘之流的响应，是在敌寇預期之內的。所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讀卖新聞”对近衛声明这样称讚道：“特别是那些顧念东亚的將来的憂国具眼之士，不問地域之南北，与东亚新秩序建設的声明相呼应，共同攜手，向此偉業的达成迈进的机运頓已釀成之秋，我国政府將中、日国交調整之根本方針向中外闡明，誠可謂机宜之措置。”敌人的和平原則——“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的三个藏着利刃的原則。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期待我国的統一战綫將会因武汉的陷落而分裂。但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由中共六中全会的決議，衡山軍事會議的决定，游击战术訓練学校的設立等等，証明国共的合作反而加强，即敌人也不能不承認这樁事实。……在第二期抗战开始后，敌人除了命令驻华各特务机关，从分化中国統一战綫找寻和平的机会之外，还希冀以近衛声明那样的花言巧語，“一面离間蔣介石將軍与共产党的威

情，一面挑起那些右派的爱好和平的心理。”（倫敦“太晤士報”社論）不管汪兆銘和附和他的德、意路線者，怎樣把最近由敵人的門戶關閉行動所激起的英、美態度的硬化，和具體的表現這事實的英、美借款，滇緬公路打通，作過低的估計，但在窘境中的敵人，不能不把這種新的國際形勢加以正視或重視，他的嘴雖然還是強硬刁蠻（如對英、美的抗議的復讞，和有田談話）。……東京“國民新聞”在評汪兆銘的行動的評論上，除了承認我國抗日統一戰綫加強之外，也不能不說：“蘇聯現已積極化，英、美、法動搖投機，不諒解日本真意，它們的局部利益會使它們的感情的行動帶危險性，戰爭前途殊為黯淡。”針對着這樣的國際形勢，近衛聲明想以威吓與欺騙並用的方法，來阻止英、美援華政策的繼續。甚至想使英、美等國以對付捷克的壓力，施於我國。近衛聲明中重復有田談話的“治外法權撤廢”和“租界返還”的話，對中國是一種釣餌，對英、美卻是一種威吓。同時，他聲明“日本無意在中國作經濟的獨佔，亦不要求中國限制那些理解新東亞的第三國的利益。”又強調“內蒙特殊防共區域”，以及“日本在華北和內蒙的資源開發上的特殊優越地位”，而不提華中、華南。這顯然是投給英、美特別是英國的一種甘餌。不過，事實上已採用門戶關閉的日寇，無論怎樣飾詞欺騙，已無法取信於英、美。近衛聲明的自相矛盾，與以前敵政府的表示的互相矛盾，更顯出破綻。所以向來主張對日妥協的倫敦“太晤士報”，雖也注意到日本要求獨佔的範圍只限於華北和滿洲兩地，但仍不能不說：“假如我們過信近衛所言，我們卻會變成笨伯。”前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英國致日本的通牒，更證明近衛聲明之枉用功夫。（思慕：“由近衛聲明到汪兆銘的‘建議’”，“世界知識”九卷三期，二

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一七 武汉佔領后敌人策略的重心放在誘降上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儲备相当力量南进，为了儲备相当力量对中国再作大规模的进攻，它必然爭取“速和速結”，以拔出已陷入中国持久抗战的深潭的泥足。我們过去曾說过：只要日本帝国主义还能在中国找出一絲一毫“和平”因素，則一千次失败之后，还要做一千零一次的嘗試的。新的求和策动的具体事实——第一，我們要知道在抗战第二期中，日軍所要集中进攻的是粵汉路，打通粵汉路是它將來战略上第一个任务；打西北，打广西，都是分散中国兵力，移轉中国注意的佯攻。但它在今天的确相当地撤退了長江一帶的陆軍，从湘、鄂、贛調走的陆軍据說已有八个联队，……据說是調到华北去“扫蕩”中国游击队的。日軍为什么將軍路进攻的区域調开一部份兵力？这正是响应汪精衛的“撤兵”主張，为通敌求降者（汪精衛代理人）預留投降活动的地步。第二，日本軍特务部本在积极制造“中央統一政府”，現在早停止活动了，后来因組織“統一政府”不成而积极制造“江汉政府”与“西南政府”兩傀儡。“江汉政府”的傀儡班头已找好一个符某（按：符定一，袁世凱称帝的劝进者）担任，而現在也奉令停止了。这又是为的什么？为的預留“和平”、“誘降”地步。第三，陈中孚等所謂“新国民党”諸汉奸，正在与汪精衛的嚙囉們进行国民党的“維新运动”，重造一个汉奸集团的“国民党”，日本和汉奸的报纸与刊物，正集中火力于“反共”、“反蔣”，不再宣傳“反国民党”了，而且“反蔣”的中心口号与内容，也限于“容共”、“袒共”上面。（“繼續粉碎日寇的‘和平’陰謀”，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导报”)

一八 敌人的新策略——政治与军事、经济 与武力、东方与西方的有机配合

日本最初的吞并中国的战略计划，是政治侵略与军事侵略并进，首先确佔华北五省，然后逐步蚕食兼併。……但这个计划在一九三七年底……已完全失败了。第二次的计划，是运用极大兵力，击破中国的军事主力，摧毁国民政府的政权，主要的以武力征服全中国。第三次的全盘战略计划，大体上原则有三：（一）政略与战略的有机配合。即一方面积极勾引所谓中国的“名望人物”，组织伪“中央政权”，稳定后方。别方面，移转自己的精锐兵力，去打击中国余下的中樞要害。（二）经济侵略与武力侵略的有机配合。即一方面积极榨取“佔领区”的资源，补充自己日趋衰竭的经济力。别方面，利用区内的中国的广大物力、人力，打中国人自己。以上两点，都是“以华制华”的具体化。（三）是日本单独的对华侵略与法西斯集团的国际侵略的有机配合。即日本一方面继续侵略中国，别方面努力使这进攻动作与目前和今后法西斯德、义轴心日益积极压迫英、法的动作相呼应。从整个上来看，日本这新计划，确比前此一年半的都毒辣，同时它更带一点真正应付持久战的性质，比较过去专打如意算盘，速战速决，盲目瞎撞，确实高明一点。这个新计划的障碍石：（一）新“中央政权”是否能圆满成立即是大问题，因为吴佩孚迄今还坚持着日军阀所不敢答应的条件，汪精卫那懦夫根本不见得有胆量当公开卖国贼。（按：这一点错了）（二）用中国物力、人力打中国的办法，在一方面，日本财阀意存观望，力量不足，不敢也不能太

批投資開發“佔領區”資源，別方面，游擊戰日益擴大深入，中國民眾愛國意識日益高漲，偽軍照過去經驗絕不可靠的條件下，是否能生宏效，也是問題。（三）……整個世界反抗法西斯怒潮日益高漲，美國日趨強硬，蘇聯的地位更臻重要，英、法不妥協政策也有漸變的可能。（“日本新的戰略計劃”，二十八年二月七日“導報”社論）

一九 遠東慕尼黑的極大危險

日本軍閥雖狂吠着稱已完成對中國“進行長期戰爭的計劃”，但他無時無刻不想與中國言和。……眼前日閥雖口頭聲明絕不參加解決中國問題的国际會議，然關於這種會議的接洽，確實在暗地進行中。日本迄今未答复英、美、法的照會，主要原因即在此。因此，日軍在此時之進攻海南島，自更含有在將來可能的国际會議造成既成事實的作用。可以預料到這樣的會議如果真正出現，日本一定會參加，而它的條件則主要的在北保有內蒙，在南保有海南島，以便將來進一步膨脹的切實根據地。至於其他被侵入各省，則它或將在“撤兵”“門戶開放”等問題上表面讓步，只要中國能與他“親善”、“經濟合作”、“共同防共”。一方面，他正在實事求是，努力加強“地方政權”，組織所謂“江漢政府”之類。別方面，他在進行更大規模含有国际性的陰謀。這陰謀的主要企圖，是壓迫和誘騙英、法兩國來用国际會議的形式（公開的或秘密的）強迫中國與日本妥協，雖然日本表面上會聲明不願第三國解決中、日衝突。在這裡，它同時用兩種手段：北面對蘇聯挑釁，向東四省增兵，預備在三月十五日（一九三九）漁業拍賣問題發生公開衝突時，對蘇聯至少像張姑峯那樣來一下，借此對

英、法表示它已实行“反共”，讓英、法好劝中国講和。南面，进攻海南島，甚至或进一步在粵南、欽州、防城等与安南交界的地方登陆一下。强力威胁英、法，特別法国，叫它們压迫中国接受和議。……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將帮忙替它向張伯倫和达拉第做一番功夫。……关于汪精衛，日本原是不願意他走出重庆的，但那懦夫已經走出，自無法挽回，可是日本决不要他跑到南京或北平当公开汉奸，变得和王克敏、梁鴻志一样。日本要把他留在南方（最好是在香港，但在河內亦無不可）做下列三件工作：（一）与留在重庆的替身通声气傳命令；（二）陰謀勾結华南的一部份將領；（三）如有可能，更与法国的投降主义者勾結。認為汪精衛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將來还可以起極惡劣的作用。（“日本的新陰謀”，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导报”社論）

二十 喜多特务机关長的和平計劃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重庆路透電：自重庆方面接获喜多所提出之和平計劃后，各方多表示諷刺嘲笑，及極度輕蔑之态度。对于日本研究有素之官員，發出如下之評論：日本採用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表示日本在精神上对华屈服，即平沼及坂垣亦公开在国会中討論三民主义問題，並重行加以解釋。惟華人必無相信日人所制造之“三民主义”者。……喜多身为北平特务机关之領袖，为日本軍官公开拟定和平程序之第一人。东京方面早有求和之意，当初曾由北平傀儡出面呼吁和平，毫無結果。目下日人对于和平事件已急不能待，是以乃亲自提出和平。……据未証实之报告，喜多自战事發生之初，即反对准备对华作战，是以曾努力阻止上海事件之爆發，唯結果失敗。喜多之夫人为華人，是以渠对

于中国事件頗为明了。渠个人亦善作华文，东京方面选之为求和之人，实系一种成功。唯日方新和平计划之錯誤，乃不知华人不易被假国民党及重行解釋之三民主义所欺騙也。（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申报”）

二一 日本七十四屆議會中所反映的对华政策

策略已經轉變
——以战为主到以和为主

二十三日众議院的总預算会，东方会的由谷义治，曾提以下的質問：“去年（一九三八）一月十六日的声明，不以蔣介石为对手的态度，轉換为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声明，这种动摇变化，在帝国的态度上，实在是不可容許的。”对于由谷的質問，首相与外相虽都答以日本的政策並無变动，尤其陆相与海相曾坚决表示，在“蔣政权”未潰灭之前，决不停止軍事行动。实际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基本政策虽無变动，但它因为力量的不足，它目前的策略，至少可說已經动摇了。不仅近衛声明前后内容不同，就是对它們所反对的，認為是阻碍日本征服中国的主要原因的三民主义思想，也加以种种污蔑，預备盜用了。……而陆军大将荒木文相的答辯为：“中国的三民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是不錯的，我以为非加修正，再施教育，沿新中国建設之綫指导不可”。而横蛮的陆相也說：“三民主义阻碍新东亚建設的思想，必須努力驅除，我以为須加修正，使与东亚的建設精神合致才可。”……中、日战争之后，对于思想問題極注意，就是創立一种荒謬的“新民主主义”，想以之代替三民主义。由这次議會对于修正三民主义的討論，可以明白敌人的一切对华政策，現在都已呈現动摇之象。

(吳斐丹：“日本七十四屆議会的開幕”，“世界知識”九卷二期)

無意撤兵，
三民主义
是要利用的

日本第七十四屆議會关于对华方針之答辯：一月二十四日，坂垣对东武关于对华方針之質問，答称：“对国民政府更当以实力排除之，自不待言。至軍事行动，不能明言，但可奉告，並未松懈。”同时，米内海相亦答称：“在国民政府潰灭以前，絕不收兵。”三月四日，坂垣答原口之質問称：“关于倒蔣，原則上不外用武力；但其他方策，亦正在講求之中。”同时，平沼亦答称：“倘蔣政权翻然悔悟，接受我方建設之方針，亦無加以敌視之必要；惟彼現已淪为地方政权，自不得視為中央政权与之交涉。要之，政府仍希望中国出現与我国交涉之中心。”关于树立傀儡政权問題，一月二十五日，平沼答阪谷之質問称：“長期建設問題，如俟抗日政权消灭后着手，則嫌太迟，故与扑灭抗日政权並行。至中国將來政权之政体，不能預言，中国情形在大体上，先有地方政权，随后成立中央政权。”

关于駐兵問題，一月卅日，坂垣答北聆吉質問称：“包括相当广大之区域，經相当長时期之駐兵一节，現正在考虑准备中。”並謂：“陸軍对于华中、华南，絕對未加輕視。”“近有从华中、华南撤兵之傳說，此全屬謠言，絕無其事。”

关于三民主义問題，一月二十二日，平沼答安藤正純之質問称：“三民主义問題，应充分研究后再决定态度。”坂垣亦答称：“三民主义違反东亚新秩序之指导精神，其內容修正后，自当別說。”二月二日，平沼答水谷長三郎之質問时，亦表明对三民主义应加修正。（楊云竹：“日本第七十四屆議會之輪廓”，“时事

月报”二十八年四月号)

又据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同盟电：坂垣在議會答問謂：現在研究如何使在华軍隊衣食住自給自足。又謂：日軍必須駐于中国較广大之面积，時間亦較長，否認欲將軍隊由华中、华南撤退之謠言。

縊鬼式的和平
——杀人
不見血的政策

在这次（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敌議會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上兩種事实：（一）对于我們中国的公然侮辱；（二）灭亡中国的陰謀毒計。关于第一点，真是多不胜举。（1）平沼的議會開幕詞，謂“日出而万物滋長，……中国应理解及此”，真是荒謬絕倫，不知所云。（2）敌議會又公佈所謂“东亚新秩序”的定义，謂“所謂东亚新秩序，即日、“滿”、支各維持独立，保持个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互相連环，以确立东亚之新秩序”。拥暴日为“家長”，使他高高在上，居于“指导”的地位。一般妄人更附会其說。如藤澤亲雄，在“东京外交时报”，發表“建設东亚新秩序的思想推进力”一文，說了一篇所謂“神国”的鬼話，主張称日皇为“皇尊”，称日本为“皇御国”。关于第二点，暴日的陰謀毒計，在这次議會中，暴露出兩個重要之点：（1）在全中国永久駐兵；（2）制造縊鬼式的“和平”。上月三十一日，敌議會討論駐兵問題，坂垣明白主張，不仅要在华北駐兵，华中、华南也同样。暴日另一毒計，便是縊鬼式的“和平”运动。暴日的鼓譟“和平”，固足証明它內心的着急，企圖速和速結，同时也是一种最毒辣的政治进攻。暴日現在，一面加紧軍事进攻，並圖永久駐兵全中国。一方却大彈縊鬼式的“和平”之調，真是兇頑無恥之至。（二十八年二月八日“大

公報”社論)

二二 四月十二日平沼演說表示日本灭亡 中国的基本方針是不变的

四月十二日平沼在精神大会中講演，謂日本繼續前进，目的有三：（一）推倒国民党政府；（二）大陆之發展；（三）国家資源之补充。（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同盟电）

二三 四月十二日小磯謂解决中日問題將 採最迅速有效办法

四月十二日小磯拓相向記者談称：“平沼內閣之使命，在于解决中、日事件，將採取最迅速最有效之办法以遂行之，現已拟定具体計劃，但此事关系其他許多問題，困难甚多。”（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同盟电）

二四 五月六日有田謂日本与大陆同生死

五月六日，有田發表外交演說，其要点为：（一）日本排除一切困难，以建設东亚新秩序；（二）日本無意完全排除外国利益，在無軍事行动之必要时，該地即可恢复以前状态；（三）日本外交置重于反对共产国际之破坏政策，將使防共协定更加强化；（四）日本与大陆有同生死之关系；（五）日本要領導中国实现东亚永久和平之偉大理想；（六）为以上目的，日本須發揮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力量。（二十八年五月六日同盟电）

二五 五月十日日本外务省發言人謂实行 亞洲地域自治为上帝意旨

五月十日外务省代言人解釋大亞洲主义云：“目前总的趨勢，

是世界上分成若干大地域，此为指揮人类事業之强大不可見之力量。如果亞洲單獨落在他人背后，对时代趋向沒有觉悟，即等于違背上帝意旨，其結果必趨于毀灭。吾人只要环顧亞洲，必能看出此願望如何在各处青年心胸中燃燒着，此为反对欧洲集权之分权，發展成为地域自治之明显标記。”（二十八年五月十日同盟电）

二六 日本的大帝国夢想

日本需要忍耐的期間，此后不会很長。更具体点講，英、美大准备完成之前，日本如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設，确立“东西新秩序”，对于任何人也就不必还有介意的必要。日本为民族生存的必要，欲在中、日間确立經濟上連环关系。同时，鑒于东亚安全的要求，是有將中国包容于国防圈內的义务，即中、日、“滿”三大独立国，有以特殊的結合而永远維持其关系的必要。当此种状态完成之日，日本在它的鄰接地上，可以拥有無限物質原料供給地，广大的民族活动地域，以及广大的市場。而且这些地域，海陆的聯絡極為近便，而国防綫之集中亦易于确保其安全性。于此各点，日本至少較遙远的英国等是可以佔有最受惠的情势，尤其中国，在領土以及資源关系上，美、苏兩國对之也要稍遜一筹。日本如能称願，自可由“無”的国家变为“有”的国家。同时它的国情兼备海洋国与大陆国，佔有世界無与倫比之地位，成为世界卓絕的重鎮。（“日本之將來”，巴黎“外交时报”，八十九卷四号之时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編者按：此文該报轉載时未載作者姓名，按其語意似日本人作的。）

二七 敌报“国民新聞”謂基本的侵略方針非貫徹

不可，否則有德俄革命危險

日本“国民新聞”社論(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云：“眼前现实的課題，已不容寸尺后退，瞬間躊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統制有疏漏，則不但將喪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上有过教訓。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須得深加洞察。”(麦逸：“敌报悲鳴录”，“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二八 一个英国記者謂日本决不能放下已經

拿在手里的劍

双方的軍營里，無疑的都存在着和平的期望，但作战的意志还在热烈的燒灼。如果想日本会屈服于和平的要求，这便是荒謬可笑。如果相信蔣介石將軍会屈服，也是同样的荒謬可笑。去年一月，日本帝国會議通过一条議案(編者按：指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御前會議决定而于十六日宣佈的不承認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一条)后来又再加一个証实。这个議案，便造成了一个差不多不能克服的壁壘。……如果日本与蔣介石談判，其在国外的威望，尤其是在国内的威望，又將因此喪失，这是它現在所不願接受的，也是它所永远不能接受的。……自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来，日本調往中国軍隊的确数虽不明白，但相信已超过一百万以上。……日本决不敢冒險締結一个为这一部份在中国的軍隊所不能接受的和平。……在华日軍紀律廢弛，現已到了非常显明的地步。这样的一种軍隊，如果他們的希望和野心受到了藐視，結果一定

非常危險。……最近在这局面中，却發生了一个新的因素，这也許可以成为一种有力的动机的。这便是东京政府所謂“东亚新秩序”的幻觉。在这一种新秩序中，从庫頁島到新加坡，或者更远的地方，日本將拥有最高的地位。英、美及其他外国，固然可以取得一个地位，但这个地位將由日政府授与之。这个“东亚新秩序”的幻觉，日本將成为一个極大的君主，而以亞洲其他各国以及外国在远东的利益，一律处于奴隶的地位。所以無怪，这就眩动了所有日本人的眼睛。日本是一个較小的国家，在七十余年中經過了从封建主义到現代国家的長途，虽然有許多封建色彩还有力地牽連未去。日本深覺它还没有达到平等一致的地步，並且認清，在某几方面，特別是在原料上，它还没有获得。現在要达到这种平等或甚至优越地位的机会，似乎唯有准备把劍握在手里。劍已握到手里，日本自然就覺得，在它沒有完成它的要求之前，不必把它放棄了。……日本如今深望与中国議和，但这种和平，須受日本支配，它覺得除了繼續作战，除了不惜任何代价繼續向中国内地深入直至蔣介石与全中国承認它們已被打至屈膝外，便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日政府曾說，此次战争，沒有和約，只有政府所發出的和平宣言。这就必須使中国降至完全薄弱無力的地位，所以更無需跟它进行談判了。日本軍隊当然热烈的希望如此。中国的抵抗与民气的力量，是出乎日本的意料的。但如今这些既是事实，于是就必須根据现实活动。……日本非至到了中国完全沒有力量，只能空想着报复再生的时候，决不滿足。从日本看来，和平的希望在未来的几月或是未来的几年中，当然非常渺茫。（“日本为什么要坚持征服中国”，Frank H.Hedges 原著，周新譯，“世界知識”九卷三期，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第三編 侵略战中日本的軍事与战略

第一章 敌人的兵力

一 敌人究能出多少兵——九种不同的估計

第 一
种
估 計

——謂日本可武裝四百三十万人上前線支持四年。

日本在兵役年齡中的男子，現在有六、四九四、一七五人。据世界大战中的經驗，这些人里面，到了战争爆發后，必有許多不能动員到前綫去，留在軍需工厂里和运输机关中工作。例如，德国在一九一六年底，一千五百万兵役年齡中的男子，只有九百五十万进到軍隊里去，有五百五十万不能調进去。其中二百万，是根本不能打仗的；其他，是要在各种生产部門中工作的。我們可以假定日本現在有五百万到五百五十万人是在工業中工作的，而其中約三分之二可以調入軍隊中。这是最高限度的数目。因为在德国，这个数目后来就証明不确。一九一六年十月，在一百个工作定額中，只有六十四人应征。如將这种計算方法运用到日本，那末可以調到軍隊里的壯丁的最高数目，是四百三十万人。

据貝茲氏調查，日本有二百万人曾經入伍过。也有其他的著作家估計，入伍过的人数有二百七十万人。不管怎样，从我們上面所引的兵役年齡中的男子和受過軍事訓練的人的数字来看，在人力方面，日本于作战第一年間武裝起二百五十万人来，並將其中

一百万动员到前方作战，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达到这个结论以前，曾考虑到这样一个军队所需要的兵力的补充。即如法国，在欧战第一年間所损失的人员，估它最初开到战场的军队的百分之八六。帝俄，在欧战第一年間，因陣亡、重伤、疾病、被虜、逃亡等，军队所受的损失，估它第一次动员部队的百分之一三〇。

我们如果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破坏性，和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以后战争技术的猛进，我们可以预计，日本在战争第一年中所损失的人员，应该不下于它最初动员到前方的部队的百分之一百。但是，这些损失并不是完全失去作用的。就世界大战的经验言，受伤的士兵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平均经十天疗养就可复原的，百分之五十经三十天乃至四十五天就可以复原的，此外，还有的是因疾病临时不能作战的，有的是给病假回里的。第一次大战的经验，是一年間完全损失的部队，估战场上部队的百分之六十四。

如果我们接受上面所提出的日本军队的数量，并假定不会超过这个数量，那末，日本军队每年的损失，当在六十五万人左右（即作战部队的百分之六十四）。因此，单论日本的人力，可以够两年半作战之用。在这个期间内，有五十万人（每年二十五万左右）可以达到兵役年龄，到第三年头，就形成一批新的后备兵。在实际上，人力的供给是可以应付比这多少更长久些的战争的。我们来看德国工业中免除服兵役义务的工人，其中调入军队里去的，有三分之一。在日本，决不到这么大的数目。日本军队中产业工人只估百分之十五。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因素加以考虑，再添上我们所估计的日本能够征调的军队，那末，它在兵力的补充上，预料可以支持四年。

指揮这么大軍隊的軍官問題，怎样解决呢？据一九三〇年的統計，日本現役士官有四万四千名，后备役士官有十一万人。此外，后备部队可以借拔擢后备的曹長和老兵来充下級軍官。至于將校，現役中有一万三千名，后备役中有三万五千名。自一九二八年以后，日本軍事学校和軍官学校每年畢業的受了完全軍事訓練的軍官，总计五万名左右，其中將校約有四分之三（按即三万七千五百名），这些还没有列入以上后备役的数目中。这样看来，一旦有事，立刻征調七万三千名軍官，是可能的（按即后备役的三万五千名，加軍校畢業的三万七千五百名）。

以軍官和兵士为一与三〇之比來說（一九一七年德国的比率是一比二六，法国是一比三二），这样数目的軍官，是够动员二百二十万士兵之用的。此外，有二万五千軍官是現役和后备役中的軍医和技师，这些人員加上由后备役中老年士官拔擢出来的軍官，就可以充当后方的任务。这些士官如果加上新拔擢的后备的曹長（姑且总计十万人），那末以一个士官的統率能力为一比一一，这些人就可以統率起三百万軍隊。（按：此段不清楚，大概数目字錯了。）

最后，依欧战的經驗，战争期間內，軍官是可以大量訓練出来的。我們回想帝俄当时受过教育的軍官比现在的日本还少，但在战争中却訓練出二十二万八千六百四十六名軍官。而原有的現役軍官不过四八、八〇〇名，后备役的軍官不过三三、〇〇〇名。但是这也不見得因此便可以無限的扩充軍隊。理由有三：（一）軍官的損失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經很重。將來的大战，因了种种深入后方的战术，特别是化学战争之故，这种損失率一定大大地加重。（二）在日本軍隊中，軍官的損失率，一定比在欧洲

諸國軍隊中重得多。因為日本軍事法令中有一條牢不可破的傳統的規定，就是：“軍官必須以其自身在槍林彈雨中之勇敢及鎮靜精神，激厲士卒，並將對其本人之信任心，貫注于士卒之中。”

(三) 在戰爭第一年中，日本平時所訓練的軍官是很容易被消滅完了的。而為了動員我們上述的數量的軍隊起見，這種軍官又是絕對必要。因為如此，我們可以預料，日本在一開戰時，就必然要大量訓練起戰爭期內所需用的青年軍官。這個期間內訓練出來的青年軍官，必定是大批地派到前方，抽替平時所訓練的軍官。這個當中，並沒有多大的餘裕。（以上均見“當日本作戰的時候”，塔寧、約翰合著，劉尊棋譯，頁七八——八二）

第	二
種	計
估	計

——謂日本僅能動員一百八十萬人上前綫編成百零二個師精兵則只有百二十五萬只能編六十四師。

在名義上，日本的常備軍，雖只有二十三萬人，其實，合計起來，共有常備兵力三十萬人。台灣、朝鮮等地的殖民地軍隊，還不算在內。滿洲的傀儡軍隊，人數也在十萬以上。

關於日本陸軍後備軍的兵力，因為它們是實行征兵制的國家，而且在鄉軍人人數亦在五十萬以上，所以，一旦動員起來，其數量可以達到平時兵力的七倍。召集總數，為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約七百五十萬）。其中可以參加戰鬥的兵員，為總召集員的四分之一（約一百八十五萬）。軍需工業直接間接之從業員約為戰鬥兵員之一倍七（約三百万）。如果將這些可以參加戰鬥的兵員統統編制起來，那末可以共編成一百零二個師。如以質素而論，挑選比較年富力強的壯丁來編制，則僅能編成六十四個師，

約計战斗兵員一百二十五万人而已。这是日本竭澤而漁的陸軍兵力了。（本段估計，根据“陸大月刊”阮楚堆君“建軍論”一文，与周傑君：“显微镜下的日本”，頁三七）

日本之海軍實力

战艦（主力艦）	九艘	二七二、〇七〇吨
	新五艘	一五四、七五〇吨
	旧四艘	一一七、三二〇吨
航空母艦	新六艘	八八、四二〇吨
A 級巡洋艦	一四艘	一二三、五二〇吨
	新一二艘	一〇七、八〇〇吨
	旧二艘	一五、七二〇吨
B 級巡洋艦	二六艘	一四四、三七五吨
	新一一艘	一二五、九九五吨
	旧五艘	一八、三八〇吨
驅逐艦	一二二艘	一五二、二七〇吨
	新八二艘	一一四、四〇〇吨
	旧四〇艘	三七、八七〇吨
潛水艦	七〇艘	八六、〇四九吨
	新五八艘	七六、一三一吨
	旧十二艘	九、九一八吨
总艦数	二四七艘	
总吨数		八六六·七〇四吨

（“显微镜下的日本”，頁三九）

日本空軍的力量

陸軍方面有飞机一、四五〇架，人員九千一百人，設八联隊，下分偵察机、战斗机，各十一中队，爆炸机四中队，又有气球队

二队，各机所裝馬达全由渡边少將設計，而由政府所設制造厂制造，不仰求于外国。海軍有飞机九百架，人員一万，分編三十六队。此外尚有民用机二三五架，于急要时多数可改成軍用机。

(“显微镜下的日本”，頁四〇)

	摩托	升五 公里 需时	每小时速 度(公里)	高公 里	載重 (吨)	远 極 (公里)	武装
偵察机(輕炸机)							
他国	800	未詳	380	—	1	1200	未詳
日本	700	未詳	260	7	1.2	未詳	机槍三
战斗机(扑击机)							
他国	1000	5—6	450	10	未詳	未詳	机槍二砲二
日本	750	9	290	7.42	未詳	未詳	机槍二
中炸机							
他国	2×1000	未詳	350—400	—	3.5	2000	机槍四
日本	2×700	未詳	220	5	3.26	未詳	机槍五
重炸机							
他国	4×1000	未詳	380—400	—	未詳	2000—4000	
日本	4×650	未詳	214	3.1	10	2000	机槍六砲一

此表他国是一九三六中正式配备，日本是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初的情形，根德国“防空月刊”一九三六年一号至三号，一九三六年初日本空軍总数二千架，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可能增至二千五百到三千架。

(刘剛：“日本不能支持長期战争”，“时事月报”十七卷六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号)

第 三
种 計
估 計

——謂日本經濟只能供給二百万軍队即八十个师的需要並且战斗力是很弱的。

据苏联軍事家塔宁和約翰的計算：“日寇在兵役中的男子，現在有六、四九四、

一七五人；但据欧洲大战时动员的限度，这些兵役中的壮丁，需要三分之一留在军火生产及其他必要生产的产业部门，可能动员的只有三分之二。如用这个方法来计算日寇的兵力，它可以征调到军队里的壮丁，是四百三十万人。”另据我国军事机关照日寇兵役制及在役人数的推算，现役兵三十八万人，预备兵役六十七万二千人，后备兵役九十一万人，第一补充兵役一百五十四万三千人，第二补充兵役八十四万七千人，第一国民兵役九十七万四千人，另有未达适役年龄及体格不合的四百余万人归入第二国民兵役。所以，确实可以动员的数目只有前五项兵役，五项合计，共为四百二十余万人（按：从现役到第二补充兵役五项共计四百三十五万二千人，从预备兵役到第一国民兵役五项共计合计为四百九十四万三千人，均与此文不合，原文数字恐有错误）。这两种计算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结果是一致的——日寇可动员的兵数是四百三十万人。塔宁、约翰又引用贝兹上校的调查，说日本有二百万人入过伍，“在战争的第一年可以武装起二百五十万人来，以一百万人在战场作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们又说：“根据日本各种经济统计，目前日本动员的准备力，不能超过二百万军队的需要。并且在飞机、坦克车和汽车等输送工具上，与需要程度相差很远。”当然，他们估计的时候是在一九三五年，近两年日寇的备战是疯狂到极度的，军事准备水准自然更提高得多了。所以，在战争总动员的一年以后，日寇供给二百万军队——八十个师团的需要，是可能的。我们相信日寇现在有供给八十个师团作战的能力，但是这些，以后备役、补充兵役佔绝大多数，而只有极少现役作基干的新组成的部队。它的一般的教育与训练的水准，是较差的。武器装备，在日寇的军事工业动员的种

种难以克服的缺陷之下，也不得不是較差的。所以，他們的战斗力，也是較薄弱的。

此外，还有几点應該提出。第一，就是它征調殖民地的人民与运用伪軍，胁迫我东北同胞当兵这一点。先退一步說，假如这些兵就真算是兵罢，这是擴張它的人力。然而，这並不能推翻兵力擴張的另一个限制——工業总动員的不可克服的弱点的限制。而况，事实上，这些兵絕不能算是兵，他們絕無斗志，更不会有坚持的斗志。这种軍隊無論日寇採取如何的編組方法，也絕不多發生战斗力。这种軍隊，以及个别的兵，只有日寇用来加紧消耗它的給养而已。

第二，是关于日寇現在每年到达軍役年齡能够入役的額数。我在前述拙著上說过：“日本現在每年到达軍役年齡的，約在二十五万人左右，然而因为积年的高度剝削与極端貧困，日本平民的体力与健康可惊的衰退。过去十年来，陆海兵役的受驗青年，不能入伍的百分比从二十五升至四十。在几个大城市和不幸的农业区里，有二分之一的青年不配服兵役。如果我們折中計算，二十五万到达兵役年齡的，百分之四十不能上戰場，則每年可增的新兵只有十五万人。

第三，是日寇士兵的战斗精神的墮落。日寇的士兵，主体是日本农工大众，他們有的是被軍閥欺騙麻醉着。有的是根本不願作战，反对作战，而被强迫来中国作战。他們知道这个侵略战争对于他們絕無好处，以只是叫他們送死，叫他們家庭貧困飢餓。他們絕对沒有战意。被欺騙被麻醉的，来中国苦战后，也清醒了。日本反战运动，在人民中，在軍隊中，暗潮正在醞釀發展。根本沒有战意以及失了战意的兵士，虽在被迫作战，然而战斗精神是

萎弱的。近来，日寇军官及士兵因反战运动被杀者，层见叠出。同时，兵士的自杀、思乡病以及军纪的败坏，这种情势的发展过程，就是军队战斗精神与战斗力的日益衰弱的过程。日寇军队的这个质的因素，比起量的因素——兵力的不足来，是更严重的弱点，更严重的危机。（凌霄：“日寇兵力的检讨”，“战时日本”一卷一期，二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第	四
估	計

——謂日本能动员一千三百万人海軍有八十万吨飞机一千六百余架。

日本有七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口，能够动员的士兵达一三、〇〇〇、〇〇

〇人。陆軍有二三二、〇〇〇人，虽然，最近的事实指出，真实的数字几达四〇〇、〇〇〇人。海軍的吨数共为八〇二、二六二吨，包括主力艦九艘，航空母艦四艘，巡洋艦三十五艘，魚雷艇一百一十二艘与潛水艇五十七艘。在建造中的，有主力艦二艘，航空母艦三艘，巡洋艦三艘，魚雷艇十五艘及潛水艇五艘。

空軍有飞机一、六七〇架（在这次战事发生前），飞行人员二一、〇〇〇名，官佐六、〇〇〇名。

目前的日本，由于在华的战争，人力与金錢兩方面都得負担一个巨大的耗費，在前綫作战的兵士的数目，也許並不太大。海軍方面有了一个巨大的增加，兩艘四〇、〇〇〇——四五、〇〇〇吨的非常巨大的主力艦正在建筑中。关于空軍的数字，我們已經估計得非常接近了。（“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的軍力比較” C. Talouis 原著，李風譯，“文摘战时旬刊”第四十号，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第五
种
估計

——謂日本虽然能动员六百万人但必引起經濟破产。

目下日本男子人数为三千四百七十七万人,这些人數之百分之四·六,等于一

百六十万人。这里我們是以为日本軍隊增到这个程度,不至使他們国民經濟大受震动的。然而現在的日本軍隊差不多已达到这个程度。自然,日本是能动员至六七百万人,但这必不可避免的会使經濟破产,並引起国内政治的紛扰。(“战争一年后的日本軍隊”,“文摘战时旬刊”三十三号,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第六
种
估計

——謂日本只有三百万人服兵役現已編到一百二十三万人即四十一个师团四百五十个团。

今日日本之侵华战争,它已有近数十年之准备,它在与英、美一离一合的工作中准备侵华战争,它在镇压其殖民地的的工作中准备侵华战争,它在与苏联胡鬧的工作中准备首先侵华的战争。可是它終竟是先天不足的帝国主义国家,因而反映到它軍事力量上只有兩年半的作战能力。战争延長到六年,它的壯丁几乎可全部灭亡。战争延長,日本的死伤,反会越大于中国的死伤。因为中、日战争之延長,中国的战略战术及战斗方法,必日益优于日本。以下是日本兵力的总計:

甲,在蘆溝桥事变以前日本陸軍只有一八三团,計十七个师。

(日軍师团表)

(所轄团数)

近衛师团

十六团

第一师团

十四团

第二师团	九团
第三师团	十六团
第四师团	九团
第五师团	九团
第六师团	八团
第七师团	九团
第八师团	十团
第九师团	八团
第十师团	八团
第十一师团	八团
第十三师团	十五团
第十四师团	八团
第十六师团	十一团
第十九师团	七团
第二十师团	十一团

(共十七师团, 一七六团)

外 加

高 射 砲	五团
战 車	二团
合 計	一八三团
(团的种类及名称)	(数量)
步兵	七一团
騎兵	二五团
砲兵	三五团

工兵	一七团
輜重兵	一四团
铁道	二团
电信	二团
飞行	七团
汽球	一团
骑砲	一团
高射	一团

(共一七六团)

外 加

高射砲	五团
战車	二团
合計:	一八三团

乙, “八一三”前后, 日本新編有二十四师团:

(日軍新师番号)	(轄有名称兵团数)
第一〇一师团	一四团
第一〇二师团	九团
第一〇三师团	一六团
第一〇四师团	九团
第一〇五师团	九团
第一〇六师团	八团
第一〇七师团	九团
第一〇八师团	一〇团
第一〇九师团	八团

第一一〇师团	八团
第一一一师团	八团
第一一二师团	一五团
第一一四师团	八团
第一一六师团	一一团
第一一九师团	七团
第一二〇师团	一一团
(共十六师团)	(一六〇团)

丙，傳說有兩種暫編师，共八师团：

(暫編师团番号)	(轉有暫編新兵师团番号)
暫編第一三师团	第一一三师团
暫編第一五师团	第一一五师团
暫編第一七师团	第一一七师团
暫編第一八师团	第一一八师团
(共計八师团約計百团上下)	

丁，謠傳日軍中有兩個秘密：

一是日本在东三省隱藏了七师团常备兵。用什么方法隱藏的，究竟有無番号，尙不詳知。傳說“九一八”以后，它在东三省編有六个师团，其番号如下：

第二十一师团	第二十二师团
第二十三师团	第二十四师团
第二十五师团	第二十七师团

二是到“八一三”以后，又抽精兵編七个师团，其番号为：

第一二一师团	第一二二师团
第一二三师团	第一二四师团

第一二五师团

第一二六师团

第一二七师团

假設这种傳說是真正可靠的，則日本放在滿洲方面尙有十四师团兵力，自吹有五十万精兵打苏联，莫非指此？

撇开上面的謠傳不算，那末日本現有总兵力不过四十一师团或四百五十团之譜，已編到一百二十三万人上下。日本如果只三百万人服役，那末它也仅只一百二十三万人可以上戰場：

第一，日本現役軍人只有二十五万人上下，由一百二十三万減去二十五万，可得新受編者九十八万（“常备”：“新編”=1:5）这在軍隊中的質量上已成了大問題。

第二，日本由蘆溝桥事变到現在，快十个月，可收新入伍壯丁，連犯人及花柳病肺癆病者，三十万上下。但十个月战争，死伤者已达三十五万人上下，新壯丁与死伤者对消，还欠五万人。加以伤者五万人可以复原，也恰保水平，無一壯丁可多，这在軍隊扩充的前途，是大問題。

第三，日本每年只能产生壯丁五十万人，但中、日战争打得好，每年可打死及打伤日本兵一百万上下，因新兵越多，死伤率越大。只要六年，日本壯丁不死光，即皆殘廢，这更是日本一大問題。（“战不得的日本”，上海“道报”五月七日。“半月文摘”二卷八期，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第	七
种	計
估	計

——謂日本可以动员作战的全部軍力只有二百四十万人，虽然連帮助作战人員計算共可动员六七百万人。

据苏联蔡霍夫的估計，当日、俄战争时，日本动员参加作战的兵力，約为全男子数的百分之四·六，

計百十萬人。照此推算，目下日本男子人數為三千四百七十萬人，這些人數的 4.6% 約等於百六十萬人。另據上海“大美晚報”統計，約可動員二百十四萬餘人，這是日本可以動員作戰的全部軍力。如連間接幫助作戰的部隊也計算在內，那末可動員至六、七百萬人。（王紀元：“第四期抗戰敵寇軍力的估計”，“世界知識”八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第 八
種 估 計

——謂日本能動員來華直接作戰軍隊至多不過二百三十萬除去滿洲駐軍四十萬只有一百九十萬再除死傷八十萬至去年底止只有一百一十萬。

照日本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征兵統計數目，計現役兵為二百萬零六千，甲種補充兵為七十八萬，乙種補充兵為一百三十九萬八千，總數為四百十八萬四千餘人。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死亡統計數目，男子由二十三至二十五歲之死亡率佔百分之八，（而在兵役年齡的男子為六百六十二萬三千人）依此率推算，死亡數為五十二萬。此外，在東北事變死亡人數，據海陸軍部公佈為十七萬一千餘人（實際當不只此數）。上海事件死傷人數，未見有整個數字發表，照最低推測，要在三萬左右。此三項死亡統計，共七十三萬人，將其扣除後（按指自四百十八萬四千中扣除），可知在蘆溝橋事件發生時，日本能動員之現役與補充壯丁，應為三百四十五萬餘人。據軍事專家的計算，日本在本國駐防軍隊以及從事於重工業工廠警察等，至少要抽出上列壯丁總數的三分之一，故現在能夠動員的軍隊，至多不過二百三十萬。另由蘇聯遠東紅軍的佈置觀察，據日本陸軍省發表數目為四十萬，日本為對抗起見，在朝鮮、東北的駐軍，至少亦有與紅軍相等之數

字。由此可知，現在到我国作战的兵力为一百九十万。由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止的死伤人数，敌方公佈为四十万，但此項数字，乃敌閥为蒙蔽国内外視听，故意減低，其死伤至少有八十万，故現在作战兵力，可断定为一百一十万。連同不能作战斗員的壯丁，如所謂宣撫班、通訊班、其他等等，要在三十万人上下。因之新兵已無法补充。照本年一月二十五日櫻內农林大臣答議員問謂：“国内現已的确感到劳力人員不足”，由此一語，可說是無新兵补充的一个鉄証。（蕭学海：“日本总崩潰之時間問題”，“大公报”，二十八年三月二日）

第	九
种	計
估	計

——謂日本可以动員五百万人上前綫。

在日本的兵役法，非日本人沒有当兵的資格，所以現在只須研究內地的人口就已經够了，日本內地人口据最近之国勢調查，为數約七千万（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国勢調查），确数为六九、二五四、一四八，日本每年約增加一百万人口之譜，那末到一九三九的現在应有七千二三百万人。

按一九三四年日本內地人口为六四、二二五、一四〇人，在兵役年齡（二〇——四〇）中的男子有六、四九四、一七五人（据日本帝国統計），也就是內地人口与在兵役年齡中的男子之比例为一〇〇：一〇一強。那末，依照这个比率去推算，現在日本內地人口为七千三百万，則在兵役年齡中的男子，应有七百三十七万三千人，除掉廢疾者，則实际不能到此數。

据欧洲大战时的經驗，这些人到了爆發战争后，並不能完全开到前綫去，勢須有三分之一的人數留在軍需工厂和运输机关中

工作，那末可能動員到前綫的只有三分之二，如將這種方法應用到日本則可以征到軍隊里最高數目是四、九一五、三三三人。

現在不妨舉幾個歷史的事實作個參考的比較：（一）在歐戰初年，英國武裝的軍隊佔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二）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大戰的十八個月的中間，日本武裝的軍隊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人，即其當時全國人口（四千五百萬）的百分之二·六強。（三）日、俄大戰時，日本動員了的為一百一十八萬五千人，此外有軍事訓練和經驗可以動員起來的尚有二百七十二萬七千人沒有利用，如把兩項合計起來，就有三百九十一萬二千人，即其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六強。

如用現在內地人口數目去推算，其公式如下：

$$73.000.000 \times \frac{5}{100} = 3.650.000$$

$$73.000.000 \times \frac{2.6}{100} = 1.898.000$$

$$73.000.000 \times \frac{8.6}{100} = 5.278.000$$

假如它可以動員的能達最高限度百分之八·六的三分之二，那就是四百一十八萬五千三百三十二人。按日俄戰爭歷史的事實去估計，此次可能動員到四百十八萬多。按歐戰兵役年齡者三分之二可以征到軍隊的經驗去估計，此次可能是四百九十多万。但我們須加以研究的是：（一）我們正在繼續着的神聖抗戰早已越過了為期十八個月的日俄大戰，日本被我們的拖拉，已經深切的了解這次戰爭的長期性。（二）日俄大戰時日本是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时代，除了在滿洲為着爭取殖民地而敵對而衝突之帝俄以

外，無什么外患或內憂，但是現階段就大非昔比了。現在它是处于即就沒落的帝国主义阶段，除了以大批軍隊侵略之外，還須分些兵力鎮壓國內的勤勞大眾之反對，防范各殖民地的革命和配置大海陸空軍以準備對付蘇、美，所以在四百一十多万和四百九十多萬的兩個數目中，敵人頗有罄全國之力作頑強掙扎的可能。因此我覺得把它可以徵到軍隊里的最大限度之人數估計成四百九十萬或五百萬也不算如何過分的誇張罷。（八路軍政治部：“敵軍調查錄”，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

編者按：對日寇可能動員的兵力總數我們所收材料，有以上各種不同的估計，最高的估計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最低的則不過二、一四〇、〇〇〇。蕭學海的估計為二、三〇〇、〇〇〇，且肯定敵軍現已無法補充，因之達到“敵人一定在本年底崩潰”的結論（見本文第四編“對日寇崩潰時間之推測”一節）。實際上，這種兩極端的估計，都是不正確的。估計日寇可動員士兵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的作者 Talouis，在他的原著中也論及英、美、法、蘇、德、意諸國可能動員的兵力，其數目均在各該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如謂蘇聯可動員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實不知何所根據。至蕭學海估計敵人現在只能動員二、三〇〇、〇〇〇，則是將一切可能扣除的數目都尽可能地扣除了，却沒有從另一方面估計敵人平時每年可增加約一百万的人口，且每年可產生新壯丁五十萬；此種過低的估計，恐怕還是主觀希望的成分居多。以上各種估計，似以最後一種（四、九〇〇、〇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較為近是；然與歐戰時各國動員的兵員人數相較，則仍不無討論之余地。據日本中村定吉少

將所著“战术学講話”的統計，歐战时各国兵員对其国之男子
总数比率如次：

德	25%
法	27%
英	23%
意	21%

如果这个統計可靠的話，則大战中各国最高兵額均在其
本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十四以下。为把这个
比率应用于日本，則敌人动員的最高兵額不能超过一千万，但
达到七百万左右是可能的。另一說歐战时各国动員的最高兵
額是：

德	9,150,000
法	5,654,000
奧	7,050,000
英	5,240,000
意	4,050,000

按当时人口总数德国为六八、〇〇〇、〇〇〇；法国为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奧国为五一、〇〇〇、〇〇〇；英
国为四五、〇〇〇、〇〇〇（指本部）；意大利为三五、〇
〇〇、〇〇〇。是則动員兵額最高者約佔其人口总数 14%
（如法奧），最低者亦达 11% 以上。这些数目字是值得我們
参考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过高或过低估計敌人的力量，
都可以产生危險的結果。

二 敵軍的編制和裝备

敌我武装之比较

我方的一个精锐师与敌方的一个普通师团，武装配备比较如下表（系抗战以前的统计）：

武装配备	敌师团	我师
步 枪	17,000	4,300
轻机关枪	436	72
重机关枪	148	24
迫 击 砲	436	20—30
攻坦克砲	24	0
大 砲	24	12

王紀元：“抗战第二期敌我情势的检视”，“世界知识”七卷九期，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战时陆军师的编制和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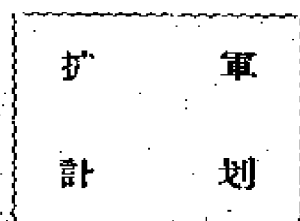
寇军平时陆军师人员约为一万七千人，战时增加为二万人至二万三千不等。其他，如砲队、战车队、化学队、机械化部队等等也都有增加。战时寇陆军师编制，据我们的军事情报的调查与判断，每个师一般的是两个步兵旅，一个战车中队（连），一个骑兵联队（团），一个砲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辎重兵联队，一个通讯中队。一个步兵旅，有两个步兵联队。每个步兵联队，有三个步兵大队（营），一个步兵砲中队，一个速射砲（即打战车砲）中队。每个步兵大队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一个步兵砲小队（排）。每个步兵砲中队，分为一个指挥班，两个战砲小队。速射砲中队组织同。每个步兵中队有三个步兵小队（排）。每个步兵小队有

四班，分冲击班与射击班两种。每个机关枪中队，辖四个机枪排，一个弹药排，一个指挥班。每个步兵砲小队辖一个指挥班，两个战砲班，一个弹药班。每个骑兵联队，有四个骑兵中队，一个机关枪队，一个骑兵砲中队。每个砲兵联队，有三个野砲大队，一个轻榴弹砲队，一个弹药大队，联队观测班属于联队本部。每一砲兵大队，辖四个砲兵中队，每中队三排。每个工兵联队，有一个筑城中队，一个架桥中队，一个坑道爆破中队，一个登陆作战中队，一个电气机械中队。每个辎重兵联队，辖六个中队，每个中队辖三排。每个通信中队，辖两个通信电话排，一个无线电排。

根据各国军事杂志材料，日本每步兵师有砲兵一团平射砲六中队，曲射砲两中队（每队砲四门），战时，平射砲增至九个中队，曲射砲三个中队。因此，每步兵师团有七生的五平射砲四十门（内团砲十六），曲射砲八，战时，平射砲五十二。曲射砲十二。步兵师团尚有用“四一”过山砲来代替七生的五平射砲者。

砲兵旅附骑兵一大队（两中队），用七生的五平射砲。总共约有九个重砲团，六个曲射砲团，两个平射砲团，共有曲射砲一百二十，平射砲五十，尚有学兵大队一。军团砲旅每旅两团，第一二旅为曲射砲旅，第三四旅为混合而成。（刘刚：“日本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时事月报”十七卷六期，页三一—，二十六年十二月号）另附“敌军师团装备推算表”及“敌军战时编制表”

三 扩军计划



日本軍閥的意見，認為現在对中国的战争，不过是他们向世界挑战的序幕，为了准备大战，日本统治阶级特别注意軍力的扩张。近年来日本努力改良軍火

工業，並設立許多新工廠，可以証實他們想要使軍隊現代化的企圖。他們特別注意使各軍都配備機關槍和重砲，飛機增加了一倍，摩托化部隊也配置更多的機關槍。但是日本軍閥的希望，絕不止此。在一九三六年，他們開始實行六年擴軍計劃，計劃的要項是：增加軍隊和飛機數，用新式飛機加強空軍力量，擴充坦克車與裝甲部隊，工程團，化學部隊，並且特別注意組成新師團及加強步兵。關於重兵器和軍事顧問，日本主要依靠其他列強，特別是德國。（“日軍戰鬥力的解剖”，林梅譯，“世界知識”七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補 充 軍 隊 的 新 辦 法

現在日本欲將自己殖民地如朝鮮及台灣的人民召往參加作戰。借以解決兵源問題。武裝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實為一條相當危險的出路，難怪日本對這一點非常謹慎。它規定了這些人民入伍的標準，並對入伍兵加以詳細的檢查。在入伍之後，他們便以小集團分散到各部隊中去。另外一個補充軍隊的辦法，便是用滿洲、內蒙古以及佔領區中親日份子所組織的部隊，來防守後方。可是，實際情形告訴了日本：這種補充的辦法是沒有多大希望的；他們部隊之大部份時常是會投到中國方面去的。（“戰爭一年來的日本軍隊”，周新譯自蘇聯“真理報”，“文摘戰時旬刊”三十三號，頁七七〇，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士 兵 入 伍 期 的 延 長

凡被征入伍于步兵隊的期限為十八個月，如入伍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種，則為二十二個月零十日，都加入現役軍隊一起受訓練；以後他們更須服預備兵役

五年零四個月，再服後備兵役十年；總計起來，他們要服十九年零十個月的兵役。在動員的時期，預備兵便編入“常備軍”，而構成一種戰鬥的力量；同時預備兵也依次分別組成預備兵的單位。並且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由於日本陸軍省的命令，把所有的現役與預備官兵的服兵役期間延長；但短期現役服務者，不在此限。所有已動員的軍隊，或駐紮在中國的軍隊，甚而他們個別的服役期間已滿，仍奉令謂在未接到其他通告之前，須繼續盡其服役職守。在預備兵名冊上的普通軍官與士兵，以及第一次被征入預備兵名冊上的官兵（他們本不受前項規章的限制，但在一九三八年，服役始告期滿），也都奉到了命令，照原來安排的期限又延長了一年。（“日本戰時的軍事機構”，Lalatt-Simon 著張愼修譯，“時與潮”二卷三期，頁一三，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軍 官 的
大
量 制 造

對於預備軍官的儲材，有一個時期竟成很嚴重的問題，用勸誘的方法，羅致应征人重新投効，確是事實上最困難的事情；因為歡喜以充軍為業的人們，

都已經升到了軍官，而窮苦階級的人們在入伍期滿之後，又極度喜歡重歸故里。然而在最近期間這種缺欠已經補救過來，現在職業化的未受委任的軍官的確比受委任的軍官總計多得多了。職業化士兵的骨干，無論在現役或預備方面，大概很可能的使戰時軍隊組織膨脹了一倍。按日本平時的常備軍才有十七個師團，而參謀本部建議要有三十二個師團的戰時組織，同時每個師團，若立刻動員，便須馬上都有十足的戰鬥力。

軍官的教育，單靠士官學校的畢業，甚而很幸運的由陸軍大學畢業，都絕對不能算作完成了。在日本各處，尚有許多軍事專

門學校，作高深的授業，在這些學校里，能得到所有陸軍中各兵種的理論與實際的教育。（“日本戰時的軍事機構”，“時與潮”二卷三期，頁一四，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一九三九
年 新
海軍計劃

這次海軍新計劃，算是第四次補充計劃。全部費用由三部構成：建艦佔百分之六十三，航空隊設備費佔百分之十六，水陸整備費佔百分之十。據“倫敦每日捷報”載稱：“日本六年建艦計劃，包括主力艦五艘，巡洋艦二十四艘，航空母艦二艘，驅逐艦三十二艘及潛水艦十二艘。”假使，建艦預算一文不折，依照每噸五千元日金計算，日本可以新造二十四萬一千噸艦艇。加上原有七六一、五八五噸完成之時，日本海軍總噸數約一百万噸強。

但是據日人山下一二調查，到了一九四三年，英國海軍總噸數，當完成二百万噸，是年美國亦同樣要完成二百万噸的大艦隊。所以，當日本海軍計劃完成的時節，對英及對美比例，不是五、五、五，也不是十比七，而是降低到十比五的悲慘境地了。

（“暴日新國防計劃檢討”，“大公報”社評，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出版）

戰時擴軍
的 數
量 和 質 量

日本平時的十七個師團，都是二十五歲以上的現役兵，在前邊兵役法的那一節已經說過了。但自從我們全面的長期的抗戰以來，它的師團數目增加太多，因而壯丁的數目也不敷用了。所以就是常備的十七個基本師團，也是于現役之外，加上預備補充後備少年志願兵而混合編成的。

他屢次增加師團的數目，僅就確切有據的而言，就有第一八、二一、二三、二五、二六、一〇一至一二〇之二十五個師團，和一四〇、一六〇、一九〇、二〇〇之四個師團，這大概是以第一補充和預備兵役為基干而編成的。還有後備第一至二〇之十六個師團（缺一三、一五、一七、一八師團，與常備同）及第五、第七、第十、第十一師管區內之十六個預備聯隊（等於四個師團），把原有的和新增的師團綜合計之，已有近乎七十個番號之多，何況實在數目，決不止此，並且仍在逐日增加中。

但是閱者務須注意：（一）日本現在的軍隊，並沒有征集到二百師之多。就是將來也絕無這種可能。它的一二〇師團呀，二〇〇師團呀，並非是依次排下來的番號，不過是虛張聲勢，眩惑視聽的煙幕。一般的說起來，它大概和常備十七個基本師團，是從同一個師管區征集而來的，如把基本師團的番號以（七）代替，那末一一四那些師團就等於 $(X + 100)$ ，一四〇的那些師團就等於 $(X \times 10)$ ，如此就可以推測它所征集的由來是第十四師管區，進而可以知道某某部隊官兵的地域性了。（二）現在日本的軍隊是混合編起來的，所以戰鬥力和軍風紀，遠不及平時基本師團的現役兵。“日本軍隊一般的戰鬥力最強的是現役兵，他的頭腦非常單純，他的紀律也好的多；可是現在一般的後備兵等則不同了，命令他是不管的，吃敗仗先跑，所以一切姦淫擄掠都是他們干的。”（據某俘虜口述）“對於命令的執行常欠確實，只召集兵中之年齡較大的，往往行動有欠穩當。”“士兵個人之任意向民眾征發，動輒有掠奪化之傾向。”（第二〇師團參謀長于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完縣師團司令部講演）由此可以看出抗戰以來敵軍的數量大增，質量大減了。（八路軍政治部“敵軍調查

录”，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

四 来 华 军 队

徐州会战
前后调
华军队表

日本开到中国来的师团：

(已开来中国之师团)

(发现地点)

近卫师团	上海
第一师团	山西、上海
第三师团	上海
第四师团	察、綏
第五师团	上海、山西
第六师团	上海、山西
第八师团	淞滬
第九师团	淞滬
第十师团	河北、山东
第十一师团	淞滬
第十二师团	上海、淞滬
第十四师团	山西、察西、山东
第十六师团	河北、河南
第二十师团	淞滬
第一〇一师团	上海
第一〇四师团	晋南
第一〇六师团	上海

第一〇七师团	上海
第一〇八师团	晉南
第一〇九师团	晉南
第一一〇师团	上海
第一一一二师团	蕪湖
第一一一三师团	南京
第一一一四师团	蕪湖
第一一六师团	福山
第十三暫編师	嘉兴
第一一八暫編师	上海

尙未証实已来中国之师团：

(军队番号)	(傳說者)
第二师团	路透社說已到山东
第七师团	路透社說已到山东
第一〇五师团	路透社說已到山东
第一〇二师团	日方人員称到了山东
第一一五师团	日方人員称到了山东
第十九师团	大美报說到过上海

以上，已証实者二十七师团，未証实者六师团。以已証实者而論，日本陸軍以四十一师团減去二十七师团，国内尙余十四师团。（“战不得的日本”，上海“导报”，二十七年五月七日）

編者按：以上是去年五月間的調查。至今年五月，来华軍有达十七师团說（單在华北就有十五师团），則其編成軍，当在五十师团以上無疑。

武汉失陷后在
华各戰場吸收
敌人軍隊估計

計——：日本軍隊在华消耗率之大，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戰爭只及十五个月，已動員了一百六十五萬人，佔甲種受訓壯丁二百零七萬的五分之

四，所剩只有四十二萬。青年訓練所尚有一百三十萬，假定其中35%為甲種壯丁，數目四十五萬五千，則未調動的合格人員共計尚有九十萬之譜。在已調動的軍隊當中，至第三期作戰截止，已經消耗的數目，當在三十二萬至六十四萬之間（依中國軍隊消耗力最低計算為三十二萬，依歐戰第一軍消耗率計算當為六十四萬），如照消耗五十萬計算，合格甲種壯丁現存額不過二百萬之多（按指甲種受訓壯丁二百零七萬，加青年訓練所一百三十萬之四分之一，計四十五萬五千，合共二百五十二萬五千，減去消耗五十萬，尚有約二百萬）。預計第四期作戰的最後一年，可以消耗敵人七十萬（由於山地戰與風土病等原因）。在最近的將來，日寇在中國的戰場需要一百三十萬以上的軍隊（陝西十二萬，湘西三十萬，十二個游擊區每一個以五萬兵力計共六十萬，維持交通二十萬）。即就現狀說，再一年後，日本軍隊將全部被吸收於中國戰場上（按指消耗七十萬，加作戰百三十萬，共二百萬），再無能力可以對付蘇日戰爭。希特勒所以責問日本消耗人力於中國戰場上有違防共協定之本意，原因在此。日寇少壯派軍人之急于速戰速決，主要原因也是在此。（宋襄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五 國內防民與滿洲防蘇之兵力

日本在本國內駐防軍隊，重工業勞動者以及警察等，至少要

佔其壯丁总数的三分之一，故現在能够动员的軍隊，至多不过二百三十万。另据日陸軍省發表，苏联在远东駐軍为四十万，日本为对抗起見，在朝鮮东北的駐軍，至少也須有与紅軍相等之数字。（蕭学海：“日本总崩潰之時間問題”，二十八年三月二日“大公报”）

当徐州会战前，日寇在苏滿、滿蒙的辽闊边境以及东北四省内地，只有六师半的兵力。而作为兩方面后备軍的，日寇国内兵力，只有六师半。在这种情形之下，日苏事变一旦發生，日寇只有被苏联俘虏。在这样威胁之下，日寇一方面乃必須尽現有的能力擴張軍隊，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尽力抑留向中国方面应行增加的援軍。日寇絕不能对中国对苏联同时作战，然而在苏联絕不与法西斯侵略者妥协的外交政策之下，日寇不得不时时准备兼对苏联作战，緊張而偏促的日寇姿态与心理，一秒鐘也緩和不下来。在这样無可改变無可緩和的条件之下，日寇对我作战使用的兵力，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充足的兵力，現在如此，將來更是如此。（凌青：“日寇兵力的檢討”，“战时日本”一卷一期，頁六——七，二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六 在华作战損失的估計

中日战争以来，在这个短時間內，日本所消耗的兵力及用着的軍隊，已达其受訓兵力的十分之七，所余十分之三的兵力，絕不能保証其統治中国的成功。更談不上“世界三分”的空想。（謝南光：“日制‘东亚联邦’与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敌一九三九年一月公佈，截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为

止，損失陸海軍飛機七百十架，有所損失不堪使用者三百架，共計一千零十架。這與我方統計相符合，計被我空中擊落者二百二十一架，被我炸燬者一百七十九架，被我高射炮擊落者八十三架，被我陸軍襲擊燬壞者一百零七架，被我砲兵擊滅者十一架，敵機被迫自行降落者十九架，被擊落影形不明者或重傷落敵人陣地者二十七架，共六四七架；再加飛行損失率最低估計有三百六十三架（實數必不如此），總計一〇一〇架，平均每月損失五十六架以上。其中在蘭州被我擊落的敵機，最近購自西歐最新式精銳重轟炸機十五架，為最大之損失。（“中國空軍”二十一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自對倭抗戰以還，已為時一年六月，我全國軍民在最高統帥領導之下前仆後繼，所給予敵軍損失之巨，實非世界人士甚且非敵國軍閥始料所及，故我軍能愈戰愈強，而敵軍則愈戰愈弱，雙方兵力消長，成反比例之演進。關於此類材料各方迭有公表，然大都一鱗半爪，系統紀述，尚付缺如。軍令部情報所副所長吳石氏近根據確實之材料，僅就敵軍在一整年以內之消耗實數精密統計。如依此項統計而觀，除經濟之崩潰，財政之竭蹶，外交之孤立等等，足制敵軍之死命者，姑不具論，即專就兵力之補充一端言之，敵軍復滅之期，必不在遠，請分別列舉于后：

甲 第十三師因死傷實錄及推算

文件摘要（摘自敵軍第十三師團一〇四聯隊死傷記錄原文）：

1. 經過時間：自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起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共六個月欠七天，即一百七十六天。

2. 死伤人数：死五八九人，伤一二五六人，共一八四五人。

敌軍編制：

1. 步兵編制 每联队三七四七人。
2. 师团編制 步兵四联队，騎、砲、工、輜、各一联队，及司令部人員等，計有：战斗兵員約二万人，后方兵員約五千人。

死伤計算：

1. 敌軍部兵联队平均每天死伤約为十一人弱，

$$1845 \div 176 = 10.5$$

(人) (日) (人)

2. 敌軍师团平均每天死伤約为五十七人弱，

$$3747 : 10.5 = 20000 : X$$

(联队)(死伤) (师团)

$$X = \frac{10.5 \times 20000}{3747} = 56.04$$

死伤比率：

1. 死与伤之比为死一伤二·一三强。

$$X = 589 : 1256 = 2.13 \text{强。}$$

2. 約六个月(欠七天)死伤人数与編制之百分比約为49%，

$$X = \frac{1845}{3747} = 49 \text{强。}$$

3. 一个年死伤人数与編制之百分比为 100%

$$\frac{176:1845}{3747:100} = 365:X$$

$$X = \frac{365 \times 1845 \times 100}{3747 \times 176} = \frac{6634250}{658412} = 100 \text{ 强。}$$

敵軍死伤人数，总計約六十二万人

每师团战斗兵約 20,000 人

每师团一个年死伤率为 100%

参加师团为 31 个

$$20,000 \frac{100}{100} \times 31 = 620,000 \text{ 人,}$$

乙 敵第六、第九、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等师团， 及波田旅之死伤纪录及推算

文件摘要（摘自敵軍黃梅九江作战后死伤調查原表）：

1. 經過时日：各师团作战日數，共計六十九日。其中台灣軍波田旅計七日，如以整个师团計算，应行折半（三日半）实共六十五天半。

2. 死伤人数：死伤病人数共为五千二百七十一人，

死伤病計算：

各师平均每日死伤病，約为八十人

$$\frac{5271}{65.5} = 80 \text{ 强。}$$

死伤病比率：

死	三七三	7%
伤	一、七八六	33%

病 三、一四二…………… 60%

計 五、二七一……………100%

与第十三师团死伤比率及其推算比較：

查第十三师团平均每日死伤人数約为五十六人，現在第六师团等（四师一旅）死伤病平均每日为八十人，比較十三师团死伤人数約多四分之一。

前以第十三师团死伤人数为基准，推算敌军来华作战共三十一个师，应为六十二万人。現以第六、第九等四个半师团死伤病人数为基准推算，敌军三十一个师团死伤病人数，应为八十二万五千人。

丙 敌第三师团部队伤亡实录及推算

文件摘要（摘自敌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第五中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至三月三十一日人員調查比較表）：

1. 經過时日：該中队于去年九月五日在淞滬登陆起，至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計共二百零八天。

2. 至三月十日止，該中队現在人員表內定員一九四人，补充二〇三人，計共三九七人，現有二一九人，对抵損耗一七八人。

3. 至三月末日止，該中队人員为二二二人，比同月十日加消耗七人，共計損耗一八五人。

消耗比率及推算：

該中队定員一九四人，不过七个月（仅二〇八天），而消耗人数为一八五人，約为定員人数95%

如以平均参战师团一个年計算，应为

$$\frac{95}{100} \times \frac{7}{12} = \frac{163}{100} \text{强。}$$

茲以敵軍來華參戰三十個師團，戰鬥兵定員每師團二萬人，計算如左：

每師定員為 20,000 人

31 個師計為 620,000 人

每師每年平均消耗率為 $\frac{163}{100}$

(以第三師團第五中隊為基準)

參戰一個年消耗人為

$$62000 \times \frac{163}{100} = 1,010,600$$

即約百零一萬人

結論：

按甲項推算，敵軍死傷為六十二萬人。

按乙項推算，敵軍死傷病為八十二萬五千人。

按丙項推算，敵軍消耗為一百零一萬人。

此均根據敵軍文件精密計算而得。惟其中丙項，消耗人數，除死傷以外，當有“病亡”“事故”在內，故消耗人數約計百萬。乙項，死傷之外，有病人，故在八十萬以上。甲項僅以死傷計，約為六十二萬。故可斷定敵軍侵華一個年中，死傷一項，已在六十萬以上。其傷亡之大，已超過一九〇四年俄日戰爭二倍。循是以往，我抗戰愈久，敵消耗愈大，囊其島國，其何以堪？故最後之勝利終屬於我，無疑也。（方秋華：“沉寂中的戰局形勢”，“時事月報”二十卷二期，二十八年二月號）

七 征兵对工业劳动力的影响

日寇征兵对劳动的影响——在农业方面，据统计，已损失优秀的劳动力，共达六十八万五千人。工商业为供军事上之需要，停业的纺织工厂竟达49%。因此，无论在农村里，都市工厂里，和各机关，都感到壮丁的缺乏。而全国各地约一百五十处医院，病兵伤兵，均有人满之患，为数在十五万以上，在华，在朝鲜、台湾之伤兵医院还不在此内。（王纪元：“第四期抗战敌寇军力的估计”，“世界知识”八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八 击破日本帝国主义的纸老虎

中国抗战开始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缺点，日益暴露，所以内部日益动摇。其兵力，在徐州会战时，已达最高度最精度，我们早已指明。今由武汉会战前后，看出左列事实，以证前言之不谬：

第一，南京会战后，期满退伍回日的士兵，到八月再被征入伍，参加武汉会战，并且内中有应选充过决死队的，在旧例有永免兵役的恩典，也都强征再入伍。

第二，徐州会战后，已开始征召第二补充兵役。原来第一补充兵，为第一乙种体格的壮丁全部，和第二乙种体格的半数，故第二补充兵役，仅所剩第二乙种体格的一半，可见补充力量已极有限。

第三，战争中不独已将现役兵一再延期退伍，并且预后备的兵役年龄亦加延长，实际上应当属于国民兵役的，也多被征用。

第四，机械化部队（飞行机重兵器等）士兵，多未曾受基本教

育，仅施应急的分業技术訓練，並且各特种兵專門学校受業中的生徒，也拿出来凑数。

第五，兵器儲造狀況：在战前，像小倉陸軍工厂之类，已加夜間作業，各工厂已使尽分業操作的最高能率。在开战初期，运来补充的彈药，尚有昭和三年制品，以后的制造年度逐漸降低，最近竟有昭和十三年制品，可見儲蓄將罄。

第六，装备狀況：在开战初期的日軍，都是不完全的乙式装备。直到徐州会战前，才將战斗部队完全甲式装备。像机关槍，一部份还系旧式，后方部队，全系旧式。（“日本支配阶级的动摇与民众的反战运动”，青山和夫寄稿，王芃生潤补，二十八年一月八日“大公报星期論文”）

第二章 敌軍的内部矛盾

一 前綫少壯派与稳重派的冲突

自我軍退出上海区域后，敌寇在华軍隊中的暗斗，已非常剧烈，稳重派軍人与急进派的意見，杆格不入。陸軍指揮官松井石根（南京佔領前的华中軍指揮官）主張步步进迫，胁使我政府作城下之盟，而不主張于最短期間內攻下南京，以逐漸增进我內部的分化。可是少壯派上校以下的前綫將官，却以攻取南京为唯一得意之作，不听松井之指揮，而直向南京猛攻。敌寇少壯急进派桥本大佐所指揮的砲击蕪湖附近的英美軍艦，更是少壯派因不滿稳重派的軍事計劃而自由地向第三国有意挑釁的行动。禍首桥本的免职，前綫部队的調动，所謂軍隊服从紀律的严格执行，总算勉强暂时压抑了少壯軍人蛮干的心理。

二 各方面的傾軋

首先是軍事的傾軋。在攻徐州時，津浦南北兩段各爭功奪徐（北段主將崗崎，南段西尾中將）。其次是政治特殊勢力傾軋。這種傾軋關係海、陸、外三方面。各該方面在滬軍政人員，為建樹其在華的特殊勢力計，各以全力拉攏人才，組織機關，它的主要的派別系統有四：（一）前陸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所組織的“東亞民族協會”。主其事的為萱野指揮下的久田寬三，以柯保羅為助手。它所拉攏的人物，多屬過去舊官僚與軍人。設辦事處於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自松井去職後，這一羣爪牙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二）陸軍少壯派所組織的“民立社”。這一社帶有深厚的法西斯色彩，由楠木所領導，直屬於陸軍特務部，且與敵國內各法西斯團體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其所吸收的人員，都系壯年中的優秀份子，組織周密，規模亦大。社址與參加人員姓名，均極秘密。（三）海軍方面所組織的“上海市民協會”。會址設外灘正金銀行四樓，主持人以敵方原來在滬的實業界為多，與國內各資本家團體有密切的關係。（四）領館方面所組織的“反共大同盟”。會址設浦東偽“大道市政府”內，主要負責人為原田（日駐滬領事館武官）以及“中國通”的西川。（王紀元：“抗戰第二期敵我情勢的檢視”，“世界知識”七卷九期，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三 三派軍人侵略目標的分歧

華南派、華北派和反蘇派。在華中、華南的現役海陸軍將領，大都是華南派中的主要份子。……華南派的主張，要完全攔除在中國境內的白種人所有的各種勢力。……同時，日本為了要奪取

中国所沒有的主要原料品，像石油、橡皮等，他們更主張應該和海軍中的極右派联合起来对英、荷作战。日本和英、荷作战的时候，可先佔領新加坡和东印度羣島，使德、意二国可以把軍火和軍需品平安地送到日本。……华南派的高級將領的姓字，虽然沒有人能够确切的指出是誰；……华南日軍总司令安藤中將和和知少將等是在內的。

华北派，也叫做“皇道”派。他們的主張是停止中日战争，完全撤退华中华南的日軍，以集中力量于“滿洲国”、内蒙、和华北各地。他們的主要人員是土肥原中將、磯谷中將、坂垣中將（即現在的陆相）、松井上將、兴亞院总务厅长柳川中將、日本青年社社長立川良次、明治神宮主祭司有馬海軍上將、文相荒木上將和富有極权主义思想的老政治家秋山定輔。……据說海相米內和某某等数个海軍省的高級將領也很贊成这一派的主張。

因此，华北派人士为了想轉移国内一般民众的目标，使他們不再为了国内的局势而憂慮，也許会来一下反苏的宣傳。

对于近衛平沼想用現存的国会和政党的力量来实现全国团结一致的計劃，表示反对最烈的，要算反苏派的軍人們。……这种極端国家主义观念的人，認為日本假使真的有一天能对苏作战，一定能得到全胜，那末，日本政府在國內外的威信自然也会因之而大为增加了。

在十一月底，有許多在中国前綫的將士和極端国家主义观念的人，寄了好几封恐吓的信給近衛首相和池田藏相，竭力駁斥他們主和的不應該。（均見“血路”五十七期，二十八年四月七日路透電）

四 軍隊中政治情緒的下降

軍紀蕩然。……在日軍部隊里反戰情緒漸熾。在上海、南京，有開小差的。……在日本有許多人裝病、逃跑，只是為了逃避兵役。在九州，被召集編隊的後備軍，起來反抗，其中許多受到嚴厲的責罰。日軍中自殺情形，大量增多。許多士兵酗酒、抽大煙，借以消愁。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戰爭越延長，日軍士氣也將日益沮喪敗壞。（“日軍戰鬥力的解剖”，“真理報”評論，林梅譯，“世界知識”七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第三章 侵華戰爭中敵人的戰略

一 武漢陷落前的幻夢

當蘆溝橋事變發動的前夕，日本對華的侵略作戰方策，以少壯軍人的智囊石原莞爾為中心而草擬定當了。他們採取了拿破崙的“急進殲滅”，“輕騎直入”的故智，採取了現代最新的戰術——主體的少數精兵打擊主義，企圖於最短期間，殲滅中國的主力，結束對華的“小戰”。他們最初的預定計劃是：戰爭發動以後，在華北，日本二週可以陷大同，一月而攻下山西全部。在東南，十日佔領上海，切斷中國的金融動脈，擊毀所謂“江浙財閥”的根據地，然後分師直迫南京，勸我政府作“城下之盟”。如其不遂，那末三週而陷南京，一月而迫武漢，再乘勢由武漢南下取湖南，由華南登陸佔廣州。日本軍部滿以為用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中國措手不及，全部失去其抵抗能力，用十五師團的兵力，於三月期間可以結束全部對華軍事。華北方面，被膠着的部隊約在十五萬以上（按：一九三九年五月，華北有十五個師團左右）。在上

海一隅，自八一三战事發動以來，我以大規模的精兵殲敵，集四十萬大軍與敵寇十餘萬，大砲三百餘門，戰車二百餘輛，飛機二百餘架作戰，抗拒之烈，開中國戰史上之先例。淞滬一綫，堅守三月，敵寇在這一綫上送掉腦袋的約在五萬人以上，距敵軍部十日下上海之估計，几差十倍。從南京的退出到徐州的放棄（自十二月十二至今年五月十九），是第二期抗戰。在這一階段里，敵寇的戰略，是由“速戰速決”進展到以“控制中國各主要交通干綫”為目標的消耗戰爭。徐州陷落以後，敵寇的戰略似有相當的轉變，即一切的目的，都集於攻取武漢，同時，在可能範圍內，吸引我方主力軍集結於數條戰綫上，企圖殲滅我主力。這時，敵寇的戰略也採取了“猛戰即決”的方策。為了完成此項戰略，敵軍的編制，有時仍採取少數精兵的突擊主義，而以質量較差的隊伍，擔任後方的守備工作。（王紀元：“第四期抗戰敵寇軍力的估計”，“世界知識”八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二 進攻華南的戰略作用

橫田實說：“如廣東歸入日軍鐵蹄之下，切斷了和香港的關係，則粵漢綫，失其本質的存在價值，無法進行其輸送任務。同時，為使廣東攻路現實化，又必須攻略海南島，切斷另一中國軍火路綫的滇越鐵路。另外的作用，則是先發制人，使英、法不能在武漢危急中和中國建立更密切關係。”……吉岡文上則謂：“攻略廣東可剷除中國長期抗戰體制之本。”又謂：“欲使英國和中國關係絕緣，舍佔領廣東即無辦法。”宮崎認定：“非攻略廣東和海南島，使中國和英國失去聯絡，以及遮斷西北的中蘇通路，則無法絕滅中國對日抗戰。”（鄭森禹：“從日本政治危急說到進犯華南”，“世界知識”

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三 所謂“坂垣停戰綫”

在戰略上趕快完成所謂“坂垣停戰綫”，以期早日結束戰爭。宇垣與坂垣的爭議，不只限于外交方面，並且由政治外交的延長而及于對華的侵略戰略。宇垣原是主張緩進的侵略方式的，加以外交的手腕，以穩紮穩打的步驟完成侵華的目的；其在戰略上的主張，自然是以武漢為終點，甚至在未攻陷武漢以前進行中日談判，結束戰爭，以便進行其所謂長期建設。但是坂垣則因欲一口吞下整個中國，即刻圓其東亞聯邦盟主之夢，所以主張硬用武力強迫中國投降。其停戰綫，則以北自西安起，經衡陽以至北海為止。坂垣的停戰綫雖然不同，但其欲趕快結束戰爭則無二致。（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四 日人大場彌平對於武漢廣州攻守戰的評論

黃河決口的大影響——武漢攻略戰，是意外的費了很多的時間。這是因為黃河決口的原故，……日軍不得不從長江和淮河中間僅僅數十日里（按一日里等於六華里——譯者）狹而又小的方口來指揮作戰。好像從漏斗的口中爬出來一樣，那種非常不自由的用兵，不知該怎樣的不利呢！

溯江作戰的重要性——在東方正面，流着洋洋數千里的揚子江，這裡華軍雖然在水中放入無數的水雷，兩岸建設許多的堡壘和砲台，作了堅固的封鎖工作，但如能把它突破，大小的軍艦和商船都可以長驅直入漢口，這才是進軍的大動脈，我想再沒比這

更好的作战的路了，这就是开始溯江作战的理由。所以说，长江对于这次的攻略战，确实完成了极大的任务。大规模日军的粮食，无数的枪弹和炮弹，都是经由长江这一路綫，运到前线去的。日本很快的开始溯江的作战了，然而这也是一个“死的通路”。

抄襲背后的江南作战——方以武汉为中心，集中了一百几十个师。在大江以南，确切的保持着南昌，面前摆着一个大障碍物鄱陽湖，并由南昌经过德安、廬山、九江，越过长江，沿湖北安徽境，以与大别山相接，然后再向左轉，直达西部的信陽，构成了一个長一百几十里(?)的大战綫，並且設施了几層近代式的要塞，差不多已把武汉化成一座难攻的城塞了。並且在第一綫之后，更佈有第二綫与第三綫，利用大别山和江南的幕阜、九岑两个山脉，以及附近的河川，造成一条鉄壁，实可称为“远东的馬奇諾綫”了。日军的溯江作战，和北进中的江北作战，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着。到七月初旬，湖口也掛上日本旗了。从全部的情形和地形推測，日军大概是由长江以北向前推进，即从大别山这一方面上来。因之对于九江的防备了就大意了。这个虛隙，早被日军看破，七月下旬在黑暗的夜里，猛然在九江东边鄱陽湖的出口，开始敌前上陆。以九江为基点的日军，南越德安，頗有压迫南昌之势。

張姑峰事件与武汉战——張姑峰事件，在汉口攻略战所以必須几个月的時間一点上，确是不可埋沒的重大事件。

“动摇的鉄壁和箬溪的突破大作战”——張姑峰事件解决以后的八月下旬，进攻武汉的作战又呈活气了。在九月初旬就开始总攻击。据守于天險的华軍是非常执拗的，猛攻十天。才完全击退。假使华方想在武汉一战获得胜利的話，在被包圍以前，以富金山战斗为轉机，乘着长江兩岸的日军正由江北大别山和长江分成兩段的时候，乘着这种战略上的分离的时机，就应猛然的向大别山的东南角采取攻势，这是对于日军極其不利的事。然而从来华軍

是想不用攻势来获得胜利的，他們已忘記兵書上“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轉过来，再看一看廬山南方的山地狀況。华方由于大兵的援助和利用天險，好容易把日軍的进攻擋住。豈不知华軍在隘口街附近，將若大的兵力，好像磁石吸引鉄片一样，都集中到那里了。华軍在長江和鄱陽湖中間，任何一点都應該准备万全，那才是华軍应採取的作战。然而实际华軍的兵力是偏于右方了，这就是所謂畸形的不完整的軍事配备。所以日軍沿着長江和江南岸的錐狀战略，在步步的奏功。在長江和隘口街中間約二十日里之長，华方的配备自然要生出虛隙，但华軍並未曾注意到。江南日軍部队參謀的眼光正向着这个虛隙注意了，他們計劃向这个虛隙来一个突破作战。这一个中央突破的大机动战，是想使江南一帶的华軍全綫，根本發生动摇的。九月下旬，日軍偷偷的繞过山中的小路，向着德安西方直通粵汉路的要冲箬溪前进，开始了突破作战。像暴風般的猛烈作战，是成功了。在十月五日佔領箬溪，从德安到修水河谷間华軍的連絡完全切断了。好像牛舌般突出的大战綫，將江南战綫数十万的华軍，分作兩部完成了一个新的战斗形势，这个新形势，不知給华軍以多大的打击呵。把守江岸的华軍堡壘已側背受敌，一座一座的开始崩潰了。

“微妙的东洋兵法”——正在这危机迫切的时期，广州在轉眼間，就陷落了。日本国民都在惊喜，專門家說这是日本历史上的一大“金字塔”。無論日本怎样希望避免和英、美的磨擦，要是沒有华南作战，日本就不能完成这次战争的目的。然而中国見到的，正是相反。中国当局，在战争剛一开始，也曾配备相当的兵力，准备日軍的急襲。然而自从巴納号事件，張姑峰事件的發生，以及誤認日本兵力的不足，当武汉战到达最高潮的时候，中国已經完

全將华南忘記了。这时华南的防衛，是非常薄弱的。粵汉路因为日本海軍航空队的轟炸，已失掉了輸送力，調动部队已不能像移动象棋子那样容易了。这是华軍自己造成的战略危机。因此，华南作战部队，好像脱兔般侵入这个大洞里。这次华南作战，就是出于“兵者詭道也”那个“詭”字上，日方在华南始終。做动兵的表现，但又不动兵的状态下，以自欺欺人若隱若現的手段，冷然的予华軍一个大的打击。

“战略外的战略”——保衛广东的責任者余汉謀，至少應該知道，假使日本要开始华南作战，一定不会从广东西南地方上陆，一定会採取大鵬灣以东的港灣这条路綫。然而余汉謀全把它忘記了，距离广东仅仅四十多日里的大鵬灣，它的防备簡直是若有若無。实行敌前上陆，全是像这样有战略上的危險。所以，我說，假使余汉謀，听到日軍上陆的消息后，立刻領導部下五万，在日軍登陸中途与以痛击，那就不知鹿死誰手了。仅在东江一帶稍試抵抗，随便的就放棄了，这决不是战略家应做的事。

武汉的陷落——华南作战成功的消息，早已傳入武汉战綫了。陣地上的华軍，已發生了动摇，特别是箬溪突破后的余势極猛，將要把粵汉路切断。决心死守的武汉保衛陣营，就这样的崩潰了。（“时与潮”三卷二期，大場弥平著，平子譯，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五 日軍攻勢已鈍

广州失守，武汉退出以后，在軍事上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虽还未变化，但是敌人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显然已大大的暴露出来。由开战到現在，敌人調来中国前綫的兵力

已由三十万增至一百五十万。可是因伤亡的重大（我方估计为七十万人），伤亡率的日益增高（淞沪战争时敌我伤亡比率为一对五，武汉会战时为一对一，华北游击战争为三对一以至十四对一），敌人不能不征到第二期补充兵役及国民兵役，無兵可調之苦快要到了。同时，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敌人的战线更长了，据敌人自己的报告，到去年十一月止，战线共长三千公里，比欧战时的西部战线之七九〇公里，长四倍。单是华南的战线也长四百二十公里，比日俄战争时奉天附近的战线之二三〇公里长二倍。长的战线之外，添上了我方日益发展的广泛的游击战争，敌人的兵力不能不分散。在这种情形之下，敌人虽仍继续进攻，但攻势已比前为钝，战局便陷于胶着的状态。（思慕：“由近卫声明到汪兆铭的‘建设’”，“世界知识”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六 日軍在中国戰場上的“悉当”战略之历史

根源——一个苏联人的看法

中国戰場上的战斗行动，已經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資料，可用以評述中、日作战兩方的軍略。

器械的绝对优势，給了日人以若干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只是表現于日人用了大量的血佔領了若干地方，並沒有把中国軍隊的主力歼灭，因之，这使战争的前途对侵略者大成問題。

日軍大胆的侵入中国領土境內，無疑的，是由于日本軍閥对他們在二十世紀初期历次战争中战略艺术方面的成就，作了謬誤的解釋。一九三七年日寇对华作战所用的，还是陈旧的德国人的主义，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和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时日人所用的，也是这种主义。

六十七年来，日本軍官所不了解的一八六六年奧普战争和一八七〇——七一年法普战争的經驗，始終支配日本的作战理論。

后来的日俄战争时的日軍总司令——大山，当时他以日本軍事特別員的資格，加入普軍观战，他对于瑟当(又譯師丹)作战的結果，極端称讚。大山返国后，充任陆相之职，便竭力在日本軍官中間宣傳“瑟当”的观念。一八八四年日人为了加紧准备侵略战争，乃聘請柏林陸軍大学教授梅开尔至东京。……梅氏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陸軍大学，給日軍的领导份子灌輸了德国式的战略学說。这一学說，在世界大战中，曾經可恥的失敗了。

瑟当一役的总结所产生的德国式的作战方法，其精义——以“兩面迂迴、包圍”及“消灭敌人”为目的的軍队集中进攻，便为日本軍队指揮長官所採取，而在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中作第一次的試驗。当时在平壤一役中，日軍即以兩万七千人，首先採取兩面迂迴的策略，演了一次微妙的“瑟当”。中国軍队約有一万五千人之數，在左宝贵指揮之下，集中在平壤。日軍从正面和側面分作数队动作，竟然迂迴了中国軍队。李鴻章的正規軍，佈置在日人企圖进攻的路徑上，予以頑强的抵抗，方使六千中国軍队得以向北突圍而出，其余九千中国士兵——剛招募的游民和穷人，他們对于中国上層統治份子的敌視，不下于对日人的敌視——則被俘虏了。

日本軍官把平壤一役評价为“瑟当”。这一役的指揮者山县將軍，因而被称为“日本的毛奇”。……日人不会正确地理解他們在平壤一役胜利的原因。他們不明白，与他們对峙的中国僱佣軍队，反映着中国深刻的內在矛盾，这种矛盾是由中国人民所痛惡的腐敗的滿清制度所造成的。訓練惡劣和器械窳敗的中国士兵，並不

关心于他們的压迫者的胜利，他們的当兵只是为了避免飢寒和失業，因之他們不願在与他們的利益無緣的战争中牺牲了自己。

在日俄战争之初，根据神話式的“卡內”与“瑟当”的經驗所造成的德国參謀总長史里芬的主义，在日本軍閥的头腦中，已經根深蒂固了。史里芬主义——“卡內”，乃是日益兴起的德帝国主义的反映。……德国的統治階級害怕“持久”战，因为当时帝国主义的德国，东西都感受威胁，“持久”战对它是非常危险的。据史里芬的意見，只有断然的包围和歼灭的动作，才能够保证战争的速战速决，而使德帝国主义胜利。于是“卡內”和“瑟当”便成了一个普通名称，內容則包含着“兩面迂迴，包围”及“歼灭”等概念。

日軍于一九〇四年对俄作战时，就抱着这一主义。但是“瑟当”並未使日人在日俄战争期間有所成功。日益沒落的帝俄的軍官們，他們的动作十分消極、被动，但是他們並未讓敌人把自己包围起来，虽然日人曾費了很大的力量。不过这並未妨碍日軍長官承認迂迴乃是他們的作战策略的最高成就（在瀋陽一役中，日人以極大的牺牲，在三十三万俄国大軍中曾俘虏了三万）。

一九三七年，日寇出兵侵略中国，仍是以过去历次在高丽、滿洲及冀东等戰場上对华冲突的觀點来估計中国軍隊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兩次对华武裝冲突的理解不正确的經驗，告訴他們，用很小的力量，在最短的期間，就可以輕易的获胜。

日軍自發動战争后，在北戰場上便採取了一个大規模的迂迴动作，为的想用“瑟当”的方式，把中国軍隊的主力一下子歼灭。但是自战争开始的头一天起，日人即已信服，与他們对峙的中国士兵，已与以前的大不相同了——現在的中国兵士都是紀律良好，有現代軍事修养，及充滿民族解放战争觀念的战士了。中国

軍隊，各方面都受到人民的支持，处处都受到击败暴敌的無限願望所支持。同时中国的軍官也絲毫不像从前的中国軍官——滿清的温順僕役了。

中国軍隊的主力原集中于平汉沿綫。九月間，日人即採取了他們企圖迂迴中国軍隊兩翼的第一次动作。迂迴策略，並未获得發展，而被中国軍事長官弄成了零。中国軍隊因进行局部的反攻和对重要地方的掩护，居然避开了实行迂迴的日軍大队的打击，中国軍事長官看到自己的队伍有包圍的威胁，即下令后退，以广大的战綫与敌人对抗，于是日寇的“瑟当”便瓦解了。

过去的軍事历史經驗，使日人惶惑起来。他們不会估計好多情形，去正确的分析环境。他們沒有估計到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变动的本質。

中国軍隊在北綫上的頑强抵抗，和保衛上海的更頑强的抗战，無疑問的都出于日人的意料之外。

德国式的“速战速决”的策略，並未使日本成功，正如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未获成功一样。因此，日寇只有走上与日益强盛的中国作“持久战”的一途，……在中国頑强的抗战之下，空間的胜利使日軍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一切歼灭对方的迂迴动作的企圖，却都告破产了。

自用北綫全部力量所計劃的第一次“瑟当”和九月間在保定及馬厂所計劃的小“瑟当”失败以后，日寇于十月和十一月間又企圖在太原迂迴中国軍隊。一路从西面来迂迴中国軍隊；別一路企圖从东面来迂迴，但是这里日人都沒有达到目的。同样，上海方面日寇的一切迂迴动作，也都沒有結果。在十一月最初几天，日寇同时开始从南北兩面迂迴上海，威胁中国軍隊的后方。不过因中

国军队从嘉兴方面即时反攻，日人的迂迴动作又被突破了。……日本大軍在南京的迂迴动作，自然也可耻地破产了，因为中国军队对于日軍左翼迂迴的英勇行动，把日軍的迂迴动作打消了。

日軍虽因器械优越，用巨大牺牲的代价，侵入中国内地，排挤了他們的敌人。不过中国军队的主力仍保存着，而且在頑强的斗争中加以鍛鍊。同时，中国人民的广大的游击战争开始获得了拿破崙时代西班牙别动战的不可調和的性質，迫使日寇不得不抽出巨大力量去保証自己的交通和对付大量游击运动的斗争。

今日，中国战场上战斗事件的发展，在好多方面將依中国軍事長官的積極程度而轉移。中国軍事長官表现得过于慎重，不够坚决，因之，日寇的行动，鑒于敌人动摇，使要勇敢起来，以至于大胆起来。不过日本軍官的拘泥于軍略的圖式主义及其創造力的貧乏，正如日俄战争的經驗所表明的一样，往往会使他們放棄了原来的动作計劃，要是敌人是積極、拚命而坚决的話。

在世界大战中史里芬的“卡內”，並未有拯救德帝国主义于破产之中。在中国战场上，重演“瑟当”故技的毫無結果的企圖，对于經濟貧弱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实在充滿着可怕的危机。（“日寇在中国战场上‘瑟当’战略的历史根源”，苏联 Levitsky 著，張仲实譯，“世界知識”七卷六期，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出版）

七 日本侵华的战略——一个美国人的看法

在中国地理上，山海关到蘭州之綫，是中国經典战略上必爭之地。在最初日本人是企圖先掌握这条綫的；但在失敗之后便改从中国的弦綫上进攻。它虽在軍事上佔領了这一富庶地帶，可是它却因此燬坏了它最不愿燬灭的中国旧有經濟社会机构。而它最幻

想的消灭中国政府的企圖，却由于这个战略上的錯誤，永远不能达到目的了。

我們可以把全部中国地理，划成一个以三根直綫構成的三角形。自联接华北与东北的山海关至溝通甘肃、新疆兩省交通的蘭州为第一直綫；自蘭州至西南滇越交界处的海岸为第二綫。而突出在中国东部的全部海岸区域則可以起至山海关迄至滇越交界的第三根直綫代表之。結果成了一个直角的三角形，直角所在地，恰为中国本部与西藏及中央亞細亞接壤之区。而在直角对面之弦綫，則代表中国的海岸綫，日本久已想从那里深入中国腹部。

这个中国的直角三角，实在是几何学上最困难的一个問題。这个三角形不仅代表了全部中国地理，也說明了全部中国的軍事史。

这里我們接触到一个重要之点。产生中国財富文化的，是弦綫所代表的富庶之区。但它虽有众多的人口，中国的軍事力量却从不生根在这塊地方。历史的、經典的中国征服战，並不由此發軔再及其他；乃是先掌握北方一根綫——山海关、蘭州之綫——上的軍路要地，再向其他兩綫推进。北方的一根綫，一向可以控制那弦綫。即使揚子江流域的势力足以逐走北方王朝，但若不能攻克华北，反而湧流西入四川——若目前日軍的做法——那新兴的朝代就無由統一中国，甚至不能維持其在揚子江流域的統治。所以在战略上講征服中国，須先控制北方之綫再趋直角，然后由北方及西方征服四川。一年以前，日軍之猛冲入晉。就是走的这一路綫；而也就在这方面他們显然失敗了。在估量全部中日战局的时候，对日軍的这种失敗，我們不能忽視。它迫着日本不得不放棄自西北而东南的經典作法，而改从弦綫上下手。

因此，問題的癥結是：由弦綫向直角進軍可否征服中國？那種經典的戰略，行之于弓矢時代，在坦克飛機時代，這軍略地形在戰爭中是否有同樣的重要性？當然，日軍之流動以及高度機械化，足以大大改變戰爭中的成規。日軍究竟能否控制中國交通動脈，佔領一切主要都市及工業據點，並“麻痺中國的神經中樞”呢？

對於這一問題之答案，我們可以从早期日本的軍事計劃中尋出其端倪。無疑的，這些計劃中規定着首先佔領各鐵道蒼輻點的北平以麻痺華北的抵抗，並從而挺進山西，再趨直角，遂后從長江上流及西部內地進而控制揚子江流域。顯然日人是師法經典戰略的。假使此而成功，則日人之獲得弦綫區域，正如探囊取物，可以無須大量犧牲該區的人命，破壞該區的財產。日本人從此可以獲得全中國，而且可以俯拾得之。

日人遭遇了華北以外的抗戰，惱怒之余，瘋狂地移轉其鋒尖于弦綫區域。……他們現在总算佔領了全部海岸。中國目前已成一內陸國，沒有一個獨立的海口，最大的都市，主要的鐵路，全都拋了。現在的日軍正蟻集在弦綫上，在瘋狂而冒險地向內地進攻。

那弦綫在中國歷史上一向是代表國富之綫。北方的一根綫則一向代表國防軍略之綫。至于西南之部則為中國少數民族集居之地，事實上千百年來成為中國本部的殖民地。建立及保持大一統的江山，關鍵往往在三角的北部而不在其他兩綫。財源之所在是弦綫。待上述二綫問題解決以后，才有余力用在西南的拓殖擴展上。

試想：日本人已經佔領了中國一切的主要“神經中樞”，而結果發覺這些地方僅為舊式統治下的神經中樞；而假定中國人要另謀生路的話，它們是並不重要的。他們佔據了中國最富饒的部

分，区域不及中国之半，但人口财富则过之。但事态显然，这些仅是旧时的农业意味上富饶的区域。即使在这些区域内利用廉价人工而建立起来的工业，亦须仍在中国人手中的贫瘠的内地获取其主要的原料。事实上，中国的工业，在过去是奴隶工业。它从外国购买机器，因之必然集中于最为外国金融资本势力所深入的地点。但假定从今以后，中国有意利用运入内地的一部份机械以制造更多的机械，那末，拥有主要原料生产区域的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

假以时日，中国人在北方、西方两线上可以获得比日人可能在弦线上获得的更多的食粮与工业——因为弦线上的财源已经在战争时给日军的砲火摧毁过半了。在过去，日军享尽了优越机械化武器的便宜。从今以后，这些武器要杀一个中国人，佔一亩中国地，打一次便宜仗，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代价了。中国人虽以一副很残缺的工业设备，开始其第二期的战争，但终可以增加设备，並积月累年的增强自己的力量，给日人以更重大的打击。（“日本吊在中国的弦上”，允怀译，“文摘战时旬刊”四十三号，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美国 Owen Lattimore 原著，见“America, New York”）

（编者按：以上两文——“日寇在中国战场上‘悉当’战略的历史根源”与“论日本侵华的战略”，前者告诉我们战略主要的是由战争的政治内容决定的，不能从纯军事的观点着眼，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后者则专从军事地理上论证日寇失败的必然性，是一种战争问题上的“地理决定论”。虽有其一面的真理，但不是主要的。最后胜利之所以必属于我，其主要根据在于我们是进步的民族革命战争，有广大的人民支持它，敌人则与此相反。战争胜败单靠地理条件决定，这是军事上的机械观点，是不足为训的。）

第四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財政經濟

第一章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 財政狀況及財政政策

一 三个年头的龐大預算

日本軍閥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發動侵華戰爭以來，為了戰費的需要，預算是逐年的增加而龐大。記得馬場時代發表一九三七年度（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十萬萬四千萬元大預算之際，曾經騷動一時。可是就現在看來，這真是小巫見大巫了。一九三七年度預算雖曾經結城修改為二十八萬萬一千萬元，加第七十屆議會的追加預算六千萬元共二十八萬萬七千萬元；但蘆案發生後，七月的第七十一屆議會和九月的七十二屆議會，又幾次通過華北事變費二十五萬萬五千餘萬元。……一九三八年度（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一般預算二十八萬六千七百萬元，追加預算六萬萬四千七百萬元，對華軍事費特別預算四十八萬萬五千萬元，合計八十三萬萬六千四百萬元之巨。如果把地方財政預算（年約二十萬萬元，除和中央財政重復，淨約十六萬萬元）也包括在內，則達一億萬元。倘使再把其他各種特別會計預算（如特別文化事業、財政金融事業、軍火事業、國營鐵道、朝鮮、關東州、台灣、庫頁島、南洋委任統治地等等）約一億萬元（除重復）也一起算入，成為二億萬元。……而且跟着戰爭的延長，繼續追加是

很可能的。本年度（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預算，据报載，已定为三十六万万九千四百万日元（仅指所謂一般預算，大量之追加預算及临时預算均不在內），其中海陸兩省佔十一万万余元，财务方面則为十三万万六百万，对华战事預算为三十五万万。收入方面，經常二十三万万七千万，特別十三万万二千万。支出方面，經常十九万万六千万，特別十七万万三千万。經常費支出之增加，其增加部分，很明显地落在海陸兩省。所以，新預算的內容，無疑地將加重全体主义即軍事的意味。而軍事費的內容，益从狭义的扩大到广义的，即軍事費与行政費之区分，漸次稀薄。例如內务省之防空計劃，农林省之新馬政計劃，遞信省之中央航空机关及航空網設立的計劃等，都一併屬於战时的性質，而归于国防經費的。（刘耀荣：“日本明年度新預算的透視”，“世界知識”，八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整个預算中，軍事預算所佔比率如何呢？

就一九三八年度計算，于全体預算中，海陸兩省佔十二万万三千二百万元，合对华軍事費預算四十八万万五千万元，共約六十一万万許，佔总預算的百分之七十三，追加預算和間接軍事費还都不及計算在內。这个比率，比較別国高得多。以一九二七年为例，軍事費对岁出总额，英国为百分之三十二，美国为百分之一二·五，法国为百分之二九·七，而日本在一般預算中已达百分之四九·一。

至于本年度新預算中軍事費所佔的比重，較之昭和十二年十三年度为低（本年度佔全体 64·6%，十三年度則为 79·1%，十二年度为 72·8%），然而实际上不过是玩的一种技巧，因为有

些軍事費已撥到行政費項下了。(鄭森禹：“一年來敵國財政恐慌的深化”，“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昭和十四年度之九十五萬萬——日本戰時龐大預算之昭和十四年度(即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預算，已于三月二十四日，經貴族院會議正式通過，新預算之全部予以成立。

一般會計	(單位千元)
本預算	三、六九四、六六六
第一號追加預算	九一〇、五四三
第二號追加預算	一九九、三三二
臨時軍事預算	四、六〇五、〇〇〇
合 計	九、四〇九、五四一

其中，如將中國事變特別稅收以及其他一般會計及軍事費之重複部份五三五、一八六、〇〇〇元除掉，而加以整理，總計為八、八七四、三五五、〇〇〇元。但另外尚有臨時軍事費關係之預算外契約，計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故昭和十四年度之實際的預算總額，為九、五七四、三五五、〇〇〇元。上述第一號追加預算，名為陸海軍新國防計劃預算。第二號追加預算，名為文治各省經費。臨時軍事費預算，乃專為侵華戰爭而用者。新預算中之軍事預算，為六、六六三、五四三、〇〇〇元，其在一般會計內者為一、一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追加預算為九一〇、五四三、〇〇〇元，臨時軍事費為四、六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其總數較昭和十三年度之六、〇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五六七、五四三、〇〇〇元。(楊竹云：“日本第七十四屆議會之輪廓”，“時事月報”二十八年四月號)

从預算案看暴日財政——全年度預算總額，一看就使人奇怪。我們以為暴日要維持在華戰爭，要準備中、蘇同時作戰，又要對抗英、美的建艦競爭，新預算非突破一百万萬元不為功。然而不料全年預算不過八十九萬六千萬元，其中一般會計（大半為行政費）佔去三十六萬九千萬元，對華戰費佔去四十六萬萬元。所謂陸對蘇聯，海對英、美大言炎炎的三大國防新計劃，僅有區區六萬七千萬元，連一部份臨時軍事費合計，也不過是九萬一千元。這不特蘇聯、英、美，將嗤之以鼻，我們也將鄙視暴日的十足寒酸。

但就數字說，暴日財政的負擔，的確是泥腳愈陷愈深，今年度比去年度又多出七萬萬元了。今年度預算總額，仍是一個突出的空前數字：這數字較暴日全部國有財產的總值還大，暴日委實已羅掘俱空，不能更闊綽下去了。

對於今年度歲出特質，首先我們發現着：軍事費的比重減輕了。去年度的臨時軍事費，加上國防追加預算，佔全年歲出的百分六十四，今年度兩者相加，僅佔百分之六十：一般會計中的陸海軍預算亦然，比較去年，陸軍減少百分十一，海軍減少百分四。根據這點我們要指出：（一）暴日軍事進攻的鋒芒已失；（二）暴日已由速戰即決，進到“長期戰體制”。其次，我們發現着：臨時軍事費中之陸海軍的比例，海軍削弱了。去年度，陸軍軍費為海軍的三·四倍，今年度為三·八倍了。這點，是根據于以下的事實：（一）今後在中國戰場，已無海軍的用武之地；（二）暴日的國防戰略，在陸為進攻，在海為防禦。基於前一點（按指軍費比倒減少），我們現階段抗戰，須嚴防暴日的政治陰謀。基於後一點（按指海軍預算削弱），我們益信，中國為打倒暴日最

大的主力。（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大公报”社評）

二 單就对华战費而論三年中就有一百二十万万

据專家估計，日本对华作战，每月需錢一万五千万美金（另据估計，每月战費达四万万四百万日元），这已超过了日本平时的一切費用。（“在战争重負下的日本財政”，Burion Crane 著，瀚生譯，“世界知識”七卷二期）

在第一期抗战中，日本所消耗的財力，則約达其全部財力的十二分之一（按日本全国財力約三百万万左右，据謝南光的估計是一千一百万万元，見“世界知識”八卷十期，“日制‘东亚联邦’与世界三分論”）。若与日俄战争时比較，其悬殊如下表：

	日俄战争	現時中日战争
	（一九〇四——五， 共十九个月）	（一九三七年七月 至十二月止）
日軍消耗財力	二三万万元	二六万万元
日軍每日消耗財力	三六〇万元	一五〇〇万元（日 俄战費之四倍）

（据莫斯科“真理报”的記載，見王紀元：“第四期抗战敌寇軍力的估計”“世界知識”，八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日本侵华战費的龐大与过去对外战費比較起来，不啻天壤之差。在抗战第一个月中所消耗的費用，已超过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全部消耗总数（二三万万元）以上。較侵略“滿洲”之費用，更超过数倍之多。至于將来的战費，也只有随着战争的發展而更加急增。据專家估計，日本如果正式宣战，每年需要一百三

十六万万战費，这个数目超过日政府历年积貯的軍备資財及財富之一半，足以吸尽日本国民的全部收入（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每年收入不到五十万万）。

再計算其于蘆溝桥事变后对华战費特別預算，一九三七年度为二十五万万五千万元，一九三八年度为四十八万万五千万元，合計七十四万万元。而过去日清战争中，日本战費二万万零四十七万五千元；日俄战争中，为十七万万一千六百四十四万三千元；世界大战时，日本对德战費一般說来計为：八万万八千万元，實質为三万万元；三次合計不及二十三万万元。而这次战争的初期預算，已达以前三次合計的总数的三倍以上。（郑森禹：“一年来敌国財政恐慌的深化”）

虽然敌人对于战費的措置是很大的困难，但純粹的从財政上观察，日本似乎还未用尽它一切的資財。蘆溝桥事件發生时，日本只預算以一千万日元作为战争的一切开支。現在，已經增加到日金七十三万万九千四百万元（約合美金二十万万四百二十六万元）。已支付的陆海軍費用，佔日本全国总收入的30%。不过，現在日本各銀行还能勉强吸收政府所發的战費公債，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日本战时工業的危机”，“太平洋学会”，天平譯，“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者按：日本对华軍事費 昭和十二年度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昭和十三年度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昭和十四年度新預算四、六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三年合計为一二、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三 这样的龐大的預算支付勢將刮尽人民的膏血

要想支付这样很龐大的預算，不能不說是日本政府的唯一困

難。就以一九三七年的一般預算而論，其收支不敷額已達八万万二千餘元之巨，故二十五万万六千萬元的侵華戰費，不得不另立賬冊作為特別追加預算。本年度的一般預算，雖然因為軍需工業的發達和增加消費稅及減低第三種所得稅的結果，在歲入方面稍微增加了一點，然其收支不敷額，仍達七万万萬元以上。至於四十八万万五千萬元侵華戰費的支出，也只有三万万元元的增稅充當，一万万餘元由鐵道收入及關東廳、朝鮮、台灣、樺太等地的收入撥充，其餘也還沒有着落。

自然，預算之增加，更加重了國民的負擔。就一九三八年一般預算和對華軍費共八十三万万六千四百萬元計之（特別會計，地方預算尚除外），以七千萬人口計，每人要派到約達一百二十元許，佔國民所得的大部份。日本國民每年所得大致是一百万萬元，就算如其御用經濟學者所說是一百四五十万萬元（即便是可靠的，主要乃因物價騰貴之故），每人也不過得二百元，一百二十元的預算佔去了百分之六十。（見“一年來敵國財政恐慌的深化”，“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今年預算的支付將更成問題。九十万万龐大的預算（三十万万通常預算，六十万万軍事預算），還有軍需擴充所需資金三十餘万万，偽滿五年計劃每年要十五万萬元，華北、華中開發四年計劃每年二十万萬元，這些數字合計（按合計為一百五十五万万餘元），已超過了敵國全年國民總所得（據三菱經濟研究所統計，日本每年國民總所得為一百五十万萬元），這些像天文學數字的支出，從那里去湊數呢？（梁式文：“近衛內閣崩潰與日本政局的前途”，“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四 是否可从对外借款找到解决

财政困难的出路？不能

日本帝国主义虽企图由国外借款来稍补充其财政及军需工业发展之不足，但由于日本在战争中国际贸易的衰萎，信用的低落，更由于野蛮的侵略战争已为一般爱好和平的国家所厌恶，所以这个企图也不免使其失望。然而不管怎样，日本资本家还得竭其努力以求向美借款。如军需财阀满洲重工业公司的主脑鲇川（资本总额八万万日元，拥有十八个分公司，还有一百三十个附属公司），计划着最近要到美国去借款，以发展满洲傀儡国的企业。安川先生的东方拓殖会社，也早先曾向摩根公司以及花旗银行借了一大笔款，最近日政府也鼓励它去进行植棉造棉及毛织业等的经营。满铁会社的主持人松冈也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派遣了一个美国人奇奈（Henry W. Kinney）到上海去宣传，鼓励美国财政家借钱给满铁发展他的计划。（见“日本强盗爵士在华北的争霸战”“密勒士评论报”，林梅译，“世界知识”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但是，这些希望是难得到圆满的实现的。美国爱好和平的大众是不会让政府大批借款给日本的。如一九三八年一月间曾传说“麦根”银行将借款五千万美金给日本而受到美国人民的反对。及至同年五月间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交涉九千万美金的棉花借款，但也因为日本本国棉业的停顿和转卖的不可能而不能实现。（宋斐如：“美国经济恐慌对日本的影响”，“世界知识”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五 为应付财政困难首先不得不 执行竭泽而渔的租税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应付庞大的战费，除了發行公債，就是增加租稅。增加租稅对于財政政策有如下之意义：“（一）战时增稅有担保公債利息及公債消化之補助作用，如能有一万万元之增稅，則能發行二十七八万万元之三分半息公債，所以明年度的战費負擔，可以从增稅二万万元之程度以收公債消化之補助作用。（二）战时增稅有調整因战争而展开的所得分配之不公平，及跛行状态的作用。（三）有抑制財界膨脹之傾向，因为从增稅以吸收国民購買力，这样防止国民物資需要的增加，同时抑制物价之騰势，並助成国民儲蓄節約之强行。”（刘耀燊：“日本明年度新預算的透視”）

日本对华而設的租稅，从昭和十二年度到現在，有临时租稅增征法，北支事件特別稅，支那事变特別稅，而其增加不过四万余元，共对战費之补偿不过5.6%。（“日本明年度新預算的透視”）

一九三七年日本政府又通过紧急增稅案，烟、酒、衣、鞋、糖、火柴、鉄路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都要增稅，財政收入可多得三万万元。一九三七——三八年度，国家賦稅本已由七万万三千五百万元增至十二万万五千万万元，將來恐仍須增加大众的負擔。（思慕：“日本七十三屆議会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二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若以增稅次數而言，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間，日本增征租稅竟达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度預算，依据“临

时租稅增征法”，达二万万六千万元。第二次是“华北事变特別稅”（所得特別稅、临时利得特別稅、盈利分配特別稅、公私債利息特別稅、物品特別稅）一万万元。第三次即是一九三八年度对华軍事特別預算中規定增稅三万万元。（郑森禹：“一年来敌国財政恐慌的深化”）

就去年（一九三八年）一般預算和軍事預算而言，征稅額約二十二万万元，七千万人口平均每人須担負三十一元以上，比一九三七年度之二十四元增七元以上。（同上）此外，各道、府、县、市、町、村地方財政之由征稅所得者，每年約六七万万元，連同國稅計算，每人大概要負擔租稅四十元左右。姑仍以每年國民所得一百四五十万万元每人分得二百元計算，租稅佔去所得額的百分之二十。而所謂所得二百元是平均數，窮人是大大低于此數。同时每人負擔租稅四十元也是平均數，一般人民的負擔決不止此數。所以平民對於租稅的負擔，實遠在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雖然租稅的增征已是用盡極大的力量了，但對於瘋狂的侵略戰爭，仍是緩不濟急。因此，除了主要地靠公債以外，還企圖向國外借款以擴充軍需工業。

一九三九年新預算國民租稅負擔的倍增——日寇戰時財政的籌措，仍不出增稅和公債這兩途。臨時軍事特別預算還沒有編成，而先事承旨的石渡，却已先作成了增稅的計劃了。石渡的增稅計劃，已提出到今次議會（即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三月的七十四屆議會）通過了。他的目標，是在增加稅收二万万元，作為臨時軍事費的一部，今次增稅的中心，是在於臨時利得稅和物品稅。且議會的增稅計劃，臨時利得稅約八千万元，物品稅約六千万元，合

計一萬萬四千萬元，佔了增稅總額百分之七十。其餘如利益稅約八百萬，公債和公司債利息稅約一百萬元，砂糖消費稅約一千萬元，清涼飲料稅約二百萬元，印花稅約一百萬元，建築稅約二百萬元，飲食游興稅約二千萬元（其中撥回地方一千六百萬元，國庫純收入實得四百萬元），合計四千四百萬元。此數連前中心項目之一萬萬四千萬元，合計國庫純收入一萬萬八千四百萬元。石渡增稅政策，無一不為資產階層着想。將近百萬萬元的軍費的分配，臨時利得稅的增征不過八千萬元而已。增稅的大部份，仍然放在老百姓的身上。今次的增稅範圍，已可說無微不至。正如“朝日新聞”所描寫一樣：“例如早起盥洗，所用的石鹼牙擦，都已課了稅；又如外出歸來，飲一杯紅茶或咖啡，也要稅金。”增稅增到小孩的糖果、玩具以及文房用品。預料一九三九年度日本公債，將增發六十萬萬元以上。石渡藏相二月三日在眾議院預算第三分科會對森田福市民的質問說：“公債利息由增稅收入來支付尚有余，在國家方面，便等於借了無利的錢。”依照他的意見只要增稅能支付公債的利息，不妨增發公債。（梁式文：“日本一九三九年度財政的診視”，“世界知識”九卷三期，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六 解決財政困難的主要方法不是依靠發行公債

近代國家的發展和國債的增大，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國債，是國家財政的基礎，這兩者的聯繫，自世界大戰以來是更其密切了。“三大列強”之一的日本，這一傾向當然也很顯著。歲入中租稅和公債所佔的比率，前者是日益減低，而後者則日益增大。因為增稅是征收現實資本，大眾立刻會感到痛苦，公債在原則上是

征收睡眠資本与遊閑資本的。根据魯白可夫氏研究所得，租稅和公債在世界大战时各国战費中的比率，平均租稅佔7.4%，国内公債佔78.7%，外債佔12.9%，計租稅对公債为7.4%和92.6%之比。可知战时財政的来源，發行公債及紙幣是居絕對的高率。

（“日本侵华的費用如何筹措”，石濱知行著，郑森禹譯，“世界知識”七卷一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日本所發行的公債額数，在战費中的百分比是相当巨大的。第一次第二次的对华事件費中，公債約四万万六百万元，第三次对华事件費二万万二千万元全部依靠公債，合計公債部份达二十四万万二千六百万元，約佔全部战費96%。

日本國債淨数，在一九一四年是二十五万万日元，一九三二年是六十二万万日元。一九三七年三月增加到一百十万万日元，預計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当增到一百四十四万万日元。（“日本战时經濟的困难”，“世界知識”七卷二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又据日本大藏相發表，截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止，日本公債總額共計一百十八万九千三百万元。另据大藏相發表一九三七——三八年度發行之公債預算額，計總額六十五万万五千六百八十万零二千元，如加上以前之發行總額，勢將突破二百万万元。（田文彬：“論本年度的日本財政危机”，“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但照日方某經濟家的估計，要日本全国人民把生活費用減縮百分之四十，才能得到这笔新公債的来源（指一九三七——三八年度所發公債）。（“敌人危机的新阶段”，“世界知識”七卷九期“瞭望台”，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又据謝南光氏的估計，日本的國富有一千一百万万元，國債的總額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已达二百十万万万元，（“日制‘东亚联邦’

与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約消耗全國動產五分之四，(二百三十七萬萬一千五百萬元，(見蕭學海：“日本總崩潰之時間問題”，二十八年三月二日，“大公報”)使日本在我余剩的活動資產，僅余二十萬萬上下。

七 但公債的消化已日見困難了

這樣巨額的公債，消化是很困難的。如一九三八年從一月到十月間，據官報，日本所發公債，共達三十六萬萬三千萬元，消化額數為二十八萬萬六千元，佔全數77%，一九三八年度應發數為六十五萬萬元，每月平均額達五萬五千餘萬元，但一直到該年六月間，實發數僅及一半餘，消化數僅及三分之一。(鄭森禹：“一年來敵國財政恐慌的深化”)

日本國內公債消化能力，各人的估計很有差別。高橋以為至多不能超過一億萬元，軍部御用學者野田豐則謂：“就日本財界的實力而言，慢說一二億萬，就是四五億萬的公債，亦無問題。”後一說顯然是欺人之談。(田文彬：“論本年度日本財政危機”)

公債消化力的貧弱，自然，主要的原因是國民生活日漸貧困，購買力疲乏。同時，公債的發行也更加重了國民的負擔。據鄭森禹氏的統計，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日本國債額已達一百三十七萬萬二千一百萬元，這巨大的數目壓在七千萬人口的頭上，每人平均一百九十六元，相近二百元。每年國民所得如以一百萬萬元計算，每人分得一百四十三元，則每人平均所負國債超過所得五十三元，縱使國民所得總額仍以一百四十五萬萬元計算，抵充國債額也相差無幾了。而且，地方債還不算在內，倘使算到一

九三八年度末，照預算，國債額將近二百萬萬元，每人分得二百八十元以上，國民要想付此巨數，即使不吃飯也不可能呵。（同上）

日政府為了要求消化這些必須消化的公債，也就不得不採用各種辦法，其主要的：（一）是運用高橋藏相以來的公債市場政策，即政府把大量資金（自然是紙幣）散佈于民間，使民間以這些資金去向日本銀行購買公債，從而通貨還流，便不致明顯的引起通貨膨脹。（二）同時實行低金利政策，把一般資金利息壓低，公債始利于出賣。但因實施低金利息的結果，第一是阻礙儲蓄，第二是侵蝕生產資金。……為了要把已經侵蝕的資本多投向軍需工業，于是運用強力的統制資本政策，在臨時資金調整法的實施之下，所謂和平工業的投資是被嚴格的限制了。……事業資金萎縮結果，一方面使軍需生產無法盡量擴充，供不應求；一方面非軍需工業和一般事業之被限制，引起物價騰貴而輸出減少，尤其是紡織品之輸出減少，產生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問題。（三）公債消化的強制的傾向已在發展。一九三七年十月大藏、商工兩省向生命保險會社提出，須把一九三七年度資產純增加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購買公債，便是明証。（四）由郵局出售小額公債以直接吸收儲蓄。同時，強令儲蓄而傾銷公債。日本大藏省發表八十萬萬元的國民儲蓄運動，其中充公債之消化者佔五十萬萬元，充生產之擴充者計三十萬萬元。（劉耀榮：“日本明年新預算的透視”）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以公債政策為財政救濟的中心，但是，它底財政政策始終存在着一個無法消除的矛盾，即生產力擴充與公債消化之矛盾，和平產業之犧牲與物資總動員計劃的矛盾。這

些矛盾，也就是日本公債政策实施的障碍。这个障碍的消除，是要待諸日本帝国主义从侵略战争中坍台以后，才可实现。（同上）

公債消化的現狀及其前途——日本大藏省关系人物，常常高唱公債消化的成績良好順利，据他們自己的發表，去年公債消化率，佔發行額87.4%，即是發行公債四十三万万三千五十万元，推銷了三十七万万八千九百四十万元。但是，即使这个数目可靠，离預定發行額尚远。在一九三八年度的公債發行預定額，和上年無法發行額合計，达八十万万五千四百万元，其中發行的合計，是五十三万万而已，余額尚有二十七万万五千四百万元。何況在去年所發行的所謂消化良好的成績，並不是真正的呢？……日本公債發行額截至去年（一九三八）为止，达百六十二万万二千二百万元，今年度預算不足額假定为六十万万元，加上去年無法發行額二十七万万，則今后一年間（按即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的一年間）公債發行額將达百万万元。石渡認定“政府資金散佈——公債消化”，这个循环为“最良方策”，今后仍將这样的进行。其实，除此之外，已別無他途。在上述情形之下，再加上百万万元公債，則通貨膨脹，必更为深化；而产业資金更無着落；信用膨脹又將更为展开。日本政府一方面是用种种統制方策以企圖防止通貨膨脹，他方面又不能不促进通貨膨脹，固已自相矛盾，而且也是自掘墳墓。（“日本一九三九年度財政的診視，”“世界知識”九卷三期，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八 最后必然走到通貨膨脹的路上去

战争的初期，战費的調度虽或局限于增稅和發行公債；但随着战局的發展，战費膨大化，傾向于增發不兌現的紙幣，是必

然的。

日本銀行紙幣的發行額，原約十萬萬元至十二萬萬元之間。事變後，漸次增高；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間，已一躍而為十六至十八萬萬元。三月中，又增至十七萬萬元至十九萬萬元。四月起，日銀準備額由十八萬萬元（現金準備八萬萬元，保證準備十萬萬元）增至二十五萬萬元。但所增加的七萬萬元純屬保證準備，現金準備分文未加，保證準備和現金準備由十與八之比，一變而為十七與八之比。而實際，就連這所謂八萬萬元的現金準備，恐怕已經靠不住了。惡性通貨膨脹如果襲至，則必然來到的是物價暴漲，國民生活破產，財政、金融、經濟大混亂，一先令二便士無法維持，貿易跌落之事接踵而至。雖善於理財若池田者，也難於挽此狂瀾。

據本年（一九三九）二月間同盟社息，日本政府“決定增加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自五萬萬日元至二十七萬萬日元。同時，各殖民地銀行亦將增發紙幣，台灣銀行紙幣擬自三千萬日元增至八千萬日元，朝鮮銀行紙幣自六千萬日元增發至一萬六千萬日元。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銀行發行紙幣最高額，曾以各種方法一再提升。……一九三六年歲暮。戰事尚未發生，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為一、八六五、七六〇、〇〇〇日元。及至一九三八年底經過兩年戰事，該行紙幣發行額已增至二、八五八、六〇〇、〇〇〇日元。前後比較，增發之數共達十萬萬日元之多。同時期內，朝鮮、台灣兩銀行亦有相當增加。總計，戰時日本國內及各殖民地所增發之紙幣，較之戰前，約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通貨膨脹，貨幣跌價的危險將不可免，而日本亦將遭遇戰後德國同樣的困境。（“日通貨膨脹”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導報”）。

第二章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經濟 狀況及經濟政策

一 資源貧乏的日本，重要資源 均不能自給，这是日本長期 戰爭的致命傷

日本帝国主义与其国际贓友德、意法西斯一样，也是个資源貧乏的国家。正由于此，也就成为法西斯侵略狂的構成原因之一。同时，在其侵略戰爭的發展过程中，也就走向自己挖就的陰森的墓穴。

然而我們絕不能太过的估計敌人資源的缺乏，那將使我們对于戰爭的發展發生不正确的估計。

据 Barion Crane 于一九三七年底的估計，那时日本的原料，是相当充足的。煤已能够用，即使不取給于伪“滿”也可以。鉄的供給只有四分之一是来自中国政府所控制区域的。还有一九三二——三七年的“軍事补充計劃”，当然也积有相当的軍备儲藏，足供三四个月之用。（瀚生譯：“在戰爭重負下的日本財政”，“世界知識”七卷二期）

当然，这个估計是有時間性的，由于戰爭的繼續，战費的龐大，虽使軍需工業增加不少繁榮，但軍需工業原料也就随着戰爭的延長而更加枯竭。即以煤油的消費量而言，在平时每年为三百五十万吨，对华战事已使煤油的需要額增至四五百万吨，本国的產量至多只有三十三万吨，頁岩提煉、石炭液体化等方法所增無几（十余万吨），故每年本国的產油總額只足供战时消費量百分

之五至一十。日本煤油商及海陸軍方面，虽有巨量的屯貯，但極其量也不过等于半年的輸入額，只够六個月至八個月之用。現在日本已開始感到煤油缺乏，因此，汽油之出售須有特別許可，私人汽車每日消費不得超過兩加侖，由此城運往彼城的煤油，就須有特別的許可証。

至于为軍事工業最重要的原料：銅、鐵，日本同样感到短少。最近日本曾謀開採菲律賓的鐵礦，虽遭奎松總統拒絕，但“日方則正盡量收買私人所有的菲島各礦所產的生鐵，足見日本需用生鐵甚多”。（一月二十二日馬尼刺“合眾社”電）日本最近为軍需而購買之銅，已達三萬萬元，使世界上跌落之銅價格突然上漲。（一月二十四日倫敦“塔斯社”電）面對着原料供給上的困難，近衛內閣時代，曾草擬充實全國資源之四年計劃來增加生產。但這種計劃究竟緩不濟急，所以近衛又不得不提出極力節省与軍需有關的原料的主張，以致勸國人節省消費，俾便于軍需品之輸入。（思慕：“最近日本內部危機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此外，日本需要最迫切的軍需工業原料還有鋼。日本儘量購買銑鐵，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一九三七年，它在美国購買的銑鐵一百九十萬噸，等于制鋼容量的三分之一，但它還是繼續購買。一九三六年購買的鋼制品為五十四萬噸，一九三七年增至九十萬噸，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前已購買了銑鐵六十五萬噸，鋼的購買量也繼續增加。日本所買的鋼並非純鋼，而是已經摻雜了銅、錒、鉛、鉻等等的混合質，以供製造高級的軍械。（塚寒譯：“日本經濟对美国的依賴性”，“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原文載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紐約時報”）

日本帝国主义重要资源的缺乏和对于国外的依存，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弱点，在长期战争时，更可以成为它的致命伤。与军需有关的物资能否自给，直接影响到它的战斗力。因此，我们得了解日本军需原料的自给程度。兹录在中日战争前一年日本的各种重要军需品原料的自给率：

铁砂	23%	铀铁	70%
铜	59%	铝	30%
棉花	20%	铅	8%
锡	29%	锌	29%
煤油	8%	羊毛	5%

他如橡皮，日本完全不能生产。铋和镁，日本差不多完全没有。镓、铜、铬等，日本的产量还不够平时所需要的一半。军需工业原料中比较上可以自给的，只有煤及硫化铁和硫黄矿。

军需原料的产量只有这些，日本军阀为了准备对华武装进攻，便不得不及早储存了。因此，日本自九一八以来，便厉行战时的经济体制，树立“原料国策”，以及预先储积军火和重要的军需原料。据塔宁氏的估计，日本军需原料如煤油、棉花、米、其他粮食，及工业原料的貯蓄额，约共值二十七万万五千万日元。战争前后，日本曾堆积有空前巨量的屑铁，准备战时的铁饥饿。但是因为战时重工业的急剧膨胀，极其量也只足供一年之用。遵照日本政府的命令，日本的外国煤油公司必须贮藏它们每年售额的百分之五十，此外，海军方面也貯有巨量的煤油。但是，煤油的积貯，还不过等于半年的输入额，而且战时的消费比平时至少增加一半，所以就令日本政府怎样设法积貯，如果战争延长到一年以上，日本的军需品原料便会产生严重的饥饿。

軍需原料是如此的饑饉，因之不得不仰給于外國。首先是汽油最感缺乏，抗戰爆發兩個月後，日本便從美國買入二千五百万加侖的飛機用的汽油，跟着又買原料一萬萬五百万加侖。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又向美國訂購大量煤油，又從澳洲、美國購買大量廢鐵，在上海曾以重價收買田野間遺棄的舊砲彈壳。（思慕：“日本軍需原料饑饉的現階段”，“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二 日本政府三種解決原料飢荒的辦法

日本當局怎樣應付原料饑饉與恐慌呢？在消極方面，不外貿易統制和消費統制，在積極方面，就是原料生產的擴充，滿洲、華北的原料掠奪，以及代用品的尋找。茲分別敘述如下：

消費的分配與統制政策

為維持國際收支的均衡，此政策的推行，日緊一日，戰後頒佈的有鋼鐵工作物製造許可規則，銅使用限制規則，白金使用限制規則，金使用規則，尤其是汽油消費的統制，特別厲害。

自去年五月一日起頒行了修正的鋼鐵使用限制條例，幾乎不能用鋼來製造普通用品。金與白金的使用也老早禁止。銅、鋁、錫、鎳及其他金屬品、橡皮、皮革的使用，均受限制。工商省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中，下令限制民間使用純銅，俾使銅的消費能減少五分之一。其他如貨幣成色的變換及以紙幣代替硬幣，都是節省金屬的結果。被節省下來的金屬，就製造彈丸槍砲，……一切金屬原料的使用，都以戰時的目的為標準。

代用品
的寻求

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間，工商省即鼓动各工厂以別的物品代替錫、鋁、橡皮、皮革等物品。同时，日政府命令組織一科学委员会，計劃以人工制造所缺乏的原料的代替物。近年，滿鉄銳意發展石炭液化事業，以謀煤油的自給；为了这試驗，已經化了好几千万元；但是非到一九四三年不能有什么成效；而且从人工方法煉出来的煤油，生产費比天然的煤油高百分之六十，殊不經濟。（同上）

向 外
購 买

軍需原料的缺乏，絕非統制政策的实施和代用品的寻求所能补救的。为了补救这个缺陷，只有向国外購買，主要地是向美国購買。日本对于美国的机械和机件，是十分迫切需要的。一九三七年，曾向美国購買了几件最新式的碾鉄机，既可节省劳力，又可大量生产。它还想購買該項碾鉄机，使每年鋼板的生产达到四十万吨（目前每年仅能生产二万二千吨）。

制造飞机和汽車的零件也很需要。一九三八年曾向美国定購五百架旋盤。因为缺乏車輛，运输大感困难，南滿鉄道又不得不向美国定購列車兩千輛，机头二十五輛到一百輛，这等于日本扩充車輛生产紧急計劃的百分之二十。（同上）

最必須向美国購買的，还有煤油。一九三七年，日本的煤油消費量为三千四百万桶，到該年十月底为止，它已經从美国購買到二千三百万桶。九、十兩个月間，兩海岸运出的煤油，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一倍。（同上）

其次，就是向美国購買鉄。一九三七年，美国屑鉄对日的輸

出，比上年增加了三倍。（杜若君：“日本挑战下太平洋斗争的新形势”，“世界知识”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根据一九三八年美货运日统计（华盛顿二十一日“哈瓦斯”电，载于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导报”），日本在去年一年内，仅止向美国购买之货物，共值二三九、五七五、〇〇〇美元。其中：

飞机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汽油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钢铁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钢制品	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棉花	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铜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汽车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机器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共计	二〇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其他杂货	二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三 但已开始遇到了抵制日货运动势 将促进日本的崩溃

最近，因为世界反侵略运动的高涨，各国抵制日货的运动也日益普遍起来，日本购买军用品的能力，因而也大大的减低。

日本法西斯军阀，在我们持久战方针打击之下，首先感觉难以应付的，就是军需原料的缺乏。“过去的储蓄差不多已用完。贸易的统制，消费的节省，只是一种暂时的补救办法。而伴着此等政策俱来的贸易恶化和物价腾贵，将促进日本经济的崩溃”。

（“日本军需原料饥饿的现阶段”）（按：此材料是一九三九年

二月下旬的估計) 这不仅是前途的推測; 而且是目前的事实, 因为由于原料缺乏, 影响价格騰貴, 跟着引起生产費的昂貴, 間接使一般物价都高漲起来。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到一九三八年三月, 燃料騰貴 34.8%, 甲于其他物品。工業物品 22.1%, 肥料 18.3%, 金屬 11.2%, 建筑材料 8.8%, 一百十类物品平均騰貴 5% (日本銀行調查)。这种物价状态, 反映出各种物資缺乏的不同的深度。(同上) 据王紀元的估計, 自抗战爆發至一九三八年五月, 物价平均增高三成。(“抗战第二期敌我情勢的檢視”, “世界知識”七卷九期,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按: 同时, 也就是增加了国民生活的穷困程度, 必然更加促进日本人民大众反战反法西的革命情緒。)

总之, 日本的資源, “縱然在粮食方面, 也許可以自給自足, 但是它所需要的許多原料, 百分之七十是仰給于国外的。为繼續擴張軍备及軍需工業所需要的新机器, 也要求諸国外。海陸軍直接需要許多制成品和許多制造專利权, 也都要購自国外。(“日本战时經濟的困难”, Gmenthu Stern 著, 周新譯: “世界知識”七卷二期, 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按: 这样貧乏的資源, 要想在長期侵略战中获得胜利, 那只有日本軍閥会这般夢想。)

四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行經濟統制政策——

物資总动員計劃

物資总动
員計
划的产生

抗战以来, 由于我們坚持持久战以消耗敌人, 使敌人的进攻陷于艰困境地, 泥足愈陷愈深, 首先表現在敌人經濟的窘困方面, 因此也就产生了为了应

付長期戰爭的各種戰時經濟的統制政策。

誰都知道，日寇的侵華方針是求“速戰速決”，打算三個月灭亡中國，然而中國的抗戰击破了日本軍閥的迷夢。因此，日本的經濟也由“不擴大”的方針而急轉為長期應戰的方針。經濟的統制与管理是強化了。虽因強化的結果，造成許多严重的矛盾現象，如對於輸出制品的原料之輸入的限制，和平產業的犧牲，更因軍需資料與輸出品材料的使用限制，以致产生百數十萬失業者，這些，都不能絲毫阻止日本經濟統制政策的實施，因為捨此別無良法呵！

去年十月我軍退出武漢，更使日本感覺有強化經濟統制的必要。日本商工會議所的理事木村增太郎，即曾著文警告其國內經濟界。他說：“漢口陷落，事變絕不終了，因此為了在今後蔣氏所企圖的長期消耗戰中，獲得徹底的勝利，必先整備國內的經濟組織。同時，以財界人對於事實本質的十分認識為基礎，而完成一切的統制。因為漢口的陷落，是事變走進長期戰爭中的新的第一步，對於國內經濟如果不實行更進一步的有組織的統制，不僅長期應戰有很大的困難，且因為矛盾的激化，對於盤鋸在事變背後將要發生的新事態，也不會有什麼有力的對策的。”（裴丹譯：“漢口戰後日本的經濟對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載於十月一日的“經濟學者旬刊”）

同時，木村增太郎又說，由於極度压制輸出產業原料之輸入，造成貿易輸出入不調和的現象，使“在國內發生了多數的失業轉業者。在華的既得市場，因為外商的搗亂，有很多人憂慮着，這或會使今次事變的犧牲致於一無所獲的重大事態”。因此，他認為“輸入手續的簡單化，貿易特殊工廠制的立案，輸出資金

預借損失，補償制的新設，聯系制的採用，外國匯兌基金制的設置等，各種非常對策的實施”還不夠，還應當“更進一步，把輸出入置於強力的一元統制之下而聯系的運營”。要像歐戰時的德國一樣，設立中央購買公司，由國家來管理，實行有組織的輸入，即使遭受部份的產業者的反對，也要斷然進行。

雖然日本經濟政策並未盡如這位理事先生的主張實施，但卻在走上而且必然地走上這條路了。它的具體的表現可以說就是“物資總動員計劃”的頒佈。

物資總動員計劃的中心目標，不消說是為的準備長期的侵華戰爭而謀軍需的充足。因為日本的資源，特別是軍需資源是異常的貧乏。為了確保軍需品的供給和保持日幣對外的購買力（外匯率），雖然曾頒佈“臨時資金調整法”，“輸出入臨時措置法”等，調整物資需給的方策，可是，賀屋、吉野所施行的無計劃的限制輸入，不獨妨碍軍需資財的入口，而且造成輸出激減的結果，更影響到輸入的困難，軍需用品的原料如銅、鐵等有色金屬及皮革、橡皮等都感缺乏。因為軍部對他們不滿，只得“讓賢”，而物資需給的再調整，也就成為必要。

正因為確保和增強軍需資材的供給，振興輸出貿易，防止物價騰貴，和厉行國民儲蓄，是目前日本為準備長期侵華戰爭在財政經濟上最迫切的問題，所以產生了“物資總動員計劃”。

物資總動員計劃的內容

這個計劃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物價騰貴的抑制——實行方法，除設定基準價格、公定價格之外，實施消費節約，分配統制等等；

第二，國內不急用物資的消費節約——實行方法，為限制以

至禁止使用，代用品之強制使用等；

第三，輸出增進的綜合計劃——例如實施輸出入運銷制，禁止輸出品原料改作國內消費之用等；

第四，輸出入分配機構之整備——例如組合制度之擴充等；

第五，貯蓄之徹底普及；

第六，非常時國民生活樣式之確立；

第七，主要物資（特別是礦產）積極增產；

第八，勞動對策——輪班制的採用，其他勞動者的急速補充；

第九，廢物之收回；

第十，失業救濟。

這個計劃，所有“強制儲蓄”“改善輸出入機構”等，是以“消費節約和統制”作軸心的。

池田對記者談話中曾這樣說：“以物資需給調整的方策論，生產力的擴充，消費和分配的調整，代用品使用的獎勵，廢物之收回等等，雖都在考慮之列，但我以為特別當務之急的，還是徹底的消費統制的實行，故要尽可能的努力於消費的節約”。換句話說，為準備長期的侵略戰爭所必須的物資，日本軍閥、財閥，便不能不以犧牲日本國民的生活為主要的手段。

日本國民究竟失去了或是減少了那些日常消費物品？使他們生活陷於艱窘貧困的地步！

根據閣議決定之計劃，被徹底限制消費的重要物品達三十二種，即是：

鋼材、毛鐵、金、白金、銅、黃銅、鋅、鋁、錫、鉛、銻、鎳、水銀、石棉、棉花、羊毛、木漿、紙、麻、皮革、木材、重

油、揮發油、制革材料、工業鹽、石炭酸、硝酸蘇打、硝酸鉀、磷礦石。

三十二種物品中，除了鋼和紙在平時可以自給外，其餘的物品的自給率都是很底，甚至不能自給。即以鋼和紙而論，前者的供給在目前已痛感缺乏，而後者的原料——木漿——也不能完全自給，故同樣有限制使用的必要。

在吉野商相時代，本已有“鐵鋼工作物鑄造許可規則”、“毛鐵鑄物製造限制規則”、“金使用規則”、“揮發油重油販賣取締規則”的頒行，現在池田除了下令把鋼、鐵、煤油的使用限制加以強化之外，還新頒關於棉製品、羊毛製品、皮革製品、橡皮製品、美國鉛、鋁、錫、鎳、銻等十七種物品的製造、販賣和消費的非常管理的法令。水銀、化學工業藥品、內地产木材、紙等的非常管理之實施，也在積極準備中。余如麻類、石炭酸、石棉、工業鹽等，均不是為軍需工業或獨佔會社所管理，所以可由匯兌管理法把民需加以限制，暫無另頒法令管理的必要。此外，重要的輸入物品六七十種，也準備於最近施行消費統制，其中煤的統制分配業經開始。

據新頒佈的強制消費節約的法令中，禁止棉花、棉紗充作國內消費用的規則，是物資總動員計劃的骨干。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府已有“國內用棉製品混用人造纖維規則”的公佈，節省棉花留作輸出用的棉製品原料。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又有“棉紗統制規則”的頒行，加強棉紗分配和使用的統制。但因為棉業整個機構非常複雜，統制極難，反變為居奇投機的棉花競買。所以池田上台後的第一砲，便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公佈和即日施行的棉製品之生產限制、加工限制和販

买限制的法令。不久，在同年七月八日頒佈並于下月十五日实施的鋼制品制造限制令，一切鋼制的日用品和民需的机械类生产，差不多完全被禁止。为节省建筑用的材料，住宅的新建，以三十坪（一坪約等于〇〇・五亩）为限，工場以八十坪为限。至于軍需以外的皮革制品和橡皮制品也差不多完全成为禁物。

实施物资
总动员計
划的办法

故政府为要强制的实行这种使国民生活益趋貧困的計划，倒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为了实施这計划，首先举行了各种宣傳，如“新国民生活运动”，以及

举行消費节约全国大运动。不过，池田主要的手段还是靠法律的强制力，而池田得意之作的“經濟警察”就是执行这种强制力的主要工具。現在內务省警保局內，設經濟保安課，东京警察所設經濟警察課，各警署設經濟警察系，各大府县的警察部內也設立同样的机关。由敦練的警官內，选出“經濟警官”三八九一名，他們主要的职权有三項：（一）取締与拘捕違反經濟統制法令者；（二）担任經濟情报；（三）执行特殊物资之分配。关于物资調整事宜，又与三千名的“物价監視委員”提攜。

此外，还推行地方預算之节约；鉄道省延緩鉄道和車站的建築和改筑；遞信省节约造船，減設电话；文部省限制学校，和学生的节约紙、皮革等学用品……。預期中央減政計划可以使本年度的实行預算減少一成以上（即二万万五千万至四万万元），但各省所編的节约总额还不到一万万元。从老百姓身上一点一滴榨取下来的一些脂血，怎能維持侵略者的凶餓？更何足延長軍閥們的統治命运？反而是日本法西斯統治者自杀的鴉片烟膏呵。（思慕：“日本物资总动员与其影响”，“世界知識”八卷三、四期，二

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物資總動員
計劃實
行後的影響

日本法西斯不惜孤注一擲的實行了物資總動員了，但它給予了法西斯以怎樣的“果”？它對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給予了如何的影響？俗話說得是“誰種下仇恨誰

遭殃”，如今，就是池田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物資總動員計劃不能免地使國民的日常生活增加許多的不自由和不方便……。如因鋼鐵消費的限制而買不到剪刀與小刀，因皮革制品的限制，而學生拖木屐上學等等。……被統制物品的“搶買”和祕密賣買，便不斷發生，投機的屯積、居奇也因此助長。

但是，物資總動員計劃最大的影響，也是最使日本當局焦慮的影響，還是在於它：（一）加深日本跛行景氣；（二）促進中小企業破產；（三）造成大批失業勞動者。

我們可見，以“徹底強化消費節約”為骨幹的物資總動員計劃的實施，是日本軍閥、財閥為準備長期戰爭所不能不注射的強心針，在某些方面會收暫時的效果。而實行不易，流弊極多。中小工商業的沒落和失業的激增，更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轉可以給日本的力量以打擊。如果說是這個政策的實行尚有它的積極的效果的話，那就是促進軍需工業的膨脹，資本的集中，以及加強他們對於勞動者的榨取。在這一點上，池田可以告無罪於他的主人——軍閥和財閥，因為他是盡了一個庸醫的職責呵。

五 發生問題的總動員法第十一條它的問題在那里？

下面是日人木村禰八郎的一篇論文，錄之于下：

第十
一
条
的
内
容

第十一条是由下列三項構成的：

- (一) 对事業資金的抑制； (二) 限制紅利； (三) 对金融机关强制資金放款。上述三項中的第一項，已經施行“临时資金調整法”而實踐着。

因十一條發動而發生了問題的是二、三兩項。关于“限制紅利”：(一) 欲增加紅利者須經主管大臣的許可；(二) 現在限每年紅利分配在百分之十以上的會社，原則上不許再增加紅利；(三) 每年紅利分配在百分之十以下的會社，原則上允許共增加到百分之十為止；(四) 关于受到限制的部份的利益金之處分，不加以强制保有公債及其法令上的限制，使其保留在會社內，期待營業者自动地运用于生產力擴充方面。关于强制資金放款：“生產力資金的强制命令”條項不發動，关于此，另研究設立“战時金融會社”方案；興銀動員等适当的方法。这个妥协案里含有种种矛盾。試舉其主要的：(一) 第十一條發動論，本是發源于与劳动統制(第六條)同时發動的均衡論，既如此，則对于現行高率紅利不加抑制，就是矛盾。这些會社多半是屬於所謂殷實產業，或者是在國家的庇護之下的，論理，要求牺牲公平，就不能不从这些會社开始。(二) 由事業界的現狀看来，以百分之十为限制的限度未免过高。但是成为問題的，是百分之十以下的會社太多。由于这回的妥协案的成立，不滿百分之十的分紅會社，得以增加紅利的分配到百分之十，这反而助長了紅利的增加，豈不是招致破坏劳資負擔均衡的結果么？(三) 妥协案巧妙的迴避开第十一條的“强制放款”規定的發動，只另行創設战時金融制度。当官民一致必須向生產力擴充迈进之际，既存金融机关得以免掉战時特別金融的負擔。(四) 結局，虽抑制住百分之

十以上的紅利增加，使其自动地以社內保留金运用于生产力的扩充上，但百分之十以上紅利的会社並不多，因此不能期待充分的生产力扩充。

实施第十一
条將發生
何種影响？

对股票市場的影响：对股票市場的影响，已經紛紛出現，虽十一条發动內容改緩和，但給股票市場的印象仍然是最不好。那作为惡影响的根源的事情

是：政府虽說在方針上容認既存紅利，但許可限度既決定为百分之十，那末現在的高額分紅会社也許要遭遇一种限制利潤政策，因而向百分之十的水准下降的傾向被促进。为了避免急激低降时財界發生冲动起見，大約將採取漸進的方法，股票市場的最大部份都抱着这种見解。此外，还有一部份抱着过分憂慮的，以为根本上十一条既發动，那末視情勢之如何，抑制的水准还不知將發生什么变化。于是股票市場發生了一种傾向，那就是投机興味本在漸次減少的市場愈呈疲弱，投資大致正向着实物中心主义移行。

对金融界的影响：金融界因为强制放款条項不致發动，当然抱好感。事实上，該法的發动，可以說对金融界几乎没有影响。金融界对本法的發动抱着極其乐观的見解。对事業界的影响：十一条發动，百分之十以下的分紅会社可以增加分紅，所以一时对此是欢迎的。但抱着十分的警戒心，因为倘若抑制高額紅利的方針，借总动员法的發动而获得法律的根据，其結果股票投“的”味將大大減少。資本市場將依然持續着現在这种股份过剩状态，市况不振，因而在以前甚至借銀行資金来向股票投資的人們將減少，經過股票投資来筹措生产費扩充資金之事不免更加困难。于是迄

今为止，在自然調节作用下的产业資本的膨脹集中，將遭遇一大制約。而依賴国家的強力統制金融之处，愈益增大。加以物价抑制、增稅、原料消費統制强化等官治統制的更有加重，抑制住財界的“創意”的活动，所以不能因为这种緩和限制紅利的不安的方針，而于此时經率地無条件地为財界的今后乐观。把上述的种种綜合起来看，財界里面对十一条發动的影响抱乐观的，只有金融界，足見金融資本在十一条的發动下如何的被拥护。

最后，敘述一下对国民生活的影响：如果十一条發动下所抑制的紅利，运用之于救济休業失業的对策，那末該条的發动直接的和国民生活具有密切的关联。但是，据說被抑制的紅利，將于生产力扩充之事十分紧迫时拿来应用，所以直接的和国民生活沒有关联。至于为了和第六条取得均衡而發动第十一条，那不过对劳資間的均衡給与心理的影响而已。实际上，不能提高国民的生活。当此之际，社会政策或道德观暫且被揚棄，这是不可避免的。大陆開發事業尙在中途，对外信用的設立实际上很困难，除去以国民生活之牺牲补助战时經濟外，別無他法。（“总动员法第十一条的發动如何影响日本国民生活及財界”，木村禱八郎著，高磷度譯，“时事类編特刊”三十五期）

軍閥、財閥互
相妥協以便共
同向中国侵略

因限制分紅条項而在产业界，因強制資金放款命令条項而在金融界，俄然間激起狂風暴雨的动员法第十一条發动問題，由于軍、財間的政治上的妥協成

立，暫归鎮靜，十一条問題告訴我們，在以利潤为基础的經濟制度下，資本的威力是如何的雄厚。在利潤經濟之下，軍需生产和資本独佔化之助成拥护，是分不开的。（同上）

六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日本的工商業狀況

它究竟是怎样的

軍需工業
打倒
和平工業

日本資本主义虽然有了高度的發展，但其工業生产的中心，依然在于輕工業。惟自滿洲事变以来，凡与战争有关的工業，發展很快，而和平工業年見

衰退。由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金屬工業对全体工業的比率，由 8.2% 增至 9.1%，机械器具工業由 11.4% 增至 13.0%，而紡織工業由 30.4% 減至 29.1%。七七战争發生后，这种跛行景气的傾向更形發展。現在（按指一九三八年八月），由于物資总动员办法的頒行，和平工業的原料入手既困难，物品的生产和販賣也有大部份遭禁止。本来已經停頓或減少作業時間的紡織業、制革業等，將更見蕭条。（“日本物資总动员与其影响”，“世界知識”八卷三、四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按：这种景气的實質，不过是和平工業日漸破产，人民大众的生活日趨貧困而已。）

由于原料的缺乏和統制，由于軍需工業的繼續扩大，直接影响到軍需工業以外的工業生产的停頓或衰弱。“現在日本的棉、毛、麻、人造絲、紡織業、制粉業、建筑業等生产，和平常商品的工業，無疑地已日漸萎弱，或全部停工，或減少工作時間。日本棉紗業在“八一三”时，总計有八百万錠，現在（指一九三八）停工的达三百五十万錠以上。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人造絲的生产能力已減少到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六。新近会社股票的狂跌，都是証明輕工業的危机”。（“日本軍需原料饑饉的現阶段”，“世

“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輕工業危机的产生，無疑地会給日本資本主义的發展以重大的打击，因为它是日本工業生产的中心。就以紡織工業來說：“紡織業在美国工業構成上只佔14.1%，而在日本則佔至37.2%。其中，特別是制絲工業，在佔全体工業將近一半比重的纖維工業中，佔很大的比重。制絲工業數在纖維工業总数二二、一九四家中，佔三、三六五家；工人數在总数九百三十八万六千人之中佔三百一十一万二千人；生产額在总额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中佔五一、〇〇〇、〇〇〇万元，而这些制絲工業，几乎可以說是完全为美国人而活动的（日本每年生絲产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归自己消費，所余部分，皆輸出外国，絕大部分輸出美国），如果因为美国經濟恐慌而減去大部份的銷路，則日本帝国主义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將必崩潰主要的一角。此外如大量輸出美国的絲織品工業、罐頭工業、制帽工業及玩具工業，也都是日本的主要工業，……这些也將因美国的經濟恐慌而受打击。”（美国新經濟恐慌对日本的影响”，“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显然的，諸和平工業部門之所以日陷于停頓困苦之境，主要地是由于战争的影响：“第一，日本去年度（一九三八）的对外輸出，虽比前年（一九三七）略有增加（百分之三十七），但中国市場殆已完全失去，南洋各地受排貨影响，日貨銷路也見停滯。故輸出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多半被逼停業或縮減生产。例如新潟县有二百多个人造絲厂停工，鹽釜地方有許多紡織厂已宣告破产，京都絲織厂从去年八月起已減少百分之二十的生产。紗業联合会在去年（一九三七）九月七日宣称，第四季沒有动用

的机器，达百分之二十七·五。第二，为了保証軍需工業原料之供給而起的入口統制和軍需工業的优先权；使一般工業缺乏原料，不能不停滯。进口限制施于棉花、羊毛、木料等物品，而且受限制的物品日益增多（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禁止入口之原料及产品有二百六十余种）。据說，商業方面有二千万元的工程，全因鋼鐵的缺乏而陷于停頓。酒厂、磚窑、大百貨商店之改建或擴張，也因此受了限制。第三，公債对于游資的吸收，及私人資本的国家統制，使日本一般企業感到資金的缺乏而难以扩充。据捷克“潑拉格报”的东京通訊，仅一个月內，日本銀行存款便猛減八千万元。因为国内信用获得日見困难的緣故，日本实業家現謀向美国信用借款美金五千万元作为構置机器，經營滿洲重工業之用，南滿鐵道公司也向瑞士接洽借款，以求稍补工業之萎弱。（“最近日本內部危机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日本的資本和生产集中虽已經到了相当高度，但在和平工業中，中小工場仍佔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加入棉織工業联合会的八千一百四十五个棉織工場中，織机不滿五十架的工場佔六千六百九十七；全体織机三十六万架中，这些中小經營佔了十七万七千架。中小工場主要的是为国内市場而生产，如今棉花原料的入手，殆已絕望，据日本“經濟学者旬刊”的估計，棉紡織工場將有十分之五六要停机。如要轉換为輸出而制造，那方面又已有“滿座”之患，轉換不得。所以，一般說来，和平工業中的中小經營，結局不是趋于沒落，便为大資本家所併吞。資本集中的行程將突飞猛进。至于棉織業及其他限制的地物的批發商，以及与他們有关的中間業者和商人，因为批發售賣的禁止，其他的居間技能的剝夺，标准价格的規定，他們也会弄到無業可營，無利可圖的。（“日本

物資總動員及其影響”，“世界知識”八卷四期，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侵略戰爭又使
日本在華
財產大受損失

日本軍閥所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使國內輕工業萎縮，同時也使日本資本家在華的財產和商業蒙受嚴重的損失。

日人川島在其“上海戰爭中日人財產的損失”一文中，曾估計“八一三”上海抗戰時日人所受直接的損失，計算起來，當在九千五百萬到一萬萬元之間。但這僅是包括虹口與楊樹浦區住宅的財產所受損失而已，把其他區域，特別是有着日人主要紡織廠的地域都加以核算，那結果一定要達到更驚人的數目。”（“世界知識”七卷三期，二十七年十月出版）

另據塔斯社通訊，題為“侵略者的代價”一文所載，謂“此次戰爭所予日本在華財產與商業上的損害，必若干年後，始能將其重復舊觀。以上海一隅而論，日本一月之損失已達一千六百萬。此尚僅限於可以計算者。”（“世界知識”七卷二期，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因此，我們知道，日本軍閥所製造的侵略戰爭，不僅不能挽救國內經濟危機，反倒使其在華企業受到極大的損失。單以上海和青島兩大都市而言，前者直接的損失不下一萬萬元，後者竟達五萬萬元。（“最近日本內部危機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編者按：難怪日本一部份的財閥資本家對於戰爭的嗟怨了。）

戰爭與工商
業狀況
之惡化引起

人民生活的惡化——物價迅速高漲，戰時米價已增漲百分之三十，麥增漲百分之五十七，肉類增漲百分之四十一，工業品，尤其是從國外輸入的增漲

百分之百。工人的实际工資恶劣下降。軍事工業的工作日延長到十六小时。全部（和平）工業都已停頓，失業工人总数达一、八〇〇、〇〇〇。战争破坏了日本的农村，农民感到劳动力、馬匹、工具、肥料的缺乏，而在苛租重稅的負担之下破产了。蚕生产的縮小和蚕价的低落，使他們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業工人、商人、学生等的生活狀況日趋惡化，貧农、小手工業工人、小工厂工人的家庭受苦最大。家庭生活的負担，在被迫參战的結果，他們实际上已陷入危境。各处人民自杀者日多。士兵家屬的情况已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这对軍部是一个極端危險的問題，国内的貧困已影响到前綫士兵的士气。（“Daily Worker”，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七 我們再来看一看日本的对外貿易政策 及对外貿易狀況

为了战争
厉行貿易
統制政策

日本对于貿易的統制，已不自战时起。但是自从战事發生以后，日本更厉行这种政策，並且由匯兌管理进为直接的“物的管理”。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便施行“輸出入临时处置法”。十月底，商工省决定了貿易統制的方針如下：（一）优先容許关于軍需資材及生产力扩充上必要物資的輸入；（二）重要輸出品的原料，在国内消費可能節約的範圍以內，限制其輸入；关于輸出方面所需原料，得自由輸入；（三）原則上，不允許需要不急物品的輸入；（四）国内供給不足的物資，禁止輸出；（五）对国内消費的輸入品，以代用品工業的扩充，防止其輸入。到一九三七年底，禁止輸入的物品达二百六十

九种，受限制的六种，禁止输出的十种。与重工业有关的输入品，在一九三七年本已达总输入额百分之三九，比一九三五年（31%）大增。棉花、羊毛、橡皮等物的输入则大减。

最近输入内容的变化，下表更可表示出来：

（单位千元，有×记号的减，无此记号的增）

物品名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 一九三八年三个月）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 七同期比较）
棉花	二七九、三六三	× 四〇八、八九二
羊毛	五一、一一六	× 七四、二九三
木浆	八六、七六〇	三三、三七二
铁及其他金属、 原油、重油等、 机械类及其他	一、三〇九、五二〇	四七〇、八四四
生橡皮	四〇、五九五	× 三一、五四一
木材	四三、九九四	五、八九九
石炭	四〇、三〇〇	二、六五一
硫酸	一八、六三一	一一、六八三

这种贸易统制政策，既招来物价腾贵及和平工业的停顿，使大部份工业家叫苦连天。同时，还增加贸易的入超，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日本军需原料饥饿的现阶段”，“世界知识”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但结果使
输出锐减
入超激增

日本帝国主义，本来是个靠对外贸易来养活自己的。可是，因为应付战争，不得不对于贸易实行严密的统制。结果，使输出锐减，入超骤增。就一九三七年

而言，该年“入超额竟达六万万四千八百零一万元之巨。……这

种入超的威胁。在今后的贸易严密管理下，只有更增加其严重性。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去年（一九三七）内，前后共禁止了四百余种商品和原料的进口，可以说，除了军需品以外，其他全部都受着限制。这表示它最近的贸易量，已到了减无可减的程度。同时，更因为原料的缺乏，又使军需品以外的工业几乎陷于停顿的地位。再加上广大的中国市场的丧失，和世界二十一国抵制日货的蜂起（见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大公报”），越发使增加输出根本无望。”（田文彬：“本年度的日本财政危机”，“世界知识”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实在，各国的抵货运动打击了日本的国外贸易，即使是殖民地市场，也不能不使它失望（如印度亦进行着抵货运动）。在输出入的激减的现象上，反映出日本国外贸易衰退的严重事实。自从实行了“贺屋、吉野的限制输入办法，结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的入超额不过一万万九千余万元，比一九三七年同期，激减四万万四千余万元。但是，入超的缩减，是由于贸易总额的缩减所致。

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棉制品的国外贸易：本来，棉制品是日本输出的最大宗（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四月，棉织物的输出仍占输出额的20%，占第一位），棉纺织业是日本最主要的产业。棉花在平时又占日本输入总额的30%，因为战时军需资材的激增，棉花输入的抑制不能避免，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棉花输入只有二万万六千九百万元，比一九三七年同期减少三万万九千九百万元。”（吴大琨译：“日本碰到了一个新中国”，“世界知识”七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再据日文“经济学者旬刊”所载：“一九三八年度，对第三国

的純輸出是漸減的。至七月份輸出額和上年比較，其減退率竟達 52.5%。日本支柱工業的輕工業生產也是日益衰退，只今年（一九三八）六月間的停業成分即達 49%。其將更影響輸出額之激減，是可預斷的。又，原料品的輸入也是激減的，本年度（一九三八）前七個月間原料品減 40.2%；准原料品更減至 62%，這不但影響其國內工業之衰退，並且減少將來的輸出額”。（同上）

貿易的衰退，更表現在國際購買力的減弱上。例如：“美國輸出日本的銅，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五月間超過去年全年總額，但是六月却馬上驟然比去年六月減三分之一左右。碎鐵碎銅的輸入，日本也未如預定購買量之增漲，反比去年跌落十分之四有奇。其國際信用又是一落千丈，最近華盛頓商務部竟發出通函給製造商，警告它們不要冒險賒貨給日商；而棉花的賣主亦已將裝運中的棉花，扣留在碼頭等候日本購賣者的現款。日寇將更無能力去購買巨量的軍火及軍火原料。”

（編者按：貿易的萎縮，不僅使日本民生發生大問題，而且軍需資源的供給也隨之減少，這不啻給日本軍閥一個大威脅。）

日本經濟素來和美國經濟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美國經濟的興衰，直接影響日本經濟，自必非常深刻而廣泛。日本輸給美國的主要商品是生絲、絲織品、罐頭、帽子和玩具，都是消費品。特別是生絲，它是日本最主要輸出品之一，佔日本輸出品之王位，輸出額最多的年度，達八萬萬七千七百萬元，其輸出之絕大部份又是美國。據日本大藏相發表（昭和十年度）日本每年輸美物品的數字如下：

生絲	約	三萬萬三千多萬元
罐頭	約	五六千萬元

玩具 約 一千多萬元

帽子 約 三百五十多萬元

這些輸出額，在美國經濟恐慌影響下，也必大減。如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美國輸入的日本絲每年總額平均達三萬萬三千萬元，一九三七年卻只有九千萬元了。（“日本經濟對於美國的依賴性”，原文載於三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塚寒譯：“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至於由美輸入的商品，則為必需品，特別是軍需品，主要的有鐵、鋼、機器、汽車、鉛、銅、皮革及棉花等類。日本由美國每年輸入總額在八萬萬元以上，而輸出則只有五萬萬多元，常年即已有三萬萬餘元的入超（據大藏相統計）。此後，這些入超額必將激增，而使日本淪於國際的債奴地位。（“美國經濟恐慌對於日本的影響”，“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入超增加則
國際收支必然惡化

由於貿易的統制，貿易入超的增加和國際收支的惡化是必然的結果。日人石濱知行說得很明白：“由於輸出商品的騰貴，戰時船舶的缺乏，中國市場的閉鎖，以及列強對日惡感等等，輸出受到了限制。反之，輸入却必須增大。其結局，就促進了國際收支的惡化。”（“日本侵華費用如何籌措”，“世界知識”七卷一期，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日本當局也深知這種情況，曾這樣說過：“觀我國（日本）貿易狀況。本年（一九三七）九月上旬止，入超額達七萬六千萬元。比去年（一九三六）同期的一萬九千萬元增大五萬七千萬元。今後跟着事變的演進，物資輸入愈將增加，入超的繼續是可以預

想得到的。貿易既繼續逆調，國際收支均衡被破壞，匯兌行市自必低落，可使日本商品在國際的價格也降低。這固然可以認為振興輸出的方法，但在目前各國竟築關稅壁壘之秋，和實施輸入比額制之際，要期待輸出之顯著的增大，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对華輸出，更會澈底削減。在這種情形之下，更因現時輸入品中关于國防的以及其他必需品着實不少，所以從匯兌低落來減少輸入，實有一定限度，却反而無法避免輸入品輸入價格的騰貴，從而招致國內物價昂騰，而有加害國民生活安定之慮。”（同上）

日本政府乃改變辦法實行所謂貿易联系制

輸入許可制，這雖然在目前已經由貿易联系制所代替，但是，為着解救輸入許可制所引起的困難之貿易联系制，也依然存在着犧牲勤勞大眾的特質。

自蘆溝橋事變起，不過二月，日本即行頒佈“关于輸出入品臨時措置之法律”（簡稱為“輸出入品法”），禁止或限制了許多的輸入品與少許的輸出品，奠定了輸入許可制的基础，以“確保軍需品的輸入”的前提，決定了人民大眾犧牲的命運。該法第一條，規定政府有權限制或禁止輸出入。第二條，則以調整供需為目的，對於政府根據第一條限制，或禁止之輸出入的物品，有權干與該項物品或以該項物品為原料的制品之製造、分配、使用和消費。第三條，則規定有權檢查各項文件，以保證上項命令之執行。

日本政府所欲限制或禁止的物品，是輸出方面，是有关軍用的品目；在輸入方面，是所謂“不急品”或“不需品”。我們從“臨時輸出入許可規則”（上述“輸出入品法”的細則）中，可以看到，禁止輸出者不過數種而已，而禁止輸入者却羅列有將近三百種之

多。这將近三百种的“不用品不急品”，或为禁止，或为限制，自然發生供需不均的問題，物价因此更加高漲，使人民生活陷于極不安的狀態。于是略事着手第二條的供需統制。此項統制細則，又是建筑在牺牲中小業者的基礎上。

直到發現禁止或限制的輸入品中，也包括了一向为日本輸出產業的原料之棉花、羊毛、木料等，日本的輸出，有減退傾向时，輸出入品法乃不得不宣告修正，这是在本年（一九三八）二、三月間的事情。修正案的目的，即为要达到調整原料与制品的供需，成立“各業調整協議会”，以对该物之供需有关的各种產業团体为当然會員，拟定关于調整供需的方策。修正案並規定当局得强迫某一業者組織各該業的協議会，並得强迫一切有會員資格的產業团体參加。

日本政府限制民需品的輸入，給予人民生活上的痛苦，暫且勿論。其对国际貿易的統制，也因阻碍輸出，而宣告完全失敗。因为这不不但未能达到一般貿易的平衡目的，更將無以清償巨量軍需品的輸入。于是，随着日本存金的繼續外流，“輸出不振”日益严重，日本政府不能不急圖改变政策，“貿易联系制”乃代“輸出入品法”所确定的“輸入許可制”而出現。

貿易联系制
的內容

貿易联系制的内容就是要輸入必須有所輸出，以期平衡国际收支。

联系制，与德国所盛行的“商品清算制”或“直抵交易”（編者按：或譯作物物交換制），在性質上是相差不多的。不过，德国自一九三四年停止一切对外支付以后，貿易政策也以停止对外支付为前提。上述清算制度，並不以匯兌为清償方法；而日本的貿易联系制，

則仍以匯兌為支付手段。在“統制對外支付”的立場說來，兩國的貿易政策則完全相同。……即在國內存金外流不止的緊急狀況中，為挽救輸出不振，聯系制規定了許可輸入時，其條件：須在一定的輸出之前與該輸出“聯系”；或者許予一定的輸入之後，為“聯系”此項輸入，必須有一定之輸出。……德國的清算貿易，必須基於兩國以上的協定；而日本的聯系制，是一個單方面的行為，不必與任何國家訂立協定，亦不必與外國商人成立契約，純粹是日本政府對日本貿易商人，或貿易團體，所下的強制命令。因為聯系制的特質，固定在以個人或團體為對象，實施輸出與輸入的聯系。貿易商將國產貨物先行輸出，國家許可其將來有一定貨物輸入的權利；或者貿易商先從外國輸入某項物品，將來有一定貨物輸入的權利；或者貿易商先從外國輸入某項物品，將來在一定期間內有輸出國產某一定商品的義務。

但是這個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空隙

貿易聯系制的機能，不外是緩和限制輸入所引起的困難，平衡國際收支，與促進輸出。特別是為要償付巨額的軍用品，除了一般貿易上的收支平衡以外，還希望有多量的額外輸出，因此，“促進輸出”效能，又是貿易聯系制機能中之最重要者。第一，先從“緩和限制輸入所引起的困難”來說，聯系制的實施，因為不必像“輸出入品法”一樣，直接羅列數百種的物品受其禁止或限制輸入，只以“輸入必有輸出為代價”的緣故，很顯然的與單純輸入許可制較能緩和輸入限制所引起的輸出困難。但是，緩和的程度，依然受許多限制。我們姑且不論人民生活上的一般民需品，依然禁止或限制輸入；而且，縱使輸出能夠增加，按理論說來，輸出增加時，輸入也應隨之增加。

但是，事实上，日本政府並不規定輸入与輸出相等的数量，輸入总比輸出較少，預備一定的出超額，可供特定輸入品（与联系制無关的軍需品之类）的清償之用。第二，联系制的“平衡国际貿易”，比較單純的輸入許可制，倒是更有确切的效果，……因为在理論上可以随意处置輸出与輸入关系，制定联系的比率，任意造成出超、入超，或輸出入均衡（日本政府在目前已經对各業規定了輸出入联系的一定比率，使輸出超过，以供清償軍用的物品）。自然，我們不否認联系制在平衡国际收支的效果上，有它許多优点。但是，日本在目前之是否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收支的目的，依然决定于輸出的狀況。因为，前面已經說过，日本对外国的支付，不仅在一般物品的輸入，还有更大宗的一笔軍需物品。因此，輸出的促进，才是改善过去日本輸出入的恶劣狀況及解决国际貿易均衡的關鍵，一切困难，集中在怎样促进輸出。而联系制可促进輸出的可能，又怎样呢？例如，輸出業者获得相当額的輸入权，因国人急于需要輸入，將此权利出讓商人，可获一种額外利潤。輸出業者既得此項利益，即可降低輸出价格，輸出能力乃借以增进。但是“額外利潤”，在这方面虽可降低輸出价格，在另一方面因輸入商須支付此項“額外利潤”之故，也將提高輸出价格。假若輸入品是原料时，輸出价格的低下，为原料輸入价格的高漲所抵消，而輸出促进力势必为之減少。棉業联系制，因輸入原料全部充当輸出，即不能純因“額外利潤”得到多大的輸出促进力，就是因为这緣故。（郑克倫：“日本实行貿易联系制”，“翻譯与評論”，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到底得一个悲惨的结果

战时日本国际贸易的政策，是由消极的对入超筑防（平衡收支，防止资金外流），慢慢转向到：把贸易当做取得外货之手段。基于现阶段的国内经济的

本质要求，基于战争及所谓“长期建设”要求，取得第三国外货，即取得第三国的军需或物资，是有决定之意义的。

但是一年来，事实证明了：日本取得外货的力量，往下跌落。因为日本生产商品的力量跌落了，日本的国际市场缩小了。在战争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总量是减少的。

日本输出工业的中枢是纺织业。因为纺织非“时局产业”，故一部份工厂改变去生产军需，已“鹊巢鸠占”。另一部份则停闭起来。类似纺织业这部门的所谓日本的“和平工业”，在战争一年之间，生产力总数减低百分之三四十（一九三八年五月，比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减少率为：纺织37%，棉织物29.2%，毛织物33.4%，人造丝26.6%，砂糖28.3%。当然生产力量的减少，即商品减少，输出减少了。主要如棉布，一九三八年度，正月至十月累计，较前年同期“纯输出”（日金集团除外）的数量，减少25.9%，金额减少38.3%。其次如生丝，同期累计，输出总额二亿二千五百万元，减少17.2%。丝织品累计，输出三千一百万元，减少38.9%。人造丝累计，减少8.9%。人造丝织品减少60.8%。纤维商品输出比重，一九三七年是46%，一九三八年（至十月累计）仅剩30%了。

这里包含着两个矛盾而极悲哀的现象。第一，金额减少比数量减少为大。本来日货全恃“便宜”做武器。可是，因为世界经济再恐慌，购买力弱落，经济战时国家主义化，买卖求换偿（可以

卖给那一国，才买那一国的货），特别是全世界的广大的民众反对侵略，到处排斥日货。所以，战时日本的商品，必须较平时更加贱价而沽，而且事实上也是比较平时更贱了。

但是自资本家的立场看来，在战争中，因为原料入手的困难，劳动力不足，运输不便种种的关系；成本价格倒是腾贵的。比如，意大利的人造丝，输出单价，一包不过五十五元。而日本的人造丝，生产的价格一包七十元以上。结果美国的日本市场，就给它的“盟邦”意大利翻手抢走了。

这说明着：战时的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场，悲哀的丧失了竞争的利器，至少竞争的光芒已敛迹了。去年输出增加最得意的商品，莫过于自称已经转入重工业阶段的“机器”了——机器输出至十月突破一万万日金。但是“谁家”用着日本机器呢？是日本在伪“满”华北自己用的呀！对“纯第三国”（日金集团以外国度）输出，不但不增加，反而减少32.1%。此外，纸也一样，“总输出”虽增加17%，“纯输出”却减少35.9%。面粉也一样。总输出增加51%，“纯输出”却减少99.8%。一言以蔽之，不过日本的东西，搬到大陆自己来使用。不是吗：“因为大陆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面粉、精糖、麦酒等，往华北满洲奔流。”

试来研究一下输入吧。第一，输入食料品减少。小麦减少60.7%，豆类减少88.9%。第二，输入原料品减少。羊毛减少77.3%，棉花减少6%，木材减少60.2%。不但和平工业的原料减少，就军需工业的原料也有减少的倾向。例如橡皮减少6.8%，煤炭减少26.1%。第三，半制品输入也是减少的。皮类减少21.2%，纤维浆减少52.2%。最后，只有完成品是增加的。完成品的“其他”一项，输入三亿四千四百余万元；增加15.5%。这一

項是包括着：煤油、汽車、土木機器諸軍需品（以上數字，皆以去年正月至十月為止，與前年同期之比較），正不曉得多少非常重要的商品，日本無力購買呀！

去年（一九三八）正月至九月累計，輸出总共減少20.2%，輸入总共減少35.2%。如果把它分做七區域，沒有一個區域不是減少的，只有減少程度的不同而已。

日本輸出入退減率（正月至九月累計與前年同期比較）

	輸出%	輸入%
亞洲	5.5	31.2
歐洲	28.4	21.9
北美	41.1	30.1
中美	52.9	63.1
南美	34.9	53.2
非洲	45.0	74.1
澳洲	1.7	58.1

輸入減少最甚的，非洲第一，中美次之，然後澳洲、南美、亞洲、北美及歐洲，新市場比舊市場減得利害。輸出方面也大致雷同。中美、非洲及北美、南美市場，日本商品大部已敗退下來，所剩最後的堡壘，偏在亞洲。

亞洲之中，自然只“日金集團”的勢力範圍內，在把握里的剝削對象，是排洩尾閭。是的，亞洲之中，只有對“日金集團”輸出，增加40.7%，對“純第三國”，反倒減少46.3%的。在日本整個貿易上，“日金集團”的比重，由47%進到69.9%。（編者按：這是說明了日寇在一般國際貿易上的損失，卻在其對殖民地的進一步榨取上特別是在淪陷區的榨取掠奪，排斥第三國的利益上，

取得了部份的补偿，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但对所谓“日金集团”的贸易，是出超的。去年正月至九月，日本对北美贸易，入超四亿三千五百美元。同期，对亚洲贸易，出超四亿一千万美元，就是：运黄金往美国去买来的“货”，恰好换一批同价的东西除给了亚洲。除给亚洲的那个主顾呢？四亿一千万当中，一个关东州便佔去了三亿三千万。第一个主顾并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傀儡伪满”，实际上即是：日本在满洲的投资、开发，并不是贸易。

因此战时日本国际贸易的特征，第一，需要“纯第三国”的军需，但不能够去“以货易货”。第二，大量商品输出于“日金集团”，但不能够换取所要求的军需。经济的政策，是要实现战时的“自给自足”。可是贸易结果，是愈经营而愈远离于“自给自足”。这又是一个矛盾而悲哀的现象呀。

最后应该指出一些含有政治意义的变化。去年（一九三八）一月至九月累计，较前年同期，日本输出于抵制日货的海峡殖民地减少73.3%，荷属印度减少5.1%。同期，自祖日的德国输入增加88%，自意大利输入增加2.2%。

这就是战时日本商品市场变异的梗概。（纯青：“战时日本的商品市场”，二十八年一月八日“大公报”）

八 因为输出不振外匯有崩潰之势， 外匯統制政策也將無济于事

拚命維持匯
價發行外匯
的統制政策

日本为了筹措大量战费，而滥发公债，其结果造成日元贬价的趋势。更因国际收支平衡的恶化，使日匯有动摇之势。日本为抵补入超而设的外匯准备，

在前年初早就用完。日本当局为了限制入超的增加，預防外匯的崩潰，不能不严厉地統制外匯，与管理貿易同时进行。其步驟，始則限制貿易以外的購買外匯，繼而將外匯許可限度規定為三萬元，后来又從三萬元接二連三地減為千元、百元。凡百元以上的外匯，都得經過大藏省的批准。此外，日政府又將擴充外匯分配制，使輸入輸出品受严格的限制。其唯一的目的，在維持外匯的穩定，侵華戰爭發生不久時，日政府即決定不顧一切，穩定日元價格，使堅守一先令二便士的比率。雖然如此，但日本近年來對外匯率是在一直跌落下來。對英鎊的匯率，由一九二一年的二、〇五先令，跌至一九三六年的一、〇二先令。對美金的匯率，由一九二一年的四八、〇〇二美元（日元一〇〇元），跌至一九三四年的二九、七一四美元，再跌至一九三六年的二八、八九六美元。在平時，匯兌低落，被對外貿易業者利用增高國際商品的競爭力，為促進輸出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在戰時，這種手段，不但因為作戰國消費品生產的停頓而失去作用，並且徒然減少了貨幣對外的信用。這就是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日本政府拚命維持對外匯率（欲使匯率固定于一先令二便士）的主要原因。

但是不能增加
輸出就決不能
長久維持匯率

但是，匯率的維持是有條件的，除了輸送現金之外，就必須增加輸出，或借外債。輸送現金，在日本現勢之下是不能辦到。告借外債，也是非常困難。

……至於增加輸出，則將因美國經濟恐慌的發展而絕望。此後，日本對美貿易只有入超日益增加，而日本對外匯率也將隨之降落。因為對美輸出額減少，世界金融市場上對日匯票的需要更加減少，日本在外抵賬的資金也更減少。“美國經濟恐慌對日本的影

响”，“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这就影响
到国际除
貨的可能

本来“日本輸出額在外国取得金融上的接济，素来是不成問題的，現在也大感困难了。据日人倫敦通訊，英国各銀行首經拒絕或至少躊躇承兌，或再貼

現日本匯出匯票。……‘朝日新聞’謂：‘对于这一种的恶劣环境，实在沒有适当的对付办法’。因为，日本出口匯票的百分之八十，是由倫敦市場承兌或重貼現的”。（“日本战时經濟的困难”，英Guentherstein 著，周沅譯，“世界知識”七卷二期 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沒有办法
只好向中
国找出路

因此，欲維持外匯，唯有出于輸送黃金一途。但存貯和产量很少，难得弥补巨額入超。

或者說，日本將要把白銀現有的正貨准备輸送国外吧。这种看法自亦有理。不过，我們觉得它鑒于此举的关系甚大，必然要先尽量向其他方面想想办法。这其中最容易想到的，而且最可能實現的，自然就落到我国身上。我們只要把伪“中国联合准备銀行”的設立一加考察，就知道該行对于日本的現阶段的意义，絕不限于統制华北的金融和产业，以便敌人安全治理而已，它进一步还供給了日本一个很好的工具，日本可以消極地減輕它維持外匯的負担，積極地吸收我們的新外匯来源。（“本年度的日本財政危机”由“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無法增加輸出
便是採取日元貶
价政策也無用

最后，如果有人以为从日元貶值而使匯兌傾銷，这也是不可能的。“第一，因为日本一切制造品的原料，都是从外国輸入的。因資源的缺乏，成本随之增

重。第二，国内物价高过国外物价，即使匯价低落，也不能再逞其低匯兌的傾銷。假使其他条件不变，入超額繼續增加，則在匯价跌落之后，它就必須輸出更多的商品，才能低銷国际債務。然而这是沒有的事，事实剛剛相反，因了匯价的跌落，將更加大其貿易入超而使国际收支愈趨惡化。”(同上)

九 現金是日本的救命王菩薩，但可惜床
头金尽壯士無顏

日本原来
存金究
有多少？

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和国内金融市場的穩固，是建筑在該国金准备的多寡上面的。日本銀行的金准备，本有五万万二千万元。提高估价的結果，这笔金子的价格变做十五万万余元，其中七万万余元拿来作外匯平衡基金之用。靠着这宗款子，以及国内和殖民地產金的獎勵，民間和我国东北四省現金的搜括，外匯的价格仍可暫時維持。不过，战争繼續下去，战費增大，而輸出随世界抵制日貨而減少，匯价便將动摇。据美国商务貿易專家的观察，“留剩于日本的現金大約已为数無几”。（“最近日本内部危机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但因为一九三二年的“匯兌管理法”，使日本政府有权管理私人在外幣方面的投資，这笔約有二万万美金的外幣，政府尚有权利用。（同上）

由于入超的激增，日元在国际市場上的匯价必形低落。假使日本要維持日元的匯价在目前的平准，它就必須繼續輸出黃金。“日本去年虽实施黃金法，一方面獎勵黃金的生产，一方面节制黃金的使用。然据藏相賀屋發表，每年所得也仅有二万万四五千

萬元。提高日本銀行金準備估價的現有正貨準備八億元，是維持對內對外信用的基礎。該銀行總裁結城前藏相早已說過：“決不能動用分文。”在這種情形下，去年（一九三七）他曾把提高日銀金準備估價的另外七萬萬元輸送國外，作為維持外匯之用。”（“本年度的日本財政危機”，“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結城所謂“新金現送主義”

我們如果要追溯黃金現送政策的實行經過，在“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中有斐丹作的“日本黃金政策的來路”一文，有比較詳細的敘述。他說：“自一九三六

年末起，日本因為軍需資財輸入的增加，與輸出貿易的不振，國際收支的惡化，而不得不採用黃金現送政策以維持對英匯兌一先令二便士的標準。黃金現送政策的實行，是在去年（一九三七）春天廣田內閣瓦解，林內閣成立，結城出任大藏大臣以後的事。同時，黃金現送政策實行之後，因為時局急轉直下，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的經濟狀態日益惡化，於是黃金現送政策的內容也日益變化。這個轉變的過程。可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結城藏相所主持的‘新產金現送主義’。就是，為維持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匯率，不得已自三月起實行黃金現送；但現送黃金不能超過新生產的黃金數量，不能侵蝕準備金額。可是，因為輸入的繼續增大，只是新生產黃金的現送，實在不足以平衡國際收支。於是，隨林內閣的崩潰，近衛組閣，結城退休，賀屋上台，而轉入一個新階段。……”

賀屋已用
完了所謂
“金資金”

“……第二个阶段，是賀屋藏相所主持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就是，国际收支，务须要使它保持平衡。为了保持收支平衡，相当数量的准备金的现送，亦是不得已的。所以日本每年新生产的黄金，虽然只有一万万四千万日元，但自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开始实行黄金现送起，到七月停止发表黄金现送数额止，日本就已现送了黄金三万万七千九百万日元，超过了新生产的黄金达二万万四千万日元之多。以后，因为黄金的现送数额停止发表，现送数额的发展无从知道。不过，据去年（一九三七）八月十五日日本银行实施‘金准备新评价法’，设立金资金特别会计时，日本银行保有的黄金已是不多，已不足发行准备的法定数。于是，把保有的黄金，由减低币值来重新评价，得十二万万一千三百万日元（按据龔德柏氏估计为十四万万日元）。将八万万一百万元留在日本银行做正货准备，把其余四万万一千二百万，划入金资金特别会计。这金资金，除了一部份用作奖励黄金生产外，其大部份是为平衡国际收支，而为现送之用。但是，后来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军需器材的输入，更为增加，入超数额当然更为扩大，此项金资金不久即已用尽，是可以想像得到。同时，新生产的黄金已完全现送，亦在意中。因军需输入数额，虽然不发表，但是一般的估计，必然超过金资金与黄金新产量。在经济界竟有日本银行准备金已大部秘密现送之说。此说是否正确，我们现在且不论它。不过，由于今年（一九三八）七月十七日日本内阁的决议，把日本银行的正货准备八万万一百万元，划出三万万元设立外匯基金一案的成立，至少可以证明金资金的已经用尽，新产金亦已完全现送了。

現在則連
正貨準備
也吃完了

自从这外匯基金的成立，日本的黄金政策可說又發展到第三个阶段，也可以說是發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因为，在外匯基金成立时，日本的經濟界，已發生了一種議論，認為日本国内既不流通金幣，則日本銀行的金准备，是全部可以現送的。此項外匯基金，虽規定只有輸出商人可以动用，但在战争的非常时局之下，誰也不能担保不用于軍需品的輸入。而且仅仅此數，所維持的时间也很短。所以最后要把日本銀行正貨准备金完全現送，那是必然的趨勢。”斐丹：“日本黄金政策的末路”，“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日本現金輸出的实况究竟如何呢？本年（一九三九）三月二日“大公报”有“日本总崩潰之時間問題”（蕭学海）一文这样答复：“在蘆溝桥事变發生时，日本銀行現金賬簿上，保留着四万万八千万数字。其实，在蘆变前几个月，業經有一万万二千万陸續运往美国紐約。現暫就此項总費用五元比十四元七角三分計算，是貶价后日本銀行現金为十四万万一千四百余万元。至一九三七年合一九三八年兩年对外支付的數額，据本年一月二十四日“讀卖新聞”社論称：‘一九三七年日本輸出現金八亿數千万元。一九三八年輸出現金实數尙未見公佈，比之上年度虽不見多，当亦不少。’可知此兩年輸出現金，为數要在十六万万上下。而日本銀行所存現金实已一付而空，其尙不足之數，只有向三菱产金会社及民間金銀飾品中購入。”然亦为數無几。又据“紐約时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日本經濟对于美国的依賴性”一文所載，从一九三七年三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輸入美国的現

金，共达二万万五千万美元（“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無錢不能
買貨外匯有
崩潰之虞

对于金准备的現送，日本的許多經濟學者，認為只要能維持社会的秩序，实行經濟統制，沒有金准备是沒有关系的；因而認為把金准备用作对外支付手段以購取战时軍需物資是金准备最理想的最經濟的使用法。这种观点的錯誤，在于忽略了国内經濟与国际經濟的关系。即使黄金在国内並無用处，無准备金的紙幣，可由国家的权力来維持它的价值；但是一个国际上貿易入超的国家，苦無黄金为国际經濟的交換手段，在国际上就失去了它的信用，在国际关系上就失去了联系。日本是一个依賴海外貿易的工業經濟的国家，一旦因黄金空虛，外匯崩潰，与国际經濟失去了联系，則其国内經濟随之崩潰，是很显然的。（斐丹：“日本黄金政策的末路”）

兩種材料
說明日本
存金已尽

“世界知識”的論文——“日本的財政，已到山窮水尽的地步，單就現金枯竭一項言，即可証明日本已無能力作長期战争。据紐約“太晤士报”Eliot Janeway的估計，‘今年（一九三八）夏季以后，日本將只剩下九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可以运出，即使日本不和苏联作战，而需要激增，这笔黄金也只能勉强支持过今年而已’。这个估計，大約和我們的計算相符。于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現存金幣为四九五、〇〇万日元，漲价加三一七、〇〇万日元，一九三二年至三七年产金与收买金計达五五八、〇〇万日元，漲价加三五七、〇〇万日元。共計十七万万二千七百万日元。但是国际貿易的入超，自一九三

二至三七年累計達十萬萬七千六百萬日元，相減尚剩六萬萬五千一百萬日元。一九三二年至三六年貿易外的收支對抵，不足九千三百萬日元。即令一九三七年貿易外收支相抵，一九三七年截至，日本存金充其量也只有五萬萬五千八百萬日元，減去必須保留充作最小限度的通貨準備金約二萬萬餘日元，正與Janeway的估計無大出入。……據政府海外支付（可以視為狹義的武器輸入項目）的數字，最近五年間共付七萬萬四千五百萬日元，又軍火原料四萬萬五千萬元，合計十一萬萬九千五百萬日元，平均一年二萬萬三千九百萬日元。而戰時消費更十數倍於此數。單就一九三八年度預算估計，對華戰費四十八萬萬五千萬元。其中陸軍部份佔三十二萬萬七千五百萬元，減去醫藥費、戰死者撫卹金等項目總額約為十三萬萬元，則至少每年須輸入軍火約為二十萬萬元。日寇無論怎樣搜括民間的黃金，獎勵生產，極度膨脹戰時財力（據歐戰經驗可增至十倍），日本的財力，亦不能維持巨額戰費至多少時候。（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第二，大公報的論文——“據日方消息：日金價格在紐約市場跌風大起，其猛烈為一九三五年来所未有，其原因為歐局緊張所致云云。此寥寥數十字，在一般人或不十分明了其重要性，而在注意日本財政經濟問題者，則視為日本帝國主義之喪鐘，其重要殊未能以數字計算也。

原來日本維持對英一先令二辨士之匯價，為絕對不能變易之國策，歷任藏相皆有斬釘截鐵之聲明。而經濟界亦認為此項匯價不能維持，即為日本財政經濟之破產。故日本政府自去年（一九三七）三月以來，即繼續輸出巨量現金赴美，以維持此種匯價。

入本年后，能輸出之現金，已漸告罄。而对华战争仍不能停止，每月尚須輸入巨量軍需品及其原料，以維持战争。万不得已，乃將日本存金之數，故意以少报多（或竟系以無报有），欺騙世人，圖由美国犹太資本家賒入若干貨物，延緩相当时期付款，以便加強对华战斗力。但日本現金輸出已尽之事实，已为世人所知。即美国貪圖小利之犹太資本家，亦不敢以貨物賒与日本，此后买貨已非現金不可。而同时从前所賒之貨，現已陸續到付款之期，又非付款不可。至此水穷山尽之际，日金在国际市場，遂不能不大跌价。

关于日本存金問題，因日本政府有計劃之欺騙。世人尚多不明了者。吾人茲根据日人自身及第三国人之材料，由数字上証明日本存金已尽，足見目前日金在紐約市場之大跌，系最后不能挽救之失敗。蓋日本若有存金，尚可以輸現方法，挽救日金之跌价。惟其存金已尽，故終無法挽救也。

日本在歐战期內，获得二十四万万現金。該項現金，半数存諸日本國內，半数存諸英、美兩國。在民國十七年底田中內閣时代，存諸英、美之現金，已經用尽。繼之以濱口內閣实行金解禁，存諸國內之現金，又大量流出。九一八事变起，日本資本大量向外国逃避，現金流出更多。現藏相池田成彬即为实行資本逃避使日本現金大量輸出之罪魁。故至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犬养內閣实行金再禁政策为止，日本現金只余四万万六千九百五十万元。二十一年二月，又为在美兌賬，輸出現金一批，最后所余者，仅四万万二千五百万元。近五年来，因日本产金若干，故至去年（一九三七）一月，現金又增至五万万三千万元。日本政府因之大为狼狽。于一月八日發佈大藏省令，凡三万元以上对外匯

款，須經大藏省核准(現已改為一百元以上亦須核准)，意在阻止外貨大量輸入，然因需要原料甚巨，大量入超仍不能免。至三月初，遂輸出現金赴美，以兌付到期之貨款。至七月止，其數達三萬七千萬元(此系時價，約合法價一萬一千餘萬元，以後說明)。八月，對華戰爭起，更須輸入大量軍需品與原料，以日本區區現金，何能應付。故日本政府窮極無賴，一面將現金輸出事件严守秘密，一面將所存現金，改定價格。即一月初所存現金五萬萬三千萬元，系照法價所計算，每兩作價五十元，現在改為時價，每兩作價一百三十一元二角五分。故五萬萬三千萬元，改算為十四萬萬元(其實尚未達十四萬萬元，且已有三萬萬七千萬元輸往美國矣)。此十四萬萬元，以八萬萬元作為日本銀行現金準備，以其餘六萬萬元(其實除已輸出者外只餘二萬萬元之譜)設立“金資金特別會計”，以備輸出之用，此關於日本現金問題之大概也。

去年(一九三七)一年間，日本入超為六萬萬四千萬元，此載諸國際貿易統計表者也。此外，軍需品之輸入，與專利權之買入(如去年由美國人買入飛機圖案，價洋六千萬元，以後每造一架，再給六千元之類，甚多)，則系秘密性質。故去年一年間，日本國際貸借，至少須付出十五萬萬左右之巨額。然日本所有現金，尚不達十四萬萬元，即全部輸出，尚感不敷也。

去年(一九三七)一年間，日本究竟輸出現金若干，因严守秘密之故，吾人尚未得確實數字。然據下引諸材料，可以得其大概：

第一，“日本經濟年報”，在日本經濟界素有权威，即在世界亦有相當地位。據今年(一九三八)三月出版之該報第三十一輯

載稱：“去年現金之輸出，認為八万万四五千万元，決不致有誤”云云。

所謂“金資金特別會計”之六万万元已盡量輸出，即日本銀行現金準備八万万中，亦輸出二万万元以上，可以完全證明。

第二，高橋龜吉，為有名御用經濟學者，素來為政府宣傳。然據“高橋財界月報”四月號所載：“現金外輸能力，大體去年已外輸完了。”

根據上述兩種材料，“金資金特別會計”之現金，業已于去年輸出淨盡，毫無疑問。故日本之對外貿易，由獲得外幣一點上言之，須將中國與偽“滿”兩部除外。若將該兩部除外，則日本今年上半年入超，共為三万万八千九百五十八万五千元，即將近四万万元。此四万万元入超需要現金兌賬，自不待言。然日本除日本銀行現金準備八万万元外（其實已無此數，姑假定為八万万），已毫無現金可以輸出。是該項準備金，至少已輸出一部，可謂毫無疑問。則日本政府在七月中間尚公佈有八万万元現金準備，其為虛偽，自不待言（由七月底起，將劃為外匯基金之三万万元除外，至今仍公佈有五万万元現金準備）。

所謂八万万元現金準備，至少已輸出一部份，可謂鐵的事實。惟究竟輸出若干，吾人有兩種材料，可以知其大概：

第一，本年（一九三八）七月中旬，日政府公佈決定由八万万元現金準備中，提出出三万万元，作為外匯基金，以便購入輸出貿易所需之原料。因之，美國聯邦準備庫公佈，日本有現金五百四十萬美元已狂向美國輸出途中。同時並稱：由去年（一九三七）三月八日起，至現在止，日本輸至美國之現金，已達三万万二千九百四十萬美元云。（“中央社”七月二十日紐約“哈瓦斯”電）

按日本对美匯价，每百元最高二十九元，則三万万二千九百四十万美元，約合日金十一万万强。此系美国联邦准备庫所收到日本現金之数字，决不致有誤。是日本除“金資金特別會計”之六万万元外，並已动用日本銀行現金准备五万万元之譜。

第二，九月七日紐約“太晤士报”論日本經濟情况称：“……由一月一日起，算至八月中旬止，日本黃金輸美者，值一万万一千九百四十万美元。其与美国来往之进口商，处境極為困难。日本經濟机构，惟有輸出存金，始能使其發生动摇恐慌。現拟輸出准备基金为一万万美元，其中四千万美元，已于八月初运到……。”（“塔斯社”，七日紐約电）按所謂“現拟輸出准备基金为一万万美元”，即指日政府所謂“外匯基金”三万万日元。其中四千万美元，系在此一万万之内。是由一月至七月中旬，日本輸美之現金，共为七千九百四十万美元，約值二万万七千万日金之譜。吾人若將“日本經濟年報”所載去年（一九三七）輸出八万万四五千万，与此二万万七千万元合計，恰与美国联邦准备庫所公佈之数字相合。

吾人由上引兩種材料，可知日本由去年三月起，迄本年（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止，輸往美国之現金共为十一万万之譜。是日本所謂十四万万元現金，迄七月止，仅余三万万元。而此三万万元，又被割为“外匯基金”而陸續輸美矣。

且日本本年（一九三八）上半年入超为三万万八千九百余万元，秘密輸入之軍需品尙不在內，而輸出之現金仅二万万七千万元，以之抵償，不敷尙巨。日政府所謂三万万元“外匯基金”，系購買輸出品原料之用，不过一种烟幕，其实亦不过填补上半年之亏空。关于此事，吾人有兩項証据：

第一，日本政府設立“外匯基金”，原定每月使用五千萬元，共分六個月用盡。然至八月初，只半月間，即已輸美四千萬元，約達半數，顯然另有用途。蓋購買原料，每月只需要五千萬元，何必急急輸出也？

第二，日政府稱“外匯基金”系購買原料之用，在理八月以後，原料輸入應較前增加。然八九月輸入，乃與前數月無異，或且較少，是其並未購買原料，亦可證明。

且據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號“東洋經濟新報”載稱：“與外匯基金關聯，尚有驚人事件，即大阪、神戶方面盛傳，此三萬萬元現金，實早已輸往美國是也，當六月間，有某外人來訪問記者，謂據美國來電，日本已將日本銀行現金準備秘密輸出。該外人之疑惑根據，即本年以來，我國對美國輸出現金，已達相當巨額，吾人固無盡載之自由。然觀美國所發表之統計，生出上述之疑惑，殊非無因。則外匯基金，縱非全部，至少有一部在從前已經輸出，我國人亦當視為當然也”云云。

是“東洋經濟新報”已以巧妙之方法，明白告知其國人，日本所謂“外匯基金”，已有一部份早已輸出矣。蓋該報為唯一反對侵略政策之機關，數十年如一日，故以種種方法，暴露日本侵略者之弱點，此種材料，吾人殊應重視也。

根據吾人上引諸證據，日本所有現金，迄目前止，當已輸出淨盡。即令今年有若干新產之黃金，為數恐亦不多。至日本政府公佈，本年可產二萬五千萬元，殆與日本銀行現金準備五萬萬元，同為欺騙世人之烟幕，殊無信賴之價值也。

現金已盡，而原料亦窮，即從前存儲之軍需品亦皆用盡（前綫所用者為昭和十三年即本年制之子彈）而戰爭之結束，尚遙遙

無期，無怪乎日人焦燥煩悶也，”（龔德柏：“日本現金已盡”，二十七年十月三四兩日“大公报”）

救济办法在于
獎勵产金与
搜括民間存金

日本的黄金产量和金准备是如此的少，而国际贸易又不得不靠大量地黄金输出来维持，因此，黄金的搜罗，在日本政府是一个煞费苦心的工作。据一般地估计，日本黄金的来源有三：第一，是政府的产金集中政策。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政府就已在公布的产金法中，规定一切金矿与含金矿物，一片一粒都要集中到政府手中。为了彻底的集中产金，对于产金業者，也由国家施以管理。就是金精煉業者与含金矿物收买業者，如不經国家的許可，是不許營業。同时，現在已在營業的，如果要停業、轉讓、合併或解散，也一一都要經政府的認可。並且于产金業者、金精煉業者及含金矿物收买者，政府对于他們的業務与財政狀況，要他們依規定提出报告。与产金統制同时施行的，尚有金的消費統制，禁止金的一切不急要的使用。第二，是产金的獎勵，一九三六年的黄金产額，概数也不过是一万万四千万元。此数与目前日本的入超数額，相差很远。于是不得不積極的獎勵黄金生产。日本政府一方面对于产金关系事業，加以直接的監督統制；同时，以各种方法，獎勵增加黄金的生产。就是由工商省制定了金增产五年計劃。一方面，对于發展产金事業所必要的机器、器具及其他必要的資材，在五年之內，免收輸入关税；並依产金業者的情形，而給与獎勵金。另一方面，对于採鑛場所用的採鑛机械，都由政府派員指导，積極的从事扩充；对于金矿金融，也積極与以方便。預算于五年后，每年能产金百三十五格蘭姆，約合时价五万万元。黄金的生产是不能急速增加

的，因此，这种计划也是緩不济急。

第三，是私藏黄金的收集。据最近的调查，日本民间保有的金货大概尚有三四千万元。过去曾经劝告人民，把金货及金制品自由送到日本银行或大藏省出售。可是，到了最近，大藏省更下命令，要强迫人民把所藏金货数额报告于大藏大臣。至于民间金器等的收集，则委托熟悉黄金散佈情形的“日本金块公司”，到民间之持有黄金的人家去查询，並强迫他们把私藏黄金出售。现在日本民间私藏黄金究有多少，是没有正确的数字。但是日本不是产金国，而且政府对于平民的使用金银，向来是有限制的，所以日本民间的藏金一定不会很多。民间是否能把私藏黄金全部献出，固是问题，即使能够集中起来。其数额当亦不多。不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对于黄金搜求的迫切了。（“日本黄金政策的末路”）（编者按：中国淪陷区是日本出路的重要方向，如果中国游击战争不能发展到力足破坏日本搜括的程度，则日本之主要出路是会向中国来找的）

第三章 从财政经济上看日本帝国主义

崩溃的时间——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 美人耿德谓日本暂时不至崩溃

要是以为中国不久即可获得完全的胜利，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无知而已。我们不赞成这种称心如意的看法。我认为把敌人估计过低，是一种拙劣的战略和战术。人家说，日本已经真正的在中国沉溺下去而不能自拔。是的，他们正遭逢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

困难，並且他們的計劃無疑地迟了好几个月。但我不相信他們已經真正地沉溺下去。人家說，如果战争延持得很長，日本將發生严重的經濟危机，也許就此引起了社会革命。这是可能的，但是我認為一兩年內还不致于發生。……日本差不多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物資，这一点，我們美国人也應該負責。不用說，日本感觉到某种程度的拮据，汽油已經严密地統制起来，而房屋建筑也已停止，借以节省物資。据最近的“日本广告报”中所載，限制使用棉花、皮革等物的新法案，也在实施了。日本的輸出——这是这个島国的生命綫——根据最近“中国評論週报”的数字，已降落百分之二十。从去年一月到五月十日，日本的輸出价值是十一万万日元（每元約合美金二角八分），而本年度同期的数字是九万万零六百万日元。日本国債在仅仅一年之內从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躍增至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在一九三〇年瀋陽事变之前，日本国債只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銀行、保險公司及大金融机关等，都充滿了赤字公債。

然而，我們並不能冒冒然說，日本就要崩潰。極权国家——日本从十六世紀起就是極权国家——在金錢方面，尤其是在战时，会变出令人不能置信的戏法。現在應該注意的事情，是輸出貿易，因为日本消息最灵通的人士認為，該国基本原料如鋼、鉄、石油等，只能再支持十八个月。虽然日本的通貨統制是非常严格，並且出售了一些黄金，但目前还没有通貨危机或通貨膨脹等現象，金准备还很充足，几乎有百分之四十。不过，一般物价都在提高了。

至于士气，只要有好的机关槍，士气几乎总是好的。日本人

是一种坚实沉着的人民，面对着他们自以为伟大的工作，现在还没有显示出多少弱点，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如果在表面之下还有些什么的话，那我就知道了，我想别人也未必知道。战事得不到人民拥护，这是无可怀疑的，即使战时经济对爱国热忱和商业都给予一种刺激。但是在日本，要发生革命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军部自己发动，或者除非日本遭遇过一次突然的、完全的大失败。（“耿德谈中日战争”，马思译，John Gunther 原著——按 Gunther 为有名的“欧洲内幕”的著者，去年曾到过汉口——“文摘”三十二——三十三号，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二 一个英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论调

此次战争中，多数日本人民认为日本即使获得绝对的胜利，但对于日本帝国，似乎也不致产生任何广大的收获。大家有一种普遍迷惑的感觉：“我们为什么打仗？”

虽然如此，但我们找不出一个人民，他不愿协助战争，从事牺牲生命，或是国家所要求他的生活的物质品。这种热情也许并不强烈，但协助日本所着手的工作，是一致而不可动摇的。

同样的，在日本即将发生经济崩溃之说，也是一样虚伪的感觉。这次战事，已使日本的金准备极大的耗去，并且还更多的耗去。但日本货币的本位，还很健全，并且还能支持着比较现在更紧张的情势。日本现在虽有膨胀，但是非通货膨胀，这是信用膨胀，特别是银行信用膨胀。……因此，日本的财政经济状况，绝非可美，但是他们的基础，还是健全，而且我们可以确当地假定，苟非发生一些目下所没有的外来因素，他们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軍部对于本国的把握，是牢固而不可动摇的，軍部主張繼續作战，非至中国粉碎不止，他就可以这样的做去。如果我们以为日本有一批人能够与軍部对抗，获得胜利，改变国策，这是一件蠢事。即使有人希望这样去做，但也决不能实现。日本民众，即使是那些时常暗中批評日本政策的自由主义派，大家都坚决地、毫無疑問的做着日本軍部的后盾，决不想到別种念头。

最近在这个局面中，却又發生了一个新的因素，这也許是可以成为一种有力的动机的。这便是东京政府所謂“东亚新秩序”的幻觉。在这一种新秩序中，从庫頁島到新加坡，或者更远的地方，日本將拥有最高的地位。（周新譯，原文見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英国“每日電訊与晨报”，Byprank H. Hedges）

三 汉奸刊物的“日本万年”論

在战后，因为海运等的种种关系，对外貿易稍稍減落了若干。然而，結果有使日本輸出金塊，以解入超結賬的必然性。从本年度日本獎勵产金以来，比較有限額的产量上还有增加，固然是在对外貿易上，有时需要拿現金来抵付，然而日本对华对滿洲以及关东州，就無須以現金去支付，这是日本对于輸入政策均衡不受若何影响的一点。

广大的資源開發了，国内的生产力亦因之增大，而影响不到国内物品价格的騰昂；同时又限制着第三国輸入的处置；已使日本国内的金融呈現了平衡的状态。

無論从那方面观察，好像潛伏着有使日本現在物品騰貴的种因，……然而这只是在表面上观察而已。前已述及从国民吸收通貨是暫时的趋势，国民儲蓄由政府而轉到日本銀行，不久此种現

象自会無形消灭。何况現在抑制物价呢？同时，还在設法增大生产呢？

日本在战时經濟已經是这样的縝密的考慮了。同时，还在整理內部，在消極方面使日本經濟力随时随地可以应付長期抗战。我們知道，日本現在正在加紧努力向外發展，以確保其將來基础的穩固。就貿易說，日本正在努力輸出，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对于中国、滿洲及关东州的貿易，已經有惊人的增加。同时，中国及滿洲，又是資料最富的出处，而使这所有的資料，运往日本，这方面可以減少对外貿易的支出，一方面日本金匯兌得以充裕。

我們从日本經濟力各方面观察，日本的經濟前途是極其光明的，充足的，应付着長期战争是有余裕的。何况日本政府又是步步为营的穩紮穩打呢。

汉口陷落，已經是最大的明証。日本的經濟已經超出一般人想像的充裕，更是超过了所謂蔣政权下的經濟学家的預料之外。至于共产党的臆造的种种宣傳，現都已有事实証明其騙术，所謂党府的長期抗战，真是欺人之談了。（曉風作，原文見北平偽政府办的“国民論壇”）

四 日人藤原謂日本可打十年之久

日本不用外資之援助，能够实行中国之經濟發展，日本拥有足以支持長期战争經費之資源。外籍观察家之日本經濟崩潰之說，系根据对日人生活及方法之不正确之估計。……有些欧、美人，相信日本沒有錢及資財来自己發展及建設中国，然此等欧、美人拿自己的尺寸来度量日本及日本人，实在大錯而特錯。蔣介石政权或將繼續抗日。举一个例子，設若中国事件延長十年之久，假

使日本因此每年必須發五十万万元的公債，則日本應發行之公債共計五百万万元。如人們不忽視日本之經濟力量及日本人民之愛國熱忱，則必能相信，此數目必足能被吸收去。再看，在此期間，日本將發展其在華佔領區之經濟，結果中日及其他國家之貿易必大增。若然，則每年發行五十万万元公債，並不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日本全國工業聯合會主席藤原金次郎的談話，本年五月五日同盟電）。

五 時事日報謂去年已是日本的危机年

現在中、日戰爭，僅爆發了半年，然而日本經濟上，已經暴露了許多弱點。假如再戰一年，將成一個什麼現象呢？

第一，一九三七年的事實告訴我們，半年戰爭的結果，發行公債四十億元，（總共一百五十億元），國際貿易入超十億元，現金輸出七億元，國民生活因物價暴漲而抬高 50%，纖維工業部份的失業工人約達百萬人，工人和農人們的經濟生活受戰爭的影響不得不日趨低落。雖然勞工運動，目前在戰爭空氣的掩護下，隱忍未發，然而這決不是永遠的。

第二，未來的戰爭，將愈趨激烈。戰爭的地域，將日益擴大。戰爭所需要的兵力和財政與物質上的消費，更將巨大。因此，至一九三八年，發行公債額百五十億元（總共三百億元）。國際貿易，因外交上的孤立，英、美的物質來源斷絕，（？）僅有少數由德、意轉迴輸入的軍需品，故貿易入超減少至七億元。現金輸出因正貨準備的枯竭，僅由民間收來二億五千萬元。物價，因物資之來源減少——除軍需品以外之日用商品的來源瀕於斷絕，物價較一九三六年九月，漲高三倍半。大多數失業的壯丁，大部份

开到前方，成了牺牲品，国内增加了一千万失了依靠的老弱残废和妇人。那时候，除了军需工业以外的工厂，全部停工。农村中，因为仅剩下了老弱残废，以致土地荒蕪，缺乏粮食，缺乏一切的日用品，人民皆奄奄一息的过着极残酷的恐怖生活。

第三，经济危机，必然转化为政治危机。日本经济虽已普遍破产，而军阀仍想要侵略战争来克服这个危机。战争愈久，消耗愈大，政治危机亦愈深，近卫内阁必因无法挽回国内的经济恐怖而解体。由军人组织“军部内阁”，解散政党，屠杀反战份子，逮捕知识阶级，整个的日本社会都陷于“灰色”恐怖之下，终于压不住革命的火焰。所以说，一九三八年是日本危机年，这不是预言，而是事实。（邓保光：“假如日本再战一年”，“时事日报”第十八卷第一期。二十七年一月出版）

六 陈豹隐谓本年夏天敌人将陷入绝境

敌人在外交、军事及财政、经济各方面，俱陷入绝境之时，这个时候，或者就在本年夏天。那时，敌人方面的革命的变化，或不像多数人所想像的那样，发生于在华一大败仗之后，或各国环攻之后，而竟意外的发生于在华前线，因而呈现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悲惨的末路。（陈豹隐：“敌人的末路”，载“半月文摘”三卷七期，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七 萧学海谓本年是日本最后崩溃的时间

日本前藏相贺屋，曾以乐观态度将该国现在财力与日俄战争比较，谓已增加数十倍。彼并未将物价及货币价值加以比较计算。今姑将其自欺欺人之宣传数字，揭录于下（单位千元）：

	明治三十六年	昭和十一年 (1936)	增加倍数
銀行存款	七七七、六九七	一三、九六八、三二二	一七、九五
郵政存款	三一、四七一	三、四三四、六三七	一〇九、一四
貿易額	六〇六、六三八	五、四五六、六五七	八、九九
現金准备	一一六、九六二	五四八、三四二	四、六九

……日本現在外交既陷于四面楚歌，借款不可能既不用說，還要年年償還以前積欠十四億，且無海外投資可以處分。所要的一切都是由本身拿出，換言之，都是由國內人民身上榨取。強制獻金、增稅以外，即如公債一項，自蘆溝橋事變起至去年（一九三八）年底增發到八十一億，已遠超過日俄戰爭時二三十倍。再將蘆溝橋事變發生前公債總額一百〇五億加上，共一百八十六億。與現在全國動產作一比較，據一九三八年日政府所公佈該年度存款數目，計特殊銀行為十四億七千三百万，普通銀行為一百五十億七千二百万，郵政為四十六億，貯蓄銀行為二十五億七千万，合計為二百三十七億一千五百万。將上列公債數與之抵銷，可說這部全國動產業經消耗到五分之四，現在所剩餘的僅五十一億余元。加以政府的通貨貶值與通貨膨脹，此項總額的使用價值，只可當作開戰前之三分之一，故以開戰前貨幣價值估計，現在日本所剩餘之流動資產，不過二十億上下。……又日本銀行之現金問題，已成為日本的致命傷。……查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銀行現金簿上保留着四億八千万數字，其實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前几个月，業經有一億二千万陸續運往美國紐約，現暫就此項總數用五元比十四元七角三分計算，是貶價后日本銀行現金為十四億一千四百余萬元。至一九三七年合一九三八年對外支付的數額，據本年一月二十四日“讀賣新聞”社論稱：“一九三七年日本輸出現

金八亿数千万元，一九三八年輸出現金实数尙未見公佈，比之上年度虽不見多，当亦不在少。”可知此兩年內輸出現金为数要在十六亿上下，而日本銀行所有現金实已一付而空。其尙不足之数只有向三菱产金会社及民間金銀飾品中購入。查三菱产金額每年約价一亿二千万（照一兩等于十四元七角三分計算），在此二年度內可达二亿四千万，恰好填补在去年底对外支付之总数。至民間所藏金飾品，在这貨幣膨脹时期，照格列沙母法則，似乎不願賣出。政府決定扩大产金計劃，以謀現金来源。茲据本年一月二十五日政友會議員东武質問政府：“扩大产金計劃后，而产金全未見有增加成績。”……由此等情形观察，日本国家現在的情形恰似瘡疾患者热度已达到四十度，如再加上一度，要达到四十三、四度，就要發狂了，故一九三九年是日本总崩潰的最后时期。（蕭学海作，見二十八年二月二日“大公报”）

（編者按：日本万年論是錯誤的，但即將崩潰論也是錯誤的。日本必然走向崩潰，但还須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世界人民共同作更大的与更久的斗争才有可能。我們反对悲观主义的亡国論，但也反对盲目的乐观論。本章所录各种意見，聊备一說，以供参考）

第四章 日本侵略战争的全国总动员

一 日本国家总动员法案全文

——原文見二月二十八日大阪“每日新聞”——

日本正在实行全国总动员，並設立了执行此总动员的中央机关——企划院。这种总动员，包括物質、精神各方面，不限于經

济一方面，今將日本国家总动员法案全文及企划院内容刊载于下：

第一条：本法所称“国家总动员”系指于战时（准战争之事变，亦包括在内。下同此）为达成国防之目的，以最有效方法，發揮国家全力，統制及运用人的物的资源之謂。

第二条：本法所称“物资总动员”，系指下列各項而言：（一）兵器、艦艇、彈药及其他軍用物资；（二）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被服、食粮、飲料及飼料；（三）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医药品、医疗机械器具及其他衛生用物资及家畜衛生用物资；（四）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船舶、航空机、車輛、馬匹及其他运输用之物资；（五）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通信用之物资；（六）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土木建筑用之物资及照明用之物资；（七）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燃料及电力；（八）前各項所列物资之生产、修理、配給及保存上所需要之原料、材料、机械器具、裝置及其他物资；（九）除前各項所列之物资外，以勅令指定之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物资。

第三条：本法所称“业务总动员”，系指下列各項而言：（一）关于物资总动员之生产、修理、配給、輸出、輸入及保管之业务；（二）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必要之运输或通信之业务；（三）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金融业务；（四）关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衛生、家畜衛生及救护之业务；（五）关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教育訓練之业务；（六）关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試驗研究之业务；（七）关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情报及啟發宣傳之业务；（八）关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警备业务；（九）除前各項所列者外，以勅令指定之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业务。

第四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时，依勅令

所定，得征用帝國臣民，使從事于業務總動員，但不得妨礙兵役法之適用。

第五條：政府于戰時之際，于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使帝國臣民及帝國法人或其他團體，協助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所舉行之業務總動員。

第六條：政府于戰時之際，于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發佈關於從事員之使用、僱入、解僱，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之必要命令。

第七條：政府于戰時之際，于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關於預防和解決勞動爭議，得發佈必要之命令；並得限制或禁止關於封鎖工廠、怠工及其他勞動爭議之行為。

第八條：政府于戰時之際，于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關於物資總動員之生產、修理、配給、讓渡及其他處分，使用、消費、持有及移動，得發佈必要之命令。

第九條：政府于戰時之際，于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限制或禁止出口或進口，命令出口或進口，賦課出口稅或入口稅，及增收或減免出入口稅。

第十條：政府于戰時之際，于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之時，依勅令所定，得使用或收用總動員之物資。

第十一條：政府于戰時之際，于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之時，依勅令所定，關於公司之設立、資本之增加、合併、變更目的、公司債款之募集及第二次以後資金之交付，得限制或禁止之；關於各公司利益金之處分、推銷及其他，得發佈必要之命令；又對於銀行、信託公司、保險公司及其他以勅令指定之公司，關於其資金之運用，得發佈必要之命令。

第十二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关于经济业务总动员事业之公司，为补充设备而募集借款或增加资本者，虽有商法第二百条及第二百十条之规定，仍得以勅令另定之。

第十三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凡属于业务总动员事业之工厂、事业场、船舶及其他设施或可转用之设施，得管理、使用或收用其一部或全部。政府使用或收用前项设施时，依勅令所定，得使其供用从事员，并得实施该设施现行之特许发明或登录实用新法。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得管理、使用或收用关于业务总动员上必要之土地，家屋及其他工作物。

第十四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关于砂矿机及水之使用权利，得使用或收用之。

第十五条：依前二条规定所收用之物至不用时，自收用时起算，于十年内发还者，依勅令所定，其旧所有者或旧权利者及其继承人，得优先收买之。

第十六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对于业务总动员事业所属之事业，得限制或禁止其设立、扩张或改良，又对于该项设备，并得命令其设立、扩张或改良。

第十七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对于业务总动员之同种或异种事业之事业主，得使其承认与该项事业有关之统制协定之设立、变更或废止，并得命令其设立、变更或取消该项统制协定；又对于加入统制协定或未加入统制协定之事业主，得命令其服从该项统制协定。

第十八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对于业务总动员之同种或异种事业之事业主，得令其设立统制该项事业为目的之组合。前项之组合，视为法人，依第一项规定其应设立组合，而不设立者，政府得为关于作成定款及其他必要之处分。第一项组合成立后，依勅令所定，政府得使有该项组合之组合员之资格者，为该项组合之组合员。对于第一项组合与其组合员营业有关之统制规程之设立、变更或废止，政府得使其认可，并得令其设立或变更该项统制规程；又对于组合员，得命其服从组合之统制规程。关于第一项组合之必要事项，以勅令定之。

第十九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关于价格、运费、保管费、保险费、租赁费及加工费，得发布必要之命令。

第二十条：政府于战时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对于新闻纸及其他出版物之登载，得限制或禁止之。违反前项限制或禁止之新闻纸及其他出版物，对于国家总动员发生障碍者，政府得禁止其頒佈或發卖，并得扣押之；在此项场合，其原版亦得一併没收之。

第二十一条：政府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得使帝国臣民及僱佣或使用帝国臣民者，向政府报告关于帝国臣民之职业能力事项；又关于帝国臣民之职业能力，得施以检查。

第二十二条：政府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对于学校、养成所、工厂、事业厂及其他技能养成所之管理者或以养成者之僱佣主，关于养成国家总动员上所必要之技能者，得发布必要之命令。

第二十三条：政府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得使以生产、贩卖或输入总动员物资为業者，保有該項物資原料，或材料之一定数量。

第二十四条：政府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得使業務总动员各項事業之事業主或于战时实施業務总动员者，于战时之际，設立关于应实施之業務总动员計劃，及举行基于該項計劃之必要練習。

第二十五条：政府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对于以生产或修理为業者及各試驗、研究机关之管理者，得命其試驗研究。

第二十六条：政府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对于以生产或修理事物总动员为業者，于預算範圍內，得保証一定之利益，或支付补助金；于此場合，政府並得使其生产或修理事物总动员及与国家总动员有关之必要設備。

第二十七条：依勅令所定，凡自第八条、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規定之处分，第九条規定之出口或进口命令，第十一条規定之資金金融及有价証券之应募、接收或收买之命令，及第十六条之設備之新設擴張或改良之命令所生之損失，由政府补償之。

第二十八条：政府根据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五条之規定頒發命令时，依勅令所定，自上項命令所發生之損失予以补償或支付补助金。

第二十九条：根据前二条規定之補助金額及第十五条規定發还时之价格，經总动员补償委員會之議定，由政府決定之。

总动员补償委員會之規程，依勅令定之。

第三十条：根据第二十六条及第二十八条之規定，政府得監督接受补償利益及补助金之事業，並得頒佈必要之命令及处分。

第三十一条：政府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依勅令所定，得征集报告或使该项官吏检验必要场所及检查业务之状况及账簿簿册及其他物件。

第三十二条：违反根据第九条规定所发之命令而经营或欲经营进出口者，处三年以下之徒刑或一万元以下之罚金；前项场合，其进出口或欲进出口之货物而为犯人所持有者，得一併没收之；如不能没收其一部或全部者，得追征其价格。

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三年以下之徒刑或五千元以下之罚金：（一）违反根据第七条规定所发之命令、限制或禁止者；（二）违反根据第八条规定所发之命令者；（三）违反根据第九条规定所发之命令而不为进口或出口者；（四）拒绝、阻碍或逃避根据第十条规定收用或使用总动员之物资者；（五）拒绝、阻碍或逃避根据第十三条规定管理使用或收用设施土地或耕作物及供给从业员者；（六）违反根据第十九条规定所发之命令者。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二年以下之徒刑或三千元以下之罚金：（一）违反根据第十一条规定所发之限制、禁止或命令者；（二）违反根据第十六条规定所发之限制、禁止或命令者；（三）违反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所发之命令者；（四）违反第二十三条规定而不予保有者；（五）违反第二十六条规定而不为生产、修理或设备者。

第三十五条：犯前三条之罪者，依其情节，得併课徒刑及罚金。

第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一年以下之徒刑或一千元以下之罚金：（一）拒绝根据第四条规定之征用或不从事于同条规定之任务者；（二）违反根据第六条规定所发之命令者。

第三十七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千元以下之罰金：

（一）違反根據第二十二條規定所發之命令者；（二）違反根據第二十四條規定之命令而不設立計劃或練習者；（三）違反根據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命令而不為試驗或研究者。

第三十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千元以下之罰金：（一）違反根據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命令而不設立組合者；（二）違反根據第三十條規定之命令或處分者；（三）根據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怠于報告或作虛偽之報告者。

第三十九條：違反根據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或禁止時，新聞紙方面，其發行人及編輯人，其他出版物方面，其發行者及著作者，應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禁錮或二千元以下之罰金。

新聞紙方面，除編輯人外，其担当實際編輯者及掲載稿件之署名者，其懲罰與前項同。

第四十條：妨礙根據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之扣押處分之執行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禁錮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一條：前二條之罪，不適用刑法合併罪之規定。

第四十二條：逃避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而拒絕、阻礙或逃避該項官吏之檢查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三條：違反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而怠于報告或拒絕阻礙及逃避檢查者，處五十元以下之罰金或扣留。

第四十四條：從事于業務總動員者，于履行業務時，洩漏或竊用由官廳所指定之關於業務總動員之官廳秘密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之罰金。公務員及在職者，于業務上洩漏或竊用由官廳所指定之關於業務總動員之官廳秘密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

第四十五条：公務員及在職者，依本法令之執行職務時，洩漏或竊用法人或自然人之業務上之秘密者，處以二年以下之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六條：根據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等三項規定所設立之組合之職員，于履行業務時，收受賄賂或要求行賄賂者，處二年以下徒刑。其因此而為不正之行為而不為正當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前項場合，其所收受賄賂沒收之；如不能沒收其一部或全部時，則追征其價格。

第四十七條：前條第一項所載，其交付、提供或行使賄賂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犯前項之罰而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四十八條：法人之代理者及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關於該法人或自然人之業務，如有違反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二號、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條前段之行為時，除處罰行為者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本條之罰金刑。

第四十九條：凡于本法施行地設有總店或總事務所之法人代表者、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于本法施行地以外所為之行為，亦適用前條之規定。于本法施行地×住所之自然人之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于本法施行地以外所為之行為，亦同。

本法之罰則。于本法施行地以外犯罰之帝國臣民，亦適用之。

第五十條：關於施行本法之重要事項（除關於軍機者外），為應政府之諮詢，設國家總動員審議會。

關於國家總動員審議會之規定，以勅令定之。

附則：本法施行之期日，以勅令定之。軍需工業動員法及昭

和十二年法律第八十八号廢止之。

本法施行前，根据軍需工業動員法所为之命令或处分，即視為根据本法之相当規定所為者，違反軍需工業動員法，其罰則亦依旧法。（刘燕谷譯，“半月文摘”二卷三期）

二 企划院的組織內容

在这个將要实际开始工作的綜合國策的企划厅成立后，不久就爆發了中日事變。后来，随着中日事變的長期化，只有“軍事工業動員法”是不够的，这也就是說，必須有更完善的國家總動員体制，因之也就需要有一个关于此一方面的中樞机关了。因此，企划厅的体制，也需要改为战时体制了。

昭和十二年（按即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月，近衛把資源局和企划厅合併一起了，这就是企划院的实现。其职能如下：（一）关于扩充及运用平时战时之綜合国力等案件之起草，並具备理由上呈內閣总理大臣；（二）关于各省大臣向閣議提出之重要案件——有关扩充及运用平时战时之綜合国力者——之审查，並附帶意見，經內閣总理大臣上呈內閣。（三）統制关于扩充及运用平时战时与綜合国力有关的重要事項之預算，並附帶意見，經內閣总理大臣上呈內閣。（四）关于國家總動員計劃之規定及实行，須調整及統一各厅之事務。企划院的機構，由总務部、產業部、內政部、財政部、調查部及交通部所組成。

在战时体制步步向前發展，由“長期战”轉入“長期建設”的情形之下，这国力綜合机关的企划院，現在又需要第四次的改組了。关于扩充企划院之机能一事，企划院本身及軍部方面，曾仔細的研究过。最近由企划院本身研究出来的具体原案如下：第一局，

总括的統一調整有关实行国家总动员之业务（以現在的总务厅为中心，把它強化起来）。第二局，执掌物質动员、精神动员、文教、学务等物心兩方面总动员的业务。第三局，执掌关于扩充生产及經濟計劃之业务。第四局，执掌关于交通总动员的业务。第五局，执掌关于金融、財政之业务（將大藏省之主計局統轄起来）。第六局，执掌关于法制之业务（統轄法制局）。第七局，执掌关于情报之业务（統轄內閣情报部）。

如上所列企划院扩充之内容，是想統轄現在大藏省主計局、內閣法制局及內閣情报部的，这是一种划期的改組，可以說是把过去几次的強化案，都收攝来了。……实现扩充案一事，还相当有政治上的困难，但客觀的情勢既然需要它扩充，而軍部又能支持它，那么势必能原案通过的。（黎民譯：“日本企划院的过去現在与未来”。原文載东京“国际經濟週报”，原譯文未署著者姓名，“时与潮”三卷五期）

第五編 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 关系及外交政策

第一章 日本对外政策的矛盾

一 軍部与財閥对外交問題之爭執

外交方面也有着种种的問題。法西斯軍人对英对苏都表示热烈的反感，甚至輕視英国，不惜与英国挑战。而政党、財閥以至軍部的穩健份子，則觉得这样發狂的表示不免增加外交的困难，使日本更陷于孤立。（“日本帝国主义往何处去”，“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二 海洋政策与大陆政策

大战后，欧洲旧国家都表现疲乏状态，日本認為机会到了，領土扩展的热烈要求的兩条路綫暴露出来，而兩者都接受了黑龙会的鼓舞，一条是大陆路綫，为陸軍所支持，陸軍方面認為日本的扩充，应从亞洲大陆开始；先向中国开刀。別一条是海軍方面所支持的，他們仍以为日本的一切根本問題全要看“向南洋的进出”如何而定，这即是說，看它怎样向安南、暹羅、馬來亞、印度、澳洲、紐西蘭的进出而定。

在目前，黑龙会的大陆路綫，較为日本所欢迎。但是，終有一天会輪到海洋和海軍派得势指导爱国的計劃，那时候，什么事情的發生都是可能的。（小默譯：“黑龙会与山头滿”，“世界知

識”七卷三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三 歐美派與親軍派

近年以來，以解放的軍部法西斯外交家色彩登場的，有白鳥敏夫等。以淡薄的法西斯色彩登場的，有廣田弘毅(前外相)齋藤博文(駐美)、重光葵(駐蘇)、天羽英二(駐瑞典)、川越茂(駐華)、東鄉茂德(駐德)、杉村陽太郎(駐法)、松岡洋右(前國際全權代表)。這些外交家，是以新官僚的姿態在外交界出現，與軍部互相提攜，高唱強力外交的。至於仍以歐美外交的風格出現的，則有小幡酉吉(前駐德)、佐藤尚武(前外相)、堀內謙吉(前外次)、有田八郎(前外相)、谷正之(駐滬總領)、吉田茂(駐英)。這霞關三派中，白鳥敏夫與歐美外交派的對立，是旗幟顯明的。而投機派，則介乎兩者之間。白鳥一派為舊勢力堅決反對，而歐美外交派之勢力亦因軍部勢力之日益囂張而宣告沒落了。官運亨通的倒是中間一派。(王紀元：“宇垣外交論”，“世界知識”八卷三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四 從廣田到有田

廣田的下台，不是表示廣田外交政策(“萬邦協和外交”，“東亞自立外交”)的沒落，而是近十年來霞關(外務省所在地)內部的暗鬥，外交上的公式事務主義，對華利益爭奪上的“保守”、“革新”勢力的無法控制，使日本的軍事和外交無法一元化，因之廣田終於不得不在這所謂強化內閣的過程中，做了犧牲品。

宇垣的上台，是以他獨特的政治地位作基礎的。他利用他的政治地位想革新下列各事：(一)霞關人事的大刷新，打破數十

年来傳統的“霞关門罗主义”，国际外交上的公式化事务主义的傾向，而代以不拘国际外交法則，陰險政客活动的手腕。（二）調和广田外相时代的外务省与內閣法制局的冲突（实則是近衛与广田的冲突），調整对东北、华北經濟利益的榨取过程中的对滿事务局（总裁由关东軍司令兼純粹是軍部的榨取机关）、商工省（革新实业界佔优势），与拓务省（保守实业界佔优势）及外务省（新官僚）的冲突，企圖在拓务、外务一元統轄之下，使經濟与外交打成一片，同时更进一步融和各派在华利益。（三）企圖以强毅勇敢的实行魄力代替过去广田对内对外人事的一味軟弱、圓滑、投机的精神。同时，用这种新的魄力，設法使日本对外关系能有进一步的打开，明白的說，繼續加强所謂“万邦协和”外交，一方面联英及協調法、美，一方面緩和对苏的关系，再一方面加强与德、意的防共結合，而使中国陷于孤立的境地，讓日本一刀一刀的斬，一塊一塊的割。这在敌寇方面說起来，就是所謂軍事与外交的一元化，以外交的認識补軍事認識之不足，以外交的力量促进軍事的成功。且看具有兩种人格的外交家的有田，將如何实现日本各界所期待的外交工作。到了誘降的陰謀、調整英日关系、改善美日交情，緩和苏日冲突等尝试失敗之后，气餒万丈的日本少壯派軍閥，將要推行沒有軌道的国际冒險。（“宇垣外交論”，“世界知識”八卷三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日本少壯派軍閥所要的外相，就理論及事实看，應該是白鳥敏夫及松岡洋右一流的所謂亲軍的革新外交家，但結果竟任用霞关正統的有田，实在有点奇特。有田本来是与亲英、美外交的穩建派接近，只在一九三三年在法西斯軍閥强制下簽訂了德日意防共协定，于是变成了兩种人格的外交家。（宋斐如：“汉口战后

日寇的对华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第二章 日本与英美法

一 兴亞院的企圖

世界三分論：陸軍省又以“对华”兩字仅指中国，不能包括南洋羣島、暹羅、印度等地，而日本的統治区域應該扩大到全亞細亞各屬，故其名称亦应称为“兴亞院”，借以表示日本所欲劫掠和它的統治权的范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長河想达夫著的書中，曾明白的指出日本的真实意圖在于三分世界：南北美洲归美国人統治；欧洲及非洲归欧洲人統治；亞洲归日本人統治，將一切欧美人排斥于亞洲之外。（謝南光：“日制‘东亚联邦’与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日本以英、美为东亚新秩序之敌：元旦日（一九三九），日本“京都新聞”評論說：“現下国际形势复杂多歧，实在不容易乐观。如去秋突然積極化的英、美对华援助，漁業交涉上的苏联侮日态度，那些怎样去調整，是今年劈头的重大課題。”东京“朝日新聞”一月二日社論上也說：“最近国际情形，須特別留意和苏联的接触；和英、美关系的調整，是一刻也不容疏忽。”大阪“每日新聞”于除夕那一天的社論上，同样強調着：“問題在于英、美資本主义的慾望和东亚新秩序树立运动間的磨擦，对日攻势的英美提攜，由于对华借款援助而更加强化了，这是英、美的逆行，是东亚新秩序之敌。”（麦逸：“敌报悲鳴录”，“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二 日本的南进政策与英美法

日本的第三条（按向满洲及西伯利亚发展为北进路线，向中国进攻为西进路线，向南洋印度为南进路线）扩展路线就是南进。南洋各国、英属印度、锡兰、荷属东印度、澳洲、新西兰、菲律宾群岛、暹罗以及马来亚，就立刻成为日本廉价商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并且是一个矿产原料以及日本必需的热带食料的仓库。棉花与羊毛，铁与黄金，橡胶与锡，煤油、苧麻与椰核，都只是日本从印度以及南太平洋各地输入中主要的几项。其中，有些完全不能从“满洲国”和华北得到的；其他的几种物品，在日本的大陆领土上是有限而没有确实把握的。

除澳洲和新西兰以外，其余一切的热带国家，都很穷困，它们不得不仰求日本的廉价纺织品、脚踏车、橡胶货品、陶器与杂货。购买日制商品增加得最惊人的，是荷属印度。

海军就是南进政策的保证者。而当陆军经济学家们着眼于“满洲国”的木材、大豆、煤与黄金，察哈尔的铁，山西的煤，河北的棉花的时候，海军发言人却经常促起日本商人注意南太平洋丰富的食料与原料。一九三六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曾在一个大阪工业家会议上演说，表示“日本的经济发展必须直向南进，以台湾或南洋委任统治地作为一个根据地。日本舰队的巡航范围，于此必须急速扩展，远及新几尼亚、婆罗洲和西里伯。”

有一个日本船业巨头，更断然指出：“日本的南进政策可以解决放在国家面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海军少校石丸藤太，在“日本必须与英宣战”那本书中说：“英国已经走到下坡，日本正开始向上坡走去。因为英国企图阻止

本，而日本則必須擴展；所以兩國就衝突起來了。英國已經擁有的領土和天然資源是很廣大豐富的，它應該可以放棄這些。日本沒有領土和天然資源，而它們對於日本却是一樁生與死的事情。石丸藤太氏預期荷屬東印度土人的暴動，可以便利日本進攻英國的南洋根據地，奪取新加坡和香港。

日本向南眺望，就有兩個偉大的富足的羣島：一個，是菲律賓，擁有七千以上島嶼一系列的羣島。從台灣最南端，而在菲律賓的南方與西南，綿延着巨大的荷屬東印度，全世界上一個最富和人口最密的殖民地。在菲律賓，有如在亞洲他處一樣，廉價的日本紡織品日益增長的侵入，各省大城市內都有許多日本商店。菲律賓人像其他東方人民一樣，太窮苦，買不起高價的歐美商品，不能不以廉價而劣質的日本貨品來滿足需要，或者就不用。

在菲律賓的後面，住於日本南進路綫之中，還有巨大的荷屬東印度羣島，它有比日本本土大五倍的面積，居住着六千五百万人口，大部份是馬來種，在東南亞，甚至在菲律賓，再沒有像這荷印帝國對日本的未來陰謀抱着更尖銳的恐怖了。倫敦“泰晤士報”訪員最近曾寫道：“荷蘭一百年來，從沒有像最近五年內在東印度那樣焦慮的，……它已經需要用強硬手段來防止日本的經濟侵入，甚至那武裝佔領的危險已在考慮之中了。”但荷蘭深信他們即使遭到這種情況，決不變更初衷。在英荷煤油公司中，英國擁有巨大的金融利益。該公司與各附屬公司，經營着殖民地內最大部份的油井。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日本在荷領東印度內，是向大不列顛在澳洲、馬來和印度的廣大的帝國利益挑戰的最大危險。荷蘭會以毫不掩飾的滿足，注視着新加坡根據地的發展。同時，荷蘭也沒有忽視了它自己的防衛，殖民地的空軍已經有了本質上

的增加，特別着重于飞船、魚雷、轟炸机、潛水艇和海軍飞机根据地，这些在新几尼亞灣上建立起来，婆罗洲和其他各島上的油田，也有了很好的保护了。

馬來亞是有日本的鉄矿的。

还有南亞洲的唯一的独立国的暹邏，佔了中樞的地位，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斗争的中心。大不列顛在暹邏是建筑下了經濟上的防綫（因为三面都比鄰英国殖民地）。日本在暹邏的活动，也是很猖獗的。

南进政策的論調已經激起了南洋各国的畏惧，它們都已扩充軍事准备，而給日本商業發展以种种的抵制了。南进政策有它本身的誘惑性，它趋向于适合日本移民的以及可以作为日本的机制商品良好天然市場的一部份国家。但是，任何日本活动，超出經濟范围的扩展，將使三島帝国冒着严重冲突的危險。（正明譯：“日本南进政策的檢討”，“世界知識”八卷三四合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从开始，法屬安南对于战争的威胁，就加以现实的注意。法国对安南保护国的元首 Bacdalo，負有特殊的責任。法国知道，構成法屬安南的三大部份——东京、安南与交趾支那，在太平洋形势惡化的时候，是特別容易受到威胁的。在四十年前，在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法国曾与中国訂有协定，規定相互的責任。中国同意于“不把位于东京灣上，距离安南海岸四百公里的海南島，轉讓于任何外国，也决不把它完全的或暫时的轉讓給他人，或給他国作为一个海軍站或貯煤庫”。中国也同意毗連东京的各省，“將永远归于中国的主权，不能割讓或租借給任何列強”。（仰山譯：“太平洋上的洋台”，“世界知識”八卷三四合期，二十七年八

月十六日出版)

如其英国的張伯倫和法国的达拉第不下台，就是日本海陆空军冲到了安南、暹羅、印度的各界內，英法依然会繼續向法西斯鞠躬的，因为它们以前宁願牺牲他人去向法西斯屈服，今后未見得不可以牺牲自己向法西斯致敬。因为如此，日軍繼續向南前进的总方針，暂时是不会改变的。日軍的南进政策与日本的侵华政策，是分不开的。日本目下的基本国策，是由“侵占南太平洋”，“灭亡全中国”兩部份組織起来的。日本的軍事总方針，必然是打通粵汉路，再打西南。（魯岱，“导报”“星期时論”，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

据法国“事業报”政治記者塔布依夫人称：“日本为援助意国对法的要求計，有向法国进攻之可能性。据夫人推測，此后之国际風潮，必为反共陣綫各國在世界各地之联合行动。日本于此一風潮中，將首先發动对越南的侵略，逼迫法国派遣大軍前往远东，然后再由意德兩國夾攻法国”。（“法報記者推測日將侵越南”巴黎十九日“美联”电，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导报”）

三 进攻华南与英美法

（一）敌方野心軍閥拚命宣傳英、法对于我国的援助；一方則决定向华南作冒險的进攻，企圖牽制我長江的兵力。（二）在敌人的內部政治上，本月初（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宇垣外相的被迫下台就表示着敌方的少壯派法西斯軍人已經不需要这个对英外交的掩护物，而决心發动南进的冒險侵略。在宇垣下台后，与軍部有密切关系的“报知新聞”在本月（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的社論中，明白指出一个日本外交上的新阶段已經开始：“亲英的原則，

將从此放棄了。”這社論同時又表示：“對華的強硬政策，即將付諸實行。同時將更加强東京、柏林、羅馬軸心的結合”。我們早就估計，本年（一九三八）五日間宇垣的被拉上台，是作為敵人進攻武漢階段的一個外交上的掩護物。這次宇垣的突被踢開，主要原因固然是為了“對華院”的權力爭執；而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法西斯軍閥已準備不顧一切，向英、法擁有重要利益的華南進攻。（三）在國際外交上最近歐洲四強會議中犧牲捷克的殘酷的方式，實在是對於日本法西斯軍閥一種有力的鼓勵。（金仲華：“華南戰爭的國際關係”，“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四 佔領海南島與英美法

佔領海南島是法西斯國際的聯合行動，也是法西斯國際的預定計劃，也就是蔣委員長所說的“不惜以最後之冒險以造成太平洋戰局之開始”。日軍部為了要爭取龐大軍費的通過國會，爭取總動員法案的實施，不能不準備進攻的架子，向國內的財閥及人民擺擺樣子。在對外作用上，日本政府認透了張伯倫、达拉第的忍受屈辱的本質，雖然英法兩國都提出了強硬的照會，但用強硬的行動來答復，它們一定會軟下去的。在歐洲對西班牙的問題如此，在遠東對中國問題也可以在侵略者的暴力壓迫下犧牲中國。……（“日軍侵瓊因果”，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導報”社論）

或許有人說：“華南目下為什麼這樣緊張呢？”原因很簡單：為着歡迎張伯倫向法西斯進一步的妥協，為着意、德（甚至英國也在內）包圍法國的活動而助威，為着不久進攻粵漢路全綫，進攻廣西，及將來進攻法屬安南而出暹羅等等，日軍此時不能不在

华南之海南島周圍向法国大示威。日軍擬將中国的海南島迅速的加以佔領，日軍擬將海南島化為“砲架子”，為在灭亡中国之后，又从此而攻安南暹羅等地，好与意大利法西斯在印度洋“結婚”了。中国的海南島，風景虽幽美，出产虽丰富，但海水不大深，沙灘却不少；而民众大多数已有組織，日軍想睡在海南島上去做“下南洋而取印度洋”之夢則可，做海、陸、空軍事根据地，那就看日本投下“人”和“物”的資本的多寡而决定。（“海南島佔領之前途”，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导报”）

法西斯德国正在准备着一个新的进攻，以法国为对象。……日本在这个进攻計劃中的任务，就是在远东方面直接打击法国的殖民地安南。同时，如果新帝国主义大战真正爆發，英、法与德、意在欧洲对壘，則日本將在远东方面替它的兩位盟友帮忙，更实进行攻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羣島。进一步，如果美国帮助英法，日本当不客气，更对菲律宾有所举动。为执行这些任务起見，海南島是有極大軍略意义的。日本佔領了之后，必然立即加紧在那里建設海、陸軍根据地。（“再論日軍进攻海南島”，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导报”）

海軍省昨晚报告，决定將最近佔領之海南島，改為海軍及空軍根据地，將該島南海岸之榆林港改為海軍港，以保障日本与南海各島間之交通。外港船泊所可以容万吨兵艦抛錨；內港則可供三千吨战艦停泊之用。北海岸某地，將建立大飞机場，以作空襲华南之根据地。（“日决將海南島改為軍事根据地”，东京十六日“海通”电，見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导报”）

假如这个軍略要点为日本佔据，那末香港、新加坡、菲律宾、荷屬印度以及法屬安南，都陷于在日本空軍的飞行半徑之

內。上述各地不但防守困難，而且軍事價值也得大大的減低。日本則退可以保守本部，進可以伸入南洋，攫奪西方各國的利益。

（杜若君：“日本挑戰下太平洋鬥爭的新形勢”，“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有田答復議員質問時，謂：“（一）英、美、法三國政府致日牒文，政府不擬立即提出答復；（二）英、美、法三國政府對所有各項問題，不致採取共同行動；（三）即三國採取共同行動，日本政府亦不欲加以重視。”（“中央社”香港八日電，見二十八年二月九日“大公報”）

白特勒次官曾于去歲（一九三八）六月二十七日向上議院宣稱：“日本若果佔領海南島，則英、法兩國即當認其為故意引起不稱意的糾紛，英、法為適應時局計，即當互相援助。”

英提抗議後之有田狡辯：“（一）日本佔領海南島之舉，純系軍略理由所致，目標所在只為摧毀中國之抗戰力；（二）日軍當繼續佔據該島，直至達到目標時為止；（三）日本政府無意威脅英、法兩國所保有之利益。”（倫敦十二日“哈瓦斯”電，見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導報”）

五 日佔斯巴特萊島與英美法

斯巴特萊島，介於西貢與菲律賓之間，東距菲律賓之巴拉望二百海里，在我們海南島東南五百三十海里，西沙羣島之南約三百五十海里，南與英屬婆羅洲相距甚近。據法水路調查船萊夫爾滿號于一八六七年所制精圖，此類海島有長五十英里之礁湖，為水上飛機、潛水艇、小艦艇等理想的臨時休息及避難所，且足容一萬噸級之巡洋艦；而該島又以其居于安南、菲律賓和婆羅洲

間，對於法屬越南沿海各航綫之交通，至關重要。英屬新加坡與香港間之海上交通，亦受其控制，為南中國海戰略上重要之據點。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三日，法國由其砲艦瑪里秀士號將斯巴特萊，作非正式之佔領。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始正式宣佈佔領。當法佔領該島時曾宣稱：“法國佔領該島後，將設燈塔於其上，為求航海便利，別無作用。”此語以表示不設軍備，以釋日本之疑。但日本始終欲佔領該島而後快，故不斷與法相爭。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雙方又復會商，法政府並在數星期之前，允將此項爭議交付仲裁。詎知日本乃以武力兼併作答，其藐視法國之程度，可見一斑。（薛正斗：“日佔斯巴特萊島問題”，二十八年四月八日“大公報”）

六 英美在華利益之被損害

英在華投資，據估計約有二万万二千五百万鎊，佔各國對華投資的百分之三十七。……英國全體對華貿易的總數，佔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的四分之一，在中國金融、產業、交通各部份中都有很大的勢力。英在華的商業利益，每年有四百万鎊至一千万鎊的收入，而在華一万三千英國人，也都獲得職業。……在上海的投資佔全部的12%。自從日寇佔領長江流域後，都受很大損失。……在華北，因為“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設立，又排斥了英國在華北的金融勢力。（杜若君：“日本挑戰下太平洋鬥爭的新形勢”，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據雷麥教授一九三一年的估計，美國在華投資為一万万九千六百八十万美元，佔各國對華投資總數的6%。不過它對華的貿易，却是很大而且增加很快的。在一九三六年最初七月，美國對

華輸出入合計（香港除外），每月平均為一百十萬美元，到一九三七年同時期則達到一百五十六萬八千美元，差不多佔中國對外貿易的四分之一。戰後，中國對外貿易的慘跌，各國在華利益的損失，更可想見了。（同上）

據本月（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海通社上海電，英國對華投資總數一萬萬八千萬鎊，已有五百萬到六百五十萬鎊被毀於上海的戰爭中。華南是英國投資最多的地方，這方面的戰爭顯然將使英國投資蒙受很大的損失。海通社的電訊中更指出上海在我們對外貿易上的百分比，去年（一九三七）前五個月，輸入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輸出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二。今年前五個月，輸入已跌到百分之二十三；輸出也跌到百分之二十三。而這跌減了的貿易，都已轉移到香港方面來。

美國在香港入口貿易中，增加的部份最為巨大。去年（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它輸港貨物的總額是一四、九〇九、〇〇〇美元，今年上半年已增加到了三三、八六〇、〇〇〇美元。我們知道，自從中日間的戰爭開始到本年九月，美國在華的經濟損失，已經達到二萬萬美元。華南貿易的增加乃是美國所得到的僅有補償，然而這一點的補償也因華南的戰爭爆發而完全失去了。（金仲華：“華南戰爭的國際關係”，“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七 英美為什麼不積極干涉日本

因為，英美在華的利益雖然重大，但在它們的算盤上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數目。據雷麥教授的推算，英國在華投資僅佔其全部對外投資三十五萬萬鎊的百分之六。英國對華輸出，連香港計

算在內，仅佔其全部出口貿易的百分之一·五，中国在英国对外貿易中，佔第十一位。英国在华的財富，在英国全部財富的总賬上，只是一个小小的数目。……虽然各国在华的正当經濟受到很大的損失，但它們却利用战争使这种損失取得了一部份补偿：从战争爆發后，各国的軍火与軍需品对远东的輸出就急遽的增加，英、美、德的軍火商人，都在中日战争中作了大笔的买卖。英国始終不發表它对中、日軍火貿易的詳情，但据一般的估計，数額是相当大的。美国各軍火厂以及和軍需有关的各厂家，从战争爆發后，就連續的接到了日本的大批定貨單；飞机、汽油、屑鉄、制造軍火的机器，以及皮革和鋼鉄，都大量的从美国运往日本。一九三七年美国屑鉄对日的輸出，比上年增加了三倍，为着从美国运输大量的汽油，在战争开始两个月之后，日本政府曾一次租用了三十二只运油船。日本运往美国偿付貨价的現金，达到了二万万五千万美元。同情中国的人士，反对实施中立法，但美国的軍火商人，也乘机在日本大大的發了一笔財。这种战时的盈利，似乎將英、美一部份人士的头腦弄昏了。美国的富翁們，忘記了日本破坏了他們在中国的傳統的“門戶开放政策”；关于日本对华侵略所加給美国的將来的損失，他們也無暇考虑；美国南部的植棉人，也不知顧慮日本在华北扩大种棉所給予他們的影响，仍反对罗斯福总统参加国际合作。当英国在华的投資人要求倫敦政府向日本索取战事的賠償时，唐宁街的閣員們，却小心翼翼的說：“政府尚未考虑及此。”同时，英国又乘着战争的机会，夺回了西太平洋上被日本夺去的航运；蘭凱夏的棉制品，也乘着日本紡織工業的衰落，活躍起来。英、美的資本家，現在所考虑的不是如何制裁日本，消弭远东的战禍，而是用什么方法在远东战争中增

加自己的收益。

各国对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所以不积极干涉，当然并不是完全基于上述的经济上的理由。

英国是远东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国家，但保守党操纵下的伦敦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向来持放任的态度。英国在太平洋上，没有足以对抗日本的强大的舰队；因为它不赞助集体安全制度，当然也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援助。近几年来英国因为日本野心的扩大，虽然采取了一种有限度的反日行动，但它并没有反对日本的决心。伦敦方面仍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时机，以求对日妥协。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扩大，很感忧虑；因为这直接危害到英国的经济商业利益。英国当局以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无论谁胜谁败，都于英国不利。英国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抬头，也怕日本独占中国。它希望中日战争能够早日终止。从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就竭力奔走和平，伦敦政府始终不愿采取激怒日本的行动，他们认为那将妨害英国调停中日战争。北京会议英国调停中日战争的计划，固然失败了，但它仍在期待着继续调停的适当的时机。目前英国一方援助中国，阻止日本军事行动的继续扩大，一方争取时间，从容布置终止中日战争的新时机。但它并不能援助中国去战胜日本；为着保留调停中日战争的地步，它并且不愿有激怒日本的行动。

美国的态度和英国不同。美国对远东传统的政策，是阻止日本的膨胀，到史汀生和罗斯福时代，美国这种政策并没有变更，一九三二年史汀生曾企图用美国的威严，压迫日本停止对华的侵略，所以发出了许多斥责日本的抗议和宣言；为着对日施行压力，史汀生也曾要求英国的合作。但史汀生是失败了，西門拒絕

了史汀生之英美合作的提議，美、苏沒有复交，中国不抵抗日本的侵略，美国在远东是孤立的；而它又沒有足以使日本駭怕的強大的艦隊。結果史汀生所留給美国的成績，只有一个不承認主义。罗斯福总统接受了史汀生失败的教訓，採取了一种“少說話多准备”的“大艦巨砲”政策，等待适当时机，和日本作一次总的清算。罗斯福对远东問題，在表面上是消極的，这种消極态度曾一度被日本誤認為美国將退出远东。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罗斯福总统發覺了他这种政策給日本以利用的机会，所以在芝加哥的演說中，就放了几声空砲，对日本示威。但罗斯福虽然已感觉到美国对远东的态度，有轉趨積極的必要，但在目前（指二十七年夏），他还不能有所行动。孤立派及一部份空想的和平主义者，認為美国对日强硬將引起战争，牽制罗斯福对日的行动。美国目前在軍事上，对日还不拟行动。白宮当局对倫敦方面傳来的英美合作对日的消息，还有些怀疑；美国不信任英国，罗斯福与赫尔並沒忘記史汀生失败的教訓；他們更鑒于一九三五年意阿战争时的霍尔拉伐尔方案，怕英国利用美国的合作，对远东作不正当的投机。目前罗斯福是已經認識远东危机的严重了；但在国内外的許多困难沒有克服的时候，他还不能有所行动。（杜若君：“日本挑战下太平洋斗争的新形势”，“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頁三五五——三五六，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八 日本对英美之准备

日本一方在南太平洋各地積極設防，一方打破了海約的束縛，和各国作大規模的海軍竞争。它秘密的設造超級战艦，並准备迅速的完成自己的造艦計劃，以便乘着英美的造艦程序未完成

的时候，向他們实行压力。……企圖利用在中国的“胜利”，造成对英、美的优势。白华脫說：“在未来太平洋战争中，誰能控制中国沿海，誰就有胜利的希望。”（同上）

日本对英、美的海軍竞争——暴日新国防計劃，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發表。五年新国防計劃費海軍几佔百分之九十，其中建艦費用达十二万万零五百七十八万元，可以說，建艦是“新国防計劃”的中心。海軍費用較大支出开始于明年（一九四〇），而以一九四二年度支出四万万六千五百万元为最大。由是推測，建艦完成，当在四年后；四年后，恰巧正是英、美兩國建艦大功告成的年度。故海上危机，比較要拖后兩年，在一九四三。……假使建艦預算一文不折，依照每吨五千元日金計算，日本可以新造二十四万一千吨艦艇。加上原有七六一、五八五吨，完成之时日本海軍总吨数約一百万吨强。但是，据日人山下二一調查，到了一九四三年，英国海軍总吨数，当完成至二百万吨；是年美国亦同样要完成二百万吨的大艦队。所以当日本海軍計劃完成时节，对英或对美比例，不是五、五、三，不是十比七，而是降低为十比五的悲惨境地了！（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大公报”社評）

九 日本对英的外交政策

近衛和广田曾宣言中国門戶仍將繼續开放，欢迎外国投資，尊重外国在华利益，来緩和英国。同时末次內相也稍改其前次的狂态，認英国协助中国为不智，希望英国重新考虑。……广田甚至說如日軍在华南有所举动，希望香港当局能严守中立。可是，在同一天，陸相杉山宣称，日本有与某第三国开战的可能。过了几天，广田又換了声調，他恐吓地說，如第三国以金錢或軍火供

給中国政府，日本將根本否認它的在华利益。（思慕：“日本七十三屆議会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对于英国也是运用这种“軍事应与政治經濟外交分头配合”的外交方針于从来的旧技上，所以一面發動輿論攻击英国，並于华南各地作威胁的軍事行动。一方面又与英国政府勾結，日英談判虽說經過一个多月的長期仍無結果，但是日本之誘惑与陰謀之进行仍未中止。英国也沒有完全关闭了談判的門戶。英国的談判自然和武汉的决斗有密切的关系，而宇垣更于此大施活动了。（宋斐如：“战时日本内外政策变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特别是日本看穿了英国的弱点，想利用机会获取英国对于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动作更进一步的諒解。它以协助德、意在远东作战，进攻南洋来恫吓英国，使英国最低限度“停止援华”。直到現在，日本对于英国还始終不放弃拉攏政策，宇垣、克萊奇的不斷会談以及最近（指一九三八年十月）决定派重光葵任駐英大使，都是明显的例子。（郑森禹：“欧局緊張中的日本蠢动”，“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十月三十一日（一九三八）东京“日日新聞”叙述日本新任外相，在其对英、德、意外交的政策的陈述中說：“英大使如願意时，有田也准备与之恢复談判。”同日中央社的东京电，且謂日报載称：“英日談判或可移至倫敦举行”，显有迁就英国，务期談判成功的意向。又对美、法等国，口头上欢迎其投資于中国佔領地，施其勾引的手段。倫敦的应声虫，竟認為“中日战争結束之期已近，現已有此种表示矣”（前国民政府政治顧問怀德在約克

的演說——倫敦二日電）。更加證明日方拉攏之切。（宋斐如：“汉口战后日寇的对华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一〇 日本企圖离間英美

英、美如合作，日本便退却。英、美如分裂，日本便抬头。如日与英、美任何一国調協，更可称霸太平洋。所以分化英、美，为日本外交上的大使命。“八、一三”以来，日本即以英为主敌，多方压迫，一再挑衅，侮英事件，層出不窮。至于对美，虽亦有非法行为，然仍維持温和态度。……室伏高信以“大英帝国打倒論”为題，說：“英帝国主义不仅是日本之敌，亦且是亞洲之敌。擋在日本發展之前的是大英帝国，而使亞洲逗留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之下的，还是大英帝国。”日本对于英国虽如此無礼，然而对美国却另眼相待，藤崗啟不是主張日本应認美国为“同道”嗎？他以祈禱的口吻說：“日、美應該复活往年的友好关系，美国为日本的朋友吧，一扫太平洋的不安吧。”日人認美国不願战争，英国無力战争，它要分化兩國关系，以便各个击破。（陈鐘浩：“民意週刊”第十六期，二十七年十二月）

一一 英美的团結及其远东政策的积极化

日本企圖离間英、美，但英、美对日本的答复却是改善兩國的关系，排除英、美間的种种隔閡，以进于兩大民治国团結一致的地步。最显著的成績，就是醞釀了几及二年的英、美商务协定，已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簽訂。这件事不仅表示英、美間經濟障碍的排除和二国合作經濟基础的奠定，借以增强它們对侵略集

团的經濟竞争力；而且它还有更重大的政治意义。查英、美的商業竞争，是战后两国关系中的最大癥結，竟能于此时以和平談判方式获得解决，这决非偶然。这一协定的签订，显然奠定了兩大民治国家政治合作，共同应付未来巨禍的根基。（沈志远：“时事类編特刊”三十三、四期合刊，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自抗战进入第二个阶段后，英、美的远东政策逐步趋于强硬。首先表现于美国二千五百万元的借款，英国五十万鎊的借款。其次，滇緬公路的通车与軍火的暢运，美国政府劝告商人停售軍火与日的見效，又可做証明。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国第二次致日本反对歧视美国利益的照会，美国会开会时罗斯福总统主張修改中立法制裁侵略的咨文，一月四日美国致日本反对近衛声明的通牒，更明确的說明英、美的远东政策，是比前强硬和积极得多。不消說，英、美远东外交的这种转变，是日寇佔領广州、武汉后建立所謂“东亚新秩序”的几次狂妄声明的反駁，以及对于日寇种种蹂躪英、美在华权益行为和拒絕屢次抗議的蛮橫不遜态度的答复。因为，縱使在美国孤立派背后的大資本家，还顧慮着美国对日本的經濟关系的密切，而不敢开罪日本，縱使现实主义的倫敦財界仍夢想日本終要乞助于英国資本，但摆在眼前的日本門戶关闭政策的厉行，使英、美不得不張开眼睛，正視现实。單是三万万鎊英国投資的前途，英貨入口值在总額中由百分之十二降至百分之八的比率，美貨入口值在总額的激減，已足够做英、美主張强硬論者的論据。深感切膚之痛的英、美在远东的商業团体和商人的呼吁，对于英、美政府的政策改变，不消說是有很大的影响。現在呢？据“美亞杂志”的考察，美国七百家重要报纸的社論中，不贊成取任何种对日經濟报复办法的，

只有十家。至于尽量给予中国抗战政府以财政和军火上的援助，也已为美国大部份的报纸所主张。以英国论，不特“每日先锋报”、“新闻记事报”等反对党的报纸，积极督促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即大资本家的报纸如“金融新闻”Financial news，也屡主张英、美一致禁止日货。（思慕：“英美远东政策的转机”，“世界知识”九卷二期，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一二 日本認法国是英国的尾巴

法国的远东政策，大致是跟英国走的，所以在日本的心目中，認定如果把英国买通好了，法国可以不成很大的问题。（郑森禹：“欧局紧张中的日本蠢动”，“世界知识”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第三章 日本与德意

一 狼狽为奸

德国把在华军事顾问福根霍森等三四十人召回，是再一次证明德政府对于日本的同盟关系的表示。这行动虽然表面上是为了中立，实际上却与承认伪“满”及增加对日输出的行动一致的。

中日战争已把日本变成德国的一个重要买主。在本年（一九三八）最初二月，日本的总输入虽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而德货输入却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从日本总输入的百分之三·五到八·五）。日本已经成了德国对苏作战的同盟者，又成为德国输出品的重要买主。（“德国怎样帮助日本” Kurt Block 作，孟如译，“世界知识”八卷六期，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出版，原

載 New York Times)

对于德、意，則一味加强所謂“德日意防共軸心”，于所謂“日‘滿’‘滿’支”布洛克上，加上三国協定的关系。希特勒于承認伪“滿”后，更于五月十二日进一步簽訂所謂“修好条約”，訂立“德‘滿’日協定”，增進伪“滿”与德国間之經濟关系。最近这个協定又于本月十四日扩大內容，成立“德‘滿’新通商協定”。对于意大利，則于今年春天引誘意國經濟使团到日本来和伪“滿”考察团开始三国貿易協定的談判，但其簽字則直延到今年七月五日始在东京举行。“德‘滿’通商協定”的扩大，及“意日‘滿’貿易協定”的簽字，都在宇垣上台以后，未始不是宇垣新外交方針所反映的日本現阶段的政治迈进。……九月九日大阪“每日新聞”更具体的宣佈：宇垣外相为加强日本与德、意兩国的盟約关系，配置“特異人物”大島浩中將与白鳥敏夫，並調东乡茂德（原駐德大使）駐苏，而以重光葵駐英。大島是駐德大使館的武官，原即执有軍部外交官的权柄，今升为大使，將更于德、日間起重大的外交作用。白鳥是一个著名的法西斯政治家，曾經参与日德防共協定的訂定，此次駐意，正可以發揮其道地的手腕。（宋斐如：“战时日本内外政策变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近衛于九月十五日捷克問題緊張声中接見新聞記者时声明：“日本政府官員已一致認為有增强防共樞軸的必要。”同时，日本外交当局也表示：“如果歐战發生，日本准备协助德、意，將按照反共協定之精神甚至参加战争，亦所不惜。”駐滬日大使館發言人，並从而复述之。同样的，外务省情报部長河相也在答复外国記者团的問話中說：“在排斥赤化魔手的意味上，日本將和德国站在相同的戰場。”

日本使勁地向德、意，特別是德國賣弄風情，正像江湖賣藝者口喊“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相彷彿。……日本是很需要西方法西斯侵略國家替它擊鼓，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以後還是這樣。過去和現在希、莫二氏已執行此任務了，不但在口頭上侮我國格的狂吠，而且在事實上，都已由互訂條約進而正式承認偽“滿”；同時意大利並以飛機資助日本，德國則停止對我國的軍火買賣，並召回在華顧問。……日本發出這個聲明（近衛的“不惜一戰”），以為用不到真正武力做後盾（因為他推測到捷克問題可“和平”解決）；日本是要憑借這個聲明，易取德意兩反共同盟國在其遠東戰事中予以更積極的聲援。（“歐局緊張中的日本蠢動”，“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據羅馬意報的記載，他們注意的焦點集中於日本在華最近的軍事結果，以及其對於太平洋局勢或將發生的影響。德、意對於最近東京所傳日方行將提議修改九國公約的要求及抗議法國政府允許中國軍火過境的态度，將予日本以積極的支持。羅馬的“電訊報”對於日本修改九國公約的提議，竟謂：“日本以巨大犧牲的代價，負有新的責任，故在亞洲應享有特殊地位。”又日本新外相剛上台，日文各報一致勉勵他加強德、意、日“反共協定”，再三主張“特別考慮便利德、意兩國在中國市場的經濟發展”（“日日新聞”的評論，十月三十日東京“路透”電）三十一日“海通”電又傳“日日新聞”載稱：“有田相信德、意、日對華有加強合作之必要。”（“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德、意、日三國侵略者間協議攻蘇的陰謀。……盛傳中日大戰爆發以來，希特勒曾幾次苦勸日本勿在中國消耗過甚，最近且

有希特勒要求日本恆常保持十四師团的勁旅以備對蘇的風說。至于數月來，德、意奔走調停于日本與中國和平主義者之間，都是日文報証實過的事實。這正和希特勒對中野正剛表示的希望如出一轍：“德國需要偉大的同志，切望日本勿消耗實力，急速克服中國事變，而成為更偉大的日本，站在事變後的舞台上。”

日本對德、意再三表示誠意合作，以開發華北。據日文報稱，德國已由日本獲得對華北特殊貿易的諒解，“除日本禁止自己輸入華北商品外，德國可自由輸往商品。”（王紀元：“東亞新情勢下蘇日關係新動向”“世界知識”八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敵因歐局變化，又思蠢動。二十二日（一九三九年三月）晚敵五相會議，討論國際形勢及應付辦法，歷時甚久，會議目的，在謀採取新外交政策，俾與德國在歐之行動相呼應。據悉，數日以內，五相會議將繼續不斷舉行。又聞敵駐滬代表，日內迭有密電向政府陳述意見，內容為歐戰發動時對租界採取行動之辦法云。（二十八年三月二四日“中央日報”）

最近在美國國會里討論到關於加強太平洋上防禦力量這問題的時候，曾說明：日本已將國聯委任統治地的一部份，讓給德國作為海、空軍的據點，以協助日本在太平洋的活動和強化遠東的法西斯勢力。討論的時候，還有人指出：德日兩國已完全取得同意，並且德國已開始在加羅林島上建築砲台了。同時，美國海軍部的某要人曾在國會里作過鄭重的報告，他說：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曾有兩架水上飛機來偵察過關島，一架是日本的，另一架是德國的。……這兩架飛機的來源，除了加羅林島之外，決無其他地點。

……这正是德、日、意三国企圖統治世界，強化軍事託辣斯的关头。……

……日本竟向法国提出索取巴里西尔島（在海南島西北，很近安南——譯者）的新要求。（李蒙原：“海南島問題与整个远东形势”，“半月文摘”三卷五期附冊，二十八年三月出版）

二 日本为什么尚未参加三国軍事同盟

……“將來德意兩國無論出以任何企圖，日本均不机械的受其約束。例如，地中海如果發生冲突，日本亦当牽入漩渦，此事令人焦慮”云云，这是出淵胜次的質問。平沼首相答称：“日、德、意因充实反共协定所拟之軍事协定，仅以第三国际为对象。”……温和派並謂：“充实反第三国际协定談判可获致之結果，仍不能無所顧慮。”……去年十二月間，德意兩国外長跟日駐德大使大島浩，駐意大使白鳥敏夫，已拟就同盟草案，其时近衛內閣原已准备签字，嗣以有鑒于是項同盟成立后，日本即須針對苏俄及英、法兩國，于是躊躇不决。厥后近衛辞职，日本主張新外交政策之輩，以为平沼首相当与德意簽訂一般的無保留的同盟条約，不意平沼不甚贊成。……日本各政党間聞已在原則上成立协定，主張由德、日、意締結最低限度之反第三国际互助协定。……要之，日本温和派对于軍事同盟之議，極端审慎。而激烈派則以压力加諸平沼內閣，促其决然簽訂。可是証明当局已感歐局之严重矣。（“中央社”香港二月二十二日电，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日本欲以武力征服中国之政策，業已失敗，其与国德、意亦必感覺苦悶。且局势所示，德、意、日已不能將反共产国际条

約改為軍事同盟條約。關於此事，日外相有田曾徵求該國元老西園寺意見，並經閣議討論之後，卒予否決。蓋日本擬于德、意締結同盟之一派，併海、陸軍人員在內，曾將其主張奏聞天皇，而天皇則照例恣詢元老，故乃未能如願以償。特此項主張，雖已失敗，究未可認為該國當局對於德、意在歐洲所抱目標不表同情，僅乃日本在此世界鬥爭中，須俟確有把握之後，始乃與德、意締盟而作孤注一擲耳。至德元首希特勒，意首相莫索里尼能否取勝，原無把握，則日本之不欲遽與德、意站於失敗方面，是在情理之中。惟該國海、陸、空軍當局，尚未公然作如是觀，庶幾維持其色厲內荏之弱點耳。（“日本殆已失敗”，美國共和派“紐約民聲報”評論，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

第四章 日本與蘇聯

一 日蘇的根本矛盾

法西斯主義的日本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在立國精神上是極相矛盾的。前者的立國精神，就是侵略和戰爭，所以不惜犧牲千萬的血肉，以從事侵略的戰爭。后者之立國精神是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福利，所以有時寧肯以最大限度的忍耐，來換取和平與福利。可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忍耐有它的限度。法西斯侵略者的殘暴，有時就是它自掘墳墓的妄行。

日本與蘇聯在政治經濟上的許多衝突，是舉世週知的。不過，正確地說，與其說是蘇、日的衝突，毋寧說是日本片面侵略行動的反映，因為這種衝突的起因和責任都在日本而不在蘇聯。

蘇、日衝突，目前在兩種事件上表現得最為尖銳：一為漁業

糾紛；一為蘇“偽”邊界鄂爾古納河上的波瀾。邊境衝突與漁業糾紛，在表面上看是分立的，實際上還存在着密切的聯繫。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蘇、日延長的漁約又告期滿，經過多次談判，終無結果。日人在蘇聯領海內從事漁業者達三萬人，每年純利達五六千萬日元，當然這種龐大的利益，在侵略的日本看來，是絲毫不肯放棄的。所以，對於這一爭端，日人是堅持依一九三六及一九三七年曾經蘇聯拒簽的漁業協定草案簽字，後又堅持依現存漁業臨時協定繼續有效。在蘇聯，則主張：為軍略關係，須收回已到期的四十漁區及使日方先付中東路售價尾款。蘇聯對自己領土雖經出租，但既已期滿，自然有權收回。何況有關軍事重要性的地方，絕沒有任自己的敵國長期給掌握着的道理。至於蘇聯向日本索付中東路結欠，是基於債權債務的關係，更沒有絲毫爭議可言。然而，日本強盜的信義是極具伸縮性的，日本為了賴債和把持漁業的利益，才造邊境的衝突，想給蘇聯以威脅，借以促成漁業協定之簽字。我們以為這是最近這次邊境衝突的原因。

再有，……日本因發動侵略，現在造成龐大的軍事預算，一般人民已經無力擔負了。為了使最近這次國會通過這預算案，它才又旧調重彈的挑起蘇、日邊境糾紛。（“時與潮”三卷二期，二十八年二月六日出版）

二 日本企圖緩和蘇聯

……荒木等雖有反蘇言論，……只是事實上，日本對俄，却在謙和的拉攏，……最近日海部發行的小冊子，且公然主張與蘇聯接近。日外務省且準備在最短期間，與俄談判，締結“新漁業協定”。……

只是我們知道，蘇俄始終是日本進攻的目標，……所以日本和緩蘇俄，只不過使蘇俄知道他軍事上不足應付，更使德、意知道反共只不過是一個遁詞而已。（陳鐘浩：“彷徨沒落中之日本”，“民意週刊”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三 漁業糾紛

……至於蘇聯對日本態度的強硬，在最近十月革命紀念和招待各國工會代表席上，有鮮明的表現。它已隨時準備予日本比張姑峯事件更嚴重的打擊。同時，蘇聯之積極履行國聯援華決議，最近已有種種事實證明，甚至日蘇漁業條約的續訂，蘇聯也有拒絕之勢。（“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現在蘇、日漁業問題已經告一段落，就蘇聯政府所發表的文件來看，蘇聯所提之條件差不多完全勝利。日政府用盡了恫吓卑憐的手段，所得的只是蘇聯要收回的四十漁區之中，保留了三個，而且把日本人認為“朴次茅斯條約”所得的“固定化”的漁權，根本推翻，所以我們就事論事，這是日寇近幾十年來外交上最大的失敗。（童蒙聖：“民意週刊”六十九期，二十八年四月八日出版）

日本人眼中的漁業糾紛與日蘇危機：蘇日兩國目前正在以所謂蘇領漁業問題為導因，而置身於重大的危機之上。……

為什麼蘇聯恰於今年堅持這樣不妥協的態度而毫不讓步呢？這與其說是由於蘇聯對北洋經濟的關心，倒不如說是由於政治關係來得更正確。……

蘇聯如今是政治地來處理漁業問題了。……

……蓋現時蘇聯在北洋是深藏秘置地擁有軍事設備，故現在

这一举动之具有若何的重要性这点，是极为明显的。苏联以海参崴为中心，沿北洋建设有六个军事根据地，据说配备有一百十八艘潜水艇。……

据此，则苏联此次于军事的理由之下，封闭日本所保有的渔区若干个，也有其这方面的特殊原因。……

还有，于苏联对渔业问题的强硬态度的背后，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国际情势的动态。正如苏联当局授意李维诺夫所说明的一般，它是使用渔业问题来对付防共阵营之强化的。……它一直就不断的与英、美接近，他方面却以强硬来对付日本，这不外是一种各别击破的战术。……（“文摘”四十八号，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四 英美法苏在远东共同反日之可能

……苏联对于日本丝毫不肯让步的态度，由最近渔业条约谈判的僵持，可以看出来。日本的“断绝邦交”，“武力出渔”的恫吓，只能得到日苏关系更恶化。结果，日本实力不能不分薄，原定进攻中国西北计划也受多少影响。苏联这种态度表现出它的力量，同时也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好榜样。本来苏联对于集体制裁的倡导最为积极，在目前形势之下，英、美等国在远东与日本的矛盾实大于与苏联的矛盾，故英、美、法与苏联的合作，不特不可少，而且应有可能。所以，日本政友会领袖岛田俊雄虑及英、美、法、苏的联合干涉，也不是神经过敏的吧。（“世界知识”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五 苏联在远东坚持反侵略政策

在东方，苏联对于日本的渔业谈判，完全根据维护本国利益

的立場，絕不表示遷就讓步的態度。它對於我國的反侵略抗戰，却採取積極援助政策，中、蘇間的交通，最近有了很大的改進，蘇聯對我的物質援助，已能源源而來。蘇聯的反侵略政策，在東方表現得最為明顯。（“世界知識”九卷二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六 日本參謀本部估計蘇聯一二年內不干涉

中日戰爭

……“日日新聞”還期待有田嘗試解決日、蘇懸案，以延長去年日本參謀本部的估計“一二年來蘇聯決不干涉中日戰爭”的期間。（“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七 一九三九年日本會挑起更大的張姑峯事件么

日本軍閥為着迅速的向日本財閥求得巨額軍費，有于短期內向蘇聯邊境挑起戰爭之必要。而且在政治上粉飾日本與英、法矛盾之尖銳，在軍事上遮蓋日軍向南太平洋軍事上的準備。日軍極需一個比較大於“張姑峯”事件的對蘇戰爭，這種戰爭或就在二月底，或者延到五月初就可爆發，因為日本需要的關係，日本軍閥決不會等到秋間發動。（魯岱：“日本又要向蘇邊弄火了”，二十八年二月九日“導報”）

八 根據一九三九年新國防計劃估計

日蘇戰爭爆發的時間

暴日新國防計劃，在上月（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發表。

……特別要指出，陸軍五年計劃經濟的支出，今年與明年兩年相加，已佔全部經費百分之九十二。而陸軍計劃志在速成。假設數目字可以做論據的話，我們不妨給它一個預言：暴日希望對蘇聯進攻，在這兩年內準備一個大概。（二十八日四月十三日渝“大公报”社評）

第五章 侵華戰爭中日寇 外交的總檢討

日本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以侵略中國獨佔中國作為核心的。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年七個月的近衛內閣，無論是廣田外交也好，宇垣外交也好，有田外交也好，大體上是以鞏固日德意同盟，討好美國，威脅法國，恐嚇並拉攏英國，緩和蘇聯，借以孤立中國抗戰作為其總路綫的。這個目的，做得到做不到呢？無情的事實，却是給與以否定的。因為日寇自“九一八”以來，即在實際上，撕毀九國公約，破壞英、美的利益。蘆溝橋事變以後，更是使英、美、在華的利益起了動搖，天津、青島、上海各地的海關之把持，稅率之改變，公開的走私，打擊了這些國家對華的貿易；而礦山、交通機關、動力事業和一切與國防有關的企業之獨佔，摧毀了這些國家在中國的投資。這種事實，並不是日寇的外交辭令所能粉飾的。而同時，中華民族之英勇抗戰，不但為了自己的光明的前途，而且為了國際的正義與和平。這一事實，亦不是日寇的外交辭令所能顛倒得了的。全世界的民眾風起雲湧地在抵制日貨，拒運日貨；全世界的人民在捐款援華，在組織救護隊與調查團。布魯捨拉九國公約會議之通過譴責日本的議案；國際聯盟的通過實施盟約第十六條，特別是蘇聯的物質上、道義上巨

大的帮助和最近美国两千五百万美元和英国五百万英镑的信用借款之成功，在在证明中国之抗战是获得国际上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之援助的。反之，日寇的独占华中，封锁长江、珠江，侵害外人在华财产，以至击伤英国驻华大使，炸燬英、美的军舰商船等暴行，则时时刻刻引起英、美之抗议，造成日本外交之孤立。广田虽则是德、日、意防共协定的签订者，在日、德、意侵略阵线的勾结上，虽然卖了一点气力，可是无法打开敌国与英、美的外交关系；结果，不得不让位于宇垣，宇垣上台之后，企图以老奸巨滑的手段来拉拢英、美，缓和日、苏间的矛盾，但是“三宅坂”的力量，毕竟压倒“霞关”。当宇垣正向英、美拉拢的时候，军部急进派和南进派的海军，却尽量破坏英国在华中及华南的利益，使宇垣奸滑的外交，一筹莫展；同时，当宇垣正企图设法缓和日、苏间的矛盾的时候，敌国的关东驻屯军，竟公然进攻张姑峯，造成远东第二个火山口的形势。然而，苏联的英勇的红军，在伟大斯大林领导之下，给与敌人以无情的打击，使敌人不得不屈膝求和，写成敌国外交史上最耻辱的一页，降低了敌国的国际地位。宇垣滚蛋以后，有田八郎再起而任外相。有田虽则是霞关的正统派，但自一九三三年签订了日、德、意防共协定之后，已跪在少壮派军阀的面前，唯命是听了。这一次再起，自然是驯良地作军部法西斯的工具的。因此，他虽然在其对英、德、意外交政策的陈述中，他说：“英大使如愿意时，也准备与之恢复谈判”，但事实上，却一依军部的主张，发表“德、意、日对华有加强合作之必要”的言论；同时，对于英、美则想用强硬的办法去对付。关于扬子江与珠江的封锁问题，英、美的抗议之被忽视，便是明证。到了英、美对华信用借款成功的时候，有田又公然对外报配

者發表狂妄的談話，謂“九國公約及其附屬之決議案，已不適用”；抨擊英、美對我借款，謂“為不適合之行為”，而以“第三國僑民在日軍所佔領區之困難較前增加”，與“外人在華之治外法權及借界地，均將逐漸取消”來恫吓英、美，甚且大言不慚，公然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為敵寇的職任。這樣一來，更加强了日寇和英、美的矛盾，引起了英、美的嚴重的抗議與斥責。在這裡態度最明顯的是美國。去年（一九三八）十月六日，提出照會，抗議日本在華侵害美國的利益的行動。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又針對着日寇之狡猾的復牒而提出了更強硬的第二次照會。羅斯福總統，且在美國第七十六屆國會中，大聲疾呼，號召民主勢力，一致聯合對抗侵略陣綫。英國方面，亦正在考慮制裁日寇的辦法與美國一致行動；菲律賓與加拿大政府，則開始禁止軍火運往敵國；關於日蘇漁業談判，日寇的無理的要求又告失敗。（許滌新：“近衛內閣的總結”，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新華日報”）

第六章 在未來世界大戰時日本 立場之估計

將有兩種立場。第一種立場，是它不直接參與新的戰爭，而它的作戰對象仍限于單純的對華侵略上。第二種立場，是它把作戰的對象擴大——主動的或被動的——進一步和蘇聯、英、法甚至和美國為敵，形成遠東戰爭的大規模化。這二種立場也許會一先一後，第一種立場為第一階段，第二種立場為第二階段，跟着時間而演化。

日本最急切地祈求的是把對華侵略戰先來一個結束。陸軍元老派、中間派、在華作戰的軍隊，以及大部份財閥（他們是經濟

危机的最敏感者)大概是不希望立时扩大战争的。他们这样期待着:欧洲混战之际,英、美、法、苏将无暇东顾,中国将失去外来的军火上、经济上以至精神上的接济和援助,日本可以迅速攻下武汉,使中国屈膝。由自由主义者一变而为军阀的喉舌的馬場恆吾說得很露骨:“倘使欧洲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对于中国军火的供给必将停止;同时欧洲列强对中国财政的援助也将随之而终结;再则,以前为中国声援的言论机关,同样也将停止作用。至于美国,它的全部目光,无疑地要移转于欧洲。这样,中国将变成孤立无援,中、日个对个打,事变也许可以提早解决。”(馬場文,見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讀賣新聞”星期評論)

在未来大战中,日本自身倒会受到极严重的威胁。即:(一)由于大战所引起的国际贸易之萎缩,会使日本的输入、输出都感受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军需原料的枯竭,是其致命伤。九月十七日(一九三八)大阪“每日新聞”在极大的标题“欧洲问题的影响”之下,论述欧战与日本经济各部门的关系,也以悲观成分居多。(二)美国在大战中站在民主国家方面,是毫无问题的。它虽不致立刻参战,但对于侵略国家经济上的制裁,必能迅速做到,中立法也可以活用,只要美国不输给日本以军火与军火原料以及煤油等等,日本就会发生大恐慌。(三)速现有德、意对日军火的供给(特别是意国的飞机)也将由于它们本身的不够用而停止。(四)英镑在战时必然会跌价,日元既然跟着英镑走,也自然会跟之而下落;再和国内原有的经济危机相配合,日元的暴跌是必然的。日本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金融恐慌中所受到的恶影响当远在中国之上。(五)日本纵使不和其他国家作战,但它却非抽调相当兵力对苏联,对英、法加以警戒不可,这样自将减

少它进攻中国的实力。

从上面几点分析，日本在大战中不会得到便宜，而反会遭到打击，是非常显著的。何况局面决不仅仅停滞于此。我们至少有三点理由可以说明最后日本必将不得不应付多方面的战争。即由前述第一个立场踏上第二个立场。（一）对华侵略战既不能一如理想的迅速了结，则影响所及，国内危机加深，非作进一步的冒险不可；（二）大战爆发后必将加紧进攻华南，可能夺取广州，这很容易跟英、法导入战争局面；（三）在对华侵略战中，海军郁郁不得志，它将趁这个机会发动其夙藏已久的南进政策。张姑峯事件关东军吐不出气，它将利用苏联和德国等作战的时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西伯利亚，也有可能。

……东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是始终对于国际局势表示忧虑。“朝日新闻”认为德国发动战事的时机尚早，劝希特勒慎重。“读卖新闻”则更认为国际局势对于德国极为不利，不宜采取军事行动。连前述的马场恒吾也以德国将陷于孤立为虑，他并且进而怀疑意大利会叛变德国。他又表示日本和德国并无攻守同盟的义务。（“欧局紧张中的日本蠢动”，“世界知识”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出版）

第六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指导人物

(編者按：此編材料不完全，許多人物因無材料沒有列入，許多則因事跡不充分有其一鱗一爪，均待他日之補充。然窺其一斑，慰情聊胜于無，諒亦讀者所歡迎的)

西園寺公望

在日本元老中，年事最高而聲望最隆重的，必然要推西園寺公望了。他現在雖然已經脫離政治，隱居在那興津的坐漁庄里，但是，他在無形中，仍然隱握大權，左右日本政局，每當日本國內發生政變或內閣更迭的時候，天皇便會將最重要的問題向他諮詢，而他底意見也是具有決定作用的，歷任內閣，沒有不經過他來決定的，故人們都稱他為“內閣的產婆”。

他生于一八四九年。……一八五五年，他雖僅有六歲，但因為世襲的關係，便充任了宮中的侍從，十二歲的時候，他就靠先人的余蔭，補為陸軍少將了。一八六七年，他隨同薩摩與長州二族的武士出征，光復帝業，漸露头角。……內亂平後，西園寺公望在貴族中聲譽鵲起。……于一八七〇年赴法留學；在那里，一住便過了十個寒暑。……西園寺在那里，不僅深深受着自由主義的思想的薰陶，而且還學會了許多政黨鬥爭的方式。……後又隨伊藤博文赴歐考察各國憲法及立法制度，一八八七年的日本憲法，卒于在他和伊藤博文的手中成功了。一八八五年，西園寺已受了侯爵位。次年，他被任為駐奧特命全權公使，一八八七年，轉赴柏林，任駐德公使，並兼駐比公使職，一八九一年八月，才由德

国返抵日本。返国后任賞勳局總裁，仍助伊藤博文处理国政，一八九三年任貴族院副議長，以后只任樞密院顧問官，中日战起，他奉命赴朝鮮活动，不久被任命为战时內閣的教育大臣。一九〇〇年任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辞职后，並代总揆兼政友会總裁。一九〇六年西園寺組閣，以后，他与桂太郎便輪流担任总理的重責，指揮着日本的政局。一九一八年八月，晉級公爵，故現在許多人称他为西園寺公。

現在日本在法西斯运动的狂流中，西園寺却是这狂流中的一个中流砥柱。在各方面压制法西斯的活动，自己成为元老重臣的中心勢力。年来荒木、平沼等人之計不得逞，大部份是受了西園寺的牽制，所以許多少壯的法西斯軍人，年来对于西園寺的攻击不遺余力。上次“二·二六”（一九三六）的东京政变，他也成为叛軍攻击的目标之一，好在他事前得訊，逃出寓所，否則八十九的老叟，恐怕也会血濺坐漁庄，与齋藤、高桥等为伍了。（“危机四伏的日本”吳浩宇編，一九三八年二月出版）（編者按：自二·二六事变以后，元老重臣失勢，西園寺公也金人緘口，对时局很少說話，在政治上也失掉过去那样的力量了）

湯淺倉平

湯淺倉平，他是內务府大臣，左翼的人指斥他是“典型的官僚重臣”，为人謹慎剛直。“二·二六”事件發生时，他才入官不久，对于当时岡田內閣的閣僚，尤其軍事參議官的处置，尽量的發揮了他的手腕。……对于軍人霸道，不怀好感。但因为地位关系，也許西園寺死后，他將成“奉答”的中心人物，急进者对他已下过强硬的警告和暗示了。（“危机四伏的日本”）

近衛文麿

負有一時令名的青年首相近衛文麿，是名門中的名門，藤原鎌足的后裔，是近衛家二十五世嫡男。近衛氏是大化革新（日本最初的政治革新運動）第一個大功臣，以後同皇室聯姻為世世重臣。近衛的父親近衛篤麿，曾任過學習院院長，貴族院議長，是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唱者，他首先想在日俄戰爭後立刻把滿洲吞併。近衛文麿承著這個血統，自幼就懷著雄心，來作個日本傑出的人物。一九一九年，近衛二十九歲時，巴黎和會開幕，西園寺公任全權代表，帶他同去，使他對國際政治有所認識。一九二七年他率公侯爵議員創立火曜會，自為盟主，一九三一年他被選為副議長，一九三三年繼德川公之後為議長。最初近衛受西園寺公的影響較深些，但是經過些時日，由他父親傳來的法西色彩又漸漸濃厚。同時，革新的新進份子，也非常信任他的。至於一般國民，尤其是在日本貴族與平民分別最清楚的国家，他們把他看做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危機四伏的日本”）（編者按：近衛於一九三七年廣田組閣，發動對華侵略戰爭，被法西斯軍閥認為不夠徹底，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下台，平沼騏一郎起而代之）

平沼騏一郎

平沼騏一郎生於一八六七年。一八八八年，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授法學博士，入司法部，一九一一年任司法次官。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任檢查總長。一九二二年九月任山本權兵衛內閣的司法大臣，在司法部內樹立了牢不可拔的勢力。一九二六年授男爵，昭和十一年，任樞密院議長。他曾於一九二四年發起“國

本社”，他愛刀劍，抱無妻主義。我們由他以上的經歷，可以想見他是個怎樣官僚型的人物。他給世間一個極普遍的印象是“過于謹嚴”，謹嚴本是法界出身的常型，而謹嚴過火，往往流諸頑固，平沼即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他是日本法西斯的總開山，這几乎是眾口一致的批評。然而他在五·一五事件（一九三四年法西斯殺死犬養毅等）之后，他曾自己聲明不贊成法西斯主義。又于二·二六事件之后，解散了法西斯的大本營國本社，他自己雖這樣否認，而論者仍不改變對於他的看法。一九二四年五月他所組織的國本社，乃為對抗左翼的“新人會”而設，因出版機關刊物“國本”，故以為社名。會員中網羅官僚、貴族、軍閥各種在內。例如，銓木喜三郎、小山松吉、小原直、山崗萬自助，乃系司法系的官僚；東鄉平八郎、土原勇作、有馬良橘、齋藤實、宇垣一成、加藤寬治、大角岑生、荒木真夫、真崎甚三郎、小磯國昭、泰良次、松井石根、永田鐵山、荻池武夫、四天王延孝等，乃為軍閥；其他尚有財閥池田成彬、結城丰太郎等；官僚學者山川康次郎、右在田直、荒木濱三郎、后藤文夫等。近數年來，每次政變必有他的呼聲，然未有一次成為事實。這原因有二：一則政黨方面對他無好感，二則元老重臣厭惡他，尤以后者的原因為大。今日竟得如願以償，這說明了暴戾軍閥指揮刀下的日本政界，元老重臣也退化到怎樣無力的地步。平沼組閣后將要如何橫沖直撞，尤其對我們中國，更將如何兇狠蠻干，這當然在意料之中。（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大公报”）

廣 田 宏 毅

一八七七年生于日本九州の藤岡县，他生長在一个貧寒的家

庭。……广田幼时受着封建思想的陶冶，在他意識里，时刻都以爱国勤王为他唯一的信念。……在高级小学讀書的时候，他即加入了当地一个爱国主义的团体——玄洋社（按：玄洋社是黑龙会的学名）——受領袖头山滿的领导，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他曾得过陆奥的資助到中国考察，以后又得山座的資助往滿洲考察，他热心研究中国的情勢和俄国的政策，一时有“支那通”之号。一九〇六年再应外交官考試录取后，派赴北平使館任隨員。因为他对于中国的情形很有研究，不久被任为通商第一課長，中国民众所不能忘怀的二十一条，据說是出于广田的手笔。

一九三〇年他出使苏联，在这里，他潛心的研究苏联狀況，並解决了日苏兩國間最大糾紛的漁業問題。九一八后，日本在高呼着“非常时”，……于是广田上台了。他上台以后，一方面放棄了幣原时代的軟弱外交，同时又否定了內田的焦土外交，他把过去日本外交的猙獰面孔变成一副暗里藏刀的笑臉，步步进攻，緩中帶急，由此可知他外交手段的毒辣了。在国内，他也充分發揮他的手腕，那时日本的右翼高潮稍形低落，日本的元老重臣資本家們，感到日本国家有一帖“定神剂”的必要，于是他也乘机提出了“协和外交”的口号，使世人頓有清涼之感。……他又在議會放言“在我充任外务大臣期內，是不会發生战争的”。他收买中东路，与赫尔完成日美亲善的換文，高唱中日亲善，大得了日本穩健份子的喝彩。同时，他对軍部和右翼份子又力与周旋，他原来是玄洋社出身，自然与右翼方面的联络也不会有多大問題，他真是八面玲瓏，四方討好，竟至使人們感到外务省的“行縱不明”。

二·二六东京政变以后，岡田、高桥及許多重臣，都是叛軍襲击的对象，但外相广田却絲毫未受惊扰，他进出自如，当然不

是偶然的。（按：二·二六事变后，广田曾一度任内閣总理，七七事变后，任近衛内閣的外相，以后，一九三八年五月宇垣起任外相，广田究竟被軍部赶走了）（“危机四伏的日本”）

宇 垣 一 成

宇垣一成原名字垣杜次，日本岡山县人，生于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六月，今年七十岁。陆军大学毕业，畢業时名列前茅。再机遇了大好老——田中义一的提攜，宇垣一成就不怕沒有發揮他手腕的机会了。宇垣之所以能够一帆風順，历任各种要职，而居然成为“惑星”者，至少要归功于田中的提拔。田中任陆军次官的时候，宇垣做軍务局局长，田中升任陆军大臣时，宇垣即做陆军次官。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一月，清浦内閣时代，宇垣之得荣任陆军大臣，据说也是田中从中慫恿的。此外，宇垣又做过駐德武官、參謀本部总务部長、陆军大学校長、第十师团长、教育总监本部長、軍事參議官等职，官銜也都着实不小。他后来又几次連任陆军大臣和出掌朝鮮总督，显赫内外。日本一个評論家——阿部真之助說：“宇垣这人的性格真是莫测高深的”。据说，宇垣实质上似近于利己主义、投机主义者，而且很欢喜摆架子，炫耀声威，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人物；但表面上却假裝得極豪爽。他政治家的气魄虽然不够，但面面俱到的投机手腕終究大部份是成功的；只是差了一步，沒有結好少壯軍人。所以几次高呼的宇垣内閣都成了难产。不錯，关西財閥願意做他的后盾，民政党極力拥护他，政友会、貴族院、官僚系、以至“薩閥系各方面也有很多人支持他，可是握有实际支配日本政治力量的軍部，不讓他出来。少壯軍人之所以这样仇恨宇垣者，主要便是他在第

二次加藤內閣時縮減過四師團的兵力，在濱口內閣時，又三次發佈了軍備整理的計劃，便因此跟軍部結了仇。中日戰爭爆發後，他和荒木貞夫一道被任為內閣參議官，受內閣總理的禮遇。不過這次戰爭一起，他却曾一度遭遇到少壯軍人的暗殺，險些兒丟去了性命呢。（“危機四伏的日本”）（按：宇垣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徐洲失陷後代廣田為外相，但因對華對英政策與軍部衝突，是年九月二十九日便被摘下台）

有 田 八 郎

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謂“日德防共協定”在柏林簽字完畢的電報達到東京的時候，那位鼻子上給軍部繩子牽住的、當時的外相有田八郎，曾經興奮得連希特勒的相片也擁抱起來，據說其肉麻的程度可以比得上熱戀時代的姑娘，抱住情郎的玉照，神魂飄蕩。“日德防共協定”，的確要算有田在上次任外相時代唯一的得意傑作。日德協定之後又有日意協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簽訂）。日本國內各界比較穩健的人物，以及凡稍稍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也一致對廣田、有田痛加抨擊。日德協定還影響到對蘇外交；……蘇聯拒絕漁業協定的簽字，其他各種談判，也馬上停頓起來了；有田突然由興奮而變成狼狽。日蘇關係惡化的責任，不得不由有田擔負起來，特別是洩漏機密之罪，連他的後台老板——軍部，也認為無可饒恕。原來，當日德協定不過尚在空氣中傳播的時候，十一月十六日，有田雖以外相的身份，竟也經不起蘇聯大使的追問，把事實透露出來了。還有一個笑話，即是當西安事變時，有田竟以外相資格，邀集外國使節大張筵席，這種幸災樂禍的輕佻舉動，連其國內報紙，也忍不

住要对他攻击。一般說来，有田是夾在軍部、外交、官僚間的一个極無主意的平凡不过的家伙。庸俗者也有他的長处，就是能够給人家牽着鼻子走。（麦逸：“有田八郎”，“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編者按：一九三八年九月有田又代宇垣而为外相了）

白 鳥 敏 夫

日本外交界也有一二个可称为革新派的人物，前駐瑞典公使白鳥敏夫就是。白鳥自己也宣言他是革新派，所以老早即以强力的右派外交家著名于世。他曾經在英文“現代日本”三月号上發表一篇論文，“法西斯主义与人民陣綫”，極力贊称法西斯主义，攻击民主主义。他甚至断言：“民主主义，究其本質，即是共产主义”，似乎有点近于开玩笑。但他現在却已是日本霞关（外务省所在地）的硬强柱石了。他排斥依賴英、美的所謂弱体外交。他有手腕，有机略，同时脾气非常奇特。有一次在外交官的宴会上，竟因小故飞啤酒瓶打自由主义者的前駐土耳其公使的小幡。中日大战爆發后，他的“革新”外交更加交了好运。（宋斐如：“日本‘革新’派人物”）（按：白鳥现为駐意大利大使，与駐德大使川鳥浩相唱和，力主簽訂日德意軍事同盟条約）

荒 木 貞 夫

在日本軍部中居特殊地位的荒木貞夫大將，人字髯，長五寸三分左右，忠于“皇道主义”，不以一己之福利为前提，而以日本帝国皇基永固为念。因此在剛强、廉潔、热情的个性發揮之下，受日本許多青年將領的信仰。……犬养內閣成立，出任陆相。以

后又任齋藤內閣的陸相。……据說他常常想到，如何去为帝国开辟疆土，如何实行他黷武的精神。……他是日本黷武軍人集团中的健將，他一方面高呼对俄作战，同时也竭力要求对华的侵略。他是“国本社”（現已解散）的一員，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中流砥柱。現在，中日战争爆發之后，他又居然被任为侵华的內閣參議官了。（“危机四伏的日本”）（按：一九三八年徐州陷后，荒木任文部大臣，手执屠刀擱在日本学生与文化人的头上，直至現在）

林 銑 十 郎

林銑十郎，石川县人，明治九年（一八七六）三月，生在一个士族的家庭。……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他畢業陸軍士官学校，三十六年又畢業陸軍大学，受中尉銜。……历任步兵第五十七联隊長、陸軍士官学校預科長、教育总监部附、步兵第二旅团长、东京灣要塞司令官、陸軍大学校長、教育总监部本部長、出席国联會議陸軍代表、近衛师团长、朝鮮軍司令官、教育总监以至陸軍大臣。“九一八”事变發生后，这位侵略家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他竟擅自調动嘉村旅团越境并赴我們的东北，跟关东軍相呼应。过后，虽經內閣紧急會議的決議，下令把越境的軍隊調回；但林銑十郎的声名，就此大大地煊騰起来，少壯軍人于是傾倒他了。本来，他在担任陸軍大臣时代，曾經以执行強力統制而遭急进派的嫉視，永田被刺事件發生，且終于不得不掛冠以去，可是，我們却不能純以机械的观点来肯定林銑十郎跟急进派是永远不能調和的。（“危机四伏的日本”）（按：“二·二六”事件广田为內閣总理接着林銑十郎繼广田組閣，近衛及代林銑十郎登台者）

南 次 郎

南次郎，大分县人，南喜平次男，生于明治七年（一八七六），系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出身，为日本陆军中资格最老者之一。卒業于陆军大学。历任大学校兵学教官、关东都督府参謀、陆军骑兵实施学校教官、骑兵第十三联队长、军务局骑兵課長、中国駐屯軍司令官、骑兵第三旅团长、陆军骑兵学校校長、骑兵监、第十六师团长、参謀次長、朝鮮軍司令官进陆军大將。昭和六年若槻内閣成立时，代宇垣一成任陆相，昭和九年十二月任为关东軍司令官、駐伪“滿”全权大使，一路發言情况更甚于伊藤博文就朝鮮总监。至十一年三月，以“二·二六”政变之故，与荒木等同年解职。（“日本之軍部政党与財閥”頁二一九—二二〇）

杉 山 元

杉山是明治維新前旧小倉藩士族故杉山真的長男，生于明治十三年一月。現年五十八岁。明治三十四年任少尉官。当士官学校在校时，功課均在同期生現台灣軍司令官畑俊六、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国昭、东京警备司令官岩越之上，但对于乘馬及机械操成績平常。任少尉官不久，逐漸高陞，历任陆军省軍事課長、航空本部補給部長、法国大使館附武官、日內瓦国际联盟陆军常任代表、军务局長、陆军次官、小倉第十二师团长、航空本部長，至昭和九年八月入参謀本部任次長。“二·二六”政变后，屈居参謀本部附。去年八月異动，繼西义一大將后榮轉为教育总监。十一月二日晉級陆军大將。家屬除四十九岁的夫人外，尙無息女。

（“东京舞台的要角杉山元新陆相”，“文摘”一卷三期）（编者按：近衛組閣后，杉山元陆相；至坂垣井任陆相后，杉山繼寺內为华北日軍最高指揮官）

寺 內 寿 一

今年六十岁，父亲寺內正毅，做过首相，更当过長期間的陆相，是日本陆軍的元老。寺內出身于世家，在士官学校第十屆畢業的。他的經歷多于隨軍駐守各地，很少在軍部內服务。到了“二·二六”政变爆發，广田弘毅受命組成所謂“举国一致”之內閣时，他以世家的名望，一躍給拔升到陆相的宝座。……当政党联合起来，攻击广田为軍部作应声虫时，不期寺內也突然翻起臉来反嫌它不中用，一脚把广田踢开，極力主張掛冠，遂使广田內閣不到一岁就夭折了。

寺內自幼就給当公子哥兒捧成他烈火一般的蛮性。却反因年紀的增多，越来越兇。虽非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在目下日陆軍部內所佔的势力是不能否認的。在現役的大將中他正与現在陆相杉山元、日美东軍司令植田謙吉兩人並称为陆軍三最高峯。（“危机四伏的日本”）（按：七七战争爆發后，寺內为华北 敌 軍总司令，直至一九三八年徐州陷后，坂垣代杉山元为陆相，杉山出任华北总司令，寺內始卸任返国）

植 田 謙 吉

植田謙吉，滋賀县人，前第九師團長，昭和五年晉升大將。向来没有什么派別，被視為軍部中比較穩健的中立派（前华北駐屯軍司令官代田及曾为八日陆相的中村孝太郎，都是此派人物）。

他既不贊成少壯份子的瘋狂的急進作風，也反對和財閥元老勾結的穩健派。“二·二六”事變後南次郎、林銑十郎、真崎、荒木等八個大將退出現役，植田為剩下的現役三大將之一，與寺內、杉山同為現役陸軍中的地位最高資格最老的人物。“二·二六”事變這個不祥事件，日本朝野震驚，政府慌於少壯軍人無法約束，特命植田、南次郎為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全權大使，據說為了他比較穩健。實際上他不肯參加任何派別，正是一種老練的機會主義。在對華侵略上他仍是與少壯軍人一致的，這是從他在關東軍司令官任內與急進的坂垣、石原的合作可以證明的。不待說，在對華戰爭中植田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人物。（編者）

真崎甚三郎

他是現在全日本少壯軍人所崇拜的領袖，同時，也是法西斯團體“國本社”的中堅。在近年日本一切的內政外交上，他都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他是日本士官第九期的五大將之一，生於一八七六年，今年已經六十一歲了。……由士官學校畢業後，進陸軍大學。日俄戰爭時，任第四十六聯隊中隊長，戰後重入陸軍大學畢業，再往德國留學。一九一七年他以大佐資格任教育總監部課長，不久，他升任軍事課長，以後又轉任近衛步兵第一聯隊長、第一旅團長及陸軍士官學校的校長。他在士官學校四年的生活中，建築了他今日在青年將校中崇高的地位，從那時起，真崎就在少壯派的中堅份子腦中不斷的貫輸黷武的皇道精神，所以直到現在，這些將校都認真崎為他們唯一的領導者。一九二七年晉級中將，先後任第七及第一師長，宇垣任陸相時，他任台灣軍司令官。“九一八”事

变后，調任參謀次長，东北、热河及上海“一二八”諸战役，他都在軍事上指导着这侵略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他晉升大將，專任軍事參議官，直到次年九月，他才代林銑十郎任軍部的教育總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軍人在国外的冒險，都是荒木、眞崎在作指导的中心。……他們高唱着“非常时”的論調，企圖在这个非常时中，整个的控制中国，並北向苏联进攻，使他們大和民族成为太平洋上的主人。

但他的这种理想和行动，終于和比較温和的林陞相發生了冲突，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他辞去了教育總監的显职。永田軍务局長的被刺，及震驚一世的东京政变（即“二·二六”事变），証之以他平常的活动，別人怀疑他是这些事变的主使者，当然絕不是偶然的。中日战争爆發后，他被釋放了出來，而且被派到上海帮助松井石根来指揮侵华的活动了。（“危机四伏的日本”）

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

“坂垣之胆，东条之智”，“放胆大臣，智謀次官”，这是許多日本人对于新陆相和新陸軍次官的招揚。就資望学历方面来着，坂垣征四郎实在輪不到跳上陸軍大臣的高位。那末，他到底憑什么現在突然官运亨通呢？关于这，我們必須牢記着坂垣在我們国土上所干的血腥的史蹟。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賢二，这三个有名的侵略陰謀家，当时正碰在一起，“九一八”事变，正由这所謂“关东軍三羽鳥”所領導而成。“三羽鳥”的主腦便是坂垣、石原莞尔担任策划，土肥原担任煽惑，而坂垣則綜其成。事变發生时，日本国内似乎有些彷徨不决，首先喊“立刻进击”的，也正是坂垣。“九一八”事变后，坂垣一度任沈陽特务机关長。一九三二

年八月升少將，回国做几天參謀本部部附，即被派赴国外考察，遍
历欧、美、南洋及印度等許多地方，增長他不少的知識。一九三
四年一月回国，八月再插足我东北，做起伪“滿”軍政部最高顧
問。伪“滿”一切的設施，多半由他导演，他自名为“滿洲国”之
父。一九三六年三月，更升任关东軍參謀長，而列入中將級了。
林銑十郎組閣时代活动陆相失敗后，接着，他被任为第五师团
長，去秋我全面抗战發动，坂垣赴华北指揮作战，平型关一役，
曾遭我八路軍林彪將軍的痛击。今年（一九三八）三月底四月初
台兒庄大会战，磯谷、坂垣兩师团又被我慘敗。不过，坂垣虽遭
受兩次的敗蹟，然而他的一双血手，却始終該为我們所惊惕。屠
南口，屠太原，以至屠徐州的都是他；还有一点不可忽視的，伪
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所串演的种种傀儡戏，也有不少出自坂垣之
手。坂垣既干过以上長时期的侵略生涯，……因此，被目为猛烈
法西斯的、少壯派中坚的、大陆派主腦的“中国通四大天王”（坂
垣、土肥原、磯谷、岡村）首席的他，出掌中央軍权，实在不足
惊異。

坂垣任关东軍副參謀長时代，东条是关东軍宪兵司令官；坂
垣任关东軍參謀長时代，东条是副參謀長；当坂垣轉任第五师团
長，东条便升任关东軍參謀長。显然，坂垣和东条是有历史的因
緣的。而且他倆人又是同乡，同为岩手县人。但坂垣和东条的个性
却完全相反，坂垣是陽性，东条是陰性，坂垣是寬容的，东条是
严正的；坂垣好像一把鈍重的鈍子，东条却像鋒利的刺刀。然
而，这兩种相反的性格，却反而促成兩者截長补短的合作，坂垣
也像信任石原一般信任东条，东条也像石原一般了解坂垣，这就
是兩者狼狽为奸的搭当。他們在关东軍任內，所謂“軍令的坂

垣、石原”，“軍政的坂垣、东条”。石原和东条，在內策划，坂垣即憑着他的胆魂出头去干。坂垣过渡放縱的短处，也正为东条的严肃厉正所补消。他們兩人是慣演双簧戏的，往往一严一宽，一打一撫，下級官兵就这样給他所收买了。东条軍政上、軍路上的特殊的才干和智慧，在日本是相当有名的，由他再来配合貌温順而心狠毒的坂垣，將是無惡不作了。（麦逸：“坂垣和东条”，“世界知識”八卷四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松 井 石 根

松井石根，因为一方面他是“大陆政策”的忠实的遂行者，他方面又因为他在陸軍部內唯一的“支那問題的先輩”，所以他在部內还卵育了大批的青年侵略家，这批青年軍人受了他的薰陶，繼續在中国国内干了許許许多多的工作。这批青年冒險家之內，著名的人物有坂垣、土肥原、磯谷、多田、喜多、根本、影佐、和知、永津等。

松井在第九屆日本士官学校畢業后，便进到陸軍大学入A班，准备做駐欧美的武官，但是不久他就轉到B班，專心于中国問題的研究了。把他的履历来看，他前后滯华达十二年，其中一半的时间，在滬任駐华武官。他还过了二十余年的參謀生活，这当中他多在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內（日本參謀部第二部，即是中国情报部，專作中国研究的机关）供职。这就是他所以被称为日大將級里唯一的中国通的由来，也就是他这次被任为华中敌陸軍最高总指揮的主要原因。

松井是著名的“中国通”，但是我們更不能忘他是个最激烈的大亞細亞主义者。……田中义一首相，是灭华大陆政策的創造

人，这大陆政策，正是出于那时候才是个少将在田中内閣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大亞細亞主義者的松井石根之手的。（“危机四伏的日本”）（按：松井任华中侵略軍总司令，攻陷上海、南京后，以战略与当局不合，日政府派畑俊大代为总司令）

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按：他是有名的关东軍“三鸚”之一）是滿洲事变时作战的參謀主任，与坂垣刚成为不可多得的对手，是陸軍中的佐官与尉官層將佐所敬服，而且实际上直接地受其领导的人物。不久以前，他还是大佐，是陸軍參謀本部的作战課長，最近始升为少將，並升迁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陸軍部內，他是以研究拿破崙战术著名的，今年四十九岁了。有豪胆，有智略，有实行力及領袖的才能。同时对于經濟，亦有湛深的研究，有人称他是陸軍政治势力的基石。一九三三年，他协助松岡洋右出席国联大会，昂然倡議退出国联。在他任課長时期中，是陸軍的少壯派中的組織者，其一言一動，在下級干部軍人中，是足以發生直接的效力的。（王紀元：“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三六）

土肥原賢二郎

土肥原賢二郎，他是士官學校的學生，以后又进日本的陸軍大學。陸軍大學畢業之后不久，他即被派到中国，在北平受坂西利八郎的訓練。他在中国的社会層中生活很久，不仅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形，而且会說一口純熟的中国話。……在日本軍部里，他是一位有数的“支那通”。远在一九二〇年前，他便以“支那通”的資格在东北活动，他与坂垣等关东軍的首腦部，主持沈陽的特务机

关，同时，並任东北当局的顧問。自那时以后，中国北方的一切政治变动，他無不側身参預其間的。第一次的奉直战争，他在幕后活动。第二次的（一九二三年）的奉直战争，他也竭力援助奉方，把直系的領袖赶到江南。以后郭松齡倒戈，也是由他給奉方的帮助，消灭了郭氏的势力。这时，他在东北方成日本帝国主义操縱中国政局的主要代表人。

一九二六年以后，北伐軍的势力向長江进展，国民革命的潮流瀰漫了整个中国。他却竭力鼓吹奉直的合作，以便共同防“赤”。他干旋于張、吳之間，並向田中首相献計，策动了在北京举行的奉直會議。皇姑屯炸車事件爆發，他被人們深重的怀疑，以为这是由于他的主动。……后来九一八事变爆發了，土肥原以沈陽特务机关長兼沈陽市長而大肆活动。据說“九一八”事变时的一切陰謀，大都是出于他的計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进攻，他也是立在这个进攻的最前綫的。几年以来，他策动着侵略蒙古和进攻华北，在冀东伪自治和华北五省伪独立的風傳中，他是最有力的一个导演者。因为他的这种“汗馬功劳”，很快地被升任少將。……並一度赴华中、华南向中国各地当局游說，制造种种陰謀。随后他又升級中將。华北战事爆發后，他与坂垣一齐被任为师团長，馳騁于我国的原野上，大做其杀人放火的勾当。……而我們中国的大众，在慘痛的历史中，自然也不能忘記这一位“非常的人物”的。（“危机四伏的日本”）（按：土肥原于徐州失陷后又不当师团長了，仍做其特务工作，現有失势之說，尙待証明）

阿 部 信 行

坂垣系的阿部信行，是現在十三个大將中的一个。但是阿部

的官运是不佳的，随着宇垣的下台，宇垣派（滅軍派）的失势，阿部不得不离开京师，出任第四师团长。接着轉任台湾司令官，昭和八年升为大將。到岡田內閣倒台时，他曾是一員有力的陸軍大臣的候补者。他是有名軍人出产地石山县人，士兵学校砲兵科畢業。同年級中有眞崎、本庄、松井、荒木几个著名的侵略者，为日本軍人所称道。敌人进攻华南，为何要他来統率呢？解答这个问题，是确与日本政治上的变化有关联。侵略战争爆發之后，显然的，長期明爭暗斗的日本軍部，也因客观环境的推进，漸漸溶合起来了。第二个理由，阿部畢竟是一員老將，同时，也算是有統率三軍人望的一員。何况阿部对华南曾經考察过的，而且与东战場的松井，又系亲友，还有这些許多方便呢？（“危机四伏的日本”）（編者按：日寇进攻广州时华南总司令是古庄千次郎，攻下广州后，日軍部又以安藤利吉中將代古庄，以迄于今）

磯谷廉介

磯谷廉介是有名的在支（中国）武官，曾任过在支特殊情报部長，公使館武官等，一向是積極侵华的主張者。在武官时代曾严格批評政府对华軟弱的态度。生于东京，陸軍大学第十六期畢業，滿洲事变前任关东軍參謀，北支协定（按指塘沽协定）以日本全权代表資格，結成侵略条約。（柳仁：“日本軍部与法西斯蒂”）

香月清司

香月是明治三十五年陸軍士官学校第十四期畢業生，初服务第十三联队，常参加日俄战争。在陸軍省做过副官及兵务課長，

在軍隊方面做過中隊長、聯隊長、旅團長及第十二師團長，又任過陸大的兵學教官及步兵學校的教育部長。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後，近衛師團長橋本虎之助以責任關係免職，陸軍省派他繼任遺缺。今年（一九三七）二月間，任教育總監部本部長。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就轉調駐屯軍，來接替田代。他臨行前，與陸相杉山元、次官梅津美次郎、軍務局長凌官淳，及新聞班長秦彥三郎幾個人曾開過一個極短促的會議。會議畢，即飛朝鮮轉錦州（原定轉長春）來津，與朝鮮軍及關東軍有過一番接洽。他做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現在是第二次了。“一二八”滬戰吃緊時，就在他前次的任期中，他賦使漢奸組織便衣隊，擾亂天津，以分散我方對滬戰的注意力，並以淆惑人心，這就是所謂“津變”。後來士肥原挾溥儀潛伏東北去充傀儡，他也是個幫手。他是荒木派人物，性格謹嚴。歐戰後曾留學法國五年，為現時步兵戰術的權威者。平時飲酒賦詩，有儒將的風度。這次奉派來華，是在蘆溝橋事件剛發生後，時局緊張，陸軍當局的所以特意點中他，看了上面的經歷，可以想見，為的是要指導作戰並使一切應付計劃更趨堅實。（叶秋：“華北日駐屯軍的少壯幹部”“世界知識”六卷十期，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按：香月現在平漢綫指揮敵軍與八路軍作戰）

梅津美次郎

陸軍的現陣勢，寺內以下最惹人注目的是居于幕僚長的地位次官梅津中將（讀者當不忘記他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件的主角！），梅津是一個架了石橋才渡河的，用心老到而深謀遠慮的軍人，他擔任着寺內的輔佐，成了現在軍部的中心，寺內十分信賴他。不

仅軍部对于內政問題，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問題，他以中樞的地位，統轄部內的各局，發揮了罕見的活躍，甚至从政党方面也听到“梅津好”的褒獎。（碧泉：“火事船中的日本”，“东京通訊”頁一九）（按：梅津于七七战争爆發时起，在寿內寺一下任平津軍司令，現在則在杉山元之下任山西軍司令）

桥 本 群

桥本羣少將，他畢業于陸軍士官学校及陸軍大学，習砲科。宇垣时代的軍縮案，就是他所草拟的。当时反宇垣派对他也深不滿，宇垣失勢后，他不得志者多年。近年来变成了統制派的人物，历任陸軍省軍务局軍事課員及課長（林銑十郎陸相时代）；陸軍通訊学校研究部部員、陸軍省軍需審議會委員、鎮海要塞司令官，去年（一九三七）八月調充現职，以迄于今。华北駐屯軍參謀長一职，向来由大佐銜人物所担任，去年（一九三七）随着駐屯軍的強化計劃实施后，司令官由少將銜改为中將銜，參謀長也由大佐銜改为少將銜了。桥本是永田鉄山下的份子，头腦縝密，善能处理大問題，于战术方面，也有特殊研究。他在华北駐屯軍中，与課長級的急进少壯派意見大不相合，他也制不住他們。

（叶秋：“华北日駐屯軍的少將干部”，“世界知識”六卷十期，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建川美次郎与桥本欣五郎

退伍軍人以右派运动指导者著名的，就是建川美次郎中將，“九一八”事变后右轉的赤松寬，听說即常奔走于建川門下。其次，以軍人資格而作右派政治活动的，还有桥本欣五郎大佐。記

得前年我們还可以在东京各車站站台的卖店櫃上，到处發見大紅封面的“大日本青年党”的宣言，著名領導者就是这位大佐橋本。在中日大战爆發前，每有演講会及座談会，总必發揮他那右派的怪調。現在不知何故，据說已少听到他的消息了。橋本大佐曾被召參加砲兵队，来中国作战，去年（一九三七）在蕪湖轟炸美艦巴納号，就是他干下的事情，因此他又被召回国了。（宋斐如：“日本‘革新’派的人物”，“世界知識”八卷二期，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米 內 光 政

在海軍方面，大臣候补者，有三位：末次正信大將，藤田尚德大將，米內光正中將，都是能够統制海軍的人物。米內光政中將襲高橋三吉之后，任联合艦队司令官，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务，海軍方面虽济济多士，也不容易找到适当的人物。他与齋藤实大將、山屋大將，樺內大將、及川中將、小野寺中將等，都出身于岩手。明治三十四年与高橋大將、藤田大將，同畢業于兵学校。今年五十八岁。他离开了兵学校之后，在日俄战争中，以少中尉階級在驅逐艦中參战，后任磐手艦長、第二艦队參謀長、第一遣外艦队司令官、鎮海要港部司令官等。其間还經驗了英、法、美、俄的外国生活。俄語很好，对于俄国文学造詣很深。（“米內光政中將”，鏡心摘譯，“文摘”一卷三期，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永 野 修 身

永野修身大將，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生于土佐高知县之

南新町，三三年卒業于海軍兵學校，三五年任海軍少尉官，以日俄戰功，賜功五級。后任第三戰隊司令部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練習艦司令官、軍令部部員。海軍兵學校校長，軍令部次長，橫須賀鎮守府長官。昭和九年升大將，任軍事參議官。“二、二六”政變時，他方以全權代表資格退出倫敦軍縮會議。在返國途中，及抵東京，即受廣田首相請任海相。就任海相后，斷然舉行人事更動，免參加“國體明征”運動人員，如真崎藤次少將等，升高橋三吉、藤田尚德為大將，黜山本英輔諸人，使海軍之陣容整飭。日人以其出身士佐及富有魄力，稱為“今之坂本龍馬”。（家禾：“日本之軍部政黨與財閥”頁二三三——二三四）

末次 信 正

陸軍的荒木、真崎，海軍的加藤、末次，是被認為昔年的革新運動的主腦。可是，隨着時勢的變遷，至今仍能屹立于所謂革新的陣頭，擁有龐大勢力而睥睨四方的，就僅有末次一人。成為這新陣營中之巨頭的末次的勢力，是日趨增大，如今竟隱然成為這方面的領袖，而于海軍的中堅之下，獲得了熱烈的擁護者。但自“五、一五”事件（即犬養毅被刺事件）之后，海軍對自己的政治行動，加以檢束以來，其內部的勢力，已不若往年之盛。但其后，比及末次一躍而成為參議，成為內相，于是久乏主腦的革新陣營，便翕然地歡迎起末次來，羣相爭馳于他的麾下。尤其是內相這一位置，不但是一个統合官僚革新各派的好位子，更可以使政、黨、學界與右翼方面的聯系趨于密切，于是末次便不期然而被擁作中心。假如目前有“革新政黨”出現，則其黨首，恐怕會是末次的。末次是一个豕突狼奔的人物，就實力說來，他是革新

陣營中的第一人。假如他執掌大權，革新的路上，是不能容赦任何障礙存在的。（“日本法西斯陣營中人物”，水田清人著，張十方譯，“文摘戰時旬刊”四十七號，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一般的所謂“革新主義者”，是指那些既不是社會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而只浸淫于帝國主義、右翼主義、對外強硬主義的人們而言的。在這意義上，我們首先要推狹隘國家主義者的現在內相末次信正了。他之被指為所謂“革新派”，不自今日始，早在他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時代，即已膾炙人口了。當時，他常發出“美國不足畏”的豪語，他對於政治改革的意見，常為主張維持現狀的重臣所不寒而慄。自中日大戰爆發後，他隨日本政治機構的增設而出任內閣參議時，更加大放厥詞說：“即與英國一戰，也在所不辭，無論香港怎樣鞏固，在我空軍所到地方將成完全無用。”末次是這樣富於排外的誇大狂者，而右派皆支持他，所以在他大發狂言的三天後，即被近衛請去當內相。他這排英的精神，大引起歐、美各國人士的注意，他之被請為內相，完全是弱體的近衛內閣欲利用為所謂“革新政治的推進力”的用意。所以他就取後第四日，即對日本無產黨大加壓迫，實施人民陣綫派的檢舉，其鋒芒且及于自由主義者，以後日本的大檢舉事件連續發生，直至于今日。即連民政黨及政友會外圍組織的“防共護國團”暴行佔據兩黨本部的事件，也是這位內相暗中指使的，所以很受議會各派激烈的攻擊。（“日本‘革新’派的人物”（按：末次內相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下台）

長谷川清

長谷川清是日本海軍里有數的人物。向稱為太平洋的日本三

大艦隊之一的第三艦隊，就是由他指揮着。日本為滅亡我國，為用武力控制我沿海各岸，這責任完全放在第三艦隊的肩上，故此又稱為中國艦隊。第三艦隊是永駐中國海或長江岸的，平素借口是保護僑民，戰時如現在就一面封鎖我國海岸，控制我一切商業的交通；一面更利用日本特有的海軍，輔助空、陸軍向我進攻。故此長谷川清在這次戰爭上就愈其重要了。長谷川生在福井縣，海軍大學畢業後，出任美國大使館副武官。回國後任橫須賀鎮守參謀長，並海軍工廠長，日內瓦軍縮會議全權代表。日俄戰爭時代他曾在三笠艦上為“皇國”立下功勳。在過去幾年中，他在侵略我國每次事變中佔着主要的一員。（柳仁：“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頁三〇）

三井與岩崎(三菱主人)

居住在日本的七千萬人民，他們的命運是完全握在日本“五大”銀行的手中，而隱藏在幕後的操縱者却只是兩個人：三井男爵——三井家的族長，和岩崎男爵——三菱家的族長。所有那些煌煌將軍們的贊美合唱班——不論是荒木或香月的，實際上僅只是三井和三菱的宣傳員，連名譽帶良心一齊都出賣給這日本不冠之王的奴僕而已。三井和三菱的財富，壓碎了日本的民眾；三井和三菱的大砲和機關槍，對准了滿洲開放；三井和三菱的家丁正在屠殺中國的婦孺；三井和三菱的飛機正在轟炸和毀滅中國未設防的城市。三井的朝代已經延續了差不多三百年。三井在日本自成為一個國家里的小朝廷。三井家的財富，據兩年前的估計，就已經超過了十五億元。因其銀行和其他企業組合而掌握了二百四十個公司，資本共達六十億元。三菱公司岩崎個人的財富是超過了

十億元。而三菱家所統治的企業，也有九十二個，資本總額共達三十二億五千萬元。在華北作戰的“皇軍”，實際上只是為了三井和三菱的利益而賣命。日本對華的投資，華北紡織業和煤礦的一半以上，就已經抓在三井和三菱的手中。不僅只是軍閥們可以在三井和三菱的走廊里碰得到，因為這兩巨室選擇來作為他們僕役的範圍是很廣的。三井便很慷慨的支持着政友會。因着三井銀行的信用，政友會便在東京的中心設立了一個很安適的總部，盡量的做着監督和辦理賄買選舉票的工作。由三井出錢，每一張農民的選舉票，固定的價格是一元到二元；市民的議員選舉票則是八元到十元。岩崎在這方面也不能比他的同伴落后。三菱家也有他馴養着的政黨——民政黨。有了這麼一個后台，民政黨也不會感到經濟的拮据。三菱支配這個黨，也正如三井的支配政友會。荒木的優美的頌讚歌，便常常在大倉信託公司和大倉銀行的會計處，莊嚴的發出來。平沼男爵——一個思想上和希特勒極其相似的人物，他常常能巧妙地利用着各種機會和三井岩崎接近，因為他同時又是日本帝國樞密院的副議長（後為議長，現為內閣總理）這兩位神聖日本使命的標準負責人，對於三井、三菱和大倉的青眼看待，感覺到很大的榮幸。（“三井與三菱——日本的真正統治者”，雷生譯，“世界知識”七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久原房之助

二年以前，曾經轟轟烈烈的發表過革新理論，而現在不得不沉默的久原房之助，也值得略為一說。久原是日本“二、二六”事件的关系者，以前極力主張過“皇道經濟論”，及“一國一黨論”，但自

从参与“二、二六”事件的嫌疑以来，即持谨慎的态度。他今年已经七十岁，当此右翼势力膨胀的今日，也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鮎川 又 介

鮎川和松岡同乡，同是山口县人，年龄也相等，现在都是五十九岁。同时，鮎川也是穷出身，充当过学校里的书僮。他的靠山是“裙带”，因为他有着多方面的实业界红人的亲戚。他的母族是明治维新功臣井上馨侯的姪女，他的妻子是高岛屋总董飯田藤二郎的女儿，他的妻妹嫁给日比谷银行董事日比谷祐藏，他的弟弟过继给藤田合作会社的藤田太郎做养子，他的姊姊嫁给曾任三菱总理的本村久寿弥太，他三个妹妹，一个嫁给貝島合名会社貝島太市，一个嫁给日本証券保有社長近藤真一，一个则嫁给大名鼎鼎的久原財閥首腦久原房之助。所以在日本经济界里，鮎川是向来兜得轉的。鮎川曾畢業于东京帝国大学机械科，一九〇五年他到美国去研究鑄鍊金屬的技术，一九〇七年便帶了不少技术回国，得井上家的帮助，創立鑄物会社。一九〇八年为購办机器及加深研究，再度赴美。一九〇九年回国后在九州設立了鑄物工厂，旋成立戶畑鑄物株式会社，受久原、貝島、藤田各家的帮助和扶掖，获得迅速的發展，其中又以久原房之助的退隐，鮎川接受了久原鑄業会社。一九二八年並將久原鑄業改組，成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即所謂“日产”。經积极發展的结果，“日产”遂即一躍而凌駕住友，仅次于三井、三菱的日本第三位大康采命。“日产”康采命的支配網，是遍及鑛山業、机械制作業、汽車業、树膠業、火柴業、化学工業、电气業、水产业、农产业、食糧品工業等各个

經濟部門，特別是軍需上的重工業，尤為“日產”包辦了不少。就資本金而觀，“日產”本身達二億二千五百萬元，直系支配會社五億元，旁系支配會社一億三千萬元，合計資本總額八億五千餘萬元之巨，確實相當驚人。但有一點是特殊的，它沒有獨自的金融資本，並不跟銀行、保險公司、信託公司等直接相結合，它所有的只是純粹的產業資本，一般人稱“日產”為非完全綜合性財閥，所以，它的股票是公開的，它必須從各社會層去吸收資金。“日產”股東達五萬人，連直接間接所支配的，共達十萬人，它形式上（但也只有形式上）沒有像三井、三菱之被一門一閥所把住；因此它就容易討得軍部的歡心，成為頭等的親軍財閥。鮎川義介跟軍部密切的勾結起來，抽筋括髓吸收中小資金，去製造侵略戰爭用的殺人的利器。“日產”王國已于去冬（一九三七）遷都到偽“滿”，除間接的旁系產業仍存留于日本國內外，“日產”全部遷到滿洲，改設“滿洲重工業會社”。從此，由“日產王國”演化出來的“滿洲重工業會社”，將支配偽“滿”全部重工業，盡其榨取我東北的最大任務，而“滿鐵王國”則反退居于輔助地位了。（鄭森禹：“松岡和鮎川”，“世界知識”八卷六期，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石原 廣 一 郎

財閥人士，由於其本質，因而不易成為“革新”的人物。不過其中亦有少數例外，其代表者，就是石原廣一郎。石原從事於購買馬來半島的鐵礦，輸入國內，更於海運及南洋其他方面，經營有種種事業，積有相當的資財，究竟為什麼他會投入於“革新”運動呢？雖這不得而確知，不過，大概是由於事業的關係，他於海軍

人士中，有着不少的知己，因而受这方面的感化吧。田中重大將任總裁的“明倫會”，其大部份的經費，便是石原所負擔。此外，石原更與大川周明以至右翼的一些巨頭廣有交遊，供給過相當的資財，成為“革新”陣營中一個主要的富源。苛刻的批評家，認為向革新派供給資金，也是一種投資，它甚且可以估計到怎樣的利潤。（“日本法西陣營中人物”）

馬場 鑓一

馬場鑓一，東京人，為山本時光的長子，生於一八七九年十月，以後為馬場兼底養嗣子，改名為馬場鑓一。明治三十六年，在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隨即投身政界，歷任稅務監督局事務官、稅關監督官、統監府書記官、財政監察官、法制局參事官、法制局第二部長等。……田中內閣時代，被任為勸業銀行總裁，在金融界佔了重要的地位。他的辯才很好，富有政治活動力。……和青木信光同為研究會的重要份子，所謂“馬場的理論，青木的智慧”。……他在貴族院中，的確具有非常的勢力，此外他和軍部、財閥、政黨都有往來。

當廣田拜受組閣大命之後，最初是以吉田茂和川崎卓吾二人為組閣的參謀，但因軍部意見發生阻礙，馬場乃代吉田而起，與川崎共為組閣之參謀，以其臨機應變的才氣，在各種勢力之間，發揮其調和的手段，他從駭濤驚浪中，使廣田內閣走上平安的道路。（“危機四伏中的日本”）

結城 丰太郎

結城丰太郎，山形人，今年六十一歲。明治三十二年，畢業

于帝大法科政治科，便进了“日銀”。……昭和五年，由于井上准之助的推举，任“兴銀”总裁。一直到现在“兴銀”在产业界中佔有極大的势力，是由于他的努力；因此，他的地位，便成了乡誠之助以后金融界的領袖。

馬場以后的大藏大臣在金融界中去找，誰都推結城为第一个适当的人。……林內閣，大家說是弱体内閣，或者說是兼攝內閣，只有藏相是其中的明星。（“东京舞台的要角結城丰太郎”，鏡心譯，“文摘”一卷三期）

池田成彬

池田是三井財閥的总帥。从青年时代起，池田个人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三井整个历史的側面。一八九三年，池田剛二十七岁，他縱橫日本經濟舞台的历史，也就从那时开始。当时三井的支配人是中上川彥次郎，池田被任为足利支行行長。中上川是以重用少壯人材出名的，池田成为中上川最亲信的少壯謀將之一，后来还变成他的女婿，帮助他扩展三井業務，尽了很大的力，而池田的英敏、果断，以至“少說話多做事”的个性，也接着出名。他曾經奉派到欧、美去考察金融事業，达二年之久，对于統制經濟，發生很大兴趣。归国时，他提出了浩大的报告書，后来三井銀行及三井其他業務的革新，多依照他的計劃而行的。中上川死后，池田繼續帮助了早川千吉郎、益田孝、团琢磨等，把三井散漫的事業統合起来，把古旧的三井逐漸近代化。引导日本資本主义發展到最高阶段。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他再度外游，从欧美特別意大利方面，他更清楚認識了金融資本和政治的密接不可分离的关系。他醉心于強力統制主义、金融寡头主义。一九三二年三

月，团琢磨被極端右傾暴徒所杀，池田繼任三井的常务理事長。团氏之死，以及連接而起的“五、一五、”大养毅被杀事件，給池田又多一層刺激，使他益發感觉到改換方向的必要了，所以接着，三井事業方針来了一个大轉換，如以三千万元巨資設立所謂“三井报恩会”作为公共事業和社会事業資金，开放三井直系的一部份事务，股票公开，施小惠于中小資本家，及三井一族逐漸在表面上退出第一綫等等，借以緩和反財閥的極端过激主义者的情緒，一般称三井这一轉向，是“伪装工作”。池田自身呢？为了怕做团琢磨之續，經常穿了保險馬甲。一方面則拉攏平沼系法西斯团体的国本社，而且做該社的理事。同时，通过国本社而跟一部份青年將校握手。又和軍部合法革新派智囊永田鉄相結託，支持林銑十郎的肅軍。这样的做法，正表现出这狡猾的老財閥的政治手腕。軍部以及比較穩健的法西斯派，对池田具有相当好感，决不是偶然的。只是直覺的極端法西斯份子依然不能諒解他，始終把他列在“应处死刑”的名單上。头脑冷靜的池田。採取不求露面的实际主义，所以他宁願在他后輩結成丰太郎之下任日本銀行總裁，而負实际指导結城財政之責。近衛組閣时，他又以病不胜任为理由，謝却出任藏相，而隨時指示賀屋、吉野以应走的路。去秋任內閣參議之后，池田更隱然成为賀屋、吉野財政經濟的后台顧問了。但时至今日，賀屋、吉野当战时財政經濟的第一綫，到底也不胜任。目前被認為日本“財宝”的有二个，一个是乡城之助，一个便是池田成彬。乡城之助是保守財政的領袖，当然不为軍部法西斯所欢迎，所以挽救日本財政經濟之“最后一張牌”，也只有池田了。（郑森禹：“池田成彬”，“世界知識”八卷二期，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津田信吾

实际上，却也有几个站在对外企业的立场上表示强硬的伙伴。第一个，我们应举津田信吾。津田原是自由主义资本家曼乞斯特派武藤山治的“干儿”。他之变成“革新派”，固由于武藤之死，但也未免有点奇突。他是在由英日棉业战产生的日印会商的当时，突然变成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者。一九三二年日印会商的时候，他一变其拜英主义的面孔而痛击日本外交界之软弱，主张对英强硬，直至今日依然坚持着他的主张。因为“革新派”就是侵华主义者，所以当芦沟桥事变发生，当时政府、财界乃至军部的一部份主张“就地解决”、“不扩大主义”的时候，这个家伙的态度却完全两样，他在事变的第三日即向全国的工厂宣传事变的扩大必然性，并促他们觉悟。以后又继续执笔写“华北经济的展望”，“列国干涉与中日事变”，“需要中日全面的决战”，及“国民殉国是奉公，是我国民的觉悟”等煽动的论文，他特别狂喊“百亿军费不足畏”，俨然是一个军部的代言人。他还把年来的抗英言论，再三运用于这次的事变中。他提倡在华北确立日本的棉花国策及羊毛国策；主张于纤维工业以外，还进行多角的经营，大倡其“为国策不计损失”的假慷慨论调，大拍军部的马屁。（“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十河信二

其次，还可以举兴中公司社长的十河信二来说。十河的活动方式，和津田信吾有点不同。他的“革新”行动的据点，安置在日本政府上，是其以实业家活动式的特点。提起兴中公司，不

过是滿鉄公司的子公司。以前說到十河信二，即連新聞記者也都少有知道的。他之成了記者的常識，是自林銑十郎組閣的時候起。当时十河是林首相組閣本部的參謀。普通組閣參謀都是由政客或官僚充当的，而十河却以實業家而当了林大將的組閣參謀，一般人皆吃了一驚。但是当时十河以关东軍及軍部一部份強硬派軍人為背景，企圖強行所謂革新政策。他曾經企圖以陸相交椅授坂垣，海相交椅授末次，欲林銑十郎迫当时的軍部承認。但是軟弱的林銑十郎的提議，完全受寺內駁回；在林銑十郎倒無所謂，氣憤的十河，認為“這樣的弱體內閣不足與謀”憤然離開組閣本部，據說從沒有再見過林銑十郎。這個傢伙態度的強硬和侵華的急進，竟然實現在今日，坂垣当了陸相，末次更是当了內相。他現在專以華北為活動的舞台，興中公司將成了積極經濟侵略的大本營，是無疑義的，這個傢伙的“革新”動向。更是值得注意。（“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松 岡 洋 右

松岡洋右，是被右翼份子景仰的。他在出席國聯以前，集軍部各派的支持于一身的時候，即已被數為右派的巨頭之一。他在辦理脫離聯盟手續上，色彩更加顯明。歸國後奔走于政黨解散運動，立場遂大確定。当时的政黨嘲笑松岡洋右的消滅政黨思想，但是現在的政治現實，却照他的預想進展着，他的預言竟不幸而中。松岡洋右是現在南滿鐵路公司的總裁，他計劃將日本的重工業移植于滿洲，他還在陰謀開展華北，可以說是一個對華經濟侵略的急先鋒。也正是因为這個原因，所以軍部和財閥都相當器重他，他的革新思想將在日本上層起相當的作用。（“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町田忠治

町田忠治（民政党总裁），文久三年生于秋田县，大学预备門畢業，由日本銀行轉为三井銀行大阪分行主持人。明治四十五年以來，当选八次議員。大正四年任农商务省参政官，大正十四年任农林大臣，昭和四年再度为农相，昭和九年任商工大臣，現任民政党总裁。（“各党首腦，”和譯，“文摘”二十六年五月号）

政友会四巨头——鳩山、前田、島田、中島

鳩山一郎，明治十六年生于东京，四十年畢業于东京帝大法科設立法律事務所，当选八次議員。昭和六年，被任为文部大臣，又被任为东京市議会議長，政友本党总务委員及政友会干事長。政友会鈴木总裁辞职后，与前田、島田、中島任四头委員，代行总裁职，將來决定总裁时，鳩山是有力的第一候补。

前田米藏，明治十五年二月生于和歌山县，三十五年畢業东京法学院。复入东京外語法科，德意志协会学校德語高等科，畢業后执業律师。大正六年以來，历任七次議員。犬养內閣时任商工大臣，兼任資源審議會副总裁，政友会总务干事長等。又兼京成、电气、軌道等数公司重要職員。广田內閣中任鉄道大臣，現为政友会四头委員之一。是鳩山的有力的竞争者。

島田俊雄，明治十年六月生于島根县，三十五年畢業于东京帝大法科政治科，大正五年畢業于英法科。初为东京市官吏，历任教育課長、劝業課長等。派往英国归来，执業律师。明治四十五年以來，历任島根县选出議員七次，昭和六年犬养內閣时，任法制局長官，昭和十一年广田內閣时，入閣任农林大臣。他虽为政

友四头委員之一，但不是所謂總裁候补。

中島知久平，政治家而兼實業家。明治十七年生于羣馬县，海軍机关学校出身，不就机关大佐，而任飞行机制作所所長。昭和五年以来，历为羣馬县选出之議員，昭和六年十二月任商工政务次官，近为众議院議員，政友会总务；現任四头委員之一，与鳩山、前田同为有力的總裁候补。（“各党首腦”）

安部磯雄

安部磯雄，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員長，議員。庆应元年生于福岡市，明治十七年京都同志社畢業后，渡美。自明治二十四年起，四年間，就学哈巴脫神学校，週游欧、美回国。初为同志社教授，繼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昭和三年辞职。其間，于明治三十六年發起日本最初之社会主义团体“社会主义研究会”，至三十三年改組为“社会主义协会”，自任会長。三十四年与片山潛、幸德傳次郎、木下尚江、西川光二郎等，企圖組織“社会民主党”，受到打击。日俄战争开始，社会主义协会被解散，复任教职。大正十五年任劳动农民党顧問，繼为社会民众党中央执行委員會議長，昭和七年被举为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員長，昭和三年十一年兩次被选为議員，著有“社会問題概論”，“仍为社会主义者”等書。（“各党首腦”）（編者按：近兩年来領導社大党走向反动化的正是此公。）

安达謙藏

安达謙藏（国民同盟總裁）明治元年生于熊本市，在其故乡惜文学处修業，不久加入政界。后至朝鮮，为李王妃杀害事件嫌疑归乡，与佐佐木左房發起国权社。自明治三十五年以来，連任

十三次議員。其間又曾出任遞信大臣、內務大臣等職。昭和二年創立立憲民政黨，任總裁。昭和四年濱口內閣時任內務大臣，六年辭職。創立國民同盟，任總裁，以至今日。（“各黨首腦”）

望月圭介

望月圭介，慶應二年生于廣島縣，畢業于慶應義塾。自明治三十一年以來，當選議員十二次，望月是政友會的重鎮，在原敬內閣中任農商務省勅任參事官，昭和二年在田中內閣中任遞信大臣，翌年，任內務大臣。于昭和九年，岡田內閣中任遞信大臣，與內田、山崎、高橋創立“昭和會”，指定桶口典常、材路以及難波清等為干事，而自己做不出面的主持者。（“各黨首腦”）

中野正剛

在純粹的政客當中找所謂革新派，那末中野正剛可算第一個。他是一個徹底的革新主張者，自從去年赴歐洲會晤希特勒及慕索里尼以後，他的法西斯思想，更加尖銳化。在中日大戰前，政府及政黨，由他看來，甚至於連軍部也都還在固守着依賴歐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却在四五年前即已一貫地反對追隨歐美的外交方針，提倡抗英的外交。中野可說是一個激烈排外的革新者。中野不但理論是飛躍的“革新”，行動也是飛躍的革新。大家都預料着：若有“革新黨”出現，那末最先登台的一定是中野正剛。（“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小林省三郎

同樣地，小林省三郎與健川一道深入于林內閣，並與宇垣大為接近。自是而後，他于青年革新層中的威望漸減。其間小林省三郎的勢力，却沒有低落，反而益為增大，這是值得注意的。身份

不过是大佐，討了一位法国女人做太太，經營过法日貿易，以其利益用作政治資金，竟于革新陣营中拿到大的势力。自解散三六俱乐部后，就以瑞穗俱乐部作基础。不过他与軍人出身的不同，他常常提供一些具体政策的研究，因而于一部份人中获得名望。（“日本法西斯陣营中人物”）

鹽 野

假如認為鹽野只是一位法官，那就大錯特錯。他拥力極大，具有过人的智謀胆略，成为平沼系的佼佼者，而將司法部及政界置于股掌之上。同时，更与軍部及右翼作广泛与深刻的聯絡，隱然拥有一大势力。他以革新派的“大立物”而繼承国本社的正統，不論于上層部份或民間，都广植可惧的势力。假如革新派結成政党，他当然会佔有重要的地位，或且会被推为党首。（同上）

秋 田 清

秋田清自命为革新派的巨头，不过假如秋田能够安居政友会的干部又如何呢？那时，他会以革新为愚蠢，而成为現狀維持派的选手了。听秋田的革新意見，就等于听猪肉店老板說佛經，無法入民众之耳。不过，他是一位“策士”，当他的手腕不变，他在政界上下的势力总不会消除。秋田所到之处，天下必乱。（同上）

大 川 周 明

大川周明是“五一五”事件以来，革新陣营中的一个“大立物”，不論就大陆政策言，或就国内革新言，其給与今日的大势以原动力的却是大川及其同志們。結合“大众学寮”，“犹存社”，“行地社”等組織中的少数同志，从事于青年指导及給与少壯軍人以激励，一直到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發生，于是革新运动乃浮露出表面

上来，大川是这时的指导者之一。于“五一五”事件曾被捕入狱，近年曾于大和俱乐部的名义之下，糾合了革新陣营中全部的巨头，儼然执这方面的牛耳。（同上）

头 山 滿

头山滿，現在已名聞国内外了，他是留着長鬚子的老头子，一个亞洲式的“託尔斯泰”兒，眼縫兒却窄窄的。他是一个現代化的佛教徒，酷爱玫瑰花，从不离开他的庭园一步。头山滿支配着六万人，个个都願为他赴湯蹈火。但是“玄洋社”的名字，只为創办者所熟知，如今已为通俗語言中較蹩脚、神祕和較适合于日本精神的名字所代替了，这就是“黑龙会”。（“黑龙会与头山滿”，小默譯，“世界知識”七卷三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出版）

抗战以来在华指揮作战的重要敌酋

第一，蘆溝桥事变初起时的指揮者是华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按：田代已死），七月中旬以香月清司繼任。后来派寺內寿一为总司令，去年五月后又以杉山元代寺內为总司令，直至于今。

第二，“八一三”上海战争的指揮官是松井石根，輔之以真崎甚三郎，南京攻下后以畑俊六代松井为总司令，武汉下后又换了山田一三。南京守將是本庄繁。

第三，最初窺伺华南的指揮官是阿部信行，进攻广州时是古庄子郎为华南总司令，当时的作战計劃听說是出于在广州失陷前一度来华的秩父宮殿下。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日本陸軍部發表以安藤利吉为华南总司令，古庄調任參謀本部附。

